



清华大学地区研究·译著 IAS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Translation

地区研究丛书·拉美系列

刘东·主编

# Americanos

Latin Americ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 美洲人 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

John Charles Chasteen

[美] 约翰·查尔斯·查斯汀——著 | 徐沛原 袁梦琪——译

A vivid and cinematic history structured around the extraordinary cast of characters who came together to create Latin American independence. Readers will find here a thoroughly engaging introduction to these "other" American revolutions.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宸星教育基金会  
Beijing Chenx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美洲人的独立之路，一部关于自由与梦想的史诗巨著  
从殖民地到民族国家，美洲人用血与泪书写自己的历史

为什么在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中，“美洲人”这个词具有重要意义？

拿破仑的欧洲战争如何影响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西蒙·玻利瓦尔是如何从一个年轻的贵族成长为解放者的？

拉丁美洲独立斗争中，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的人们是如何团结起来的？

拉丁美洲独立后，新建立的共和国是如何面对内外挑战并逐步走向稳定的？

## Americanos

Latin Americ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约翰·查斯汀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这部史诗般的叙述中，主人公们生动而迷人。除了常见的那些历史人物，如玻利瓦尔、伊达尔戈、圣马丁、若泽·博尼法西奥，还有一些出身平凡的有色人种男性以及来自各个阶层的女性，他们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巴巴拉·温斯坦，纽约大学

本书以其区域性和跨大西洋的广阔视角令人惊叹，它对重新评价拉丁美洲独立斗争期间的人民主权概念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见解。本书代表了叙事性历史的最佳水准。无论是学生还是专业研究者，都会很难放下这本生动的书。

——吉尔伯特·M. 约瑟夫，耶鲁大学

上架建议：世界史·  
ISBN 978-7-208-1



9 787208 190894 >

定价：75.00 元  
易文网：www.ewen.co

地区研究丛书·拉美系列

刘东·主编

# Americanos

Latin Americ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 美洲人

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

John Charles Chasteen

[美] 约翰·查尔斯·查斯汀——著 | 徐沛原 袁梦琪——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洲人：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 / (美) 约翰·查尔斯·查斯汀 (John Charles Chasteen) 著；徐沛原，袁梦琪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 (地区研究丛书 / 刘东主编). -- ISBN 978-7-208-19089-4

I. K7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PP8536 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设计 安克晨

地区研究丛书

**美洲人：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

[美] 约翰·查尔斯·查斯汀 著

徐沛原 袁梦琪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177,000  
版 次 202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9089-4/K·3404  
定 价 75.00 元

致美洲

## 总 序

### 展开地区研究的三根主轴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在一种并存着刺激与困扰的张力中产生的。它既然是以在中国尚属“新兴”的学科来命名，那么顾名思义，当然是顺应了“地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而这项研究在中国的应运而生，则又肯定是顺应了全球化的迅猛势头。——正是在这种方兴未艾的势头中，中国不光是被动卷进了全球化的进程，还进而要主动成为更大规模的“全球性存在”。就此而言，收进这套丛书中的著作，虽然将视线聚焦在了地球上的某一“地区”，但那都要隶属于环球视界中的特定“视域”。

不过，正如罗兰·罗伯逊所指出的，经常要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相伴生的，竟又是所谓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这不光从文化上喻指着，一旦遭遇到“麦当劳化”的夷平，就会激发与强化地方的认同；还更从经济上喻指着，由跨国生产与流通带来的重新洗牌，无论在一个社会的内部还是外部，都会造成新的失衡、落差、不公与愤懑。——正因为这样，反倒是全球化的这一波高潮中，人们才大概是不无意外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竟又以原以为“过了时”的民族国家为框架，利用着人类最基本的自卫本能，而煽起了民族主义的普遍排外逆流。

其次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也是在一种“学科自觉”的批判意识中产

生的。这种批判意识的头一层含义是，正是成为“全球性存在”的迫切要求，才使我们眼下更加警觉地意识到，再像传统学科那样去瓜分豆剖，把知识限定得“井水不犯河水”，就会对亟欲掌握的外部世界，继续造成“盲人摸象”式的误解。正因为这样，我们想借这套丛书引进的，就不光是一些孤零零的研究结论，还更是一整套获致这类结论的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相对集中优势研究资源，来对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调动各门学科，并且尽量促成彼此间的科际整合，我们就无从对于任何复杂的外部区域，获得相对完整而融汇的有用知识。——不言而喻，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中，“地区研究”既将会属于人文学科，也将会属于社会科学，却还可能更溢出了上述学科，此正乃这种研究方法的“题中应有之意”。

接下来，这种批判意识的第二层含义又是，尽管“地区研究”的初始宗旨，当然在于有关外部世界的“有用知识”，而一俟这种知识落熟敲定，当然也可以服务于人类的实践目的，包括作为出资人的国家的发展目标，不过与此同时，既然它意欲的东西堪称“知识”，那么，它从萌生到发育到落熟的过程，就必须独立于和区隔开浅近的功用。无论如何，越是能争取到和维护住这样的独立性，学术研究的成果就越是客观和可靠，越足以令读者信服，从而也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不言而喻，又是在这样的理解中，率先在中国顶尖大学中建立起来的“地区研究”，虽则在研究的国别、项目和内容上，当然也可以部分地与“智库”之类的机构重叠；然而，它在知识的兴趣、理想的宗旨、研究的广度、思考的深度、论证的独立上，又必须跟对策性的“智库”拉开距离，否则也就找不到本学科的生存理由了。

正是基于上述的权衡，我在清华大学地区研究院的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向各位同行当面提出了这样的考虑——我们的“地区研究”应当围绕着

“三根主轴”：第一，本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第二，在地的语言训练与田野调查；第三，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毋庸置疑，这“三根主轴”对我们是缺一不可的。比如，一旦缺少了对于本国文化的了解与认同，从而无法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就不仅缺乏学力去同外部“地区”进行文明对话，甚至还有可能被其他文化给简单地“归化”。再如，一旦缺乏对于国际“地区研究”的广阔视野，那么，就会沦入以往那种“土对土”的简陋局面，即先在本国学会了某一个“小语种”，再到相应的“地区”去进行综述性的报道，以至于这种类似新闻分析的雏形报告，由于缺乏相应的学术资源、知识厚度与论证质量，在整个大学体系中总是处于边缘地带，很难“登堂入室”地获得广泛的认可。

关于这种所谓“小语种”的学科设置，究竟给我们的知识生产带来了哪些被动，我上次在为“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作序时，就已经以“日本研究”为例讲过一回了：

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与被动，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五十年代的外语教学，曾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六十年代中苏分裂以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关冷门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sup>[1]</sup>

---

[1] 刘东：《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有鉴于此，为了让我们蓄势待发的“地区研究”，能真正摆脱以往那种被动的局面，既不再是过去那种边边角角的、聊备一格的国别史，也不会是当下这种单纯对策性、工具性的咨询机构，也为了能够让它所获得的学术成果，最终能被纳入公认的学术主流，进而成为人们必备和必读的文化修养之一，我才提出再来创办一套“地区研究丛书”。当然，如果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我以往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也都属于海外，特别是美国的“地区研究”，具体而言，是属于“地区研究”中的“东亚研究”。于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套丛书亦正乃以往努力的延续。另外，考虑到美国的“地区研究”虽说无所不包，甚至还包括哈佛设立的“美国文明”项目，也即还要包括用来反观自身的“本国研究”，可毕竟它那些最富成果也最具功力的领域，还要首推其中的“东亚研究”“中东研究”和“拉美研究”。既然如此，我们这次就先行推出两个“子系列”，即“地区研究·中东系列”和“地区研究·拉美系列”。——如果再算上我以往主编的两套“东亚研究”，那么或许也可以说，这大概是美国“地区研究”的主要精华所在了。

最后，尽管在前文中已经述及，但行文至此还是要再次强调：在我们规划与期望中的，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全球关怀的“地区研究”，必须围绕缺一不可的“三根主轴”，即第一，本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第二，在地的语言训练与田野调查；第三，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在这套丛书中引进的，就属于对于那“第三根主轴”的打造，也就是说，它既会形成学术对话的基础，也将构成理论创新的对手。也就是说，一旦真正展开了这种学理形态的对话，那么，“前两根主轴”也势必要被充分调动起来，既要求本土经验与价值的参与，也要求在地调查的核实与验证。由此一来，也就逻辑地意味着，对于既具有强大主体性又

具有亲切体验性的，因而真正够格的“地区研究家”来说，无论这些著作写得多么匠心独运、论证绵密、学殖深厚、选点巧妙，也都不可能被他们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了，否则，人类知识就无从继续谋求增长，而学术事业也将就此停滞不前。

不过话说回来，不会去“照单全收”，并不意味着不能“择优吸收”。恰恰相反，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从这套书逐渐开始的、逐字逐句和恭恭敬敬的移译，恰恰意味着在起步阶段的、心怀诚敬和踏踏实实的奠基。也就是说，从这里一砖一瓦缓缓堆积起来的，也正是这个学科之标准、资格与威望的基础——当然与此同时，也将会是我们今后再跟国际同行去进行平等对话的基础。

刘 东

2019年8月28日于青岛海之韵

## 人物表

按字母表顺序

卢卡斯·阿拉曼 (Lucas Alamán), 生于 1792 年——墨西哥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格雷罗的对手

伊格纳西奥·阿连德 (Ignacio Allende), 生于 1769 年——伊达尔戈的副手

卡洛斯·德·阿尔韦亚尔 (Carlos de Alvear), 生于 1789 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贵族

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 (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 生于 1763 年——巴西开国元勋之一; 有安东尼奥·卡洛斯 (Antônio Carlos) 和马蒂姆·弗朗西斯科 (Martim Francisco) 两个兄弟

何塞·阿蒂加斯 (José Artigas), 生于 1764 年——进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主义者领袖

胡安娜·阿苏尔杜伊 (Juana Azurduy), 生于 1781 年——上秘鲁爱国者游击队领袖

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 (Manuel Belgrano), 生于 1770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者, 于上秘鲁被击败

安德烈斯·贝略 (Andrés Bello), 生于 1781 年——出生于加拉加斯的

文学家，长期居于伦敦

威廉·贝雷斯福德（William Beresford），生于1768年——指挥了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对葡萄牙战斗的英国军官

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生于1783年——五国解放者

托马斯·博韦斯（Tomás Boves），生于1782年——平原枪骑兵军队的西班牙统帅，击败了玻利瓦尔

费利克斯·马利亚·卡列哈（Félix María Calleja），生于1753年——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的主要对手，后来成为（新西班牙）总督

卡洛斯四世（Carlos IV），生于1748年——西班牙国王，退位给其子费尔南多七世

卡洛塔·华金纳（Carlota Joaquina），生于1775年——费尔南多的姐姐，嫁给了葡萄牙的若昂六世

哈维拉·卡雷拉（Javiera Carrera），生于1771年——智利杰出爱国家庭的一位女性

何塞·米格尔·卡雷拉（José Miguel Carrera），生于1785年——哈维拉的弟弟，贝尔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的主要对手

胡安·何塞·卡斯特利（Juan José Castelli），生于176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者，于上秘鲁被击败

托马斯·亚历山大·科克伦（Thomas Alexander Cochrane），生于1775年——智利和巴西海军上将

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生于1784年——西班牙国王，被俘期间被称为“被期望者”

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生于1766年——使巴拉圭独立的独裁者

曼努埃尔·戈多伊（Manuel Godoy），生于1767年——被世人唾弃的

西班牙女王情人

比森特·格雷罗 (Vicente Guerrero), 生于 1783 年——新西班牙起义的第三大领袖

米格尔·伊达尔戈 (Miguel Hidalgo), 生于 1753 年——在新西班牙起义的激进牧师

亚历山大·冯·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生于 1769 年——普鲁士科学家、探险家和专家

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 (Agustín de Iturbide), 生于 1783 年——美洲军官, 自封墨西哥皇帝“阿古斯丁一世”

若昂六世 (João VI), 生于 1769 年——摄政王子, 葡萄牙国王; 后逃亡到里约热内卢

安东尼奥·德·拉腊萨瓦尔 (Antonio de Larrazábal), 生于 1769 年——加的斯制宪议会的危地马拉领袖

伊格纳西奥·洛佩斯·拉永 (Ignacio López Rayón), 生于 1773 年——锡塔夸罗洪达组织者

圣地亚哥·马里尼奥 (Santiago Mariño), 生于 1788 年——委内瑞拉的“东方解放者”

胡安·马丁内斯·德·罗萨斯 (Juan Martínez de Rozas), 生于 1759 年——智利爱国领袖, 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的赞助人

塞尔万多·特蕾莎·德·米耶尔 (Servando Teresa de Mier), 生于 1765 年——新西班牙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牧师

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 (Francisco de Miranda), 生于 1750 年——拉美独立运动先驱

贝尔纳多·蒙特亚古多 (Bernardo Monteagudo), 生于 1785 年——丘基萨卡 (Chuquisaca) 知识分子, 圣马丁的盟友

胡安·多明戈·蒙特韦德 (Juan Domingo Monteverde), 生于 1772 年——击败米兰达的西班牙将军

卡洛斯·蒙图法尔 (Carlos Montúfar), 生于 1780 年——洪堡的伙伴, 胡安·皮奥的儿子

胡安·皮奥·蒙图法尔 (Juan Pío Montúfar), 生于 1759 年——1809 年基多洪达首领

何塞·马利亚·莫雷洛斯 (José María Morelos), 生于 1765 年——西班牙起义的第二领袖

马利亚诺·莫雷诺 (Mariano Moreno), 生于 1778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洪达的秘书

巴勃罗·莫里略 (Pablo Morillo), 生于 1778 年——领导再次征服新格拉纳达的西班牙将军

安东尼奥·纳里尼奥 (Antonio Nariño), 生于 1765 年——起义者, 后来的新格拉纳达爱国领袖

贝尔纳多·奥希金斯 (Bernardo O'Higgins), 生于 1778 年——智利解放者, 圣马丁的盟友

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帕迪利亚 (Manuel Ascencio Padilla), 生于 1775 年——上秘鲁爱国者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 (José Antonio Páez), 生于 1790 年——玻利瓦尔在平原地区的盟友, 后来的对手

佩德罗一世 (Pedro I), 生于 1798 年——若昂六世和卡洛塔·华金纳之子, 宣布巴西独立

曼努埃尔·卡洛斯·皮亚尔 (Manuel Carlos Piar), 生于 1774 年——被玻利瓦尔处死的帕尔多将军

霍姆·波帕姆 (Home Popham), 生于 1762 年——英国海军上将, 于

1806 年袭击布宜诺斯艾利斯

马特奥·普马卡瓦 (Mateo Pumacahua), 生于 1740 年——1814 年库斯科城起义的印第安领袖

安德烈斯·金塔纳·罗 (Andrés Quintana Roo), 生于 1787 年——新西班牙爱国知识分子

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 (Bernardino Rivadavia), 生于 1780 年——独立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自由派总统

西蒙·罗德里格斯 (Simón Rodríguez, 也就是萨穆埃尔·鲁滨孙 [Samuel Robinson]), 生于 1771 年——厄瓜多尔革命者

曼努埃拉·萨恩斯 (Manuela Sáenz), 生于 1793 年——基多爱国者, 玻利瓦尔的合作者

玛丽基塔·桑切斯 (Mariquita Sánchez), 生于 1786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者 (后来的“门德维尔夫人”)

弗朗西斯科·德·葆拉·桑坦德 (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 生于 1792 年——玻利瓦尔在新格拉纳达的对手

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娜 (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 生于 1794 年——年轻的考迪罗, 曾帮助推翻阿古斯丁一世

何塞·德·圣马丁 (José de San Martín), 生于 1778 年——在瓜亚基尔 (Guayaquil) 隐退的解放者

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 (Antonio José de Sucre), 生于 1795 年——19 世纪 20 年代玻利瓦尔的得力助手

莱昂娜·比卡里奥 (Leona Vicario), 生于 1789 年——墨西哥城地下爱国运动的组织者

惠灵顿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生于 1769 年——拿破仑在西班牙战场上的英国对手

# 总 督

按出场顺序

新西班牙	秘鲁	拉普拉塔	新格拉纳达
伊图里加雷 (Iturrigaray) 1803—1808	阿瓦斯卡尔 (Abascal) 1806—1816	索布雷蒙特 (Sobremonte) 1804—1807	阿马尔·伊·波旁 (Amar y Borbón) 1803—1810
贝内加斯 (Venegas) 1810—1813	佩苏埃拉 (Pezuela) 1816—1821	利涅尔斯 (Liniers) 1807—1809	蒙塔尔沃 (Montalvo) 1816—1818
卡列哈 (Calleja) 1813—1816	拉塞尔纳 (La Serna) 1821—1824	西斯内罗斯 (Cisneros) 1809—1810	萨马诺 (Sámano) 1818—1819
阿波达卡 (Apodaca) 1816—1821		埃利奥 (Elío) 1810—1811	
奥多诺胡 (O'Donjú) 1821			

## 编年表

1799	洪堡开始他的美洲旅行
1806	贝尔斯福德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科罗
1807	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 葡萄牙王室逃离里斯本前往巴西
1808	西班牙王权落入拿破仑之手 西班牙君主危机开始；洪达在西班牙开始形成 墨西哥城举办公开市政会议，伊图里加雷被免职
1809	中央洪达协调抵抗力量反抗拿破仑统治 拿破仑征服除了加的斯以外的西班牙 谁应该统治美洲的辩论兴起 安第斯山脉的小叛乱：丘基萨卡、拉巴斯、基多
1810	加的斯议会成立和成立摄政政府 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和圣地亚哥成立各自的洪达 第一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派出的军队前往上秘鲁 伊达尔戈大军横扫新西班牙
1811	米兰达宣布在委内瑞拉建立独立共和国 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智利爆发内战 伊达尔戈被俘并处死；莫雷洛斯接任 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在上秘鲁的巴拉圭被击败 秘鲁成为西班牙重新征服安第斯山脉的基地 英国和葡萄牙军队从拿破仑手中夺回了葡萄牙

(续表)

1812	拿破仑放松了对西班牙的控制 加的斯议会颁布了自由宪法 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崩溃 莫雷洛斯在庫奥特拉战役幸存，占领了瓦哈卡城
1813	玻利瓦尔宣布“向死亡宣战” 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在上秘鲁再次败北 莫雷洛斯在围攻阿卡普尔科时攻势逐渐减弱
1814	费尔南多七世复位，废除 1812 年宪法，解散加的斯制宪议会 西班牙军队从秘鲁重新占领智利 被博韦斯打败后，玻利瓦尔被流放
1815	后拿破仑时代的西班牙派出再征服远征军主力 阿蒂加斯联盟团结起来迎战布宜诺斯艾利斯 若昂六世联合英国使巴西获得与葡萄牙同等的地位 莫雷洛斯被捕并被处决
1816	西班牙重新征服除了拉普拉塔以外的美洲
1817	圣马丁从门多萨穿过安第斯山脉到达智利 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东山再起 伯南布哥叛乱 (Pernambucan rebellion) 揭示了自由正在巴西“传染”
1818	格雷罗在新西班牙重新点燃了起义的火种 圣马丁准备袭击利马
1819	玻利瓦尔在博亚卡桥 (Boyacá Bridge) 获胜，控制了新格拉纳达
1820	西班牙和葡萄牙宪政革命 西班牙放弃了对拉美的再征服远征计划 圣马丁开始从海路入侵秘鲁
1821	里斯本制宪议会迫使若昂六世返回葡萄牙 伊图尔维德和格雷罗加入伊瓜拉计划，进入墨西哥城 中美洲加入伊瓜拉计划，宣布独立 玻利瓦尔在卡拉沃沃 (Carabobo) 获胜，而圣马丁在秘鲁受挫
1822	佩德罗王子宣布巴西独立，自立为皇帝 伊图尔维德宣布阿古斯丁一世为墨西哥独立后的皇帝 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在瓜亚基尔会面

(续表)

---

1823	极端反革命势力占领西班牙和葡萄牙 阿古斯丁一世被推翻，墨西哥成为共和国 玻利瓦尔的秘鲁战役打响
1824	佩德罗一世巩固了巴西帝国的权力 阿亚库乔 (Ayacucho) 战役，西班牙军队在美洲最终战败

---

## 前言：为什么叫“美洲人”？

主权人民万岁！

我们的时代终于到来……

——“美洲之歌”，1797年

为什么 *americanos*（美洲人）这个单词没有大写呢？为什么 *América*（美洲）有重音符号？“美洲人”，简而言之，就是指美洲的人民。有人可能认为“美洲”这个词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中的表达与英语中的表达一样，其实不然。对于拉丁美洲人来说，美洲从来就不是美国的代名词，美洲人也不是简单地指代美国人。在本书中，这一区别就显得尤为重要。本书中的“美洲”将被用来指代我们今天在英语中所说的拉丁美洲，包括所有曾经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过的土地；而美洲人则指代讲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人，而不是讲英语的人。

美洲和美洲人是拉丁美洲独立斗争中的关键术语。“美洲人”是一个通常仅指白人的术语。直到1807—1808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和西班牙引起美洲危机、到1825年尘埃落定，多年的流血事件改变了美洲人的含义，其范围延伸到原住民、非洲人和占人口大多数的混血人。正如爱国者、诗人和演说家所描述的那样，这种转变已经发生，他们将这场斗争称为“美洲事

业”，并号召所有美洲人参与。1797年一首名为“美洲之歌”的委内瑞拉地下革命歌曲的歌词在这场斗争之初呈现出新的含义：“我们的祖国在呼唤，美洲人，我们将一起摧毁暴君。”<sup>[1]</sup>

爱国者口中的“美洲人”被应用于指代墨西哥人、委内瑞拉人、哥伦比亚人、智利人、巴西人、危地马拉人、秘鲁人，以及其他与如今的拉丁美洲国家有关的民族身份。从现代墨西哥到阿根廷和智利，拉丁美洲独立斗争的爱国者构建了一个二元分界，将所有的美洲人与欧洲人（指在欧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分开。乍一看，这似乎并不起眼。毕竟，还有什么比大西洋造成的分隔更明显呢？美国不是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美洲身份吗？

然而，美洲人这个词的语义进化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其意义不亚于几十年前在英国殖民地——美国——所发生的事件。美洲在被殖民期间形成了由血统区分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印第安人、非洲黑奴的自由后代以及各种混血人与占据统治地位的美洲白人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美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差别。但最明显的社会差异也没有把美洲人和欧洲人区分开来。总结一下我们将要详细追溯的历史，绝大多数白人爱国者领导层接受了新的、更广泛的“美洲人”含义，因为这能大大提高他们战胜宗主国的概率。如果所有在美洲出生的人——每一个在美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混合交融过程中诞生的个体——都可以算作美洲人，并且同属一个阵营，那么占人口比率极小的欧洲人（不到人口的1%）根本没有机会维持殖民统治。待美洲人民认识到他们如彩虹般的血统事实并为之定义时，这一事实又同时创造出一个新的真相——一个空灵而有力的抽象概念。这个抽象的概念就是主权人民（sovereign people），那些理应得到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的人。与18世纪80年代美国独立不同的是，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美洲主权人民包括了非白人的大多数。

美洲相对同时地建立了十几个独立国家的重大意义与美国独立的意义

并不相同。这两场独立都标志着世界正向着去殖民化的未来而前进。美国的独立无疑是在欧洲殖民地建立新共和国的典范，它激励了许多重要的美洲爱国者。但有一件事并没有成为趋势，非欧洲移民的后裔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美国的共和模式之外。美国的独立意味着对自决权的基本诉求，但只有纯血统的欧洲人后裔才能获得这一权利。与此相反，美洲大批出现的民族国家则将自决权真正变为趋势，并鲜明地确立了一个未来去殖民化的模板。

美洲人以美国为模板，由全国选举组成制宪会议，会议制定成文宪法将人民主权纳入其中。与美国模板不同的是，美洲国家宪法将大量印第安人、非洲人以及混血后代纳入公民这一主体（必须承认，海地是这一创新的先驱，但它没有被其他美洲国家效仿，相反成为一个被其他国家上层阶级领导人害怕的例子）。美洲模板至少可以说是不完美的。在几十年间，每个人都能获得公民身份这一理念仍然仅存在于理论而非现实。尽管如此，美洲的独立意味着西半球属于共和党人。这也正是1823年美国门罗主义所宣称并且在整个19世纪所实现的内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才丢失了其非洲和亚洲殖民地，此时拉丁美洲，尽管内部有一些矛盾，但早已作为一个完整的、去殖民化的地区被载入世界历史。美洲人的宪法制、共和制模式于20世纪下半叶在非洲和亚洲新国家中大量涌现和流行。尽管这种已经被广为传播的模式有其局限性，但它还是成为在全球取得真正胜利的思想。这种思想今天被美国人称为“西方”政治价值观，在世界其他地方被称为“自由主义”。

事实上，自由主义这个词是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中被创造出来的，它被用来形容打着自由旗号的西班牙爱国者。他们支持建立保障公民自由、商品流通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立宪政府，没有任何官方真理、任何团体、任何利益或意见可以完全支配这个自由的市场。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出发点

是——我们将看到，这是由西班牙王室令人震惊的失势所引发的——人民主权。

为了将人民主权理论化，有必要先定义主权人民，也就是定义民族。而美洲的新民族从一开始就要求包括原住民、非洲人和混血人。民族层面的自我定义过程包含一些战术上的否认和自我欺骗，然而，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美洲对世界历史的贡献比自由共和主义的传播更显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颇有影响力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强调了“克里奥尔先驱者”（Creole pioneer）在全球进程中的角色——他指的正是我称为（并自称为）美洲人的那些人。安德森对美洲独立战争形成经过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但他却帮助了一代学者明白拉丁美洲的独立是全球民族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

美洲人（Americanos）这个词并不是英语界拉美历史学家最常用的术语。相反，他们将在美洲出生的白人称为“克里奥尔人”——对西班牙语单词“criollo”的英语直译（也是安德森的世界民族主义中的“克里奥尔先驱者”）。美洲人是一个更好的术语，因为它澄清了关键概念的延伸，即主权人民的定义不仅限于白人，还包括任何出生在美洲的人。

拉美历史学家对1808—1825年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每个国家的爱国史都提供了关于模范英雄和基本行为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世界各地的民族身份。阿蒂加斯（Artigas）、安德拉达（Andrada）、贝尔格拉诺（Belgrano）、玻利瓦尔（Bolívar）、格雷罗（Guerrero）、伊达尔戈（Hidalgo）、米兰达（Miranda）、莫雷洛斯（Morelos）、奥希金斯（O'Higgins）、派斯（Páez）、佩德罗一世（Pedro I）、圣马丁（San Martín）、苏克雷（Sucre）和桑坦德（Santander）——这些仅是一部分美洲领导者——等人都是爱国史的主角。他们的名字被广泛应用

于命名城市、公园、州和大道，毫无疑问，对于任何想了解美洲独立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名字。在爱国主义的想象中，这些英雄也是伟大的男人或女人，他们超群的智慧、美德和勇敢被后人奉为灵感并被竞相效仿。本书无意于此赘述。对于我来说，这些英雄之所以对我有启发，并不是因为他们完美的，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不完美。

当代拉丁美洲史学研究首先要问的是，独立对殖民地的等级制度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对占少数居于统治地位的白人与占多数居于被统治地位的非裔人和印第安人后裔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由于殖民地的等级制度在独立后的美洲仅缓慢地瓦解，学院派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独立运动在破除等级制度方面令人失望。毕竟，共和国应该是由平等公民组成的人民主权社会。奴隶制和劳役偿债制从根本上与共和主义不相容，尽管这种不相容可能会持续几十年，就像美国一样。主流的爱国运动已经在口头上承诺要结束在美洲盛行的种姓分层。但言辞上的承诺并不总是有效的，在独立之后，共和党的理想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这些独立斗争产生了统一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法治正确地占主导地位，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共和政府仅仅在理论上代表着普遍利益。事实上，“西方”政治价值观在拉丁美洲有着一段麻烦的历史（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包括欧洲），因为它们与之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习惯相抵触。通过要求他们的自决权，美洲人在200年前定义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但是在20世纪之前，他们寻求有效公民身份的努力通常都失败了。这部分故事最好留作后记。

本书不同于拉丁美洲独立的纯粹爱国史和学术描述史。本书的目的是将爱国者的名字串联在一起，通过统一的叙事来均衡地评估整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区。葡属美洲（巴西）所起的作用没有西属美洲那么重要，西属美洲人口更多，独立过程也更复杂，并产生了更多现代国家。尽

管如此，产生上述结果的基础力量在美洲各地均发挥着作用。让我们从下面的讽刺且不常被提及的观点开始。总的来说，1799年的美洲人忠于他们的国王，并不是特别渴望接受由历史上最杰出的旅行家带来的美国和法国革命思想。这位旅行家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普鲁士人，一个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的外来者，他可以作为我们探索后殖民时期美洲的向导。

### 注释

[1] Carmen Clemente Travieso, *Mujeres de la independencia: Seis biografías de mujeres venezolanas* (Mexico City: Talleres gráficos de México, 1964), 36—37.

# 目 录

总 序 展开地区研究的三根主轴	刘 东	1
人物表		1
总 督		1
编年表		1
前言：为什么叫“美洲人”？		1
第一章 发现美洲（1799—1805）		1
第二章 王权支柱（1806—1810）		34
第三章 不算内战的战争（1810—1812）		70
第四章 一份消逝的独立事业？（1812—1815）		103
第五章 独立胜利（1816—1824）		138
第六章 国家建设的开始（1825—1840）		183
后记：遗产经久不衰		209

## 第一章 发现美洲（1799—1805）

在 1799 年，旅行记录是欧洲读者和羽翼未丰的美国读者了解美洲的基本信息来源。在那一年，极具影响力的美洲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开始了他著名的旅行，穿越了当时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地区。洪堡从未使用过拉丁美洲这个名称，因为它还不存在，事实上，这个名称在本书所述的整个时期也不存在。在洪堡访问后的短短几年里，美洲就痛苦地“分娩”了十几个新国家。但在 1799 年，这些并不显而易见。

### 洪堡和邦普兰发现美洲

亚历山大·冯·洪堡——未来的探险家、全能科学家、男同性恋者——在 1799 年 7 月第一次踏上新大陆时年仅 29 岁。你一定会爱上年轻的洪堡：这个古怪的男孩太喜欢虫子了，以至于不能像他母亲希望的那样从政；20 岁的他曾去巴黎参加法国大革命一周年纪念，并作为志愿者帮助建造了巴黎的自由神庙。想象一下，他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地质学和植物学研究生，最重要的是满怀探索欧洲以外世界的愿望。他是一个傲慢的柏林人，他用出色

的西班牙语说服了西班牙国王让他进入当时几乎没有外人被允许访问的美洲。

或者你可能宁愿不喜欢洪堡，毕竟他浑身散发着特权的气息。他是那种家里有一座城堡、有能力资助自己五年科学考察的孩子。这个瘦长的年轻德国人，他的民主原则没能消除他的优越感，但他的相貌实在是太漂亮了。洪堡绝对是个万事通。他同时代表了欧洲知识和科学加速发展阶段——启蒙运动——的光明面和黑暗面。理解宇宙的那纯粹、原始的喜悦在年轻洪堡的脉搏中清晰地跳动。达尔文说洪堡的《个人叙述》（他去委内瑞拉、古巴、安第斯山脉和墨西哥的旅行日记）是他伟大的灵感来源，但洪堡也体现了启蒙运动的掌控欲。“发现”世界的途径是走进它。分类，既是启蒙运动和洪堡的思想热情，也是一种控制手段。洪堡能够在当时的欧洲成为全球殖民时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绝非偶然。

洪堡得到了卡洛斯四世（Carlos IV）的许可去收集植物、动物和矿物标本，测量风、洋流、海拔和纬度。他的研究范围涵盖整个自然历史，即对不断变化的地球进行综合研究，尤其是对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仅仅是因为一位曾经探索了南美洲的法国科学家于1735年听说有一条连接亚马孙河（Amazon）和奥里诺科（Orinoco）水系的水道，洪堡便会划着独木舟穿过一千多英里的热带雨林去寻找。他会不断地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爬上他发现的任何一座火山，然后下到火山口，亲自调查令人窒息的火山灰、汨汨的熔岩和隐形的致命气体。

洪堡和他的同事艾米·德·邦普兰（Aimé de Bonpland）原本打算前往古巴。但在委内瑞拉海岸外，他们的船上突然爆发了伤寒病，洪堡和科普兰决定一有机会就登陆。那是一个被遗忘的古老加勒比海港口，叫作库马纳（Cumaná），是南美洲大陆上最古老的西班牙殖民地——由于最近的一次地震，当时部分地区已成为废墟。幸运的是，西班牙在库马纳的总督

是一名亲法知识分子，他积极欢迎洪堡和邦普兰，并希望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探险。库马纳周围的土地展现出热带特有的生命力，“强大、茂盛、宁静，”洪堡在一封语气极为欢快的、写给他兄弟的信中这样描述。<sup>[1]</sup>他写道，船上的生活很适合他，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甲板上测量天文数据，收集海水样本进行分析。为了不让兄弟担心，他只字未提旅行中的伤寒，这位欣喜若狂的29岁年轻人疯狂地谈论着老虎、鸚鵡、猴子、犰狳、鸟类、色彩斑斓的鱼类、椰子树和“半野蛮的印第安人，一个美丽而有趣的种族”<sup>[2]</sup>。这个热带天堂的天气似乎也很适合他。一踏上热带地区，洪堡和邦普兰就兴奋得一连几天都说不出几句连贯的话来，因为一个奇迹紧接着一个奇迹。委内瑞拉到处是西方科学界不知道的物种。花几个硬币，就可以租一所带仆人的房子住上一整月。洪堡向他的兄弟保证，加拉加斯（Caracas）周边拥有全美洲最宜人的气候之一。所以他改变了计划，他和邦普兰准备在前往古巴之前在委内瑞拉休整几个月。由于当时西班牙和英国正处于交战状态，传闻英国军舰驶近的消息使得这个计划听起来更加明智。

与此同时，洪堡新居所外仅一窗之隔的日间奴隶市场破坏了他对天堂的憧憬。洪堡和邦普兰觉得这景色令人心碎和“恶心”。洪堡鄙视奴隶制，他愤怒地写信给他的兄弟，说他看到买主们强迫人们“张大嘴巴，就像我们在市场上对马那样”<sup>[3]</sup>。实际上，如果他们踏上加勒比海滩，他们会发现更多的奴隶。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奴隶制，那就是法国前糖业殖民地圣多明戈（Saint-Domingue），也就是现在的海地。在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帮助下，一场奴隶起义演变成了一场摧毁奴隶制、铲除白人统治阶级的革命。洪堡计划的下一个目的地古巴是西班牙奴隶驱动下的伟大试验田。奴隶制只是欧洲殖民者带来的众多社会不公平之一。

然而，洪堡后来写道，在使他声名鹊起的1799年至1805年的旅行中，他没有预料到他回到欧洲后不久，美洲就开始了激烈的独立运动。为什么

没有呢？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脱离英国赢得了独立，海地脱离法国获得独立，无论是西属美洲还是巴西都赶走了驻守的欧洲军队；其次，殖民地商人由于长期受西班牙贸易垄断制度的限制，已经积攒了相当的不满情绪，这是殖民政府长期以来优待欧洲出生的西班牙人而压榨美洲本土出生西班牙人政策的结果；西属美洲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黑色和棕色人种占据了殖民地种姓制度中所有的底层，他们长期受到的压迫积攒了无尽的愤怒和屈辱。综上所述，美洲人民去殖民化的进程如历史车轮一般不可避免。洪堡并没有发现美洲人对西班牙有多大热爱，相反却发现一些人很乐意自豪地称自己为美洲人。但是美洲革命的时机到底有多成熟呢？

1800年，美洲整体上没有表现出多少革命倾向。洪堡穿越了美洲主要人口中心（包括四个总督辖区首都中的三个：利马、波哥大和墨西哥城）、亚马孙低地、加勒比海盆地、安第斯高地以及西班牙最重要的殖民地新西班牙。以下是他遇到的情况。一方面，在欧洲出生的西班牙人（西班牙语为 *españoles europeos*，下文简称为“欧洲西班牙人”）占总人口不到1%；另一方面，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西班牙语为 *españoles americanos*，下文简称为“美洲西班牙人”）占总人口约四分之一。欧洲西班牙人比他们的美洲“表亲”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得更加高贵。在就业和提拔任免方面，王室政府和教会更喜欢欧洲西班牙人而不是美洲西班牙人——这一政策使美洲人长期愤怒且不满。此外，那些最富有、人脉最广的商人——实际上都是跨大西洋的商人——无一例外都是欧洲西班牙人。嫉妒心强的美洲人把富裕的欧洲西班牙人视为无情的金钱掠夺者、自以为是的贵族。对欧洲西班牙人的不满体现在美洲人给初到美洲的西班牙人起的不讨喜的绰号，最明显的莫过于“查贝顿”（*chapetón*）和“加楚平”（*gachupín*）这两个外号。欧洲西班牙人和美洲西班牙人都觉得自己比另外四分之三的非洲人或美洲原住民更优越，并以主宰他们为生。尽管傲慢的欧洲西班牙人让美洲西班

牙人头疼，但后者还是急切地肯定他们共同的、区别于非洲人、原住民和混血人的西班牙人属性。美洲大部分人口居住在沿海、内陆热带雨林河流腹地、雨林空地、安第斯山脉山坡，他们不受任何有效的政府控制，专注于农业和渔业生产，并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美洲不断扩张的边界可以很容易地为该地区人口提供几倍于人口的食物。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饥饿才会成为叛乱的动机。

18世纪80年代，美洲多地因税收发生过叛乱，但其中只有秘鲁的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和上秘鲁（今玻利维亚）的两处叛乱有一定威胁。这些叛乱通常表达了对当地政府的不满，并要求进行有限的改革。他们的战斗口号通常是“国王万岁，坏政府去死！”其主要反对的对象是王室限制殖民地经济活动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因为叛乱而消失。的确，部分西班牙官方垄断贸易活动——即西班牙商人通常拥有在美洲海港买卖货物的专营权——出现松动，但这一特权并没有被废除。不管怎样，殖民地的叛乱在1800年之前就已经过去了，但当时洪堡就注意到，包括（白种）美洲人、印第安人、混血人以及黑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对西班牙王室表达了压倒性的忠诚。对于他这样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年轻人来说，美洲人民总体上表现得相当冷漠。

1800年，除了殖民地内部对欧洲帝国的不满，欧洲帝国的外部冲突也导致殖民地的分裂。西班牙和英国在18世纪经常交战。殖民地国民卫队组织的成立是为了保护美洲不受英国的入侵，但由于英国驻扎在加勒比海岛屿基地的海军控制了水路，殖民地的人员交流和物资运输都瘫痪了，货物只能成堆地积压在码头，旅客也滞留在殖民地。特立尼达是原属西班牙的一个岛屿，最近成了英国海军基地。当洪堡和邦普兰终于走出热带雨林准备乘船前往古巴时，他们发现西班牙船只不敢沿着委内瑞拉海岸航行。洪堡和邦普兰因此不得不在委内瑞拉多等了4个月才找到一艘走私船。这条

船往返于特立尼达和南美洲大陆之间从事英国商品的走私。他们一出海，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私掠船（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是被英国海军雇佣的海盗）就突袭了他们。洪堡和邦普兰发现自己被安置在一艘英国海军单桅帆船上。幸运的是，英国舰长读过他们的科考报道，并将他们礼貌地送回了委内瑞拉。在那里，他们徒劳地等待着能把他们送往古巴的西班牙船只。最后，他们得以登上一艘中立的美国货船，与船上运载的、已经散发恶臭的几吨牛肉干一起前往古巴。

### 想象一个边域大陆

牛肉干是将涂有盐的肉片堆放在阳光下暴晒制成的。这个过程需要在肉彻底腐烂变质前，通过盐和热量将水分迅速从肉中吸走完成。牛肉干是美洲边境的常见牛肉制成品。在冰箱出现以前，将牛肉制成牛肉干是长距离海洋运输牛肉的唯一方法。牛肉干蛋白质含量高、味道浓郁，是海员和奴隶定量食物配给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奴隶——这也是洪堡所乘坐的货船满载牛肉干驶向古巴的原因。这批让洪堡和邦普兰捏着鼻子的牛肉干很可能来自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或更南部的牛肉产地。

除了沿海聚居地接壤的部分，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在 1800 年仍属于人迹罕至的边疆。事实上，当时整个大陆的人口大约与今天的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墨西哥城人口相当。洪堡和邦普兰对美洲广阔的边疆地区特别感兴趣，他们希望在那里发现欧洲科学界未曾知晓的新物种。由于 1800 年 11 月，这两位勇敢的探险者前往了相对温和而著名的古巴，因此我们暂

且离开这两位探险者，转而跟随一位名叫费利克斯·德·阿萨拉（Felix de Azara）的西班牙军官去探访另一处边境。在美洲大陆的另一边——南大西洋海岸的草原上，阿萨拉正在思考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那里是寓言传说中的牛仔——高乔人（gauchos）——居住的地方。

拉普拉塔河（边疆）区是一片没有尽头、几乎没有树木的平原。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半野生马和牛自由地游荡。这片区域居住着流动性极强并学会骑马和狩猎牛的原住民，他们可以与同样学会骑马和狩猎野牛的阿帕奇人（Apache）和苏族人（Sioux）相媲美，区别在于后者狩猎的是野牛。对于像阿萨拉这样的殖民者来说，这片边疆是需要为西班牙保留的资源。虽然远比洪堡年长，但阿萨拉在观察、分析和做笔记的习惯上和普鲁士人很像。他当时正要给西班牙王室写一篇著名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阿萨拉和他的助手何塞·阿蒂加斯（José Artigas）阐述了即将到来的独立战争。战争前夕，反抗是整个美洲人民最不关心的事情。当发生在欧洲的事件已经将美洲人卷入西班牙对抗法国和英国的国际冲突之际，美洲人民依然继续做着西班牙王室的忠实子民。

阿萨拉第一次作为西班牙探险队的一员来到美洲的任务是勘测和标记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土之间的边界。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宣称对拉普拉塔河区域有所有权，且双方互不相让。谈判破裂以后，阿萨拉留了下来并以另一种方式完成西班牙王室的使命——在该边境区安置忠诚的武装西班牙臣民。为了保护边境不受葡萄牙人的侵犯，阿萨拉建议西班牙政府建立一系列城镇，并将农场大小土地免费分配给那些同意与家人一起占领农场、持有猎枪并参加国民卫队组织的人。葡萄牙人曾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模式。阿萨拉建议，应当将那些愿意生活在西班牙统治下的葡萄牙移民树立为榜样。

拉普拉塔河辖区说西班牙语的居民并没有给阿萨拉留下深刻印象。他估计，可能有一半人口是西班牙裔美洲人，但实际上很多人有一些印第安

血统。剩下的人口包括帕尔多人（Pardos，欧非混血）、来自附近耶稣会使命团的瓜拉尼印第安人（Guarani），以及一些非洲奴隶。只要工作是在马背上完成的，美洲人就会毫不犹豫地与帕尔多人、瓜拉尼人甚至奴隶一起完成。拉普拉塔河居民很少拥有土地，但每个人都有马。阿萨拉取笑边区居民的衣服，比如一种被称为“齐里帕”（Chiripa）的瓜拉尼腰布，这种衣服是白人、帕尔多人和奴隶穿的，因为穿着它非常适合骑马。阿萨拉曾哀叹，这些高乔人从小在充满暴力的边疆区长长大后变得极为冷酷，他们自相残杀时平静得就像在“割开一头牛的喉咙”<sup>[4]</sup>。

阿萨拉非常厌恶地写道，在18世纪，由于西班牙猎牛人在春天开始探险时粗心大意，许多小牛在混乱中无辜地死去，拉普拉塔河区域牛群大量死亡。恰卢亚（Charrúa）印第安人——与瓜拉尼人不同，他们不接受基督教——故理所当然地争夺牲畜。牛肉是他们的主食。然而西班牙猎牛人捕杀成千上万的牛不是为了获取牛肉，而是为了牛皮，这些皮是唯一出口到欧洲可以赚钱的部分。在过去的20年里，每年大约有80万头牛的尸体被留在平原上腐烂。据阿萨拉估计，如果管理得当，30年内牲畜数量将增长到近9000万头，并能生产足够古巴所有奴隶食用的牛肉干。

阿萨拉很幸运，他有一位很熟悉甚至过于熟悉拉布拉塔河流域及其人民的当地军官做助手。何塞·阿蒂加斯上尉是那种常被人叫绰号“佩佩”（Pepe）的人，他的装扮与高乔人无异，行为举止也很相似。来自欧洲的阿萨拉其实并不特别擅长对付高乔人，但在这方面，这位来自美洲的阿蒂加斯没有对手，这使他确实很有用处。阿蒂加斯来自辖区内的军旅世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骑兵团的队长，他们世代保护当地农场主和猎人免受蛮荒恰卢亚印第安人的袭扰。阿蒂加斯14岁时离开家园到平原上碰碰运气。他成了美洲猎牛远征队的一员并和高乔牧人混在一起，这是让阿萨拉很头疼的地方。阿蒂加斯在拉普拉塔平原上漫游，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在

此期间，阿蒂加斯的大本营是一个叫索里亚诺（Soriano）的旧教会定居点，那里满是印第安人和混血儿，比如勇敢的伊莎贝尔·贝拉斯克斯（Isabel Velásquez），她为阿蒂加斯生了四个孩子。佩佩和伊莎贝尔没有能够结婚，他们以为阿蒂加斯的家人会同意这门婚事，因为她现在的丈夫在监狱服刑。

年轻的阿蒂加斯被指控在西班牙定居点和葡萄牙定居点之间走私了2 000头牛。他与葡萄牙人和恰卢亚印第安人都相处得很好，并且在农村地区说西班牙语的、形形色色的高乔人中有一群热情的追随者。1795年，西班牙殖民地拉普拉塔河辖区最坚固的港口城市——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其总督发出逮捕令逮捕被控走私的牧民。然而，西班牙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最高权力当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督很快赦免了阿蒂加斯，并招募他领导一支新的骑警部队。让他的家人高兴的是，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叛逆青年一夜之间经历了极端的转变，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成了国民卫队队长。上级对阿蒂加斯的期望是把工作重点放在走私品和恰卢亚人上——这也是他已经擅长的领域。但事实证明，阿蒂加斯在击杀恰卢亚人方面明显缺乏效率。其他的指挥官擅长突袭恰卢亚人的营地和屠杀男人、女人和小孩，而阿蒂加斯看起来不能或者不愿意去攻击他曾经的伙伴。

未来的某一天，阿蒂加斯将向西班牙开战，成为他的祖国——乌拉圭共和国——的国父。但在1801年，他还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的一名忠诚的军官，尽管他“热爱印第安人”并且最近的行为都不是特别得体。

## 洪堡的探险继续

洪堡在古巴只待了两个月。古巴横跨海上主要航线的独特地理位置使

其闻名于世，而且它不像亚马孙盆地部分地区那样有未知的地形和未按生物种属分类的生物。在洪堡的时代，虽然古巴一直是英国人袭击的目标，但其依然成为美洲经济成功的典范。因此，洪堡在古巴逗留的两个月里，并没有进行探索，而是主要从事人口、农业、贸易和政府事务方面的统计工作。他把注意力重点放在整理奴隶统计资料方面。

回到欧洲后，他会用收集来的材料论证奴隶制是不经济的，也是明显不道德的。他正确地预言，未来的人们将难以相信在哈瓦那（或华盛顿特区、里约热内卢）实行非人道的奴隶制度竟然一度被视为正常。“奴隶制无疑是所有人类祸害中最严重的，”这段话被证明是洪堡长篇游记中被引用最多的一段。<sup>[5]</sup>洪堡的论点有坚实的依据，他记录了古巴原住民是如何在16世纪晚期被彻底摧毁的，古巴岛是如何在17世纪保持着人烟稀少、适合隐藏的偏远地带状态等信息。直到1762年英国占领哈瓦那为英国奴隶贩子打开了大门，古巴的经济才开始腾飞。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甘蔗业的增长使古巴西部成为农业增长引擎。洪堡和邦普兰抵达之时，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正戴着镣铐通过哈瓦那海关，且数量逐年增加，其中以走私奴隶居多。古巴奴隶主进口了成吨的牛肉干并任由其堆满哈瓦那街道散发臭味。奴隶进口和蔗糖出口每年为古巴带来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收入，而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城市里，哈瓦那的蔗糖种植者挥霍无度，引人注目。

对宗主国西班牙来说幸运的是，古巴的奴隶驱动经济使得其种植园主非常保守，再加上海地发生的事件，他们尤其不愿意容忍叛乱行为。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古巴提供了极为可观的利润、西班牙在该岛的驻军尤为强大，并且古巴也居于西班牙美洲军事战略的绝对核心地位，它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永远忠诚的岛屿”等多方面因素的叠加，该岛最终没有参与即将在南美洲大陆上展开的革命事件。

洪堡和邦普兰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回到了南美大陆的卡塔赫纳

(Cartagena)，在1801年的6月和7月，他们又逆流而上到达今天哥伦比亚的马加达莱纳河（Magdalena），他们的目标是探索美洲的另一面——安第斯高地。就像新西班牙（今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高地一样，在欧洲人入侵之前，安第斯山脉高耸的高原已经供养着相对密集分布的土著村落长达数千年。这里也因此不是边疆，反而是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核心区域。

在蒸汽机船航行之前，沿马加达莱纳河上行是一个非常累人的过程。一队队的船工——几乎都是非洲人的后裔，用长杆顶着船沿着河岸的浅滩逆流而上，那里的水流不那么急（但是热带的太阳也同样猛烈地照射下来）。从海边到波哥大（Bogotá）要花六个星期的时间坐船航行，然后再花三个星期沿着一条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河床的地方步行。除此以外，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路可以走。洪堡利用这个机会研究了几种短吻鳄，试图确定它们与尼罗河鳄鱼的关系。当这两位科学家终于到达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首府波哥大时，科学界和知识界隆重地欢迎了他们，但邦普兰的身体已经被旅途折磨坏了。对一个欧洲人来说，海拔八千英尺的波哥大寒冷雾气似乎比加勒比海岸冒着的热气更宜人、更诱人。于是，这两个人在图书馆度过了四个月的休息时间，他们大部分时间泡在了何塞·塞莱斯蒂诺·穆蒂斯（José Celestino Mutis）图书馆，穆蒂斯是第一个使用林奈植物分类系统的西班牙科学家。

在波哥大，洪堡发现这座城市被层层高耸的、陡峭的斜坡所包围，和现在一样，那里的道路很难修建。洪堡将新格拉纳达与古巴进行了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格拉纳达作为殖民地在发展上是令人失望的。虽然新格拉纳达人口众多且幅员辽阔，但它为西班牙创造的财富却很少。高地印第安人（以及他们拥有的大量黄金物品）的出现吸引了西班牙征服者来到昆迪纳马卡（Cundinamarca）高原——波哥大所在地，但就目前而言，那些农场无法种植任何可以出口到欧洲的作物。安第斯山脉北部参差不齐的

地形导致只能将最有价值的物品——例如黄金——运到海岸。任何价值低于黄金的其他物品都不值得运输。这一事实使得大部分新格拉纳达的农村人口成了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散布在杂乱的山脊和山谷中，聚集在分散的小城市周围，点缀着小的原住民群体和陡峭的无路荒野。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卡塔赫纳和考卡（Cauca）河畔，有一些糖和奴隶贸易，但都无法与古巴相提并论。

因此，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的重要性要小于另外三个总督区。拥有巨大银矿的秘鲁总督区和新西班牙总督区更富有，也建设得更好。拉普拉塔河总督区也因为要和邻近的葡萄牙殖民区竞争而受到西班牙王室更多的关注。但是波哥大周围的昆迪纳马卡高原郁郁葱葱景色秀丽，而穆蒂斯收集的惊人植物标本使这次访问本身就很有价值。此外，新格拉纳达蕴藏着洪堡尤为钟爱的火山。所以当邦普兰觉得可以动身时，他俩立刻再次出发，穿越赤道从安第斯山脉到利马向南旅行，攀登沿途每一座火山。前方，耸立在基多（Quito）城上空的，是一座被白雪覆盖的名叫皮钦查（Pichincha）的大火山。洪堡觉得这座城市很可爱，但阴冷的天空显得过于庄严。洪堡在一位印第安向导的陪同下爬上了皮钦查山。有一次，他和向导发现自己走在一个冰桥上，冰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陨石坑。洪堡玩得很开心，他说服了邦普兰和一个名叫卡洛斯·蒙图法尔（Carlos Montúfar）的新朋友两天后一起去攀登皮钦查山，他是当地贵族的儿子。三人随后都去高耸于其他火山之上的钦博拉索（Chimborazo）火山碰碰运气。洪堡攀登了基多周围的六座有雪盖的火山，这样的行为让一些高地人印象深刻，也让另一些人迷惑不解。钦博拉索山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山，攀登这座山使他在19世纪获得了相当于国际巨星的地位。卡洛斯·蒙图法尔对这段经历非常兴奋，他也因此得到了父亲的祝福以陪伴洪堡和邦普兰完成剩下的旅程。

## 走进西蒙·玻利瓦尔

洪堡 1802 年 7 月登上钦博拉索山并成为国际名人的那一刻，也是一个名叫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19 岁孩子的狂喜时刻，他刚刚结束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三年的生活回到委内瑞拉。他在西班牙与他的叔叔们居住在一起，这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已经初步掌握如何保持优雅，比如他第一次认真地注意拼写，在私人课堂上学习法语和跳舞。年轻的玻利瓦尔穿着国民卫队制服（尽管他没有服过任何兵役）在马德里大摇大摆地走着、挥霍着金钱，随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疯狂地爱上了一位名叫玛丽亚·特蕾莎·罗德里格斯·德·托罗（María Teresa Rodríguez de Toro）的年轻姑娘，玻利瓦尔当时十七岁。玛丽亚·特蕾莎比她的男友大 20 个月的事实虽然不常见，但也不妨碍他们结婚。这段婚姻是天作之合，玻利瓦尔和罗德里格斯·德·托罗家族都属于委内瑞拉精英阶级之一的曼图亚诺（mantuano）家族，两大家族又互为加拉加斯政坛的长期盟友。然而，由于涉及的财产数量太多，他们不得不等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在两家人达成了谨慎的婚前协议后完婚。在马德里举行婚礼后，玻利瓦尔和特蕾莎立即乘船前往委内瑞拉。

这对新人的世界是如此美好。他们年轻、富裕且享有特权，处于殖民社会的最顶层，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真爱，这对于富人来说是一件稀有物品，因为婚姻通常要服务于家族战略。新人一抵达拉瓜伊拉（La Guaira）港，他们就派信使去加拉加斯通知玻利瓦尔的叔叔和特蕾莎的阿姨。同样在拉瓜伊拉港，特蕾莎遇到一位即将乘船前往西班牙的乘客，于是她借机给父亲写信，报告他们平安到达。信的开头是“我亲爱的爸爸”，里面以口语和日常的语调讲述他们航行的细节、她的表兄弟们如何来拉瓜伊拉港迎接他们、大量的问候，以及对父亲身体健康的衷心祝愿。<sup>[6]</sup>如果

这不是她写的最后一封信的话，这本不值一提。

在加拉加斯热情地向朋友和亲戚问候之后，这对幸福的夫妇立即前往他们家族众多产业中的一处，位于加拉加斯内陆的甘蔗种植园。他们憧憬着在玻利瓦尔小时候常去的富饶的委内瑞拉的乡村生活。出生于马德里的特蕾莎第一次看到了这里的一切：站满鹦鹉的参天大树，山坡上的可可果园，遍布山谷的甘蔗林。没有任何记录描述了她在成为一个奴役非洲人的种植园女主人时的反应。当然，她家族的财富，与其他委内瑞拉大家族一样，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尽管特蕾莎早就知道这一点，但现在她必须亲眼正视它。

毫无疑问，她只是习惯了看到奴隶，并开始认为这是正常的。这是奴隶主土地最普遍的态度。纯粹的奴隶制是恐怖且难以持续的，所以奴隶主把纪律和家长制混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和奴隶，特别是主人和家仆之间形成了温和的关系。玻利瓦尔和许多可可和甘蔗种植园主的孩子一样，是由他的黑人奶妈依波利塔（Hipólita）抚养长大的。几年后，当玻利瓦尔率领军队在加拉加斯取得胜利时，他在人群中发现了她并下马去拥抱她。他还和奴隶玩伴一起长大，这对一个每次比赛都要获胜的小男孩来说是完美的安排。家长制（和偶发的自利属性）的结果是部分受恩宠的奴隶获得自由或允许他们花钱购买自己的自由，这一过程被称为农奴解放。洪堡专门谈到了美洲农奴解放的频率。

被特赦的奴隶的后代经过多年的积累逐渐成为委内瑞拉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自由黑人通常是混血帕尔多人。和许多美洲混血人一样，帕尔多人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上升。他们对在种植园里劳动没有兴趣，无论种植园主愿意支付多高的价格。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手工艺工匠，收入与贫穷白人相当。但旨在阻碍人口跨阶级流动的等级制度使得帕尔多人无论多么富有也不能做与更高社会阶级有联系的事情，比如骑马、穿丝绸、佩剑

或在神学院学习等，这些社会活动是留给尊贵的美洲（白）人的。这些限制激怒了不断向上爬的帕尔多人，在这里，西班牙王室的某个足智多谋的仆人找到了生财之道。18世纪90年代中期，王室官员宣布出售一项新产品：豁免权，该权利使帕尔多人在法律上成为白人，允许他们做任何美洲人能做的事情。

加拉加斯市议会被称为“卡维尔多”（Cabildo），大家族在这里实行半世袭的控制。国王在想些什么？卡维尔多动员了整个曼图亚诺阶级来抗议这一罪恶政策。玻利瓦尔的叔叔及其监护人卡洛斯·帕拉西奥斯（Carlos Palacios）就是这场抗议的带头人。该城元老在给国王的信中痛苦而清晰地解释了他们的情况。帕尔多人是奴隶的后代。有些人家里仍然有奴隶。被殴打和恐吓是他们继续被奴役的必要条件。（显然，身为奴隶主的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的观点是，奴隶已经被贬低、被剥夺了“荣誉”。那么，即便是有点钱的帕尔多人怎么可能被平等地对待？怎么可能像他们这些用光荣的家族历史、血液来定义自己，并将其从非欧混血裔的污名中区分出来的一样呢？特蕾莎的叔叔，德·托罗家族侯爵也在这封致国王的抗议信上签了名。有爵位的贵族最不需要的就是对等级制度的挑战。

元老们解释说，帕尔多人最近变得傲慢无礼，他们涌入城镇（或出城到边境区域），而不是和奴隶一起在种植园劳动。加拉加斯市议会在抗议中坚持奴隶作为劳工的需要。在城里，帕尔多人变成了铁匠、木匠、银匠、裁缝、泥瓦匠、鞋匠和屠夫。正是由于帕尔多手工业者很容易就获得生活保障，因此他们可以收取被城市元老视为离谱的价格。最糟糕的是，成千上万的帕尔多人加入了新的殖民地国民卫队组织。加拉加斯议会认为让帕尔多人穿上制服使他们变得更傲慢。戴着红色国民卫队徽章帽的帕尔多人，在治安官面前总是很乐意为自己的利益说话。

在议事厅中的抱怨没有丝毫讽刺的意味。在玻利瓦尔成长的地方——

殖民时期的委内瑞拉——到处是被奴役的仆人、不平等，或者更准确地说，等级制度才是主流。统治者谈到继承来的荣誉和特权时并不感到尴尬。没有荣誉的人不配与有荣誉的人得到同等待遇。只有麻烦制造者才想在生活中出人头地。市议会认为，一个被剥夺了荣誉的人就应该在法庭上闭上嘴、低下头。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即便他是一个做得很好的商人，应该明白自己的地位，他的孩子也应该知道。最后，市元老们以“征服者”子孙般大言不惭的口吻向国王陛下发出警告，这些“法律上的白人”将成群结队地进入教堂、从事商业和提供公共事务，并且会把所有可敬的人赶走。他们警告说，严酷的日子将会到来，西班牙将由黑人来守卫。那么谁来保卫领土和控制奴隶呢？

最后一点是他们认为的关键。18世纪90年代，由于海地革命的持续进行，控制奴隶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当种植园奴隶的大规模起义摧毁了法属圣多明戈的奴隶主统治时，市议会回忆说，自由帕尔多人煽动引爆了炸药。自由帕尔多人曾希望，巴黎大革命国民大会宣布的《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宣言》的原则可能使他们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平等公民。圣多明戈奴隶主阶级曾试图在国民大会上粉碎这种愿望，罗伯斯庇尔派激进分子坚持要求宣布种族平等原则，但这最终并未适用于奴隶。与自由帕尔多人不同，圣多明戈奴隶阶级不能将希望寄托在法国国民大会上。在人权被广泛提及同时又没有任何希望享受人权的刺激下，奴隶终于起义了。他们的领袖杜桑·卢维图尔（Toussaint Louverture）在十年的血腥镇压中声名鹊起，并最终颁布了废除奴隶制和禁止种族歧视的宪法。海地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奴隶起义，对奴隶主来说，它成了一个可怕的警示故事，不断告诫奴隶主，非洲人一定要被奴役。对加拉加斯市议会来说，发生在附近圣多明戈的大火将此地更名为海地，拼写出来的意思就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玻利瓦尔11岁时，一名来自库拉索（Curaçao）的奴隶出现在委内瑞

拉，宣布“法国的法律”，显然指的是海地。殖民当局很快就把响应号召的一群武装不良的潜在解放者消灭了。为进一步施加道德教训，当局将一名自由帕尔多人的头砍下并挂在一个高二十英尺的铁笼子里供路人看，时间长达好几个月。另一个恐慌事件出现在一年后的1797年，三名受法国影响的欧洲西班牙人因从事煽动活动而被驱逐出西班牙随后关押在拉瓜伊拉地牢中，然而三人却在当地激进分子的帮助下逃离。这些激进分子的诉求包括废除奴隶制，废除印第安贡品以及自由贸易。这个新的黎明的标志是一条彩色的缎带，象征着由白、黑、帕尔多和印第安人联盟而成的彩虹。然而，其中一名参与者背叛了密谋起义，于是该组织解散了。西蒙的叔叔卡洛斯·帕拉西奥斯称其为“黑白混血无耻混蛋们”的反叛（*la canalla del mulatismo*），也可以简略点称为“帕尔多人渣”的反叛。他在给马德里的亲戚的信中写道，这些“人渣”自然诉诸“可恶的平等原则”，而这正是他们警告过国王的。<sup>[7]</sup>

1802年，这种焦虑情绪仍在蔓延，当时的玻利瓦尔正尝试经营一家甘蔗种植园，特蕾莎则尝试当种植园女主人。如果这对年轻夫妇曾担心他们的奴隶造反，那么他们显然多虑了。特蕾莎不能克服的不是帕尔多人的起义，而是当地水土。特蕾莎得了热带病，病情迅速恶化。玻利瓦尔急切地把她送到加拉加斯医治，可她依然于1803年1月去世。他们的田园生活只持续了几个月。沮丧的玻利瓦尔决定立即返回欧洲。

### 洪堡视察秘鲁和新西班牙

在特蕾莎去世后的1803年1月，洪堡和邦普兰前往新西班牙。在沿南

美洲太平洋海岸向北的航行中，洪堡开始了他的海上例行娱乐——对海水和洋流取样。这样，他就成为第一个测量出这一重大全球现象的人，这一现象现在被称为洪堡洋流\*，是一种与墨西哥湾流相反、将极地的寒冷海水输送到赤道的洋流。

1802年，洪堡和邦普兰对秘鲁的印加历史进行了调查，并对美洲原住民的安第斯腹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那里的农业村庄中，印加人的原住民语言克丘亚语（Quechua）依然被当作日常口语使用。在秘鲁，洪堡的想象力被印加工程智慧所激发，尤其是其道路系统，这些长达几万英里的道路至今仍有部分可以使用。这个普鲁士人（指洪堡）称这些印加人的建造工艺和古罗马人一样好。洪堡研究了原住民从古代就开始使用的鸟粪肥，发现这种肥料在保持土壤肥力方面效果出奇的好，故推荐在欧洲使用。（当欧洲农民终于在多年后开始尝试鸟粪肥时，他们买了两千万吨。）

在利马休息的时候，洪堡给他的兄弟写了一封信，这是为数不多的几封真正漂到大西洋彼岸的信。他提到了过去几个月的亮点：攀登皮钦查和钦博拉索两座火山以及对前印加语言手稿的检查。此时，洪堡已经研究了好几种原住民语言，并认为这些语言被错误地认为“原始”。洪堡在为美洲原住民辩护。在秘鲁之旅中，他坚信“较深的肤色不代表卑微”<sup>[8]</sup>。他断言，西班牙征服者的出现导致现在印第安人的悲惨生活。洪堡描述道，印第安搬运工每天在新格拉纳达的安第斯山脉上花三四个小时背着旅行者，却赚取着微薄的收入。被这种联想所激怒，他和邦普兰拒绝骑在这些人的背上。但事实证明，这些搬运工并不欣赏这种精神上的支持，他们更关心的是收入的损失。洪堡和邦普兰为他们的英勇行为付出的代价不止这一种，还有倾泻而下的暴雨、从布满车辙和岩石的小路上倾泻而下的雨水、淋湿

---

\* 即秘鲁寒流。——译者注

并最终磨破的靴子，以及他们赤裸且鲜血淋漓的双脚。

洪堡憎恶那些 19 世纪成群结队来利马旅行的欧洲人，他甚至成为这些人的头领。他认为，精神上，利马面对着海港和外面的世界，背对安第斯山脉和说克丘亚语的大多数印第安同胞。它是西班牙皇家和教会官僚机构的大本营，根本不是安第斯山脉的城市。他是对的。利马曾是西属美洲第一批总督辖区首府之一。17 世纪时，波托西（Potosí）丰富的银矿使秘鲁这个名字在欧洲成为巨额财富的代名词。波托西的“银山”（位于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最高海拔）位于上秘鲁（今玻利维亚），因此当 18 世纪西班牙王室新设立总督辖区时，上秘鲁（唉，包括波托西）被移除出利马的管辖范围。利马从未从失去波托西中真正恢复过来。洪堡在的时候，利马城从外部看上去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密集的教堂和修道院仍在证明着过去的美好。现在西班牙帝国王冠上最大的宝石无疑不再是秘鲁，而是新西班牙，也就是洪堡、邦普兰和卡洛斯·蒙图法尔在 1803 年 3 月登陆的地方。

洪堡在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太平洋主要港口阿卡普尔科港（Acapulco）登陆后的第一个外交思考就是给总督写一封信，宣布他的到来。到了这个时候，他不用别人的帮助就能用优雅、正式的西班牙语完成写作。他将愿意听从总督大人的吩咐，表达对总督大人深深的敬意，赞扬总督大人作为实用艺术和科学保护者的声誉，并向总督大人提供他在美洲所有访问完整的行程安排。

总的来说，新西班牙给洪堡带来的冲击大于任何一个更南部的辖区。新西班牙是西属美洲总督辖区中人口最稠密、最繁荣也是最有利可图的区域，它为王室创造了大约一半的殖民地收入。在这里，洪堡致力于履行他对西班牙国王的承诺：评估殖民地采矿技术。洪堡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之一就是专业的矿物学知识。就洪堡自己的观察而言，他看到了新西班牙的改进空间，但不是针对采矿业本身的改进，而是过度依赖采矿业这件事。几

个世纪以来，西班牙王室一直为秘鲁和新西班牙的大银矿提供特权，组织整个美洲帝国为其矿业利益服务。考虑到这些矿山在其鼎盛时期的巨大财富，不难理解各种缘由。在洪堡访问位于墨西哥城北部的瓜纳华托（Guanajuato）的时候，那里的瓦朗西亚纳（Valenciana）一个矿就生产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白银。几个世纪以来，对铸造的银币征收 20% 的税一直是西班牙王室在美洲的主要经济利益。

然而洪堡认为新西班牙肥沃的土地可以比它的矿山创造更多的财富，也可以雇用更多的人。雇用劳动力似乎是当务之急，因为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原住民占新西班牙人口的一半。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边缘化”的印第安人仍享受着可靠的自给农业。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这么看的。总的来说，习惯于满足自己需要的原住民对贸易或雇用劳工没有什么兴趣。然而，洪堡认为，如果西班牙不想失去它的殖民地，“铜色种族”就必须更好地融入它，分享其繁荣。否则，他解释说，会有更多 18 世纪 80 年代秘鲁图帕克·阿马鲁式血腥的原住民起义，那次叛乱是美洲殖民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造成数万人死亡。在镇压了叛军的野蛮行径之后，西班牙人也展现了自己野蛮的一面，在嘲弄的人群面前，他们将图帕克·阿马鲁的尸体肢解成块并分发，以此作为对潜在叛乱者的可怕警告。

## 走进神父伊达尔戈

在新西班牙，洪堡发现了一些和他一样批判西班牙帝国主义的人，尽管他没有见到一个叫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的牧师。伊达尔

戈与洪堡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如果他们相见，伊达尔戈一定会很乐意接待我们的旅行者。此外，伊达尔戈住在新西班牙最大银矿瓜纳华托的附近，它就是洪堡的目的地之一。

伊达尔戈神父对洪堡关于新西班牙应该经济多样化的观点和“铜色人种”也应该得到繁荣昌盛的机会的观点均表示赞同。和洪堡一样，他思考了很多实用的创新，它们能给印第安人和混血人提供有收益的就业。他提议种植橄榄树和葡萄园。既然新西班牙能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为什么要从西班牙进口呢？实际的回答是，西班牙的垄断贸易体制禁止来自殖民地的竞争，但伊达尔戈对此并没有耐心。他提议种桑树，因为他想养蚕，而蚕以桑叶为食。当时，各地都在试图打破中国对丝绸生产的垄断。为什么不是新西班牙呢？当地的黏土可以制作出好的陶器，伊达尔戈对于制作和销售什么样的陶罐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富饶的矿业城市瓜纳华托可以在附近提供一个市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罐子很重，运输起来很麻烦。建立一家制革厂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毕竟，每天都有家畜被作为食物宰杀；为什么不把兽皮晒成褐色来做皮革呢？此外，人们可以考虑纺织业——当然是小规模羊毛纺织；但谁买得起棉花？伊达尔戈设想这些企业可以由村里人共同拥有并为之工作。他们将为市场生产，但生产组织将是公共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伊达尔戈的朋友，新近被选为米却肯（Michoacán）主教的曼努埃尔·阿瓦德·伊·奎波（Manuel Abad y Queipo），一定也会很想见见洪堡。1799年，奎波因为给西班牙国王写了一封抗议信而声名鹊起。奎波解释说，据他估计，印第安人、贫穷的印欧混血人和非欧混血人（即帕尔多人）占新西班牙人口的十分之九。贫穷使他们无法对殖民秩序进行任何投资。他们憎恨白人拥有一切，而自己却一无所有。印第安人抗议他们必须支付的特别贡品，而梅斯蒂索人（Mestizos，印欧混血人）和帕尔多人则对限制

他们社会流动性的等级制度感到愤怒。主教的建议中包括了取消贡品和种姓差别，自由分配新西班牙所有闲置土地，但其主要建议还是要求西班牙王室应该更多地支持教会，尤其是教区神职人员。主教认为，只有教区的神职人员才能发挥必要的道德劝说以维持西班牙在新西班牙村庄的统治作用。奎波和伊达尔戈有时会讨论这样的话题，也会讨论法国书籍和“实用的艺术和科学”，比如丝绸生产，这两个人都对丝绸生产有特殊的兴趣。他们是老朋友了。

不过最近，主教听说伊达尔戈正在接受宗教裁判所的调查，对此表示关切。这项调查源于1800年一次集会上的轻率言论，据说伊达尔戈曾宣称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之子。伊达尔戈的教育观点也被贴上了异端的标签——他曾受到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观点的影响。伊达尔戈曾宣称自己支持“法国的自由”。事实上，他所在的圣费利佩教区的家就获得了“小法国”绰号，因为据目击者说，伊达尔戈本着平等的精神把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那里，没有对等级差别或社会等级差异给予应有的关注。伊达尔戈在“小法国”举办的传奇性派对包括跳舞、戏剧表演、打牌，以及严肃的讨论。审判官发现伊达尔戈取笑教堂的仪式和熏香。他的助手，另一个经常读法语且经常替代伊达尔戈参加弥撒的激进牧师，需要时刻警惕他上司的恶作剧。不止一次，当信徒们跪在地上时，助手发现伊达尔戈把圣餐饼藏了起来。此外，伊达尔戈宣称私通并没有那么糟糕，他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多年来，他一直和几个为他生过孩子的女人住在一起。何塞法·金塔尼利亚（Josefa Quintanilla）就是其中一位，伊达尔戈喜欢时不时在自家表演戏剧，她就经常在其中担任主角。

奎波主教对于伊达尔戈的这些行为显然部分持有保留意见。他看着伊达尔戈的行为摧毁了其富有潜力的学术生涯。伊达尔戈来自西班牙裔美洲中产阶层家庭，父亲是一个乡村地产的管理者。12岁时，伊达尔戈就离家

上学。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潜心学习拉丁文学、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神学、意大利语、法语，以及两种本土语言纳瓦特语（Náhuatl）和奥多米语（Otomí）。尽管他爱搞一些恶作剧，有一个“狐狸”绰号（西班牙语 zorro，意思是“狐狸”），这也暗示了他未来的越轨行为，但他依然成为自己学校深受欢迎的校长，这所学校是新西班牙最好的学校之一，是位于省城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的圣尼古拉斯（San Nicolás）学院。

伊达尔戈立即开始对圣尼古拉斯学院课程和课本进行现代化改革，从注重修辞学、逻辑和理论的中世纪风格转向注重实用的知识。考虑到大学教员在这些老课题上已经进行大量的个人投资，改革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不过，这一点上，伊达尔戈的学术生涯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这给他带来了足够的经济回报、获得相当规模的财产。但后来伊达尔戈堕落的生活害了他，他不仅对大学资金管理不善，还欠下了大笔个人债务，原因可能是赌牌，这是新西班牙殖民地最流行的消遣方式之一。再加上伊达尔戈不检点的个人生活细节（包括一个私生子和私生女），他在学院的敌人要求他下台，他最终于1792年辞职。到那时为止，伊达尔戈在圣费利佩镇（San Felipe）已担任了十年的教区牧师。

当洪堡和邦普兰从阿卡普尔科一路赶到墨西哥城时，伊达尔戈正准备离开圣费利佩搬到附近的一个属于印第安教区的贫穷小村庄多洛雷斯（Dolores）村。在这里，他可以一一尝试他所有的项目——养蚕、葡萄园、橄榄园、织布机、制陶和制革。那时伊达尔戈已经五十岁，已经过完半生，但他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要老。他厌倦了所有的聚会，甚至想要以某种方式改变世界。1803年8月，当他把他的家人（包括他的伴侣金塔尼利亚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用吱呀作响的破车搬到多洛雷斯时，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因为正是这一年他开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章。然而，他却无法预见自己人生篇章的结局。

## 思考自由和暴政

1803年8月，洪堡和邦普兰在离伊达尔戈只有一天的路程时，两人参观了瓜纳华托的矿山。1803年，洪堡在新西班牙忙着探矿，收集经济和人口数据。新西班牙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另一个中心地带，而不是有待开发的边陲之地——除了遥远的北部，包括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广袤而人烟稀少的省份。洪堡把他的时间花在新西班牙的办公室和图书馆上，而不是在荒野中漫步。墨西哥城是他访问的第三个西属美洲总督首府，这是迄今为止最令他印象深刻的首府。恢宏、繁荣、喧闹、规划严格、拥有壮观公共建筑的墨西哥城自阿兹特克时代以来就一直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首都之一。

但是洪堡和邦普兰现在渴望回到巴黎。洪堡一开始想去美国，他主要是希望能见到他所狂热崇拜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因此，他一抵达费城就用法语给杰斐逊写了信。旅行家们没等多久就得到了杰斐逊的热情回应。杰斐逊对洪堡在新西班牙收集的地理数据特别感兴趣。作为总统，杰斐逊的豪赌是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北美大陆的大片土地，这笔交易能使年轻的美国的领土在一夜之间增加一倍。杰斐逊需要从拿破仑手中买下这片土地，后者需要钱，他正忙于收拾欧洲和海地的烂摊子。在海地，由杜桑·卢维图尔及其继任者等前奴隶领导的反抗运动击溃了几支庞大的法国军队。购买与新西班牙北部省份得克萨斯接壤的路易斯安那，但这条边界完全是理论性的，在1804年洪堡等人受到邀请时仍然基本上没有地图和地标。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已经在几周前启程开始探索路易斯安那，并且要到几年后才能回来。因此洪堡被邀请去杰斐逊位于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庄园。

洪堡穿过尚未完工的华盛顿特区，来到西弗吉尼亚州的山脊上。在那里，他和杰斐逊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正在形成的美国地图。毫无疑问，他们还谈到了他们的共同信念，即自由将使新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1804年，解放（libert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这个词的意义区别于以往。作为一个伟大的想法，解放意味着执行理性利己主义的自由，免受政府任意干预或暴政。洪堡相信美国理解解放——当然，除了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美利坚第一个共和国以一种盛气凌人的方式登上了世界舞台。它享受着有利的欧洲贸易，经受住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亲法”（French-loving）的杰斐逊当选总统是这些政治危机中最严重的一个。洪堡注意到这一点，类似的现象在美洲的表现是选出伊达尔戈这样的人。但是美国的例子并没有吸引到许多像伊达尔戈这样的同胞。毕竟，几个世纪以来，说英语的新教徒一直是说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徒的敌人。美洲的自由思想家钦佩英国和美国，但是他们往往对法国大革命更有激情。

到了1804年8月，洪堡和邦普兰来到了巴黎。在那里，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洪堡总是独自出现在聚光灯下）受到了热烈的赞誉。在当时的欧洲，只有拿破仑比亚历山大·冯·洪堡更有名。拿破仑似乎不喜欢这种竞争。在拿破仑于巴黎圣母院称帝后，洪堡出席了加冕庆典并祝贺新皇帝，但拿破仑仅冷冷地对他说了一句：“我知道你收集植物，先生。我妻子也是。”<sup>[9]</sup>法国大革命早期理想主义的阶段现在结束了。

为了缓解失去亡妻特蕾莎的悲痛，玻利瓦尔也在巴黎参加拿破仑的加冕典礼，他经常和她富有的亲戚费尔南多·托罗（Fernando Toro）在一起。在法国首都兴奋氛围的熏陶下，这位年轻的委内瑞拉人正经历着一场政治蜕变，成为一个自由解放的拥护者。在一些时髦的聚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谈论西班牙的暴政，谈论在美洲建立新的共和国。当洪堡和玻利瓦尔在巴黎某个主要由高雅人士组成的社交活动上被介绍给大家时，洪堡并没有被

深深打动，但邦普兰喜欢玻利瓦尔并鼓励他继续思考。尽管玻利瓦尔在参与革命方面还是一个新手，但这成了他释放精力的好办法。

玻利瓦尔蜕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身边出现了来自加拉加斯的前校长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他是一个公然不墨守成规的人，蔑视所有的社会习俗。罗德里格斯在1797年卷入发生在委内瑞拉的“法国式”起义后离开了委内瑞拉。这位思想自由的教师以化名萨穆埃尔·鲁滨孙（Samuel Robinson）逃离了学校，他从《鲁滨孙漂流记》中取了这个名字，以表明他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的自我重塑。罗德里格斯先去了牙买加，在那里提高了英语会话后抵达美国。然后，当然，到达自由的发源地法国。在那里他以“费城的萨穆埃尔·鲁滨孙”的身份与塞尔万多·特蕾莎·德·梅尔合租了一段时间，后者是一个激进的牧师，因为政治原因离开了新西班牙。罗德里格斯最终游遍了欧洲，学习了更多语言，并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行业。罗德里格斯是卢梭教育理论的狂热倡导者，其核心就是强调不断实践积累经验不断发现，而不是简单的死记硬背。

在巴黎与洪堡见面后不久，年轻的玻利瓦尔便带着罗德里格斯离开了。罗德里格斯现在是他的导师和法定监护人，他参加了一个从法国到意大利的徒步教育之旅，这是一次关于自由哲学的国外暑期速成课程。在意大利北部，导师和学生亲眼见到了拿破仑本人，这是他一生中最神圣的时刻。玻利瓦尔后来经常被比作拿破仑，或许就在几周后这位年轻的委内瑞拉人在古罗马令人振奋的废墟中发誓要将美洲从暴政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时，他心中就想到了拿破仑。同样在罗马，玻利瓦尔与洪堡再次相遇，但后者没有记录他对罗德里格斯或鲁滨孙有印象，这是个耻辱。相反，洪堡急于去攀登另一座火山——维苏威（Vesuvius）火山，他希望能目睹火山喷发。

## 若泽·博尼法西奥向往巴西

1805年3月，洪堡的一个老相识，一个叫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席尔瓦（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 e Silva）的巴西人要（以一种与火山喷发不同的形式）“喷发”了。若泽·博尼法西奥，我们以他的巴西名字称呼他，在葡萄牙接受大学教育。为了进行研究生学习，葡萄牙政府把这位聪明年轻的殖民地青年送到德国弗莱堡（Freiberg）采矿学校学习矿物学专业，他在那里遇到了洪堡。经过多年的北欧研究生阶段学习，博尼法西奥回到了葡萄牙，政府很快让他开始为科英布拉国立大学（Coimbra）创建一个矿物学项目。此外，为了利用博尼法西奥昂贵的培训和多方面的才能，葡萄牙政府给他分配了数量惊人的额外项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巴西的家？他有二十年没有见到他的母亲了。

与此同时，他在葡萄牙得到了弟弟安东尼奥·卡洛斯（Antônio Carlos）和马蒂姆·弗朗西斯科（Martim Francisco）的安慰，这两个弟弟也证明了安德拉达家族的学术天赋，他们也横渡大西洋获得了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学位。两人后来都在葡萄牙寻找自己的财富。读过伏尔泰、写过十四行诗的博尼法西奥显然很喜欢欧洲以及它提供的知识机遇，更不用说他读研究生时遇到的女人了。最终，他和一个爱尔兰女孩安定了下来（母亲安慰他，那个女孩至少是天主教徒）。与洪堡一样，博尼法西奥也于1790年夏天体验了巴黎的热闹。然而，由于他年纪更大，因此也更保守，他很快就对革命的愿景产生了反感。到了1805年，当他在政府的资助人、前外交部长罗德里戈·德·索萨·库蒂尼奥（Rodrigo de Souza Coutinho）抱怨“令人憎恶的法国原则”时，博尼法西奥也认同库蒂尼奥关于葡萄牙在美洲拥有大量主权的事实。当拿破仑在欧洲“踉踉跄跄”时，库蒂尼奥甚至建议

葡萄牙王室将王室所在地迁到里约热内卢。这的确是一项非同寻常的举措——这是欧洲君主第一次将王位设立在欧洲以外的地方。

作为法国邻居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过得并不容易。自 1793 年以来，西班牙基本上持续受到法国施压，并被迫与法国结盟，代价是受到英国几乎始终的敌意。正如我们所见，强大的英国海军破坏了西班牙与其美洲殖民地的联系。相反，葡萄牙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不顾法国的反对，选择了其长期盟友英国。但拿破仑变得更加凶狠了。他一再要求葡萄牙对英国船只关闭港口，逮捕英国人，没收其货物。

非凡的时代需要非凡的领导力。在这一点上，博尼法西奥尽管是一个忠诚的葡萄牙裔美洲人，但他也无可奈何。葡萄牙王室的领导能力不强。女王玛丽亚一世是不可救药的疯子。在过去的 14 年里，她的儿子若昂（João）以摄政王的名义统治国家。若昂是个善良的人，但不是领袖。在这场地缘政治混战中，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欧洲，若昂只是个卑躬屈膝的旁观者。1805 年末，他的妻子卡洛塔·华金纳（Carlota Joaquina）开始陷入抑郁和沮丧之中，发作时的吵闹程度与若昂母亲不相上下。华金纳对若昂的干扰可谓有主观敌意的，只有两个人可以原谅她：华金纳的父母，同时也是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在华金纳 10 岁时将其嫁给了若昂。毕竟，王室婚姻事关国家利益而不是儿女情长，婚姻这件事本身并不会征询他们的个人意见。现在这位活跃而坚强的曾为葡萄牙布拉甘萨（Braganza）王室生了七个王子和公主的女人发自内心地鄙视她的丈夫，并想破坏他的摄政权。排在若昂之后的王位继承人是她的儿子，王子佩德罗，他只有七岁，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人们寄予厚望的对象，至少博尼法西奥是这样认为的。说实在的，在这样一个不和睦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在一个疯祖母主持的阴森森的宫殿里，能有什么指望呢？

博尼法西奥写信给库蒂尼奥说自己又病又累，但很快就会准备辩

护——“与国王的手脚直接对抗”，希望得到许可结束为王室服务并返回巴西。<sup>[10]</sup>现在当他40岁时，他渴望成为一个绅士农民，将他的科学培训用于提高农业技术、选择育种、植物繁殖，正如洪堡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喜欢在弗吉尼亚的偏远地区做的事情一样。博尼法西奥已经在科英布拉附近租了一块土地用于种植谷物、蔬菜和花朵，他将此事也告知库蒂尼奥以表明他渴望回到巴西缘由的真实性。

尽管博尼法西奥长期住在欧洲，但他了解巴西。如果他要为我们描述它，他可能会首先指出，巴西有许多独立的、几乎没有联系的定居区，被称为“卡普腾西”（captaincies）。巴西作为美洲大规模制糖并出口的国家，其境内种植园曾有很多非洲奴隶。三大港口城市昭示着葡萄牙殖民地糖工业的繁荣：累西腓（Recife）、萨尔瓦多（Salvador）和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每一个城市都拥有大西洋港口海湾（或者像累西腓那样，是一系列的暗礁）和一条可通航内陆用于糖的水路运输的河流。在博尼法西奥时代，巴西的蔗糖贸易较17世纪的鼎盛时期有所下降，但其总人口200万中有一半以上居住在这三个主要的沿海定居区。还有很多人住在从亚马孙河口一直延伸到拉普拉塔河的一系列次要港口沿途城镇。

在博尼法西奥时代，葡萄牙人声称（非定居人口，大部分居住于沿海）已经向内陆扩张，覆盖了南美洲大陆的一半，主要是因为从大西洋一侧渗透到南美洲大陆要容易得多。博尼法西奥不会羞于描述葡萄牙的西进攻势，因为这正是他所在城市圣保罗人民的功劳。今天，圣保罗是南美洲最具活力的大都市。沿着大西洋海滩到最初的耶稣会定居区的30英里内，你会看到圣保罗在山坡上连绵不断地蔓延。在博尼法西奥生活的时代，从海岸向山坡的进程让圣保罗小镇截然不同。圣保罗是多个印第安人定居点沿着河流进入海洋的终点，这些河流深入美洲大陆深处。在17世纪，圣保罗人沿着这些河流徒步进入内陆进行探索，抓捕印第安人为奴，并将其土地宣称

为葡萄牙王室新的领土。

沿途，圣保罗的徒步旅行者发现了黄金和钻石。作为一名矿物学家，博尼法西奥对巴西矿藏的潜力十分感兴趣。尽管巴西 18 世纪的淘金热已经结束，但它通过吸引更多的移民到内陆来改变了巴西。在博尼法西奥时代，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是巴西内陆唯一人烟稠密的地区。采矿只在人口极其稀少的巴西边境创造了几个人口稠密的岛屿，这是一片广阔地带，土著和分散的牧牛场艰难地共存。

博尼法西奥有理由对巴西未来持乐观态度。总的来说，葡萄牙裔美洲人的经济状况要好于西班牙裔美洲人。1791 年的海地革命结束了加勒比地区最大的（或最可怕的）种植园殖民地的蔗糖生产，同时为巴西的蔗糖出口提供了巨大机遇。巴西甘蔗种植园的奴隶感受到了主人提高产量的强烈压力。与此同时，一些以前的糖厂主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市场——棉花市场，因为英国工业革命提高了纺织厂对于棉花的需求。到 1800 年，棉花已经是巴西种植园经济的第二大产品。葡萄牙的对外贸易依赖于巴西的农产品，前者将后者的农产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国家，再将英国的工业产品出口给巴西。尽管巴西相对更繁荣，但它与西属美洲面临同样的问题，它们都被一个专为本国利益而设计的垄断贸易体系所钳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英国走私活动在巴西也在增加。

博尼法西奥对 1805 年巴西的描述，可能不会包括法国大革命在那里引发的各种反叛。他不是革命的支持者。此外，在殖民后期的巴西发生的各种叛乱都是小规模、孤立的，并很快被镇压。我们之所以注意到它们，只是因为它们表明了意识形态骚动的存在和局限。巴西的第一场阴谋叛乱发生在 1789 年的米纳斯吉拉斯。除了一堆被没收的法国书籍，反叛者还被指控拥有美国宪法类书籍。受那份文件牵连最深的是一名靠拔牙来贴补收入的帕尔多军官，他也因此被称为“拔牙者”。他成了替罪羊，是唯一被

处决的反叛者，因为其他涉案者都是白人，他们用财富和影响力逃脱了处罚。“拔牙者”的安慰奖是在他死后成为巴西的民族英雄。随后巴西各主要港口城市——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和累西腓——都发现了相应的“法国式”反叛。在里约热内卢和萨尔瓦多，帕尔多的各类手工业者正是这些年来在委内瑞拉宣扬革命思想的那类人。萨尔瓦多的一名帕尔多裁缝正在传播“所有人都应该成为法国人并平等生活”的口号。<sup>[11]</sup>在累西腓，葡萄牙当局发现了一群种植园主，他们似乎正在开会讨论在拿破仑·波拿巴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共和国。

最后，如果让博尼法西奥描述 1805 年的巴西，他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谴责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这些制度在葡萄牙统治者中非常普遍：从亚马孙盆地的帕拉州（Pará）和马拉尼昂（Maranhão）到最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博尼法西奥或许不相信民主，但他知道奴隶制是不好的，而且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这一点，尤其是在巴西，当时很少有人敢这么做。

### 著名的洪堡游记问世了

1805 年 9 月，洪堡终于回到柏林的家中。柏林科学院（Berlin Academy of Science）任命他为院士，普鲁士国王还为他提供了津贴。在巴黎，他的长篇旅行见闻法文版面世：《1799—1804 年新大陆热带区域旅行记》（亚历山大·洪堡和艾米·邦普兰著）（*Voyage aux régions é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 fait en 1799, 1800, 1801, 1802, 1803, et 1804, par*

Alexandre de Humboldt et Aimé Bonpland)。洪堡已经收集足够的数据来完成他一生的出版计划。他有很多话要说，读者也很期待。从1799年第一次在库马纳登陆开始，洪堡写了一卷又一卷，共计35卷，来讲述他探险事迹和科学观察中的种种细节。除了他的多卷游记，洪堡还系统记叙了墨西哥和古巴经济的统计研究。他将这些研究进行一定总结后写成一篇论文并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新西班牙王国政论文集》上，当时西班牙君主政体即将陷入一场毁灭性的危机，这场危机将使一切失去控制，并在美洲掀起独立运动。洪堡把这本书献给了曾允许他探索西属美洲的卡洛斯四世。洪堡并没有发现美洲殖民地充斥着叛乱，但是，他在文中暗示了一些能够保持殖民统治并改善殖民地现状的改革建议。在总结中，他满怀希望地写道：“当我们跟一位好国王谈论国家利益时，我们怎么能得罪他呢？”他最后的签字落款为：“您天主教陛下非常谦卑且顺从的仆人——冯·洪堡男爵。”<sup>[12]</sup>

在卡洛斯四世看到这本书之前，他的王国就已经开始崩溃了，但是它分崩离析的那一击并非来自美洲的任何地方，相反，它来自邻国法国。十多年来，法国一直让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感到恐慌。

## 注释

[1] Alexander von Humboldt, *Cartas americanas*, ed. Charles Minguet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80), 16.

[2] *Ibid.*, 14.

[3] Helmut de Terra, *Humboldt: The Life and Time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114.

[4] Félix de Azara, *Memoria sobre el estado rural del Río de la Plata y otros informe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Bajel, 1943), 5.

[5]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he Island of Cuba: A Political Essay*, intro. Luis Martínez-Fernández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1), 256.

[6] Gastón Montiel Villasmil, *La parentelaz las relaciones femeninas del Libertador* (Maracaibo: Comisión Ejecutiva del Bicentenario del Libertador, 1985), 34.

[7] Salvador de Madariaga, *Bolívar* (Mexico City, Editorial Hermes, 1951), 1:94, 103.

[8] Gerard Helferich, *Humboldt's Cosmo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the Latin American*

*Journey That Changed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New York: Gotham Books, 2004), 262.

[ 9 ] Terra, *The Life and Time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96.

[ 10 ] Octavio Tarquiniode Sousa, *História dos fundadores do Império do Brasil*, vol. 1: *José Bonifácio* (Rio de Janeiro: José Olímpio Editora, 1957), 93.

[ 11 ] Sousa, *História dos fundadores do Império do Brasil*, vol. 9: *Fatose personagens em torno de um regime*, 13.

[ 12 ]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ed. Mary Maples, trans. John Black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20.

## 第二章 王权支柱（1806—1810）

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引起了愤怒和反对。至关重要但非常令人困惑的是，美洲的独立斗争却都起源于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世袭君主制几乎一致的忠诚。这种狂热的忠诚在1806年两位说英语的探险者试图从西班牙手中撬得美洲的一小块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 米兰达入侵美洲

1806年8月，当数百名武装人员（大部分来自美国）进入委内瑞拉小城科罗（Coro）时，英语在荒芜的街道上怪异地回响。这些人几乎都是为钱而来，但称他们为雇佣军似乎有点不公平，因为他们是在虚假的借口下被招募的，据说是为了保护邮件运输。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米兰达（Francisco Miranda）的美洲革命党人，他绝对不是为钱而来，他在欧洲生活了大半生后回到阔别三十年的委内瑞拉。对米兰达来说不幸的是，科罗的人们听说他要来了，在他的人进入城市之前就撤离了。唯一的一次射击是一群神经紧张的人侵者错误地向自己人开火。随着

米兰达一声令下，其手下的人挥舞着亚麻手帕作为某种入侵纪念品和宣传物，这些手帕上有几幅鼓舞人心的画像，其中有一幅是米兰达本人，还有乔治·华盛顿和两名英国军官，分别是海军上将霍姆·波帕姆（Home Popham）和威廉·贝雷斯福德（William Beresford）将军。似乎这还不够鼓舞人心，手帕上还印着乐观的口号，比如“让艺术、工业和商业蓬勃发展”<sup>[1]</sup>。

米兰达还做了其他的准备，以吸引大众加入他的事业。他的远征船队在甲板上放着一台印刷机，一页一页地印制着有关法国的宣言和传单，如《自由》和《人权宣言》，每种2 000份。米兰达长达66岁的一生可以理解为他在科罗扮演的角色的塑造：他的军事训练、他对法国政治哲学的阅读，以及最重要的——他多年自诩为革命者的经历。米兰达见证了乔治·华盛顿（会面过）领导的美国革命和汤姆·潘恩（Tom Paine，后来成为他的朋友和支持者）。自美国以后，他游历了欧洲的英国、荷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希腊、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和法国。在四年的欧洲漫游中，米兰达到处谈论他的革命计划。

1789年5月法国大革命前夕，米兰达在巴黎完成了他的国际旅行，他加入了法国大革命并成为一名将军，并最终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凯旋门上。然而，尽管米兰达的名字被刻在了那座伟大的革命纪念碑上，但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将军，军事失利最终将他打倒。1797年，他放弃法国和法国大革命，在伦敦推行他的计划。在离开法国之前，他和其他几位移居国外的美洲人发起了一场运动。继而，米兰达假冒西属美洲代理人并以此假外交身份来到了伦敦。他很快就忙于为事业游说和出版。在众多出版物中，他翻译和分发了胡安·巴勃罗·维斯卡尔多（Juan Pablo Viscardo）《写给美洲西班牙人的公开信》，作为为美洲独立的辩护。米兰达甚至草拟了一个模糊的计划，将这个实体命名为哥伦比亚（以纪念哥伦布），但这份计划包含

了被称为“印加”(Inca)的统治者(们)和一个位于巴拿马地峡(为了纪念古希腊城邦在科林斯地峡的会址)的联邦首府。

与此同时,米兰达在伦敦定居生活,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买了一个三层独立洋房,娶了一个名叫约克郡的年轻女子为妻,与主要知识分子交往,包括反奴隶制改革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功利主义者(“对大多数人最大的好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以及先锋教育家(“一人教一人”)约瑟夫·兰卡斯特(Joseph Lancaster)。米兰达总是更喜欢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现在,他把自己在伦敦的房子变成了促进美洲独立的国际密谋中心。这场反叛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理性绅士协会(Society of Rational Gentlemen),是他在伦敦专为美洲人建立的共济会分会。19世纪初,共济会风格的小屋在大西洋世界蔓延开来,成为精英政治组织的一种关键模式。

共济会的一员,海军上将波帕姆,与米兰达入侵委内瑞拉的纪念品手帕有相似之处,是米兰达在英国最热心的支持者和合作者。波帕姆把西属美洲看作自由(以及与英国商贸)扩张的温床。在他看来,西班牙是愚昧落后的,这是当时英国和美国很常见的观点。没有西班牙的统治,美洲将会更好,可以自由贸易和发展,并享受(英国)文明的好处。在实际操作中,直接的方法是开放美洲(与英国)的贸易,并关闭与拿破仑的贸易,因为他的阴影已经逐渐覆盖西班牙。外国官员答应提供援助,但波帕姆和米兰达白费心机的等待并无结果。

1805年底,米兰达前往美国寻求帮助。与英国不同,美国没有与西班牙交战,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没有为米兰达计划提供任何资源,但他也没有施加任何干预。对米兰达来说幸运的是,英国的援助终于实现了。有了这个帮助,再加上典当了他宝贵的图书馆,米兰达成功地在纽约置办了一艘小船,并吸引了美国志愿者参与了他神秘但报酬丰厚的探险。其中一位

是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孙子。远征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革命后的海地做准备。这些即兴组建的“哥伦比亚军”在那里接受了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并宣誓“忠实于南美自由人民且独立于西班牙”<sup>[2]</sup>。米兰达举起了他为这次探险设计的新旗帜：以黄、蓝、红三色为基础组成的旗帜，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国旗至今仍以上述三色为主基调。米兰达还写了一份措辞优美的《致南美居民宣言》(Proclamation to the Inhabitants of South America)，并印刷了2 000份。《宣言》要求所有成年男子进入目前仍是假设中的“哥伦比亚军”服役，还规定必须每天在公共建筑中大声朗读维斯卡尔多的《写给美洲西班牙人的公开信》。

虽然经过精心策划，但米兰达吸引大批追随者的愿望在1806年8月的委内瑞拉几乎没有任何反响。尽管米兰达自信地认为他会获得大批追随者，但委内瑞拉忠诚的西班牙臣民显然无意按照他提议的方式获得解放。相反，在被占领的鬼城科罗待了几天后，米兰达意识到，当地的国民卫队正在结集，要粉碎他的小部队，其中一些还是由即将从巴黎回来的西蒙·玻利瓦尔的叔叔率领（米兰达不知道）。1806年8月13日，也即科罗登陆11天后，米兰达的部队撤退并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米兰达1806年远征的结果表明单靠“法国思想”不能在美洲掀起独立运动。科罗居民把米兰达看作外来入侵者也是有道理的。米兰达计划的失败在美国引起公众的愤怒争论，因为它一方面违反了美国的中立原则，另一方面米兰达船上载着57名美国冒险家囚犯。但是一股强烈的反西班牙情绪导致所有被指控者无罪释放。与此同时，一艘英国军舰将米兰达送回英国老家，那里的教堂钟声把他当作英雄来迎接。当米兰达抵达他在伦敦的别墅时，他的英国妻子莎拉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以及几个朋友都等着迎接他，其中一个就是他的朋友波帕姆海军上将，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下面再讲。

## 英军入侵拉普拉塔河也失败了

1806年8月12日，就在米兰达对科罗入侵以微弱之声被挫败的前一天，拉普拉塔河那边的另一次入侵则以震耳的方式结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上，巷内混战带来的滚滚浓烟伴随着爆炸声四处飘散。在海军上将波帕姆的反叛军事行动中，英国士兵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达三周之久。波帕姆在受命接管南非开普敦后私自命令舰队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位海军上将认为，只要他的军队还在南大西洋，不“解放”渴求贸易的西班牙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就太可惜了。

西班牙在该地区的总督索布雷蒙特（Sobremonte）一看到波帕姆的船，就毫无廉耻地迅速出逃，这使得震惊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乎没做任何抵抗就陷落了。指挥入侵部队的将军是贝雷斯福德，他在米兰达的入侵纪念手帕上作为第二个图案出现。要理解波帕姆和贝雷斯福德在做什么，必须认识到19世纪早期版本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英国商业推动的事实。尽管全球化这个词在当时还不存在，但现在一样，全球化的支持者们将自身利益合理化，将其称为一种普遍的利益。事实上，美洲对于英国走私货物有大量的需求，而英国商业界也迫切希望打入西班牙的殖民贸易体系。因此，贝雷斯福德将军在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立即宣布脱离西班牙的垄断贸易体系。他解释说，这座城市的居民现在可以享受自由和文明带来的好处，以及能以一个更合理的价格享用国际产品。许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奴隶因此误解了他对自由的解释而逃离了他们的主人，贝雷斯福德不得不将他们送回给各自的主人，因为他并不想破坏经济秩序。部分西班牙垄断商人以歇业表示抗议，但贝雷斯福德命令他们开门营业。然而，另一部分居民实际上渴望这种解放。

玛丽基塔·桑切斯（Mariquita Sánchez）是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年轻女孩，渴望着快速发展的大西洋世界的清新之风。玛丽基塔 19 岁，刚结婚不久，在那个时代，婚姻定义了女性的人生，而她的婚姻充满传奇色彩。玛丽基塔的父亲是个商人，因此，毫不奇怪地，他是一个欧洲西班牙人并且他商业上的成功是基于他在西班牙垄断体系中拥有的人脉。理想情况下，商业关系就是家庭关系，就是这样。玛丽基塔的父亲在她 14 岁时就安排好了她的未来。他选择了一个他喜欢的未来女婿，一个像他一样的欧裔西班牙商人。玛丽基塔拒绝嫁给这个男人，毕竟，即使是在包办婚姻中，也需要她亲口说出“我愿意”。因此，她的父亲把她送到了一个小女修道院进行看护，而她的父亲的朋友们则把她的情郎——一位朝气蓬勃的英国后裔但出生在美洲本土的海军上尉——部署到了西班牙。这对恋人热情地保持着忠诚，合法地捍卫着他们为爱而结婚的权利，他们最终在总督的亲自裁决下取得了胜利。当时，为了爱情而不是为了家庭利益而结婚成了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这是来自欧洲大量新思想的一部分，尤其是来自法国。尽管自由贸易是贝雷斯福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宣扬的“解放”理念的核心，但它客观上充满了诱人的可能性、孕育了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思想家，就比如邀请贝雷斯福德来家中做客的玛丽基塔夫妇。

尽管 1806 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自由思想家寥寥无几，但抵抗贝雷斯福德入侵的呼声迅速高涨。三周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在蒙得维的亚重新集结，在蒙得维的亚市民的帮助下，西班牙在拉普拉塔河的另一股军事力量夺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赶走了入侵者。何塞·阿蒂加斯（José Artigas）被蒙得维的亚总督派去报告最后一场战斗的结果。当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联合兵团结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主广场时，贝雷斯福德迅速投降并撤退到近海战舰上。夺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雄均隶属于美洲本土国民卫队组织，该组织由一个名叫圣地亚哥·利涅尔斯（Santiago Liniers）的

效忠于西班牙王室的法国军官领导。

阿蒂加斯迅速赶回蒙得维的亚，发现该城已经被铲除异端胜利的喜悦所笼罩，他发现这些反叛者的支持者只比米兰达在科罗时略多。鉴于蒙得维的亚城在夺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中的重要作用，西班牙帝国政府给了它一个新荣誉称号“最忠诚和再征服之城”。

事实上，蒙得维的亚是一个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更重要的军事基地，其防御更严密，拥有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缺乏的优良港口。波帕姆的侦察舰于1805年末的到访已经算是他即将入侵的警告，随后舰队在拉普拉塔河出现，此时蒙得维的亚已经采取积极措施准备应对威胁。蒙得维的亚本地的一家牛肉干公司——当地最成功的实业企业，即便不是最成功的也是最成功的之一——愿意为招募280名志愿者提供资金，这些志愿者是从乡下招募来的，以应对英国的威胁。

负责从高乔暴徒中筛选建立这样一支队伍的是前违禁品线索头目何塞·阿蒂加斯。阿蒂加斯彼时刚刚结婚，并已获准离开他担任了10年队长的骑警部队。他的新娘不是伊莎贝尔·贝拉斯克斯，她显然几年前就去世了，而是他的第一个表妹拉斐拉（Rafaela），一个比他小11岁的女人。然而，如果阿蒂加斯曾经期待过定居生活，而长期寻找游牧高乔人的边境生活已经使他忘记了此念想。这些高乔人习惯在野外生活数月，几乎不需要接受训练就能成为轻骑兵。阿蒂加斯有权对他熟悉的各种走私犯、叛徒和土匪提供他十年前得到过的那种特赦。他还参观了蒙得维的亚的监狱，并在那里为国王征召了几十名可能的候选人。一个名叫贝南西奥·贝纳维德斯（Venancio Benavides）的证词记录如下：“当我需要一件衬衫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工作；当我得到衬衫，我再次跨上马背”，这是高乔人简洁、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sup>[3]</sup> 档案显示，他仅仅是因为开枪打了自己的马而被警察逮捕，然而，当双手已经被绑，贝纳维德斯突然跳到一个警卫的马上，

并把警卫从马上摔了下来，于是警察又不得不开枪打死了那匹马。显然，这种人正是阿蒂加斯寻求的招募对象。

然而，需要比这更大的资产来抵抗接下来的事情。贝雷斯福德将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撤退被证明只是战术上的。10月，他和波帕姆又回来了，并且得到了强大的增援，这一次他们计划先攻下蒙得维的亚。他们在附近的马尔多纳多镇（Maldonado）登陆并洗劫了该镇，并等待时机。布宜诺斯艾利斯显而易见的脆弱唤醒了英国官方对波帕姆流氓远征的支持，在1807年1月中旬，包含大量船只的整个舰队，开始沿着蒙得维的亚外的海滩登陆。对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索布雷蒙特总督曾亲自指挥蒙得维的亚的西班牙军队，但像往常一样，他什么都做错了。由于错误指挥、寡不敌众、强弱差距过大，守军在两周后向英军投降，造成四百人死亡。索布雷蒙特在英人结束围城之前就谨慎地撤退了。

英国占领者宣布了一个新的开始，包括自由贸易和蒙得维的亚的第一份报纸《南方之星》（*Southern Star*），这份报纸将以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出版。不过，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准备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起进攻，而利涅尔斯正在那里组织当地国民卫队进行防御。伦敦派了一位新将军约翰·怀特洛克（John Whitelocke）来指挥这次行动，但英军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进攻以失败告终，这场失败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怀特洛克在1807年7月6日的投降条款中包括了英国完全从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撤出。由于被无能的西班牙总督抛弃，美洲国民卫队打败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欧洲职业军人部队。一种新的自我满足精神注入了防御者的内心。随着利涅尔斯受到民众支持和索布雷蒙特受到蔑视，布宜诺斯艾利斯国民卫队组织和市议会使用了显然超越了他们被赋予的权力——宣布利涅尔斯为总督。布宜诺斯艾利斯国民卫队组织获得的信心将在西班牙君主制危机迫在眉睫时产生深远影响。

波帕姆和米兰达的解放美洲计划中最重要的教训是，他们得到的公众支持是如此的可怜。启蒙运动的新政治哲学对于西班牙殖民地的一些懂法语和英语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或者说就是极有影响力的。然而，总的来说，1806—1807年间，自由的语言对大多数美洲居民来说都是虚假的。英国提供的经济利益也不足以让人们背叛国王和国家，拥抱入侵的“异教徒”。但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就要开始：英国很快从西班牙的世袭敌人变成了盟友。

### 摄政王若昂启程前往巴西

1807年9月8日，拿破仑写给葡萄牙摄政王若昂的信中断了若昂在皇家住宅和修道院马夫拉（Mafra）的隐居生活，这是一个严酷的最后通牒：选边，英格兰或法兰西，立刻决定。面对这个紧急的决定，若昂做了他惯常做的事。他犹豫不决，虽然对英国船只关闭了葡萄牙港口，但没有按照拿破仑的要求逮捕英国臣民或扣押他们的货物。狡猾、拖沓的王子还提出愿意让自己的长子佩德罗（Pedro）给拿破仑的侄女当丈夫。若昂认为，这位傲慢自负的帝王很想看到他的家族和传统的王室成员结婚。此外，拿破仑的侄女是法国穆拉特将军（Murat）的女儿，而此时的穆拉特将军正蓄势待发，准备指挥法国军队入侵葡萄牙。因此，如果穆拉特和若昂恰好在那个时候成为亲家，那将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外交手段。

拿破仑可不愿意把他的法国亲属嫁给葡萄牙王室。相反，他制定了入侵和分裂葡萄牙的计划。为了确保西班牙的合作，他把南葡萄牙作为奖赏，

由臭名昭著的戈多伊（Godoy）统治，后者是西班牙女王的情人。穆拉特的军队借道西班牙向葡萄牙进发，而西班牙自己的军队也准备配合法国的入侵。

若昂很不情愿地开始准备葡萄牙舰队，把王室迁往巴西的老想法又有了新的吸引力。不过，他动摇过。也许不留下战斗是可耻的。作为王室的保全政策，将一些王子或公主派去法国无法祸及的地方是可行的。1807年11月11日，消息传入里斯本称，法国士兵已经进入葡萄牙，正向首都进军。就在同一天，英国舰队抵达里斯本，奉命协助葡萄牙王室撤离。“我们都是王室成员，我们要么都去，要么都不去，”若昂的母亲、疯狂的玛丽亚一世（mad Maria I）以上述论述为葡萄牙王室的去留做了最终决定。<sup>[4]</sup>整个葡萄牙王室，包括成千上万的朝臣和仆人，都将迁往巴西。在此之前，为防止惊动民众，秘密试探性航行的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当准备工作被疯狂地公之于众时，里斯本人民对看到自己的王室在侵略军面前抛弃他们表示失望。里斯本海滨到处是纷乱的马车、手推车、杂乱的衣柜和箱子，里面装着从瓷器、银器到亚麻制品，再到沉重的雕刻框里的家庭画像等所有东西。围观的群众哭喊着面对这混乱的一切。

当穆拉特的士兵进军里斯本郊区时，若昂和卡洛塔·华金纳在不同的海岸登上不同的船只前往巴西。年轻的佩德罗王子和他的疯祖母一起来了，祖母对马车夫大叫，不要像逃窜的强盗那样驾车。若昂发表了最后声明，解释说离开葡萄牙将使葡萄牙不再为他而受苦。为了寻求最后的和解，他下令让穆拉特的军队得到食物和居住条件方面的优待。若昂宣称，法国和葡萄牙注定是朋友。随后，在英国海军护航队的保护下，整个葡萄牙王室家族驾着里斯本港的每一艘能够进行越洋航行的船只出海。

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不在随同王室撤离到巴西的数千名葡萄牙人之列。显然，他本可以陪伴他的赞助人罗德里戈·德·索萨·库

蒂尼奥完成这次航行。博尼法西奥的两个弟弟安东尼奥·卡洛斯和马蒂姆·弗朗西斯科已经回到巴西，在安德拉达家族的家乡圣保罗省担任要职。博尼法西奥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他想回巴西看看了。但是，当远去船队的最后几张帆消失在大西洋地平线上时，博尼法西奥将注意力转向在科英布拉大学（Coimbra University）组织一支学术志愿者队伍以抗击法国侵略者。

与此同时，航行在大西洋上的葡萄牙王室和朝臣开始忍受因仓促而不充分的准备工作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在船上，饮用水、差强人意的食物和空间都变得奢侈。曾在陆地上身着华服的朝臣，脸色变绿、吐得浑身都是。与此同时，佩德罗王子的新家庭教师正让他忙于学习拉丁文课、读维吉尔（Virgil）的书，或者至少努力去读。佩德罗王子根本不是一个勤奋的人，但维吉尔《埃涅阿斯纪》（*Aeneid*）的情节——一个流亡的国王带着有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漂洋过海去建立新王国——吸引了这个九岁男孩的注意力，这是可以理解的。

终于，在1808年1月下旬，若昂的舰队及其英国护卫队驶进了美丽的万圣湾（Bay of All Saints），这里是巴西第一个首都：巴伊亚州萨尔瓦多（Salvador, Bahia）。萨尔瓦多人民欢天喜地，城市元老极力说服他们的君主在这里建立新首都。然而，若昂的心却放在了里约热内卢，他机智地拒绝了巴伊亚人的热切恳求，但在表态之前，若昂宣布巴西所有港口向任何国家的贸易船只开放，尤其是英国。一方面，结束葡萄牙的贸易垄断当然是必要的。葡萄牙，以前是巴西所有贸易的目的地，现在处于敌人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若昂的新盟友英国的一个迫切目标就是自由进入巴西发展商业活动。在若昂踏上巴西土壤后没几天，英国就开始了对于巴西长达一个世纪的商业统治，这并非偶然。事实上，这就是若昂能安全到达那儿的一个条件。

在1808年3月8日，伴随着烟花的绽放，响彻整个城市的教堂钟声，

战舰在壮观美丽的瓜纳巴拉湾（Guanabara Bay）鸣放着礼炮，若昂和他的随从们终于在里约热内卢下了船。城市的元老和兴奋的民众聚集在海滨迎接王室成员，若昂径直走近庄严的游行队伍，聆听人民的呼声，侍从在一边举着丝绸遮阳篷，街上挤满了围观的人。摄政王立刻爱上了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也爱上了他。然而，大多数葡萄牙朝臣对里约热内卢的喜爱远不及摄政王。他的妻子华金纳是最不喜欢这里的一个。

### 拿破仑又入侵了西班牙

与此同时，尽管来自像博尼法西奥这样的人的阻力越来越大，法国—西班牙联军仍然占领着葡萄牙。1808年3月，占领军中有一个名叫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的30岁西班牙军官，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兵。作为一个美洲人，他出生在偏远前哨亚佩耶（Yapeyú）的一个军人家庭，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服役。他童年时只在美洲住了几年，待到上学年纪，圣马丁的父母决定将他送回西班牙读书。圣马丁11岁时与两个兄弟跟随父亲加入了西班牙军队，成为职业军人，并以一个西班牙军人的视角目睹了1791—1808年欧洲历史上的风云变幻。1808年3月，当西班牙发生惊心动魄事件的消息传来时，圣马丁在葡萄牙担任西班牙军队的总指挥。

法国在西班牙北部结集了10万军队，这远远超过支援葡萄牙军事行动所需的兵力。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María Luisa）的情人戈多伊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唆使法国人入侵葡萄牙，最终使得自己声名狼藉，王

后本人也受到牵连。西班牙人还指责卡洛斯四世（Carlos IV）没有控制好他的妻子。声名受创的王室家族和戈多伊远离马德里，住在偏远的宫殿里，以避免城市人群的敌意。人群随后将卡洛斯四世的儿子和继承人——王子费尔南多——视作王国唯一的希望。对王国来说不幸的是，费尔南多的受欢迎程度并不是基于王子的真实品质，其受欢迎程度是人民对于戈多伊仇恨的心理补偿，人民对戈多伊憎恨多少，就对王子喜爱多少。最后，人民连王子的名字也省略了，直接变成了人们口中的“被期望者”（El Deseado）。

渐渐地，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法国皇帝的激进目标变得明确无误。一收到拿破仑要求臣服的最后通牒，西班牙王室就逃去马德里附近的阿兰胡埃斯（Aranjuez）宫殿，准备撤往南方。谣言自阿兰胡埃斯传开，更有甚者说王室打算横渡大西洋到新西班牙去。虽然这样的计划并不存在，但考虑到若昂已经离开里斯本，这个想法还是很有道理的。西班牙人认为如此可怕的想法只能来自戈多伊，于是成百上千的暴徒涌入阿兰胡埃斯寻找他。为了躲避愤怒的人群，戈多伊不得不在阁楼里躲了一天多，他的政治生涯就此永远结束了。在阿兰胡埃斯宫殿周围驻扎的西班牙军队也有着同样的愤慨并最终加入了上述暴民。1808年3月19日，阿兰胡埃斯的暴乱达到高潮，人群强迫卡洛斯四世放弃王位，并让位给费尔南多王子，后者当晚被拥立为国王。几天后，费尔南多进入马德里时，人行道和阳台上挤满了疯狂的人群。

这位所谓“被期望者”立刻开始辜负他的臣民。在法国军队的保护下，他的父亲卡洛斯四世要求其归还西班牙王位，并指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出于糟糕的判断，父子俩接受了拿破仑的邀请，在法国南部的巴约讷（Bayonne）举行了一次友好会谈以解决此事。然而，在巴约讷，费尔南多和卡洛斯四世都事实上成了拿破仑的俘虏，狡猾的法兰西皇帝强迫

他们放弃对西班牙王位的要求并建立新王朝——波拿巴王朝（Bonapartes）。西班牙的第一位波拿巴国王是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Joseph）。卡洛斯四世和玛丽亚·路易莎流亡意大利。西班牙人民不想让他们回来，但是西班牙确实想要费尔南多，但他仍将在法国被继续关押六年。这给了他忠诚臣民将他作为一个象征去继续渴望，而不是去真正了解的理由。

拿破仑变节的消息传遍了西班牙，也传到了在葡萄牙的西班牙军队。1808年5月2日，西班牙爱国日历上著名的一天，马德里人民奋起反抗法国军队，该起义以大规模处决而平息。在尚未被法国占领的其余西班牙各省，各省领导人组成了“洪达”\*（Juntas），他们拒绝承认新波拿巴王朝的合法性，并宣布在国王不能履职的情况下，主权恢复到省一级。省级洪达的第一个倡议是向拿破仑的主要敌人英国寻求帮助。由于这次事变震动了政治格局，圣马丁的部队与昔日的法国盟友分离，撤出葡萄牙回到西班牙。

在西班牙南部的港口加的斯（Cádiz），圣马丁作为西班牙将军核心集团一员，尽可能多地对这些令人困惑的事件进行深入了解。他的指挥官索拉诺（Solano）将军是他的朋友和心腹，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索拉诺也是一个美洲人。尽管等级不同，两人还是发展出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甚至在长相上也有几分相似，这一点对于圣马丁来说太糟糕了，1808年5月下旬的某天成了他一生都难以忘记的日子。索拉诺将军刚刚宣布他决定不率领他的军队反抗法国的占领。元气大伤的他认为，西班牙军队根本无法击败他们强大的前盟友。英国的帮助还有待检验，而索拉诺对反对法国的民间起义也几乎没有信心。不幸的是，起义民众对索拉诺将军同样持怀疑态度，后者在西班牙军队中的声誉是建立在提倡法国式组织和战术之上的。出于控诉索拉诺危险的亲法倾向，一群爱国分子抓住了圣马丁的这位

---

\* Junta 是指在政变中以武力夺取政权并统治国家的集团，也包括一些地区自治组织的机构。本书根据 Junta 一词的音译将其译为洪达。——译者注

朋友、庇护者和导师，并将他撕成碎片。圣马丁自己也曾被误认为是索拉诺，差点丧命。从那以后，圣马丁随身携带一块印有索拉诺画像的金属牌，并从那时起，他就把民主等同于暴民统治。

与此同时，西班牙举国动员反抗法国的占领正在成为现实。在所有的省级洪达中，塞维利亚是最强大的，它自称为“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最高洪达”，原因也很合理，比如这座城市的规模、财富和海外关系，更不用说它离法国遥远的地理位置，加上附近的加的斯港，几个世纪以来，塞维利亚一直主导着与美洲的贸易，同时也是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的主要行政中心。塞维利亚最高洪达因为其对法国取得了两场军事胜利而声名远扬。第一次发生在1808年6月底，这是一次规模很小的冲突。不过，这是西班牙第一次取得胜利，爱国者因此举行了庆祝仪式。对于我们而言，其唯一重要的是当天指挥西班牙军队的下级军官名叫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下个月，圣马丁还在规模更大的拜伦（Bailén）战役中崭露头角，那次战役使约瑟夫·波拿巴在抵达马德里即位仅10天后就从马德里出逃，其尊严受到极大损害。

七年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加起来就是伊比利亚半岛）两国成为英国人口中“半岛战争”的战场，这场战争中，惠灵顿公爵（Wellington）成为拿破仑在战场上的死敌。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来说，半岛战争是一场抵御军事占领、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战争。葡萄牙和西班牙军队主要由像博尼法西奥一样的平民志愿者组成，英军和法军主要由正规军组成。英军的反攻开始于里斯本附近，在那里，贝雷斯福德将军正着手组织葡萄牙志愿者。

1807年至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的史实引发了美洲彻底但缓慢的变化。它促使葡萄牙君主做了其他欧洲君主从未做过的事情——离开，使巴西在当时成为葡萄牙君主政体的所在地。它也在西班牙殖民地引发了一场缓慢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国王不在时，由谁来统治？

欧洲危机的消息延迟了大约六个星期才传到新西班牙。关于法国入侵西班牙、阿兰胡埃斯起义、戈多伊陨落、卡洛斯四世被迫退位、“被期望者”短暂的统治、马德里5月2日大屠杀，以及西班牙地区军事组织相继成立等事件零星的、相互矛盾的报道是最具戏剧性的。在1808年6月到7月的短短两个月里，每周都有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新西班牙民众自发的反应包括对戈多伊失势这一正义结果的满足感、对法国的愤怒谴责，以及对费尔南多王子的亲切关心，新西班牙人民立即接受他为国王，并庄严地在公开仪式上宣誓服从他，尊称其为“费尔南多七世”。总的来说，美洲人看起来与欧洲人一样对“被期望者”保持忠诚，但美洲人对地方洪达的态度要轻蔑很多。军官能代表国王施政吗？不能。如果这些洪达确实是代表国王说话，他们不还是专横的西班牙人吗？

1808年8月，塞维利亚“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最高洪达”的使者出现在墨西哥城——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内规模较小但富饶且强大的城市。欧洲西班牙人希望新西班牙政府承认塞维利亚洪达的最高权威。鉴于塞维利亚洪达对于商业利益至关重要，来自欧洲西班牙人的压力是可以预见的，他们是垄断商业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毕竟，这些人控制了新西班牙的统治机构，但美洲人却实质上控制了墨西哥城议会，正是在这个议会上，塞维利亚自诩的最高洪达代表于1808年8月出现在那里，并呼吁援助和服从。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需要一个特殊术语来描述。塞维利亚的使者被邀请参加墨西哥城议会的“公开市政会议”（西班牙语为 *Cabildo Abierto*）。公开市政会议是西班牙传统自治的基层组织，其参会成员包括任何值得被听取意见的人，基本上也就是少数有钱人。参会者包括文官、军官、教会官员、（在大城市如墨西哥城的）高等法院（也被称为“检审庭” [audiencia]）法官、官方垄断商人行会（也被称为“领事馆” [consulado]）的成员。就像在整个美洲一样，这些要人基本都是欧洲西班牙人。但很显然，普通的市

政会议成员也参加了本次公开市政会议，这些人主要是美洲人。

在1808年墨西哥城的公开市政会议上，神父塞尔万多·特蕾莎·德·米耶尔（Servando Teresa de Mier）直言不讳地说，欧洲西班牙人的主要利益是保持他们的贸易垄断。这位牧师（西蒙·罗德里格斯的前室友）在其短暂的墨西哥城逗留期间所表现出的桀骜不驯很快就使他再次流亡国外。他的观点不言自明，但令人痛心。由于欧洲西班牙人广泛地执政，西班牙的贸易垄断表明新西班牙依旧被当作殖民地对待。但是，新西班牙的美洲人更愿意把自己看作勇敢的征服者的后代，这些征服者打败了阿兹特克人，在美洲建立了一个新王国。在一场后来传遍整个西半球的争论中，墨西哥城1808年公开市政会议上，勇敢的美洲人引用了一个无懈可击的西班牙政治传统来否认国王在美洲的王国是西班牙殖民地的想法。他们坚持认为，西班牙和新西班牙是由同一君主统治的两个独立王国。美洲西班牙人不必服从欧洲西班牙人，只服从于费尔南多。在那几个月里，流传着这样的比喻，西班牙和新西班牙是费尔南多王冠上独立而平等的两根支柱。西班牙的各类洪达只能决定西班牙事务，新西班牙事务应该由其自己决定。

这种说法之所以更有说服力与当时西班牙各种洪达的内部混乱有关。尽管塞维利亚洪达标榜自己是西班牙和西印度的最高洪达，但它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地区洪达。西班牙其他地方洪达不接受塞维利亚的指挥。事实上，在1808年墨西哥城会议期间，某人收到来自另一个西班牙政府洪达的信，警告塞维利亚关于其统治地位的虚假宣传。简而言之，市议会开始考虑成立自己的洪达来支持费尔南多七世。

与此同时，新西班牙总督伊图里加雷（Iturrigaray）在不确定性气氛中比大多数人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他是一名政治任命官员，其职位是由备受鄙视的戈多伊任命。伊图里加雷在墨西哥城的欧洲西班牙人中树敌众多，只有美洲人的政治支持才使其能保住政治地位，但伊图里加雷对美

洲人的同情在西班牙王室、教会、商人团体和矿业贵族间传递了一丝危险的信号。为了保证西班牙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的安全，欧洲派系组织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政变，并且于9月中旬逮捕了伊图里加雷，用一个他们可以控制的美洲人来代替他。在索布雷蒙特失宠后不到两年，又一位西班牙总督倒台。美洲的一场大变革正拉开帷幕。

就目前而言，那次改革对富人最有意义。以居住在墨西哥城的19岁年轻女子、最近成了孤儿的莱昂娜·比卡里奥（Leona Vicario）为例，她父亲是一个富有的欧洲西班牙商人，娶了一个贫穷但体面而有魅力的美洲人，这是当地普遍的模式。莱昂娜的家产使她成为一位拥有许多仆人和大房子的女主人。年轻、聪明、有才华、富有，再加上孤儿身份，莱昂娜非常适合结婚。在1808年激动人心的政治事件中，她与一位同样富有魅力的年轻男子的订婚占据了当时生活的全部。事实上，莱昂娜的未婚夫来自传说中拥有瓜纳华托（Guanajuato）的巴伦西亚纳（Valenciana）银矿家族的一个分支。莱昂娜未来的公公和总督伊图里加雷关系密切，密切得以至于总督的倒台把他也拖下了水。由于害怕欧洲西班牙人的报复，莱昂娜的未婚夫不得不离开她，逃离新西班牙。欧洲西班牙人和美洲西班牙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决定了莱昂娜未来几年的政治方向。

### 会见曼努埃拉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12岁的女孩曼努埃拉·萨恩斯（Manuela Sáenz）的生活中，她住在一个小得多的城市——基多（Quito）。曼努埃拉并不富

有。她的父亲，像莱昂娜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富有的欧洲西班牙商人，但没有娶她的母亲，她母亲在婚外产下曼努埃拉。1809年3月底的一个午后，基多鹅卵石街道上回荡着的马蹄声将曼努埃拉和她的母亲唤到窗前。胡安·皮奥·蒙图法尔（Juan Pío Montúfar），即塞尔瓦·阿莱格雷侯爵（Marqués de Selva Alegre），是基多一个重要美洲家庭的首领（洪堡在城里的时候就住在他家，他的儿子卡洛斯还和洪堡一起爬上钦博拉索火山），他被警卫押着作为囚犯进城，因为密谋反叛西班牙政府而被捕。

在基多，就像1809年初的整个美洲一样，人们正在努力收集、解释和吸收欧洲的新闻。他们刚听说费尔南多登上王位，就听说约瑟夫·波拿巴把他推下了王位。他们刚听说“塞维利亚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最高洪达”成立，就又听到某个新中央洪达宣称它拥有更大权力。现在谁代表合法王权？在整个美洲，新西班牙总督辖区提出的观点被一遍又一遍地提及：西班牙洪达不能代表国王发号施令；美洲的地位并不屈居于西班牙之下。争论的结果是，在没有合法国王费尔南多的情况下，他的臣民应该像在西班牙一样，在美洲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以他的名义组建临时洪达来统治，直到他归位。发生于1809年3月的基多密谋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迫于公众的压力，基多市检审庭的西班牙主席最终释放了蒙图法尔等人，宽慰了基多大量愤怒的美洲人。

这些政治事件直接关系到曼努埃拉的家庭。她那拥有欧洲血统的父亲在基多声名显赫，是蒙图法尔家族的死敌。现在，曼努埃拉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她的父亲完全抛弃了她。曼努埃拉的家族不认为蒙图法尔是一个有罪的阴谋者，而是一个英雄。曼努埃拉青少年时期对欧洲西班牙人的同情心变淡，部分出于个人原因，但当时类似的心态变化在整个安第斯山脉都在发生，最明显的是在上秘鲁（Upper Peru）的丘基萨卡（Chuquisaca）和拉巴斯（La Paz）。

与基多类似，丘基萨卡也推翻了当地检审庭的西班牙主席。丘基萨卡的反叛涉及该法院所有法官、美洲人律师、混血人和愤怒的民众，他们反叛的原因是有传言称该主席接受了现居于里约的葡萄牙摄政王之妻、“首席诽谤者”卡洛塔·华金纳的外交提议，后者毕竟是来自西班牙的公主。事实上，她是费尔南多的妹妹，是其家族中唯一没有在1809年被拿破仑控制的成员。

丘基萨卡的叛乱激励了附近城市拉巴斯市议会的反叛，他们于1809年7月罢免了王室行政官，并大声宣示自己对费尔南多七世的忠诚。拉巴斯的叛乱比丘基萨卡的更进一步，他们建立了洪达，并向上秘鲁说克丘亚语（Quechua）和艾马拉语（Aymara）的印第安人寻求支持。这场运动的领袖佩德罗·多明戈·穆里略（Pedro Domingo Murillo）是一个混血儿，但他非常富有。拉巴斯洪达的宣言是迄今为止最大胆的美洲独立主张——从西班牙独立，但当然不是从“被期望者”那里独立。拉巴斯洪达成立不到一个月，美洲的起义者在基多再次出击。大约50名代表在1809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一位拥有自由思想的美洲爱国主义夫人的家中）会面，他们决定推翻检审庭主席，并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在塞尔瓦·阿莱格雷侯爵的领导下组建了自己的洪达。基多人连续三晚用蜡烛点亮窗户以示庆祝。洪达迅速监禁了怀有敌意的欧洲西班牙人，比如曼努埃拉的父亲。

对于拉巴斯和基多的洪达来说不幸的地方在于，利马附近的西班牙总督是被派往美洲的最能干的殖民总督之一。到了1809年，阿瓦斯卡尔（Abascal）总督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统治者。他在加勒比、新西班牙总督辖区、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服役，包括在成为秘鲁总督之前在瓜达拉哈拉担任了七年的检审庭主席。在管理西属美洲的工作方面，阿瓦斯卡尔总督的工作卓有成效，他修建了防御工事、在秘鲁的深井银矿中引入了蒸汽动力，建立了一个植物园和一所医学院，最近还为西班牙抵抗拿破仑的爱国

运动筹集了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在阿瓦斯卡尔的严厉施政下，利马的美洲人宣誓效忠新中央洪达，也未公开表达对秘鲁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地位的质疑。

当基多和拉巴斯叛乱的消息传到利马时，阿瓦斯卡尔迅速而致命地做出了回应。到1809年11月，总督军队已经剿灭安第斯高地起义洪达的所有武装部队。在拉巴斯，他们处决了佩德罗·多明戈·穆里洛（Pedro Domingo Murillo）和其他8名叛军。同样地，阿瓦斯卡尔的军队也镇压了基多洪达。基多的贵族起义人士中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但有60人被处以无限期监禁。在针对基多众多反抗人士的指控升级态势下，曼努埃拉的父亲也在其中，他刚刚从监狱获释。

尽管曼努埃拉的青少年时期充满戏剧性，但还有很多其他事件发生了。例如，她的奴隶赫纳塔斯（Jonatás），一个只比曼努埃拉大两三岁的女孩，是真正陪伴曼努埃拉一生的重要伴侣。当曼努埃拉同父异母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年龄是她两倍的西班牙人去了西班牙后，曼努埃拉终于享受到了家庭的欢乐。然而，她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仍然不稳定。这还不是她唯一的麻烦。在社会保守的基多，妇女和儿童只有被看见的权利，而没有发声的权利，曼努埃拉桀骜不驯的性格在那里制造了持续不断的摩擦。很快，她的母亲就会把她送到一所修道院学校学习，那里完全不适合曼努埃拉这样有自由精神的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她的叛逆倾向更多的是出于个性而非政治。

曼努埃拉·萨恩斯、莱昂娜·比卡里奥和玛丽基塔·桑切斯——注定会成为最著名的美洲爱国者——她们都有显著区别于其父辈的独立性。曼努埃拉与她父辈的关系疏远，莱昂娜失去了父亲而玛丽基塔在一场官司中击败了她的父辈。在父权统治的社会中，这些年轻女性失去、逃脱或反抗了父族权威，难怪她们最终会毫不犹豫地反抗那位常被称为“父王”的统治。

## 西班牙对抗拿破仑的起义失败了

回到西班牙，圣马丁在1809年11月帮助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抵抗法国入侵。西班牙的爱国志士没能组成正规军，而是像与威灵顿合作的葡萄牙爱国志士一样，组成非正规部队。他们很少采用固定战斗队形敲着鼓、挥舞着旗帜与法军正面对抗。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爱国志愿军进行了游击战，以秘密、出其不意和打了就跑的战术来对抗强大的敌军。当然，这些战术并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但他们给这些战术起了今天我们仍然使用的名字。在这场战争中，圣马丁参与的是训练、组织和联络工作，因为他病得很重，所以不参加战斗。很明显，这是他患上肺病——肺结核——的最初征兆，随后他又对抗病魔几十年。

1809年在塞维利亚康复期间，圣马丁目睹了西班牙试图建立统一抵抗政府的过程。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塞维利亚是中央洪达的主要所在地，这是一个由西班牙各地区洪达两名代表组成的联盟组织。塞维利亚所谓“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最高洪达”在一开始反抗中央洪达的权威。然而，中央洪达最终也确实得到了整个未被占领西班牙地区的承认。

然而，中央洪达无法阻止法国逐渐向南席卷西班牙乡村。1809年底，拿破仑亲自率军以20多万人的压倒性优势重新将约瑟夫·波拿巴扶上马德里的西班牙王位，当时西班牙的爱国抵抗力量全面崩溃，中央洪达不得不从塞维利亚逃到附近的加的斯港（Cádiz）。最终，西班牙抵抗政府失去了除加的斯岛以外所有西班牙领土。加的斯岛是一个准岛屿，在那里，西班牙可以用英国战舰的炮火进行防御，并与美洲保持联系。中央洪达一到加的斯就解散了，并将其摇摇欲坠的权力移交给了新成立的摄政议会，摄政议会声称直接代表费尔南多，但这并不令人信服。现有的地方洪达，包括加的斯洪达，都

迟迟不接受摄政议会的权威。加的斯洪达非常担心这些坏消息可能会影响美洲，因此禁止船只离开。但是坏消息不是通过航行传播，而是飞速传播。

### 美洲人在克雷塔罗（Querétaro）组织起来

西班牙抵御拿破仑入侵的明显失败鼓舞美洲军民在新西班牙建立自己的洪达。美洲人现在开始同情被罢黜的亲美（洲）总督伊图里加雷，这种情绪第一次出现是在1807年伊图里加雷曾领导的国民卫队组织中。新西班牙的20个步兵国民卫队营和24个骑兵国民卫队营聚集在哈拉帕市（Jalapa）附近的高原上，这是新西班牙抵御海上入侵的战略重镇，他们为此进行了几个月的训练和团建。近期发生的入侵科罗、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给了他们很多谈资。当伊图里加雷亲自去指挥他们的演习时，每个单位都竞相在技术和热情上超越对手。不管他有什么缺点，伊图里加雷都会在粗犷的男性社会式的军营中保持胜利者的风度，在几周的军事演习中，许多美洲军官都对他个人表现出忠诚的态度。

在我们的故事中，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伊格纳西奥·阿连德（Ignacio Allende），一个40岁的富有美洲人，来自圣米格尔（San Miguel）镇，离伊达尔戈的多洛雷斯村不远。当1808年墨西哥城的欧洲西班牙人推翻了总督伊图里加雷时，阿连德受到刺激，采取行动反对欧洲白人，他加入了一个试图在新西班牙建立新洪达的起义，即所谓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密谋。阿连德很不幸，密谋的消息传到了西班牙政府的耳朵里。政府对心怀不满的美洲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与在拉巴斯处决佩德

罗·多明戈·穆里洛等混血儿的严厉对待形成鲜明对比。然而，阿连德一获释便继续从事组织起义工作。

1810年3月，阿连德和其他国民卫队军官与伊达尔戈在他多洛雷斯村的家中会面。表面上看，这些军人似乎对这位世俗牧师的著名聚会很感兴趣，但实际上他们是来邀请伊达尔戈参与起义的。伊达尔戈已经47岁，正在享受着自己多样化农业和其他项目的成果。他过得舒舒服服，受人尊敬，美满的私生活令人嫉妒，但伊达尔戈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梦想家，并且永远无所畏惧。此外，他多年来也像洪堡、杰斐逊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忠诚地信奉自由。即使在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之后，伊达尔戈仍然对法国思想充满好奇。他经常去瓜纳华托和阿连德的家乡圣米格尔。这些城市在1810年充满了令人不安的言论。西班牙抵抗军的灾难性崩溃，只留下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几乎是真正离岸的加的斯政府。即使是这个小政府，也可能很快沦陷。拿破仑和傀儡西班牙国王约瑟夫一世会试图控制新西班牙吗？在新西班牙建立洪达的理由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阿连德来了没多久，伊达尔戈就同意加入所谓克雷塔罗密谋。

克雷塔罗市位于莱尔马（Lerma）河流域北侧，莱尔马河流域中部构成新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巴西奥（Bajío）。巴西奥既是一个大粮仓，又是银矿主脉的所在地，大约位于瓜纳华托市的下部平原，洪堡在访问新西班牙时，曾在这里逗留并为之感到惊叹。克雷塔罗密谋把伊格纳西奥·阿连德等国民卫队军官，包括药剂师、法官和牧师在内受过教育的上层城市人聚集在了一起，甚至克雷塔罗市首席皇家官员也参与了密谋。密谋者们计划通过宣布组建美洲洪达来捍卫费尔南多七世的权利，他们为此选择了一个适合起义的时机——热闹的圣胡安·德·洛斯·拉戈斯（San Juan de los Lagos）乡村集会，届时那里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印第安人和混血儿。集会于每年12月的某两周举行一次，营地内人们交易马、骡

和驴等牲畜，并以纪念圣母的名义举杯欢庆。

伊达尔戈同意在克雷塔罗的密谋中扮演关键角色。伊达尔戈为当地农民所熟知，也深受他们的喜爱，他在动员他们参与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密谋者认为农民起义是至关重要的。巴西奥有无数的农村居民，他们不再生活在美洲传统的印第安人社区，而是从事农业劳动，过着更加不稳定的生活。在这里，饥荒是穷人的家常便饭。在1766年，成群结队的巴西奥农民参加了大规模的反对欧洲西班牙人的抗议活动。密谋者希望伊达尔戈神父帮助他们掀起类似的反欧洲情绪。伊达尔戈在印第安农民中享有威望，因为他尊重他们，能够将他们组织起来，同时也因为他是神职人员。

但是，任何关于法国自由的言论都会让聚集在圣胡安·德·洛斯·拉戈斯乡村集市上虔诚的人们感到失望。阿连德觉得他必须向伊达尔戈强调这一点，伊达尔戈已经在制造背带枪、长矛、弯刀和其他原始武器，准备在起义那天分发。伊达尔戈总是渴望面对实际的挑战，他甚至尝试过分发几门大炮。阿连德不希望事情失去控制。阿连德告诉伊达尔戈，新西班牙老百姓可能会加入反抗欧洲西班牙人统治者的起义，特别是如果这些统治者已经沦为拿破仑的傀儡，但是他们永远不会起来反抗“被期望者”，对于建立共和国也没有丝毫兴趣。圣胡安·德·洛斯·拉戈斯计划中的起义口号必须是“西班牙统治者去死！费尔南多七世万岁！”<sup>[5]</sup>

### 戴上费尔南多的面具

1810年，27岁的西蒙·玻利瓦尔回到委内瑞拉。尽管玻利瓦尔在理论

上拥护自由，认为共和政体优于君主政体，但他在日常事务中仍像委内瑞拉傲慢的曼图亚诺家族大地主一样行事。想象一下，他带着一队武装奴隶来到一片有争议的土地上种植靛青作物，另一个土地所有者也带着一队武装奴隶，并接受他的挑战。这两个种植园主最终在他们的奴隶面前扭打起来，奴隶将他们分开。玻利瓦尔感到遗憾的是，他必须将邻居的“奇怪行为”通知当局，并让后者将其逮捕。不久之后，当这些当局要求年轻的曼图亚诺种植园主在他的种植园附近担任地方官员时，玻利瓦尔因没有时间而傲慢地拒绝了。这些无足轻重的地方当局以为他是谁？

与此同时，西班牙君主制的合法性危机在加拉加斯日益加剧。1808年7月，拿破仑篡夺西班牙王位的消息传来，加拉加斯人民立即、自发、压倒性地宣示对费尔南多国王的强烈忠诚。然而，这一次，人们对法国影响其宗主国的恐惧是有根据的。1810年4月，西班牙派驻在委内瑞拉的将军是比森特·恩帕兰（Vicente Emparán），正是这位西班牙军官在1799年欢迎洪堡到库马纳并赞扬他的工作。与伊达尔戈或圣马丁不幸的上司索拉诺将军一样，恩帕兰被称为“亲法派”，这意味着他对于法国科学、文学和政治文化过度崇拜。只不过恩帕兰在委内瑞拉多年的出色治理弥补了他不受吸引的亲法派人设。恩帕兰的朋友和同事也有亲法倾向，其中包括西蒙·玻利瓦尔和他来自法国的姻亲费尔南多·托罗。在一次聚会上，玻利瓦尔甚至在恩帕兰将军面前为西班牙暴政的结束祝酒——多么荒诞的一幕。

1810年4月19日，一艘船在拉瓜伊拉靠岸后仅仅4天，西班牙对拿破仑的抵抗明显崩溃了，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公开市政会议上大家决定组建洪达，外面的人群纷纷高喊：“法国人去死吧！费尔南多七世万岁！”恩帕兰率领手下向市议会首脑投降。洪堡认为加拉加斯的精英阶层是美洲最外向的（因此也是最进步的），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洪达废除了贸易限制、出口关税、印第安贡品制度和奴隶贸易制度。此外，既然英国支持费尔南多

七世反对拿破仑，加拉加斯最高法院计划向伦敦派遣外交使团。

西蒙·玻利瓦尔自荐为特使，但洪达犹豫不决。这位斗志旺盛、缺乏纪律的年轻士兵是不是执行这一微妙任务的合适人选？玻利瓦尔通过提出自掏腰包支付整个任务费用的建议终结了争论。然而，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加拉加斯洪达派了几位更睿智的年长者和玻利瓦尔一起前往伦敦。其中一位是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他曾教过玻利瓦尔并且会说英语。（幸运的是，对于玻利瓦尔来说，安德烈斯·贝略和西蒙·罗德里格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成了他们这一代人中全美洲最伟大的教育家。）洪达向玻利瓦尔提供了来自“费尔南多七世，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国王，并以其王室名义维护其在委内瑞拉最高洪达的权利”的外交文书。<sup>[6]</sup>由于了解玻利瓦尔的情况，他们对挥霍行为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以免在伦敦留下不好的印象。最后，洪达告诫玻利瓦尔说，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不是费尔南多七世的忠实臣民。尽管可能有必要与他在伦敦接触，但玻利瓦尔应该和米兰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坚决不要鼓励他回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同意了他们的条件，但是，就像阿连德和伊达尔戈在新西班牙一样，他将自己的真实意图用“费尔南多的面具”掩饰了起来，正如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共和党革命者不真诚地使用国王的名字一样。

1810年6月初，加拉加斯洪达的使节登上了一艘英国军舰，很快就在一个月后抵达了英国。玻利瓦尔直接去见了米兰达，后者利用他在外交部门的关系为双方安排了一次非正式的、毫无结果的面谈。米兰达还把他的客人介绍给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美洲人，玻利瓦尔和贝略甚至还花了一些时间去伦敦的酒吧。贝略第一次来到欧洲，他非常喜欢这种移居国外的生活，因此再也没有回到委内瑞拉。带着西班牙口音、代表洪达来到伦敦，真是个好时机。就像西班牙语中的自由主义和游击战一样，洪达这个词在这个时候被融入英语，带着一种时尚而友好的光环。玻利瓦尔直接违抗命令，

说服米兰达回到委内瑞拉，赌这位年迈革命者的智慧、威望和关系能帮助他赢得任何对抗西班牙以及费尔南多七世的战斗。米兰达，曾经的梦想家，决定再一次向他的英国家庭告别——事实上是永别，正如后来发生的那样。

与此同时，与塞维利亚洪达一样，加拉加斯洪达也很难得到邻国的认可。委内瑞拉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而加拉加斯则是最近才成为首都的。在此之前，库马纳和科罗分别是委内瑞拉东部和西部的首都。库马纳组建了自己的洪达，决定有条件地承认加拉加斯的领导，但科罗拒绝了。小城市纷纷效仿，引发了国内战争的恐慌，类似的内战阴云很快就盘旋在美洲上空。

### 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革命

马里亚诺·莫雷诺（Mariano Moreno）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年轻的美洲革命者，他在1810年也戴着国王“费尔南多的面具”并以他的革命热情闻名于世（尤其是在他的敌人中间）。莫雷诺是皇冠上耀眼的明珠，他帮助发动了1810年最持久的美洲革命，但自己只参加了几个月。

1810年5月，莫雷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检审庭获得一份优渥的工作，考虑到他家庭微薄的收入，这份工作可以算作重大个人成就。只是因为莫雷诺在学生时代靠才华吸引了一位慷慨的资助人——一位崇拜他的主教，莫雷诺才得以进入远在丘基萨卡的拉普拉塔辖区的重点大学学习。莫雷诺的早年生活受到保护，几乎与世隔绝。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他的教会赞助人家里。莫雷诺获得了神学学位和法律学位，随后让他的家人（他们希望他

能成为牧师)失望了,莫雷诺结了婚。莫雷诺去了附近被称为“银山”的波多西(Potosí)——丘基萨卡城因它而存在,随后莫雷诺被原住民虐待矿工的情形吓坏了,这些矿工仍然在臭名昭著的、被称为“米塔”(Mita)的殖民劳工制度下受苦。在丘基萨卡做了短暂时间的律师之后,莫雷诺决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正值英国入侵。甚至在波帕姆的流氓远征出现之前,聪明而雄心勃勃的莫雷诺已经成为检审庭的秘书。

在1806年英国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英国商船迅速聚集在近海提供各类诱人的商品,莫雷诺开始相信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和优点,但当然不是在英国统治下。在英国人被驱逐后,莫雷诺公开主张结束官方贸易垄断。这个观点为他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同时也带来了朋友。一群经常在玛丽基塔·桑切斯·德·汤普森(她婚后的名字)家举行社交聚会的温和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意莫雷诺的观点。此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主作为一个集团,迫切希望自由贸易。就连长期担任该市商业协会秘书的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Manuel Belgrano)也认为,与英国的直接贸易已经成为一种经济需要。贝尔格拉诺是一位相当老练的贸易分析师,他的论点很简单:随着西班牙逐渐被法国占领,西班牙的港口变成了敌人的港口。与此同时,英国和西班牙成了盟友。那么,为什么不与英国进行贸易呢?无论是合法的还是违禁品,与英国的贸易似乎注定要发生。事实上,除了少数垄断商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中并没有多少人不赞成自由贸易。利涅尔斯总督容忍了这种情况,直到他被一个从西班牙派来的新人接替。

玛丽基塔·桑切斯和她的丈夫马丁·汤普森在1808年至1810年的政治动荡中被彻底清洗了。玛丽基塔按照法国沙龙的模式主持晚间聚会,客人欣赏音乐、跳舞、讨论文学和时事,偶尔还会有科学演示,但这位年轻的母亲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另一个也即将出生。当她在照顾孩子的生活中忙得不可开交时,几位经常光顾她的沙龙的客人,包括贝尔格拉诺,成了

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用自己的国民卫队击败了两次英国入侵后变得相当自信。因此，当5月份传来法国已将西班牙抵抗军从地图上彻底抹去的消息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洲人迅速做出了反应。

贝尔格拉诺和胡安·何塞·卡斯特利（Juan José Castelli，贝尔格拉诺的表弟，长期的同谋，也是玛丽基塔的另一个朋友）要求召开一次公开市政会议，为了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请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民选国民卫队指挥官科尔内略·萨阿韦德拉（Cornelio Saavedra）。支持者聚集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卡斯特利在大厅里发表了他的观点，这一观点当年在全美洲都能听到：在费尔南多七世缺席的情况下，他的美洲臣民应该建立自己的军政组织。在市政厅内部和外部都占人数优势的美洲人共同保证了胜利。1810年5月25日，市政会议任命萨阿韦德拉为新洪达主席，该洪达还包括贝尔格拉诺、卡斯特利和担任秘书的玛丽亚诺·莫雷诺。

虽然仅仅作为秘书，莫雷诺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他同时担任战争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他以近乎无情的专一态度来完成这些任务。莫雷诺致力于巩固所谓1810年5月革命，建立洪达的武装力量，并在6月开始发行的一份报纸上宣传洪达的意识形态。洪达是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成立的，而且，其主席萨阿韦德拉是一个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因此，莫雷诺、贝尔格拉诺和卡斯特利都牢牢地佩戴“费尔南多的面具”，但莫雷诺的真正意图包括建立一个南美联邦，为此他对美国宪法进行翻译并将其作为典范。莫雷诺因迫害欧洲西班牙居民而赢得了“无情革命者”的名声，当他得知被废黜的总督利涅尔斯正在密谋反抗洪达时，莫雷诺毫不留情地将他处决了。与此同时，卡斯特利和贝尔格拉诺分别着手维护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在上秘鲁和巴拉圭的军事权威。

在莫雷诺的活动仅仅进行了几个月之后，保守党就将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赶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并把他送往伦敦执行外交任务，由此

将他安全地排除在外。那个被一些人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人在前往伦敦的途中死亡。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

### 洪达在新格拉纳达大量涌现

随着西班牙军事和政权崩塌的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加拉加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其中一位传播上述消息的人就是卡洛斯·蒙图法尔，他就是洪堡那位来自基多的年轻旅伴，曾陪同洪堡和邦普兰回到欧洲，并于1810年作为自由的倡导者回到美洲。蒙图法尔被认为是加的斯摄政议会的代表之一，但他鼓励在美洲设立洪达。1810年5月，蒙图法尔抵达卡塔赫纳——西班牙位于加勒比海新格拉纳达海岸坚固的海军基地。与加的斯摄政议会的意愿相左，卡塔赫纳强大的商人团体已经将与英国船只进行贸易的权利作为其绝对的诉求。蒙图法尔来自西班牙的坏消息刺激了卡塔赫纳市议会。6月，一场长达10小时的公开市政会议罢免了卡塔赫纳的王室总督，并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建立了地方洪达。

新美洲当局从卡塔赫纳恶臭的地牢中释放了一个瘦弱的囚犯——安东尼奥·纳里尼奥（Antonio Nariño），可以想象他的兴奋之情。纳里尼奥是波哥大人，已经快50岁了，他因其共和思想在监狱里度过了15年。纳里尼奥更像是一个早出生20年的莫雷诺，也像是一个一直待在祖国的米兰达。1781年，在目睹了几名抗议增税的起义者被残忍处决后，纳里尼奥宣布放弃他的军官职务，转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与莫雷诺一样，纳里尼奥是一个勤奋的读者，他被法国书籍深深地迷住，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王室

政府财务主管；他还是王室垄断企业奎宁（金鸡纳碱）的管理者；最重要的是，他还是商业出版社的经营者。当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纳里尼奥就像伊达尔戈那样，举办了沙龙晚会，讨论法国政治哲学家和来自欧洲的新闻。纳里尼奥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收藏了一些禁书，放置于他特别崇拜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半身像旁边。就像伊达尔戈一样，并且也部分地因为他（后面我们会看到），安东尼奥·纳里尼奥异乎寻常地早早成为一名彻底的革命者。

1794年，纳里尼奥阅读了法国革命制宪会议的历史，其中包含了宣言的全文——《人权宣言》。他把文件翻译成西班牙语，并找机会要求出版社印刷了100份。因为很快被王室当局发现，纳里尼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找到并公开了纳里尼奥的禁书。监管禁书是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职权范围，它公开烧毁了纳里尼奥的译本，然后审判这位激昂的革命者，判处他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惩戒场所服10年劳役。

然而，纳里尼奥在船停留加的斯港期间，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逃了出来，并径直向革命时期的巴黎进发。在巴黎，这位固执的美洲异见人士会见了弗朗西斯科·米兰达（Francisco Miranda），后者还没有转移到伦敦活动。1797年4月，纳里尼奥在离开新格拉纳达后不到一年就伪装成牧师回到故土，试图将他和米兰达等少数亲法美洲知识分子的愿景变为现实。在新格拉纳达农村的旅行中，纳里尼奥发现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的共和党愿景，到了7月，他又成了一名囚犯。随后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直到1803年获得人道主义释放。

1809年，当胡安·皮奥·蒙图法尔建立基多洪达激励了波哥大爱国主义情绪的消息传出时，纳里尼奥还在康复中。一位名叫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的波哥大市政会议员向总督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谴责王室的不良管理，并要求美洲人组建自己的洪达的权利。这位心生不满的总督

粉碎了议员的妄想，一并惩罚了许多并未参加这场企图颠覆王室统治的无辜者，其中就不幸地包括了纳里尼奥。他被送到了卡塔赫纳密不透风的地牢。在途中逃跑后，他又被抓了回来，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监禁，他几乎奄奄一息。1810年6月，卡塔赫纳洪达解救了他。

接下来的几周，这位憔悴的革命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新格拉纳达的几座次要城市在卡塔赫纳的领导下，组成自治军。公开市政会在卡利（Cali）、潘普洛纳（Pamplona）和索科罗（Socorro）建立了洪达。1810年7月20日，美洲爱国者在波哥大市主要广场故意挑起了一场与欧洲西班牙人的事端，引发了暴乱。负责平息暴乱的美洲国民卫队拒绝干预，市政会也说服总督，只有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组建地方洪达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尽管总督仍希望主持新的洪达，但抵抗情绪将这场运动领向了不同方向——人们希望逮捕不受欢迎的欧洲西班牙人，这也包括总督本人，后者被激动的人群粗暴对待，他的朋友劝说他离开此危险之地，并最终离开波哥大。这样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整个新格拉纳达的二线城市都成立了各自的洪达。

当安东尼奥·纳里尼奥从卡塔赫纳到波哥大沿着马加达莱纳河逆流而上时，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这个西班牙在拉美最分散的殖民地在总督的统治下产生了比美洲任何地区都多的公开市政会和洪达。从混乱中恢复秩序将是纳里尼奥自封的任务——如果他的身体保持健康且能暂时离开监狱的话。

## 智利也成立了洪达

智利是美洲离西班牙最远的地区。在1810年，很少有船能艰难地绕过

大陆最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智利和西班牙之间的正常通信是通过太平洋沿岸进行的，需要在巴拿马和利马中转。因此，当所有其他美洲人已经听说了中央洪达撤退到加的斯并随后解散的消息后，智利才在晚些时候收到这一消息。同年9月18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了公开市政会，并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成立了洪达。卡雷拉（Carrera）家族是圣地亚哥最重要的家族之一，牵头组织了这次活动，包括其中一场盛大的庆祝舞会。负责准备工作的是优雅的弗兰西斯卡·哈维拉·欧多西亚·鲁德辛达·卡门·德·洛斯·多洛雷斯·德·拉·卡雷拉·伊·维杜戈（Francisca Javiera Eudoxia Rudecinda Carmen de los Dolores de la Carrera y Verdugo）女士（下文简称为“哈维拉·卡雷拉”），与玛丽基塔·桑切斯相似，哈维拉·卡雷拉是一位贵族年轻女子，主持了一个类似于革命组织的夜宴沙龙，那里聚集了圣地亚哥最耀眼的知识分子。几个参加过卡雷拉聚会的人（包括她自己的三个兄弟）都被认为会是智利新政府的领导成员。

然而，圣地亚哥洪达的核心是胡安·马丁内斯·德·罗萨斯（Juan Martínez de Rozas），他成为核心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学识渊博，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在智利第二大城市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的影响力。马丁内斯·德·罗萨斯在康塞普西翁也举办了类似聚会，客人讨论的内容或多或少与在卡雷拉聚会上的相同，但他的房子没有卡雷拉家那么豪华。有一个年轻人时不时参加马丁内斯·德·罗萨斯家的聚会，后者对这个年轻人有特殊情感，他是智利前总督的私生子，这位总督后来获得了贵族头衔并成为秘鲁总督。总督的姓是奥希金斯（O'Higgins），我们需要对他稍加介绍。

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Ambrosio O'Higgins）总督小时候离开爱尔兰，去西班牙探亲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加的斯和爱尔兰商人一起工作，然后坐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在智利建造防御工事，加入西班牙王室

军队并干得非常出色。在他担任康塞普西翁王室行政官期间，他遇到并勾引了年轻的美洲女子伊莎贝尔·里克尔梅（Isabel Riquelme）。当她怀孕时，他拒绝娶她。安布罗西奥和伊莎贝尔的儿子贝尔纳多（Bernardo）出生于1778年，12岁以前都在西班牙最偏远的殖民地比奥比奥河（Bío Bío），那里居住着好战的阿劳科人（Araucano），他们从未被西班牙军队征服。

贝尔纳多缺席的父亲把他送到利马（秘鲁总督辖区首府，安布罗西奥当时任总督）上学，然后又送往加的斯。年轻的贝尔纳多·里克尔梅（当时的名字）离开了加的斯，随后在伦敦待了5年。在那里，他掌握了父亲的母语——英语，阅读了太多的法国书籍以至于树立了共和信念。自然而然地，他成了弗朗西斯科·米兰达的门生。可以理解，贝尔纳多的父亲对他儿子的意识形态演变并不高兴，并最终完全切断了资金供给。贝尔纳多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付不起，直到他的父亲1801年在智利去世，并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

贝尔纳多的遗产不仅使他成为在辖区拥有3000头牛的地主，还给了他在公开市政会的一个席位。他的母亲和同父异母的妹妹与他一起在庄园居住。尽管是私生子出身，但贝尔纳多的欧洲教育背景使他在圣地亚哥沙龙聚会上受到欢迎，这也包括马丁内斯·德·罗萨斯在康塞普西翁的聚会。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贝尔纳多请求王室政府允许使用他显赫的父姓奥希金斯。然而，因为奥希金斯从未在法律上承认过是他的父亲，法庭要求有极高声誉的人宣誓作证，马丁内斯·德·罗萨斯提供了这一证词。王室政府从来没有批准这一请求，但沉浸在建立圣地亚哥洪达的狂喜中，这已经不再重要了。最后，贝尔纳多·里克尔梅自行采用了奥希金斯这个姓氏，这是他从总督私生子蜕变为戴着“费尔南多的面具”的美洲军官的一小步。

1810年，由于西班牙抵抗拿破仑的行动崩溃，美洲抵抗力量惊人地团

结一致，组成看守洪达，在王权没有明确归属的情况下主张地方拥有自治权。他们解释说，费尔南多七世的王冠上有两根支柱：西班牙和美洲。一根柱子被震碎了，但另一根还坚挺。因此，绝大多数美洲人，包括美洲西班牙人、印第安人、混血儿和帕尔多人，以绝对的真诚向费尔南多宣誓效忠。尽管没有明说，美洲人的意图就是宣称人民主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在许多情况下，领导新洪达的是激进分子，他们实际上想要建立与美国类似的共和国。共和党人不得不戴上所谓“费尔南多的面具”，以掩饰他们缺乏多数支持的真相。尽管他们人数不占优势，但未来将会影响巨大。

与此同时，巴西的情况则远没有那么复杂。在那里，王室的权威实际上得到了加强，若昂六世舒适地安坐在里约热内卢，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危机。随着西属美洲大陆陷入不算内战的战争，这种差异已经非常显著，而且还将变得更加明显。

## 注释

[1] Karen Racine, *Francisco de Miranda: A Transatlantic Lif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2003), 163.

[2] *Ibid.*, 161.

[3] Fernando Assunção and Wilfredo Pérez, *Eljefe de los orientales* (Monte-video: Editorial Próceres, 1982), 212.

[4] Octavio Tarquiniode Sousa, *História dos fundadores do Império do Brasil*, vol. 2: *A vida de Pedro I* (Rio de Janeiro: José Olímpio Editora, 1957), 13.

[5] José Mancisidor, *Hidalgo, Morelos, Guerrero* (Mexico City: Editorial Grijalbo, 1956), 54.

[6] Salvador de Madariaga, *Bolívar* (Mexico City, Editorial Hermes, 1951), 1:287.

### 第三章 不算内战的战争（1810—1812）

到1810年9月，葡萄牙爱国者和他们的英国盟友重新占领了里斯本，而西班牙加的斯仍然在反抗拿破仑。因此，总的来说，伊比利亚半岛仍然处于法国军队的控制下。与此同时，美洲洪达数量成倍增加。他们都宣称效忠于费尔南多七世，但同时否认自己对西班牙的从属地位，并宣称其与西班牙是独立平等的王国。如果这些声明生效，这些声明本身就会终结西班牙的殖民制度，所以西班牙在加的斯的抵抗政府永远不会接受这些声明。然而，就目前而言，加的斯政府弱小、脆弱且孤立，并且仍然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和圣地亚哥的美洲洪达几乎无需担心西班牙的报复。他们的问题暂时在他们自己的后院，因为各种各样的冲突开始把美洲弄得四分五裂。其中，发生在新西班牙的事件是最具戏剧性的。

#### 新西班牙发生了暴乱

1810年9月16日黎明前，伊达尔戈和阿连德得知克雷塔罗密谋已经暴露。此类事件是当时经常发生的：有人临阵退缩，向当局告密。克雷塔

罗的王室执政官是密谋者之一，他拖延了，而他的妻子警告了正在多洛雷斯村的房子开会的阿连德和伊达尔戈。今天，墨西哥的学童学习背诵这名妇女给伊达尔戈的著名讯息：“紧跟着这些话而来的是牢狱之灾和死亡威胁。明天，你要么成为英雄，要么成为囚犯。”<sup>[1]</sup>换句话说，除了逃跑或投降，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发出反抗的呼声。伊达尔戈一点也不动摇。他平静地邀请阿连德共进早餐，然后结集起义军的核心，包括三十人的多洛雷斯国民卫队和十几个伊达尔戈陶瓷厂的工人。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监禁当地的欧洲西班牙人。

这是一个星期天，也是多洛雷斯的集市日，早起的印第安农民已经开始来到这里交易他们的货物。然而，这并不是密谋者最初选定的圣胡安·德·洛斯·拉戈斯的大型集市，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天的集市依然有数百名参与者。伊达尔戈对这些谦逊的人表达了敬意，他们大多是原住民后裔，那天他戴着“费尔南多的面具”向他们发表讲话、激发了他们的强烈虔诚。后来有多个关于这场演说的版本流传，但主旨总是一样的：“必须为费尔南多七世保住新西班牙王国，以对抗无神论的法国人。背信弃义的欧洲西班牙人不能被信任。许多人为拿破仑服务。他们中的很多人侍奉拿破仑。我们必须逮捕他们并收缴他们的财富来保护费尔南多国王！”尽管伊达尔戈已经厌倦继续戴着“费尔南多的面具”，但那一天他看到了面具实际起到的作用，数以百计的自发志愿者愿意加入他们。

我们已经介绍完了这场简单得令人相当惊讶的起义背景。把欧洲西班牙人当成替罪羊显然是其中的主要背景。起义前几周，手写的传单不断地炮轰欧洲西班牙人。伊达尔戈开始了他的行动，他强迫多洛雷斯的欧洲西班牙人骑着驴子走在他纵队前面，作为被嘲笑的对象。对人民主权的主张则是另一个更精妙的次要背景。在一个叫作阿托托尼尔科（Atotonilco）的小镇，伊达尔戈拿着一幅瓜达卢佩的圣母像走进教堂。这幅被火焰包围的

瓜达卢佩圣母像成了起义的官方旗帜和军队总部标志，“瓜达卢佩”这个名字也成了革命口号。伊达尔戈的选择绝非偶然。有一则传说是这样描述的，圣母瓜达卢佩曾在墨西哥城外的一个印第安男孩面前奇迹般地现身，几个世纪以来，她已经成为新西班牙美洲人骄傲的来源。她的出现表现出上帝对美洲的眷顾。她的脸经常被画成黑色，以博得印第安人的好感，他们有时用纳瓦特语（Nahuatl，阿兹特克语）来称呼她。1810年，当伊达尔戈在他的追随者面前举起瓜达卢佩的画像时，她当然代表了宗教忠诚，但也代表了新西班牙的集体认同——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美洲原住民、黑人和各种混血人。伊达尔戈在画的底部刻了三个“万岁”：一个献给瓜达卢佩，一个献给费尔南多，还有一个献给美洲。

乡民高举着瓜达卢佩的旗帜，伊达尔戈的军队在向阿连德附近的家乡圣米格尔镇挺进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随着军队不断壮大，阿连德担心发生抢劫行为。抢劫会疏远有产的美洲人，而这些人正是他最需要的。此外，这些人也是阿连德的邻居。伊达尔戈并没有给他什么帮助，他已经开始设想新西班牙会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的运动——一场全面的社会、经济 and 意识形态的变革，让欧洲西班牙人和美洲西班牙人都失去他们相应的优势地位——这样的变革必然是伴随着一定暴力的。因此，为了实现这样一场革命，伊达尔戈酝酿了一场异动来帮助被压迫者释放其对于压迫者的积怨。阿连德和大多数美洲人对这一想法感到不寒而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伊达尔戈军队的人数扩大到数千人，但正如阿连德所预测的那样，美洲原住民参与人数很少。在接近新西班牙巴西奥地区粮仓城市塞拉亚城（Celaya）的时候，军队人数激增到大约 25 000 人，在这个人烟稀少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规模。如果军队指的是一群士兵，那么将这支军事力量称为军队可能都不一定准确。阿连德带来了大约一百名受过训练、拥有武器和制服的国民卫队，其他组成伊达尔戈部队的

24 900 名“战斗人员”则是贫穷的农村人，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他们的武器起初是农具，随后很快就被各种各样的战利品替代，如椅子、山羊和鸡。塞拉亚没有抵抗，该市的美洲人甚至提议建立一个地方洪达。伊达尔戈群情激昂的部下尊称他为上将，阿连德为中将。伊达尔戈给西班牙瓜纳华托总督安写下一份最后通牒。

瓜纳华托拥有令人称奇的巴伦西亚纳银矿，这是一个拥有许多欧洲西班牙富人的重要城市（根据洪堡的计算，它是美洲人口第三多的城市，仅次于墨西哥城和哈瓦那）。由于瓜纳华托城位于一个陡峭峡谷的底部，非常难以守卫。事实上，该城总督完全没有选择进行守卫。在塞拉亚，伊达尔戈曾威胁如果该城反抗，他就要处决 78 名欧洲西班牙人俘虏，瓜纳华托的其他欧洲西班牙人也会成为目标。因此，瓜纳华托总督将当地欧洲西班牙人聚集在城市又厚又高的谷仓石墙后，而任由其余人自生自灭。谷仓由全副武装的守军把守，有充足的粮食，有自己的水井，还有 25 名妇女来煮玉米饼，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漫长的围攻。

他们只坚持了几个小时，伊达尔戈的部队就到达了瓜纳华托。目睹那里受惊吓的居民在自己的房子里设置路障，他们直接扑向谷仓，高喊“加楚平人去死吧！”防御者从高耸的城墙上开枪，在最初的几分钟内杀死了数百名攻城者，但随后又涌上来数百名意志坚定的攻城者。当天的英雄是一位年轻矿工，他成功地撬开了谷仓沉重的门，使得伊达尔戈的部队得以冲进去完成任务。在谷仓里死去的 300 人中，大部分是欧洲西班牙人，他们都不是战斗人员。他们的死亡——以及随后几天的抢劫，包括摧毁采矿设备和洗劫镇上所有欧洲人的商店——成为反伊达尔戈运动的重点。瓜纳华托幸存下来的官员对目睹的事件感到震惊，因此当硝烟散去，他们拒绝效仿塞拉亚组建洪达。

伊达尔戈部队人数继续增长，但它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安静的省城巴利

亚多利德。选择这个城市与其说是出于军事目的不如说是出于个人目的，巴利亚多利德是伊达尔戈早年作为学生、教授和校长生活的地方，也是他黯然失色和丢脸的地方。伊达尔戈以前的朋友阿瓦德·伊·奎波（Abad y Queipo），现在是巴利亚多利德的主教，在叛乱开始时，他立刻将伊达尔戈逐出教会。主教的命令被钉在城市教堂的门上。现在，伊达尔戈率领着他的部队向巴利亚多利德进发，并且要把他们打倒。

### 加的斯议会提出一笔交易

在伊达尔戈进攻瓜纳华托的前四天，一群西班牙爱国者聚集在加的斯的一个教堂，声称代表整个西班牙国家的主权。按照西班牙传统的称呼，他们将这一会议称为“制宪议会”（Cortes）。这与西班牙历史上任何一个代表大会都不同，尤其是因为它包括代表美洲。

在那一年早些时候解散之前，在劫难逃的中央洪达要求举行这次议会选举。然而，在法国占领下，常规选举是不可能的，所以1810年议会中的代表主要是以加的斯为基地的爱国者。他们大多相当年轻，尽管他们献身于以费尔南多七世为象征的抵抗事业，但他们倾向于信奉激进的新理念，例如选举、立宪政府。总而言之，他们是自由的拥护者（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谨慎地不自称为法式自由的拥护者）。相反，他们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刚刚出现的新绰号。在这些最初的自由主义者中，有一个叫基多的何塞·梅希亚·莱克里卡（José Mejía Lequerica）的代表，他领导着大约30名恰好居住在加的斯的代表，“代表”着美洲。

在西班牙代表中有来自美洲的议员是前所未有的。受法国占领危机的启发（再加上已不存在的中央洪达），加的斯代表大会扩大了西班牙国家的定义，将美洲包括其中。因此，美洲在国民代表大会中理应有代表。问题在于，据梅希亚的美洲代表所述，这不公平。不管以哪种方式估算，美洲的人口都比西班牙多得多，但西班牙在大会中的代表人数比美洲多三倍。在大会的第二天，梅希亚请求按人口分配代表权，如果这一请求得到执行，加的斯代表大会将处于美洲代表控制之下。

西班牙代表立即拒绝了这项建议。他们永远不会自愿接受与被他们视为殖民地的美洲平等。不过，他们是不会在大会中承认这一点的。加入美洲代表的全部意义在于，在这个对西班牙极其危险的时刻，保持他们的忠诚。因此，西班牙代表对他们希望保持西班牙在人数上的优势地位提出了种族方面的解释。他们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的种族地位低下，永远不能与西班牙人在人数上算作等同，也不能参加代表大会。如果只有美洲本土西班牙人可以被代表的话，大会上的西班牙代表与美洲代表比值将超过五比一。

由于这些美洲代表属于美洲本土西班牙人，所以他们的个人名誉没有受到这条种族歧视的牵连，但不管怎么样，这仍然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因此，从种族角度的另一面作为切入点，以学识渊博而闻名，也被认为是代表大会最雄辩的演说家梅希亚谴责道，将对国王忠诚的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裔排除在政治代表之外是不公正的，但是西班牙的代表拒绝让步。1810年10月1日，梅希亚准备提出另一个建议。要是只将非洲人后裔排除在议会之外会怎么样？这样的话，美洲大陆最原始、至今仍数量最多的印第安人，连同本土美洲人和印欧混血人也将被赋予公民权。如果梅希亚和其他美洲代表能接受这一建议，那么可以推测，西班牙也可以接受。

波多黎各代表为妥协提供了完美的措辞。为了让欧洲西班牙人满意，

他特别提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概念，即西班牙在两个半球的领土共有一个君主制、同属一个国家、是一个家族”。但是，正如美洲代表所坚持的那样，新措辞还规定：“欧洲领土的本地人和海外领土的本地人享有平等的权利。”<sup>[2]</sup>“本地人”一词被解释为美洲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但不包括自由帕尔多人，因为他们的非洲祖先既不是来自西班牙，也不是来自美洲。尽管帕尔多人有一部分白人/西班牙人血统，但国民大会很方便地忽略了这个问题，并在1810年10月15日颁布了这项法令。

“横跨大西洋的单一君主国”是制宪议会对美洲众多洪达“王冠的两根支柱”说法的回应。为了使交易更有吸引力，代表大会颁布了对美洲叛乱分子的赦免令。它所指的叛乱者是新近成立的美洲军事力量。当时关于瓜纳华托的消息还没有到达。

### 伊达尔戈的军队被打败了

在加的斯议会通过这项将非洲人后裔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妥协法令两天后，1810年10月17日，巴利亚多利德市未做任何抵抗就向伊达尔戈投降。伊达尔戈庞大的、衣衫褴褛的起义军凯旋式地进入了这个他多年前离开的小省城。为了享受他个人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回归，伊达尔戈穿上了一件华丽的军装，脖子上挂着一幅瓜达卢佩圣母的金色画像。就让主教的心腹们来试着逮捕他吧。

主教奎波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反复发表对伊达尔戈的谴责，这无疑是由于遭到个人背叛的原因，但同时也是担心受牵连而被威胁。奎波和

伊达尔戈一样，也曾尝试过丝绸生产，最近也遭到了宗教裁判所的怀疑。另一位在伊达尔戈军队逼近巴利亚多利德之际逃离的年轻有为的美洲军官名叫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他后来短暂地成了墨西哥皇帝。不过，就目前而言，以及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伊图尔维德仍对殖民统治保持着坚定的忠诚。与此同时，一个名叫何塞·马利亚·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的乡村教士，他是伊达尔戈曾任校长的圣尼古拉斯学院的学生，加入了伊达尔戈的部队。莫雷洛斯成了军队中又一位激进的牧师，此前军队领导层中已经有多位激进派牧师，然而最终莫雷洛斯成为伊达尔戈的继任者。

在巴利亚多利德，伊达尔戈推翻了他早期保持的宗教忠诚，摘下了佩戴已久的“费尔南多七世的面具”，下令对社会秩序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他的第一个主要主张是无条件地彻底废除奴隶制。这种没有耐心的做法是典型伊达尔戈式的。无论是欧洲人奴隶主还是美洲人奴隶主，都必须立即释放他们所有的奴隶，否则将面临死刑。参加革命事业的奴隶主也不例外，他们昂贵的人力资产也没有相应的金钱补偿制度。此外，伊达尔戈颁布法令使得被释放的非洲或美洲原住民奴隶立即获得与白人平等的权利。实际上，上述事情只发生在伊达尔戈的梦里。他的军队只控制了新西班牙很小的一部分。然而，伊达尔戈关于非洲人后裔的声明与从未考虑过废除奴隶制的加的斯议会声明形成了鲜明对比。伊达尔戈宣布废除奴隶制也不是为了招募新兵，他的军队已经过于庞大了。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这是正确的，他宣布被解放的奴隶与白人平权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风流的、无能的、偶尔鲁莽且一贯自负的神父和将军，正勇敢地接受正义的原则，这些正义原则被他那个时代所谓可敬的道德家完全否认。

在巴利亚多利德待了几天之后，伊达尔戈庞大的部队已经达到约8万人，正向着墨西哥城缓慢行进。要到达那里，他们必须穿过克鲁塞斯山

(Monte de las Cruces) 的一个狭窄通道，这里由一支规模 2 500 名守卫的部队把守，他们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且忠于总督。不幸的是，对于伊达尔戈和他的事业来说，一支既没有武装也没有军事经验的部队在那种情况下毫无价值。在 1810 年 10 月 30 日的克鲁塞斯山战役中，伊达尔戈的追随者经过一天的血战仍无法攻克关隘。2 000 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逃兵惊恐地涌向后方。因此，当总督的军队在第二天撤退留下了开放的隘口时，起义军的胜利显得苍白无力。不管怎么样，前方的道路畅通无阻，受伤的人群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隘口朝新西班牙总督首都所在地墨西哥城走去，它现在几乎触手可及。然而，克鲁塞斯山一役已经使伊达尔戈头脑冷静了下来，他的部下已经耗尽了为数不多的弹药，而另一支忠于总督的军队正从后方逼近。这支军队由阿连德的前任上司费利克斯·马利亚·卡列哈 (Félix María Calleja) 率领。虽然阿连德敦促在卡列哈抽出时间加强防御之前进攻首都，但当伊达尔戈坚持向巴利亚多利德撤退时，阿连德只能同意。他曾希望为起义招募更多的美洲国民卫队——那些原本会跟随他而不是伊达尔戈的追随者——在瓜纳华托劫掠后避开了他的召唤。在任何争论中，群众都会服从富有魅力的传教士，而不是阿连德。

1810 年 11 月 7 日，卡列哈 7 000 名国民卫队组成的快速部队在一个叫阿库尔科 (Aculco) 的地方赶上了起义军。这些国民卫队身穿鲜艳的制服，拥有总督为其配备的精良装备。阿库尔科战役再次显示了伊达尔戈军队缺乏战斗经验的弱点。一名骑兵被炮弹斩首，但他的脚还卡在马镫里，残缺的身体被疾驰的战马拖着穿过队伍，引发了恐惧和混乱。为了逃离卡列哈，伊达尔戈和阿连德将他们剩下的追随者分开，伊达尔戈前往巴利亚多利德，阿连德则前往瓜纳华托，以后再集合。

伊达尔戈成为美洲有史以来吸引最多追随者的领袖。他的宣言毫无疑问是诱人的，但却不能广泛传播。例如，他还没有印刷机来传播他的宣言。

在莱尔马河流域之外，新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对总督忠心耿耿。现在，起义者迅速推翻总督并为新西班牙组建由美洲人主导的洪达的希望已经破灭。恐惧的墨西哥城人全力配合了总督的备战守卫工作。现在他们可以庆祝自己获救了，特别感谢救难圣母（*Virgin of los Remedios*），她的画像被带到城里来守护这座城市免遭伊达尔戈部队的蹂躏，她的形象可以象征性地与起义军瓜达卢佩圣母形象对抗。

到11月中旬，伊达尔戈回到了巴利亚多利德，继续全力推进民众起义。当他授权在巴利亚多利德大规模处决60多名囚犯时，他将欧洲西班牙人作为替罪羊的行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阿连德的部队因为卡列哈军队的逼近而被迫离开瓜纳华托，但他也允许执行死刑。虽然他并没有明确下令处死囚禁在谷仓（现在是临时监狱）的100多名欧洲西班牙人，但在他和部队离开后，愤怒的当地人不出所料地替他做了这件事。当卡列哈进入瓜纳华托时，他开始了一场以牙还牙的血腥杀戮。他随机挑选几十名普通居民，在谷仓溅满鲜血的墙根下向他们开枪。起义军的两队人马现在都沿着莱尔马河谷向西撤退到瓜达拉哈拉市（*Guadalajara*），处决事件也随之发生。虽然有一些例外，但总的原则是：伊达尔戈处决欧洲人；卡列哈处决美洲人。

1810年11月26日，人数大为削减后的伊达尔戈部队在音乐声和欢呼声的包围下进入瓜达拉哈拉城。伊达尔戈乘坐的是一辆四轮轿式马车，陪同他的显然是一位“女队长”（*la capitana*），因为她身着军装，这是从伊达尔戈诽谤者的流言蜚语中获得的一点小道消息。然而，考虑到我们对这个人和他所处时代的了解，如果这不是真的，那就奇怪了。这位有点精神错乱的领导人开始任由其“费尔南多的面具”滑落，开始组建起义政府的核心。“费尔南多七世在美洲的权利”成了强制性、公式性的口号，但这句口号与伊达尔戈真正在做的事情毫无关系。伊达尔戈要求将“被期望者”的

画像从办公场所移除，并从政府公务人员的头衔中去掉“王室”一词。他呼吁选举国民大会，并任命了一位驻美国大使，显然他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最后，伊达尔戈宣言也开始被印刷出来。他颁布了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并结束了印第安人每年强制性的进贡制度。他下令将印第安人被剥夺的土地归还给印第安人社区。新政府的官方报纸《唤醒美洲》(*El Despertador Americano*)，英语可意译为“醒醒吧，美洲人！”在第一期以后，这份报纸省略了所有关于费尔南多七世的内容，转而提出了建立一个由所有在美洲出生的人组成新国家的想法。

伊达尔戈的魔法再次吸引了新志愿者抵达瓜达拉哈拉。五周后，他的人数又增加到8万左右。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没有武器装备的新起义者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比前辈更出色。当卡列哈7000名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军队逼近瓜达拉哈拉时，伊达尔戈的军队斗志昂扬地迎战。但发生在1811年1月17日的卡尔德龙桥(Calderón Bridge)之战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就像在阿库尔科一样，当一辆军火车在起义军队中间爆炸时，因缺乏经验而引起的恐慌立刻注定了伊达尔戈的失败。卡列哈军队在卡尔德龙桥之战只损失了50名战士，而伊达尔戈的军队却有1000多名士兵阵亡，另外79000名士兵四散奔逃。

两天后，阿连德和其余起义军军官剥夺了伊达尔戈的军事指挥权，只保留了他的名义领袖地位。随后，人数逐渐减少的起义军向北挺进到新西班牙最北部人口稀少的边境省份。在那里，他们几乎得不到回应，当地美洲领导人认为他们对墨西哥城造成了破坏。1811年2月，当伊达尔戈和阿连德获悉加的斯制宪议会几个月前向起义者提出大赦，他们骄傲地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还有希望。

但在1811年3月，起义军整个领导层陷入圈套，未鸣一枪一炮就被俘获。

## 巴拉圭抵制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

1811年，内战在美洲内部迅速蔓延。然而，比伊达尔戈式的自下而上的起义更常见的是不同省份之间的战斗。例如，前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巴拉圭首都亚松森（Asunción）举行了拒绝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公开市政会。布宜诺斯艾利斯派出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去说服巴拉圭人，但他完全失败了。

不可否认，贝尔格拉诺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不适合打仗，仅靠手下的几百士兵就想劝降巴拉圭人，换作别人也无法成功。巴拉圭是一个偏远、艰苦的地方，位于大陆的深处。拉普拉塔辖区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人口繁衍的温床，并且其拥有的历史长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巴拉圭的边境位置赋予了它军事能力，因为很多巴拉圭人参加了国民卫队。1811年3月9日，在塔库埃里（Tacuarí）战役，巴拉圭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决定性地击败了贝尔格拉诺军队。

在塔库埃里战役（battle of Tacuarí）时，巴拉圭仍有一位欧洲西班牙人行政长官，但他很快被一个美洲洪达取代。洪达的缔造者何塞·加斯帕·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在巴拉圭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弗朗西亚有博士学位，是亚松森为数不多的几个博士之一，他支持法国大革命的某些观点。他以民粹主义者的身份控制了亚松森洪达，通过这些民粹主义者的不满来对抗所谓“更好的人”。他最受欢迎的提案是省级自治，他也将该议题坚持到完全控制巴拉圭为止。大家都知道弗朗西亚博士曾发誓绝不让巴拉圭再被布宜诺斯艾利斯所统治，所有巴拉圭人都坚决支持他。从那时起，弗朗西亚的巴拉圭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不仅是从西班牙独立，而且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控制下独立。

巴拉圭并不是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内唯一一个发生内战的地区。在一次与贝尔格拉诺类似的军事远征中，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另一位初创成员，贝尔格拉诺的堂兄胡安·何塞·卡斯特利（Juan José Castelli）被派去镇压第二个不服从的省份——拥有波托西银山、行政中心位于丘基萨卡的上秘鲁。

### 上秘鲁之战开始了

卡斯特的任务进展得不比贝尔格拉诺的好，在最初赢得几次胜利后，于1811年6月20日在一个名为华基（Huaqui）的安第斯山坡上遭遇失利。卡斯特利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沿着这条路向西北穿过科尔多瓦、图库曼（Tucumán）和萨尔塔，到达丘基萨卡和波托西的银矿。自1776年以来，上秘鲁就是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一部分，这条南北轴线是它的主要道路。丘基萨卡是一座有着白色建筑的优雅大学城，到处都是粉刷过的建筑。在开始各自艰苦和辉煌的学术生涯前，许多青年都曾在此学习。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前秘书马里亚诺·莫雷诺就是其中之一，卡斯特利也是其中之一。卡斯特利在丘基萨卡的阅读，以及后来他参加玛丽基塔·桑切斯的沙龙谈话，使他感染上了“法国思想”，使他像莫雷诺一样，成为洪达中比较激进的成员之一。

卡斯特利并未以将军的身份前往上秘鲁，而是以洪达政治代表的身份前往。他致力于传播被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隐藏在费尔南多公式化忠诚表象之下的革命思想。和伊达尔戈一样，卡斯特利对印第安人的困境倾注了特别的关注，大笔一挥就废除了他们古老的朝贡和劳动义务。几个世纪以来，乡村长老一直向远方首都派来的王室官员鞠躬，当他们向卡斯特利鞠

躬时，他把他们扶起来并告诉他们，卑躬屈膝的日子过去了。现在美洲人，是指所有在美洲大陆上出生的人，他们与在欧洲大陆出生的人有相同的权利。印第安人挠挠头，他们是什么时候成为美洲人的？美洲人这个词的含义在血腥内战中已经变得模糊。1811年5月25日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成立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卡斯特利选择在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的废墟上庆祝这一天，这样可以把他的爱国思想与印加的辉煌形象联系起来。和伊达尔戈一样，卡斯特利设想了一个包括所有出生在美洲的人在内的新国家，这些人都将被称为美洲人。

可惜的是，卡斯特利傲慢而教条，没有很好地回应上秘鲁人对他革命教义的提问。当伊达尔戈用圣人的肖像作为旗帜时，卡斯特利收获了亵渎神明的指责。其中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卡斯特利本人，而在于他的助手贝尔纳多·蒙特亚古多（Bernardo Monteagudo），另一位年轻的丘基萨卡知识分子，他于1809年出版了一本充满幻想和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册。在这本小册子中，他用最后的印加——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的精神来鼓舞支持美洲革命事业。蒙特亚古多因政治活动而入狱，他逃了出来加入了卡斯特利。勇于打破传统的蒙特亚古多在讲坛上发表了亵渎宗教的政治演说，他认为教会极大地促成了对原住民的殖民奴役，为了实现真正的解放，必须打破教会对人民思想的控制。然而，巨大的文化隔阂将卡斯特利与那些他希望鼓舞的人分隔开来。上秘鲁大多数人还比较保守，包括占人口多数的印第安人，都不欣赏蒙特亚古多的精神解放方式，而相当确信地狱之火会将他和他的信众吞噬。

对起义军来说幸运的是，在秘鲁北部和其他地方，把欧洲西班牙人当作替罪羊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卡斯特利发现，当地居民渴望从欧洲商人、矿主和王室手中解放出来。卡斯特利在丘基萨卡、波多西、拉巴斯和科恰班巴（Cochabamba）招募了美洲人和混血儿。他还获得了几千名没有武装

的印第安辅助部队，他们主要是搬运工。不过，与伊达尔戈的军队相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军队只能算是微型的。

最糟糕的问题是卡斯特利与米兰达一样无法评估自己真正的军事前景。尽管他拼凑起来的军队不稳定，他还是萌生了向遥远的利马进军的想法，因为他确信西班牙的抵抗将会瓦解。卡斯特利的军队最远只能到达一个被称为德萨瓜德罗（Desaguadero，字面意思是“排水沟”）的深而蜿蜒的峡谷。上秘鲁高原汇集到的的喀喀湖（Titicaca）的河水，从这里奔流向太平洋。从上秘鲁到利马的所有道路都要经过德萨瓜德罗，秘鲁总督阿巴斯卡的军队对峡谷进行了严密的控制。此外，为了削弱卡斯特利的民间支持，阿巴斯卡散布了加的斯代表大会对美洲人作出让步的消息，并要求停战。卡斯特利接受了停战协议，随后阿巴斯卡违反了停战协议，下令对华基发动突然袭击，在几乎没有发生实际战斗的情况下就将卡斯特利没有经验的部队驱散。华基战役的失败中止了卡斯特利的行动，并永久地损害了他的声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革命”激烈演讲而闻名的演说家不久后就因舌头上的肿瘤而完全失去了声音。

华基战役之后，阿巴斯卡总督逐渐重新实现了对上秘鲁的掌控。事实上，安第斯高地成为西班牙美洲殖民统治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然而，随着卡斯特利的撤退，六个农村游击运动最终形成了上秘鲁抵抗阿巴斯卡统治的飞地，它们后来被称为“迷你共和国”，因为每一个共和国（最终为六个）都在迷宫般的峡谷中独立了若干年。其中一个迷你共和国由一对来自丘基萨卡的夫妇领导，他们是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帕迪利亚（Manuel Ascencio Padilla）和胡安娜·阿苏尔杜伊（Juana Azurduy）。

帕迪利亚和阿苏尔杜伊都是丘基萨卡偏远农村地区的原住民——他们不是印第安人，只是与印第安人一起长大，并且说着印第安人的语言。胡安娜是一个混血儿，她从母亲那里学过盖丘亚语，还学过上秘鲁的另一种

主要印第安语——艾马拉语。她同时帮助管理家族的土地。父母去世后，阿苏尔杜伊与监护人发生了冲突，进入了一所修道院学校，她的同学后来回忆说，她少女时代的主要英雄偶像是战士圣徒。当丘基萨卡事件引发民众对西班牙统治者的反抗时，阿苏尔杜伊的丈夫帕迪利亚已经在当地和拉巴斯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10年，科恰班巴镇宣布支持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帕迪利亚前往那里帮助招募印第安新兵。当卡斯特利率部到达上秘鲁时，帕迪利亚选择加入。与此同时，阿苏尔杜伊与孩子们守在这对夫妇的土地上，为革命事业提供食物。

西班牙当局侵占了她的土地，并将她和孩子们囚禁在丘基萨卡郊外，借此希望诱捕帕迪利亚。尽管如此，帕迪利亚还是设法救出了阿苏尔杜伊和孩子们，并把他们带到了山中隐蔽处，那是一个真正的秃鹰巢穴，挂在两座山峰之间，当地的印第安人保证他们会很安全。十天后，他又出发去组织爱国者游击队。阿苏尔杜伊等着他回来，一边照顾她的孩子（其中一个还在襁褓中），一边开始练习使用帕迪利亚留给她的枪和刀。

### 委内瑞拉成为共和国

卡斯特的垮台恰逢弗朗西斯科·米兰达的胜利时刻。在西蒙·玻利瓦尔的劝说下，年迈的革命家米兰达在委内瑞拉受到了比1806年更热烈的欢迎。例如，米兰达被授予了一个不需要经过选举的国会席位，尽管他让大家知道，他所代表的选区葆（Pao）这个地方太不知名也太遥远，并不适合他。或许可以考虑加拉加斯某个地方……

在委内瑞拉大多数人看来，米兰达仍然是个问题。例如，他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法国革命将军的金饰制服，这是他过去戎马生涯的证据，但委内瑞拉人却找不到让人安心的东西。普通民众不信任米兰达的外国气派，贵族把他看作加拉加斯某个惹是生非的商店暴发户二代。玻利瓦尔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说服加拉加斯洪达允许米兰达进入该国。洪达最终欢迎了他，但让他们有些懊恼的是，米兰达很快就表现得好像已经掌握了大权，对那些最热情的祝酒词只作回应，自己却不举杯。

另一方面，米兰达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有效地争取到了城市中大量不安分的自由帕尔多人的政治支持，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与法律的限制抗争。在玻利瓦尔和其他当地革命者的帮助下，米兰达为现有的加拉加斯爱国协会（Patriotic Society of Caracas）增添了民粹主义倾向，邀请帕尔多人加入并出版了一份名为《委内瑞拉爱国者》（*Venezuelan Patriot*）的报纸。米兰达提高革命意识的努力似乎比卡斯特利在上秘鲁的类似尝试笼络了更多的听众。加拉加斯洪达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活动中，热情的示威者烧毁了费尔南多七世的肖像，这让保守派感到震惊和恐惧。

1811年6月28日，就在卡斯特利革命梦想在华基破碎的一周后，米兰达出席了委内瑞拉第一次国民大会，他很快就在几天之内正式提出了独立宣言并草拟了初稿。在前一晚纪念1776年费城《独立宣言》后，国会于1811年7月5日正式宣布委内瑞拉独立。不久之后公布的新宪法也显示出费城榜样的强大影响，委内瑞拉成为第一个从席卷美洲的大危机中崛起的共和国。

另一方面，对新政权的抵制也普遍存在。三个重要的城市——科罗、马拉开波（Maracaibo）和圭亚那（Guayana），各自控制着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地区，还没有加入共和国，而瓦伦西亚虽然加入了共和国，却几乎立即试图退出。与此同时，加拉加斯欧洲人举行抗议示威，高呼“国王万岁！”部分人被捕，12人被处决。如此苛刻地对待欧洲人已经成为美洲革命运动

的普遍特征。

米兰达在他年轻的朋友玻利瓦尔的帮助下，领导共和军对抗叛变的瓦伦西亚。玻利瓦尔因为米兰达的行动而受到特别嘉奖。米兰达胜利返回加拉加斯是他最开心的时刻。最后，他被公众誉为国父。身穿白衣的处女在他经过的路上撒下月桂花瓣。

### 葡萄牙人的干预使局势更复杂

1811年，西班牙费尔南多七世的妹妹卡洛塔·华金纳以哥哥的名义宣称自己在西班牙领土上拥有权力，给已经困扰西班牙语世界的合法性危机雪上加霜，增添了新的国际复杂性。卡洛塔·华金纳当时还在里约热内卢，她和她的丈夫葡萄牙摄政王若昂为了躲避拿破仑来到这里。她的视线专注地盯着东海岸的拉普拉塔省，也就是今天的乌拉圭，梦想着将它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蒙得维的亚，东部海岸的省会，是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保皇派。华金纳利用该地作为其向南延伸自己触手的跳板。于是，她不惜卖掉自己的珠宝以为该市提供防御资金，并指派了一家印刷厂来制作反革命宣传材料，在拉普拉塔河分发。

葡萄牙在巴西的王权完全不受西班牙殖民地起义事件的影响。葡萄牙王室生活中考虑更多的是内政而不是外交，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热带地区的新家。不过，在里约热内卢，若昂和华金纳之间的好感并不比在里斯本时好多少，他们依然有各自的居所。华金纳最喜欢的是博塔福戈（Botafogo）的皇家乡村别墅，那里的绿色山峦在海滩后蔚为壮观。尽管博

塔福戈现在是 21 世纪大都会里约热内卢中心位置的优雅老社区，但在 1811 年，博塔福戈还是城外花园区。随王室来到里约热内卢的朝臣从土生土长的巴西精英那里征用了许多这样的房子。这就是贵族的特权。即将进入青春期的佩德罗王子在里约热内卢非常快乐，在那里他和他的弟弟米格尔尽情地度过属于他们的时光。两个男孩都患有轻微且不时发作的癫痫，包括周期性的癫痫，但在他们的新家，这些严重问题似乎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麻烦。在里约热内卢，就连若昂疯狂的母亲玛丽亚王后似乎也获得了一点清晰的思维和平静。

尽管拥有优美的自然风景，里约热内卢并不是一个能令欧洲王室宫廷印象深刻的城市。它的主要现代设施是一个公园和一套罗马式渡槽安全供水系统。街道狭窄，没有灯光，也没有铺路，污水经常从街道中心往下流。沉重的木格栅覆盖着窗户，尽管这样可以保持室内凉爽，但创造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外观。橘子、香蕉、菠萝和其他热带水果丰富，但是小麦面包很难找到，而且几乎与相同重量的黄金等值。当时还没有重新设计以迎合有品位的富裕贵族的高档商店。城市社会等级制度的顶端由朝臣、官僚、商人，以及喜欢住在城里的种植园主组成；天主教神职人员、律师、店主、工匠、渔夫、士兵和酒馆老板组成剩下的部分，但不包括奴隶。里约热内卢大约一半的人口被奴役。虽然王室男性成员很快就失去了返回里斯本的任何念想，但他们光彩夺目的伴侣们却没有，卡洛塔·华金纳也没有，她和以前一样不安分。

华金纳声称是她哥哥费尔南多七世的代理人，她联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多方势力，包括前总督利涅尔斯和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提议自己担任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摄政公主”。但她打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执政，尽管华金纳作为公主，她依然必须征得丈夫的允许才能旅行。若昂自然拒绝了。他想限制她对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影响，以最大化自己的影响。若昂听从了罗德里戈·德·索萨·库蒂尼奥的建议，这位前部长是若泽·博

尼法西奥在里斯本时的赞助人，他多年来一直设想将葡萄牙王权永久移至美洲。库蒂尼奥和若昂已经开始在巴西南部边境结集军队，而这位叛变的公主则继续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另有谋划。

华金纳的代理人至少取得一项成功，就是与加的斯派来的新总督建立了友好关系，后者试图夺回对拉普拉塔辖区的控制权。这位新总督是一个经验丰富、立场强硬的西班牙殖民者，名叫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埃利奥（Francisco Javier de Elío）。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组建洪达，蒙得维的亚成为埃利奥临时总督首府。蒙得维的亚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严密的防御工事使它能够抵抗布宜诺斯艾利斯超过一年的进攻，但埃利奥的支持力量并没有延伸到港口城市以外的地方。当埃利奥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宣战时，东海岸农村的起义力量宣布反对他，转而承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那些农村起义者的首领是我们的老朋友何塞·阿蒂加斯。几周后，一支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远征军加入了他那支小小的乌合之众军队，他们一起围攻了蒙得维的亚。1811年7月，埃利奥决定向葡萄牙求援。

### 伊达尔戈和阿连德最终功败垂成

与此同时，伊达尔戈、阿连德和许多其他起义军俘虏已经从被俘地向北转移，他们就像一种危险的病毒，必须被尽可能地隔离，并被转移到奇瓦瓦（Chihuahua）的边防哨所。他们将在那里接受审问和判刑。对较轻囚犯的处决从5月开始，而对伊达尔戈的审讯持续了数月。他是最后一个面对行刑队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唯一一个被允许面对行刑队的人。阿连德和其他

人都是在背后被羞辱地射杀，这是当时的标准程序。1811年7月30日，行刑当天，伊达尔戈感谢狱卒对他的仁慈，并向尴尬的行刑队分发糖果。

伊达尔戈死得很惨。阿连德曾与审讯他的人搏斗，甚至一度用铁链殴打他们，但伊达尔戈似乎诚心悔改了。至少从讯问记录上可以看出来。而一向注重真实招供的宗教裁判所则声称对这位老人的悔悟感到满意，因而给予了一些宽大处理，比如有权面对行刑队。伊达尔戈在去世时，并不知道9月16日，也就是他在多洛雷斯村开始起义的日子，会在未来几年被当作墨西哥的独立纪念日来庆祝——甚至不知道他的革命种子已经在南方生根。伊达尔戈被砍下的头颅，连同阿连德和其他几名起义军高级官员的头颅，被运回瓜纳华托；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被装在铁笼里，挂在城市谷仓布满坑洼的墙上任由其腐烂了十年，以此提醒着路人背叛西班牙的下场。

### 纳里尼奥成为昆迪纳马卡的总统

请尝试想象以下场景，一场集烟火、爱国庆典和官方招待会于一体的盛大活动，在1811年8月29日为“无可比拟的、不可征服的、不朽的英雄”（也是长期受苦的政治犯）安东尼奥·纳里尼奥举办。<sup>[3]</sup>纳里尼奥因在波哥大出版的政治期刊《俏皮话》（*La bagatela*）引起了广泛关注，其英文标题采用的“Wisecrack”一词以意译的方式准确地抓住了其西语标题半开玩笑的精髓。《俏皮话》于巴士底日开始出版，那一年波哥大为庆祝法国大革命周年纪念日举行了游行和化装舞会。

纳里尼奥的报纸是当时全美洲印刷媒体爆炸性增长的报纸之一。在殖

民时代，不受审查的政治出版物根本不存在，自1808年以来，合法性危机在西班牙语世界断断续续地蔓延，这为数以千计的新出版物提供了机会和题材。诚然，这场印刷革命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大多数出版物规模都很小，像纳里尼奥这样单枪匹马的编辑就能将一份四页的宣传单印几百份。毕竟，美洲的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然而，文化人聚集的城市是这些小报纸的主要战场，也是它们受到极大重视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些小规模出版物经常在酒馆、车间和公共场所被大声朗读。大多数人是第一次从这些期刊上读到“宪法”和“主权人民”之类的词。那位勇于改革的新闻记者成了著名人物。例如，波哥大洪达于1811年9月19日授予纳里尼奥总统一职，他的《俏皮话》功不可没。

波哥大现在只是昆迪纳马卡省周围高地的首府，因为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其他省已经选择自己的道路。纳里尼奥渴望将支离破碎的前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重新统一为一个共和国，但障碍重重。许多省份成立了自己的洪达。最值得注意的是，堡垒城市卡塔赫纳有自己的洪达，对波哥大成为潜在的共和国中心没有耐心。总的来说，有自己洪达的各省倾向于反对波哥大，而不是支持它。更糟糕的是，保皇派仍然控制着一些省份，比如圣玛尔塔（Santa Marta）和帕斯托（Pasto）。简单地说，内战在新格拉纳达就像在美洲其他地方一样隐约可见。

### 智利的情况类似

当纳里尼奥升任昆迪纳马卡总统时，年轻的煽动者何塞·米格尔·卡

雷拉（José Miguel Carrera，哈维拉·卡雷拉的兄弟）控制了智利圣地亚哥的局势。何塞·米格尔二十多岁时是个大胆的人物，他是有着贵族家庭和生活习惯的西蒙·玻利瓦尔和曾担任西班牙民族抵抗军军官的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的综合体。卡雷拉一家——哈维拉·卡雷拉、何塞·米格尔·卡雷拉，以及同样是军官的其他几位兄弟——都支持起义人士现在所说的“美洲事业”，这是超越“费尔南多七世事业”的修辞手法。1811年9月，卡雷拉利用他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策划接管最近选出的洪达，并以圣地亚哥人民的名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在卡雷拉的指挥下，圣地亚哥洪达多次重组，并最终被何塞·米格尔·卡雷拉的个人独裁统治所取代。卡雷拉监督了一些进步性立法，比如禁止引进奴隶、后来被整个西半球复制的“自由子宫”法、解放所有被奴役妇女的后代，但卡雷拉的统治也反映了他家族作为圣地亚哥贵族的根基。一如既往，首都的自命清高激起各省的抵制。在智利紧凑的中央谷地南端，圣地亚哥的老对手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贝尔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和他的政治赞助人胡安·马丁内斯·德·罗萨斯的故乡——也想组建自己的洪达。最终，圣地亚哥和康塞普西翁各自的下属省份在两地边界线上动员和部署了军队。

### 阿蒂加斯率众离别

随着若昂六世的葡萄牙军队即将打破爱国者对蒙得维的亚的包围，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与总督达成一项协议，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意放弃围城，埃利

奥同意阻止即将拯救他的葡萄牙军入侵。因此，在1811年10月14日，洪达部队开始从东海岸撤退并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埃利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之间的协议并没有征求何塞·阿蒂加斯上校领导下的当地爱国人士的意见。当布宜诺斯艾利斯部队当着前进的葡萄牙军的面撤退时，留下来的当地爱国者称赞阿蒂加斯将军，并宣布从实际上脱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自治。

一星期后，东岸的军队无法维持包围，开始从蒙得维的亚撤退。部队向西穿过它的发源地——索里亚诺，阿蒂加斯曾在这里追求伊莎贝尔·贝拉斯克斯。沿途，牧场主和牧人聚集了他们的家人，每个人都带着一辆由几头牛拉着的两轮大车。成百上千辆这样的大车，满载着骑手、妇女、儿童、其他乘客和牲畜，在尘土中缓缓前行，排成了一条绵延数英里的长龙。在这些艰难跋涉的人中，有许多美洲人的奴隶。在马背上，有更多的从欧洲奴隶主那里逃出来的奴隶加入了阿蒂加斯的部队。阿蒂加斯的部队是边疆社会的一个缩影，其中也包括他的老伙伴恰卢亚印第安人的辅助力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军队及其随行家属沿着乌拉圭河逆流而上，这是阿蒂加斯在法律边缘游走了几十年的老地方。最后，他们渡到西河岸，在一个叫阿优伊（Ayuí）的半永久营地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挤在低矮的树下，等待葡萄牙人离开东岸。他们再也不会相信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未来的几年里，这次被称为“东方人大逃亡”（Exodus of the Easterners）的迁徙将被铭记为乌拉圭民族意识的结晶。

### 走近莫雷洛斯

与此同时，在新西班牙，新总督贝内加斯（Venegas）有理由惊慌。伊

达尔戈的起义群众已经被驱散，其最高领导人在遥远的北方被处决，但现在国内发生的事件令人不安，威胁着战火的重燃。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在总督看来）是何塞·马利亚·莫雷洛斯神父（Father José María Morelos），他就是伊达尔戈派到新西班牙南太平洋海岸——阿卡普尔科港附近——去散布起义火种的那位。莫雷洛斯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并凯旋般地进入了伊祖卡城（Izúcar）——一座靠近普埃布拉（Puebla）的新西班牙主要城市。1811年12月10日，莫雷洛斯大获全胜，俘获了400名囚犯，其中包括那位欧洲指挥官，并将其处死。在伊祖卡，莫雷洛斯的军队首先接受了音乐、烟火和竖立在街道两旁木制凯旋门的欢迎，随后举办了欢庆瓜达卢佩圣母的盛宴。此外，马里亚诺·马塔莫罗斯（Mariano Matamoros），一个注定要成为著名爱国者领袖的名不见经传的牧师，加入了莫雷洛斯。

这个故事中牧师的激增需要解释。它可能会让人觉得是美洲天主教会在推动革命进程，然而现实不是如此。神职人员是社会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因此有特权接触到被禁止的关于法国自由的文本。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伊达尔戈，显然阅读了大量此类“课外书籍”，而像莫雷洛斯一样的大多数人，只是坚持做好他们的“课内宗教作业”。牧师在独立运动中激增的最好解释是他们在殖民时期普遍突出的地位。教会在殖民时期的美洲，与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都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内拥有崇高的权威。教会人士在任何社会事件中都不可避免地扮演了主角，因此他们在内战中自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内战双方中都是如此。事实上，大多数牧师都服从他们的主教，对西班牙保持忠诚。然而，相当一部分美洲神职人员皈依了独立的福音。因此，当牧师被征召参加爱国事业时，他们也扮演了领导角色。

然而，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任最高领导是新西班牙独有的。其他地方

的美洲洪达也有很多神职人员，但洪达的最高领导人，遵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通常都是执剑者或执笔者——也就是说，军人或律师，而不是神职人员。新西班牙的不同是因为，1808年紧张的欧洲人对亲美总督伊图里加雷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挫败了墨西哥城追随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和其他首都城市建立洪达的企图。所以当伊达尔戈发动革命风暴，将新西班牙美洲人精英联合起来时，墨西哥城仍然是西班牙殖民势力的堡垒。由于首都没有出现高级别的爱国领袖人物，所以国家层面的领导权是以军事方式来定义的。最终，在巴利亚多利德附近的锡塔夸罗（Zitácuaro）诞生了反抗洪达，由一位名叫伊格纳西奥·洛佩斯·拉永（Ignacio López Rayón）的律师领导，他曾担任伊达尔戈的秘书。但是锡塔夸罗洪达没有自己的军队。另一方面，莫雷洛斯神父确实有一支军队。1811年底，整个新西班牙开始把他视为伊达尔戈的继承者。

何塞·马利亚·莫雷洛斯来自巴利亚多利德的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因为父亲抛弃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多年来，他不得不养活她们。莫雷洛斯在驾着骡车穿越巴利亚多利德南部巴尔萨斯河谷的热土多年后选择进入神职。在那里，他像许多赶车人那样学会了在头上系一块手帕来吸汗，这身装扮成了他的标志。在伊达尔戈担任圣尼古拉斯学院校长期间，莫雷洛斯在那里学习神学。他比他的同学年长得多，最多算是一个中游学生。他的志向只不过是像他母亲一直希望的那样，当一名乡村牧师，过着体面生活。在他被任命为牧师后，莫雷洛斯被接连分配到南部的一系列教区。由于气候炎热，巴利亚多利德高地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那里不利于健康。事实上，当莫雷洛邀请他的母亲来和他住在一起时，她很快因病去世。相反，莫雷洛斯在卡拉卡罗（Carácuaro）和诺库佩塔罗（Nocupétaro）潮湿的村庄里住了漫长而不算是太愉快的12年。他定期给妹妹寄钱，让她在老家盖一所房子。

得知伊达尔戈的起义后，莫雷洛斯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莫雷洛斯从来不是禁书的读者，只是对法国大革命有粗略的了解，但他尊敬伊达尔戈并且想要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他立即投入新事业，沿着新西班牙南太平洋海岸——这个莫雷洛斯再熟悉不过的“炎热乡村”——传播伊达尔戈的革命思想。他从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卡拉卡罗教区开始，在那里，他废除了将伊达尔戈逐出教会的法令，并利用其人脉招募信徒。莫雷洛斯并没有接受所有的志愿者。作为一名前骡夫，莫雷洛斯有驱赶牲畜沿着南方崎岖蜿蜒道路旅行的经验。他知道他需要一支比伊达尔戈规模更小、训练更有素、装备更精良的部队。经验丰富的国民卫队和一些有权势的家族加入了他的部队。离阿卡普尔科不远的太平洋海岸特克潘（Tecpán）的加莱亚纳（Galeana）家族，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给莫雷洛斯带来了他的第一门大炮，一门叫作“厄尔尼诺”（El Niño）的微型加农炮，加莱亚纳家族曾在他们的庄园里用它来给聚会活跃气氛。另一家叫布拉沃斯（Bravos）的家族确保莫雷洛斯能在南塞拉马德雷山（Sierra Madre del Sur）的奇尔潘辛戈（Chilpancingo）受到热烈欢迎，此地后来成为莫雷洛斯活动的中心地带。

奇尔潘辛戈位于阿卡普尔科的内陆。攻占阿卡普尔科是莫雷洛斯的终极目标，也是伊达尔戈在克鲁塞斯山战役之前给他亲自下达的命令，但西班牙人在阿卡普尔科重兵设防，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莫雷洛斯。因此，莫雷洛斯转而向内陆进军，取得了一连串的小胜利。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训练和装备这支由1000多名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后，于1811年12月突然出现在伊祖卡，在贝内加斯总督看来，那里离墨西哥城太近了。

平安夜，他的军队受到了离墨西哥城更近的库奥特拉镇（Cuautla）居民的欢迎，贝内加斯总督紧急联系卡列哈将军阻止莫雷洛斯。卡列哈将军当时正忙于攻击锡塔夸罗洪达，故拒绝仓促采取行动。1812年1月，他有

有条不紊地俘虏或杀死了锡塔夸罗剩余的守军，把小镇夷为平地，但洪达逃了出来。直到1812年2月中旬，卡列哈才带着他久经沙场、永不言败的军队来到了库奥特拉镇，莫雷洛斯昂首以待。

### 加的斯议会颁布宪法

一个月后，在1812年3月19日的加的斯，拿破仑军队仍将西班牙孤立的民族抵抗政府包围在几英亩的沙土上，激动的爱国者伴随着钟声宣誓效忠新宪法。加的斯宪法是西班牙第一部由代表大会颁布的宪法。这是一项重大创新，如果它被完全实施，将深刻地改变西班牙殖民制度，限制王权，建立包括美洲在内的永久性选举代表制。加的斯宪法确认了美洲人、印第安人以及他们后代——所有没有一丝非洲血统的人——为西班牙公民，并在法律面前与欧洲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尽管如此，参加加的斯议会的美洲代表还是不能全心全意地欢欣鼓舞。

对非洲人后裔的排斥意味着欧洲代表参加议会的人数将远远超过美洲代表。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美洲人的要求可能也将永远遭到拒绝。欧洲代表将在事实上继续维持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位。他们一直阻挠美洲人要求在政府任命或经济事务上平等或更大的自由，而且他们所用的手段也是种族主义污蔑，这深深地激怒了他们的美洲同胞。许多美洲人虽然属于白人种族，但实际上都有非洲裔或美洲原住民血统的痕迹，这在西班牙引起了嘲笑。当议会全面拒绝了美洲人的请求时，种族暗示更是雪上加霜。那些在本国自由地蔑视帕尔多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美洲人，在加的斯尝到

了类似的苦果。

“可怕的不平等，” 安东尼奥·德·拉腊萨瓦尔神父（Father Antonio de Larrazábal），这位通常更为沉稳、经常主持代表大会会议的美洲人团体核心，在大会讲台上忍不住喊道。<sup>[4]</sup> 在加的斯，像拉腊萨瓦尔这样的牧师人数超过了任何其他职业的代表，而且他们大多数算不上革命者。总的来说，在拉腊萨瓦尔领导下的代表致力于提出一个由少数美洲白人占主导地位的自治计划。在加的斯参会的美洲代表接受了西班牙君主制，但不接受他们相对于西班牙的政治代表性被削减。

在实践中，加的斯宪法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影响。毕竟，加的斯议会并没有真正统治西班牙，1812年3月，西班牙仍处于法国的占领之下，美洲的许多地方完全拒绝接受它的统治。即使是理论上忠于加的斯的新西班牙和秘鲁总督也拒绝实施新宪法中更自由的内容，比如新闻自由。他们确实举行了选举，尽管有些勉强。拉腊萨瓦尔神父的危地马拉王国反而是执行加的斯宪法相对更彻底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理由提到危地马拉王国，尽管它的名字叫危地马拉，但它只是一个落后的西班牙殖民地，包括巴拿马在内的整个中美洲，领土比西班牙本身大三分之一，但只有大约一百万居民。在一位堪比秘鲁总督阿瓦斯卡尔的卓越西班牙执政官的监督下，危地马拉和秘鲁一样，没有发展出独立运动，也没有组建洪达。王国的主要人口中心位于危地马拉靠近太平洋一侧的北部地峡——这使得加拉加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他们心中向往的大西洋贸易隔绝。危地马拉的美洲人统治着大量被征服的玛雅印第安人。因此，危地马拉的精英对于将民粹主义诉求与美洲洪达联系起来犹豫不决，害怕出现类似伊达尔戈抵抗运动的结果。与新西班牙、秘鲁和上秘鲁不同，危地马拉王国并没有丰富的银矿，但是丰富的热带水果和染料可以为家庭带来适度的财富。拉腊萨瓦尔

神父自豪地宣传，一船危地马拉可可豆和靛青可以给加的斯政府带来三万比索。王国的多个城市——莱昂（León）、格拉纳达（Granada）和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近几个月来都发生了小规模的反欧袭击，但仅此而已。

回到加的斯，早在1812年宪法完成之前，一些曾经支持加的斯制宪大会的美洲人代表就因欧洲的阻挠而受挫，并因抗议而清除了他们。其中一个是何塞·德·圣马丁，他一开始是加入了“理性绅士协会”（Society of Rational Gentlemen）的加的斯分会，该组织是米兰达为有独立思想的人而秘密组织的团体。圣马丁认识了其他一些理性的美洲人，如刚刚再次出逃新西班牙的神父塞尔万多·特蕾莎·德·米耶尔和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年轻而家庭殷实的官员卡洛斯·德·阿尔韦亚尔。加的斯分会很快就有了63名成员，他们致力于“美洲事业”。当西班牙代表在大会辩论期间有计划地阻挠美洲代表的倡议时，米耶尔、阿尔韦亚和圣马丁离开了加的斯转而谨慎地抵达了伦敦。

### 上帝保佑费尔南多七世

在1812年3月26日的神圣星期四，加拉加斯发生了明显的神迹。那一天正好是委内瑞拉组建洪达两周年的纪念日，一场猛烈的地震将加拉加斯震得四分五裂，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其中很多人因为在教堂中听弥撒而被倒塌的建筑压倒。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倾向于将地震当作上帝对民众公投独立的判决。显然，这似乎是一个不利的判决。在一座教堂废墟上

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只有一根柱子还立着，那根柱子上印有西班牙王室盾形纹章。玻利瓦尔巡视了尸横遍地的大教堂废墟，愤怒地大喊：如果有必要，委内瑞拉的爱国者连大自然也会一并征服。但在解释地震对加拉加斯人民的意义方面，保守的神职人员似乎比玻利瓦尔等革命者更成功。1812年3月星期四的地震标志着美洲第一次共和实验的结束。

### 印第安人、混血人和帕尔多人都变成了美洲人

在被西班牙常胜将军卡列哈围攻了70多天后，莫雷洛斯和其他库奥特拉守军耗尽了食物，他们开始吃皮革、鬣蜥、老鼠和昆虫。除了投降，他们什么都能忍受。卡列哈认为，库奥特拉“聪明的防御”击退了其5000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包括两个刚刚从西班牙坐船抵达的欧洲人营队。<sup>[5]</sup>随后，卡列哈命令部队向库奥特拉发动连续炮火攻击，试图击溃防御者的意志（他们人数只有攻方的一半），但依然没有奏效。村里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在热情高涨的气氛中帮助城防。他们在废墟瓦砾间生起篝火并围着火焰唱歌跳舞，庆祝在又一天的炮火中幸存，这让守城部队倍感惊讶。“如果是下士，我愿意给两个比索 / 如果是上尉，六七个比索 / 但是，哦，如果是莫雷洛斯将军，我愿意去一趟天堂。”<sup>[6]</sup>

莫雷洛斯士兵和库奥特拉村民之间的紧密联盟是值得铭记的，因为这里的村民是原住民，而许多士兵是南太平洋海岸的帕尔多人。在库奥特拉的守卫者中，来自不同殖民地种姓的人聚集在一起，成为美洲人。莫雷洛斯坚持，从现在开始，不仅美洲西班牙人是美洲人，每个在美洲出生的人

都是美洲人——种姓制度的旧术语应该被抛弃。真正重要的是美洲西班牙人和欧洲西班牙人的区别。莫雷洛斯宣布，从现在起，所有的公共事务都将由美洲政府接管，这推翻了欧洲西班牙人对政权的垄断。美洲西班牙人欠欧洲西班牙人的债务被宣布无效。莫雷洛斯通过讲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和使用他们的语言来吸引追随者。与堂吉诃德式的伊达尔戈相比，莫雷洛斯有点像桑丘·潘沙（Sancho Panza）：矮胖、平易近人，满口俏皮话。锡塔夸罗洪达曾警告莫雷洛斯，有一个大肚腩的男子企图暗杀他，莫雷洛斯差点笑死：“这里唯一的大肚腩就是我！”<sup>[7]</sup>莫雷洛斯在很多方面都有勇气。卡列哈第一次进攻库奥特拉的那天，莫雷洛斯亲自领导了反攻，在一次战斗中，他与部下被冲散，这位无畏的神父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用剑术击退了一圈围攻他的士兵——后来部下们以极大的热情庆祝他的壮举。接近4月底时，在被围困两个多月后，卡列哈向莫雷洛斯和他的军官表示，如果他们立即交出库奥特拉，可以赦免他们。在上级的要求下，莫雷洛斯回应，如果卡列哈和他的军官们投降，他也会宽恕他们。

1812年5月2日午夜的黑暗中，库奥特拉守军和镇民蹑手蹑脚悄无声息地穿过了包围圈，以几乎完美的方式撤离。卡列哈原计划以俘虏和摧毁库奥特拉作为对潜在叛乱分子的威慑，所以他没有追击莫雷洛斯，而是进入村庄，处决无法撤离的守军，并烧毁剩余的建筑。从卡列哈魔爪中逃脱是一项值得庆祝的壮举，但是莫雷洛斯起义军再也不会如此接近墨西哥城了。

到1812年中期，美洲在西班牙危机最初阶段表现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致性已经消失。对费尔南多的忠诚已经不足以维持既有权威，比如美洲人主张地方自治。美洲洪达的形成打破了原有的省级政府从属于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智利和原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旧模式。新西班牙目睹了受压迫印第安农民的大规模血腥起义。这些都是内战。尽管欧洲西班牙人占据

了重要的领导职位，但他们终究只占人口的不到1%。因此，在这场不算内战的战争中，双方主力的绝大多数是美洲原住民，忠于费尔南多七世的力量依然强大。然而，随着冲突的激化，某些爱国主义领导人开始揭开“费尔南多的面具”。当他们披露自己的共和思想时，其命运立即急转直下。

## 注释

[1] Matilde Gómez, *La epopeya de la independencia mexicana a través de sus mujeres* (Mexico City: ANHG, 1947), 8.

[2] Timothy E. Anna, *Spain and the Loss of Americ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68.

[3] Thomas Blossom, *Nariño: Hero of Colombian Independence*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77.

[4] Mario Rodríguez, *The Cádiz Experiment in Central America, 1808—182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67.

[5] Rubén Hermendorf, *Morelos: Hombre fundamental de México* (Mexico City: Editorial Grijalbo, 1958), 93.

[6] *Ibid.*, 96. The actual verse reads: “Por un cabo doy dos reales, / Por un sargento, un doblón. / Por mi general Morelos / Doy todo el corazón.”

[7] Roberto Blanco Moheno, *Historia de dos curas revolucionarios: Hidalgo y Morelos* (Mexico City: Editorial Diana, 1973), 176.

## 第四章 一份消逝的独立事业？（1812—1815）

拿破仑对西班牙的控制终于松动了。到1812年年底前，以加的斯（Cádiz）为秘密大本营的西班牙民族主义抵抗者防御住了所有来自法国军队的袭击，他们组建政府，制定了西班牙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当拿破仑将他的军队从西班牙抽调到俄罗斯帝国，去增援他糟糕的征俄战争时，西班牙本土的游击队则慢慢地破坏法国的控制网。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尽管那时他还没有获得这一头衔）从他的葡萄牙基地出发，狂暴地给予法国军队痛击并且多次击败他们。到1813年，更多属于英国和西班牙方的胜利消息接踵而至。这一年年底，费尔南多七世终于摆脱了在法国的囚禁，正如我们所见，他发誓要逐步恢复西班牙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同时，美洲的独立斗争事业正在逐渐失去动力。

### 委内瑞拉共和国的坍塌

在卡贝略港（Puerto Cabello），绿色的陡峭山岩俯冲进蔚蓝的加勒比海岸，这里设置了年轻的委内瑞拉共和国首要的军事堡垒，设施齐全——

港口、仓库、据点、军火库，还有专为危险的保皇派囚犯设立的监狱。弗朗西斯科·米兰达（Francisco Miranda）将卡贝略港军队的实际指挥权给了他的门生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但是在1812年6月30日，那些保皇派囚犯策划了一场暴动，并且趁着玻利瓦尔在堡垒外时控制了这一要塞。更令人感到耻辱的是，玻利瓦尔只能在墙外看着堡垒里的大炮轰炸着原本应由他保护的城镇。四天之后，玻利瓦尔的自尊心被现实撕碎，他和其余八位军官一起搭乘一艘小船灰溜溜地逃离了卡贝略港——米兰达交授给他的军队，也就仅存下这八位军官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委内瑞拉共和国遭受了一连串的灾难，这场在卡贝略港的惨败又是一个新的灾难。几个月前，一场地震袭击了加拉加斯（Caracas），一位名叫蒙特韦德（Monteverde）的西班牙指挥官已经召集了一些在科罗（Coro）周围的保皇派势力，不久就向这座被摧毁的未来首都进发，沿路招兵买马，寻获支持。在那个关键时刻，爱国者们诉诸罗马的一种制度，即由一名被选出来的“独裁者”实施紧急统治，他可以在危急时刻领导共和国度过危机。这一独裁权力首先给了玻利瓦尔的旧盟友——侯爵大人托罗（Marqués of Toro）\*，但是他审慎地拒绝了；接着这一独裁权力被授予米兰达，他接受了。作为一名独裁者，米兰达对民众开展了激进的呼吁。“自由和平等”是当时的主旋律，强硬对抗欧洲人的想法也是。曾有十多个加那利群岛岛民（在美洲人眼中他们就等同于欧洲人）穿着锡制铠甲，打扮得类似堂吉珂德在加拉加斯的大街上游行，叫嚣着“国王万岁”。虽然这并不是一场可以造成威胁的抗议，但这些岛民还是被处以死刑。在废除合法的种族等级制度区隔后，委内瑞拉共和国为了更进一步追求获得帕尔多人的支持，开始反对旧有的种族主义习俗，例如在教堂做弥撒时给白人女性安排特殊座位的特权，米

---

\* 该人名为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德·托罗（Francisco Rodríguez del Toro），在委内瑞拉历史上被普遍称为侯爵大人。——译者注

兰达还规定，如果奴隶愿意为共和国服兵役，那么他们将拥有最终的自由。但是这一切尝试都是徒劳的。

当蒙特韦德从西边逼近加拉加斯时，在委内瑞拉的东部也酝酿着奴隶起义，显然，米兰达领导的共和国从整体上来看在委内瑞拉缺乏大众的支持。接着，自由主义的加的斯宪法确立的消息传来，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承诺给予和共和国相同的政治自由。然后，共和国就遭受了失去卡贝略港关键据点和军火库的打击。米兰达认为继续抵抗是没有希望的，会导致不必要的生命损失。于是他和蒙特韦德进行了秘密谈判。米兰达声称，秘密谈判可以防止民众恐慌，还能促使谈判达成有利的投降条件——保密也便于他安排自己从一艘英国军舰上秘密地撤离。但是，这位逃亡的独裁者并没有把这些逃亡计划告诉他的军官们。当玻利瓦尔和其他几个愤怒的官员知晓此事时，他们宣布米兰达是美洲解放独立事业的叛徒，并把他交给蒙特韦德。尽管玻利瓦尔还在为他在卡贝略港的耻辱而耿耿于怀，但似乎他把这些沮丧的情绪都发泄在他堕落的偶像身上。蒙特韦德为表示感激，允许玻利瓦尔安全地离开委内瑞拉，并拒绝没收玻利瓦尔的财产。

米兰达几年后死于加的斯的监狱。

### 理性绅士接管布宜诺斯艾利斯

卡洛斯·德·阿尔韦亚尔（Carlos de Alvear）在1812年崭露头角。想象一下他那无可挑剔的蓝色制服和贵族风度，他那坚毅的下颌和高高的前

额上拳曲着的一缕黑发，以及他作为西班牙抵抗拿破仑的年轻退伍军人而享有的盛名。阿尔韦亚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富裕而显赫的家族，都以这位 23 岁的英雄而自豪，对这位年轻人的年长且仪表堂堂的同伴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也表示欢迎，他的军衔和经历远远超过阿尔韦亚尔，但在社会地位或社交礼仪方面他无法与这位年轻人相提并论。圣马丁出生在亚佩尤（Yapyuú）的边防哨所，那里有士兵、高乔人和印第安人，他小时候就去了西班牙，直到现在都没有回过美洲。当这位略显呆板的职业军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口说话时，他听起来更像是欧洲人而不是美洲人。

从伦敦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久，圣马丁和阿尔韦亚尔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仅限美洲人加入的理性绅士协会，这是此前他们在加的斯加入的协会的分支机构。新协会将成为旧协会最重要的分支，后来以劳塔罗俱乐部（Lautaro lodge）而闻名。那几年，共济会风格的俱乐部激增，成为美洲革命组织的载体。他们撰写了会员资格的选取条规，召开秘密的烛光会议，戴上眼罩进行保密宣誓，使用化名，采用编码符号，以及进行秘密握手等活动。

玛丽基塔的丈夫马丁·汤普森（Martín Thompson）也加入了劳塔罗俱乐部，而玛丽基塔显然不能加入，因为俱乐部只是男人的兄弟会组织。但是，阿尔韦亚尔和圣马丁成了玛丽基塔著名的沙龙聚会的常客，该聚会已成为革命时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爱国主义社交生活的主要场所。玛丽基塔家中的一间大房间可以容纳 120 人，他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爱国精英在那里跳舞庆祝他们的革命胜利。据传，阿根廷国歌最初出现在玛丽基塔的一次聚会上，由她用竖琴伴奏合唱出来的。玛丽基塔还向另一位理性绅士贝尔纳多·蒙特亚古多（Bernardo Monteagudo）提供过社会支持。他是一位来自丘基萨卡（Chuquisaca）的激进分子，他曾在上秘

鲁陪伴卡斯特利，他的贫穷和深色混血肤色使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遭受了许多白眼。除了大无畏的勇气和出色的辩才之外，蒙特亚古多还极其英俊，这是玛丽基塔欣赏他的另一个品质。

但是，更有影响力的是阿尔韦亚尔、圣马丁和其他白人理性绅士，他们也没有如蒙特亚古多那般激进，逐渐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中占了上风。他们最初的优势来自圣马丁的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是在他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几个月内招募、装备和训练了的骑兵。他们的政治对手是洪达秘书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 (Bernardino Rivadavia)，这人的发展路径追随洪达第一位有影响力的秘书马里亚诺·莫雷诺 (Mariano Moreno) 的脚步。洪达成员通常是名义上的领袖，而秘书则是专职的政治操控手，而且往往是多个洪达背后的推动力量。里瓦达维亚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是一个像莫雷诺或蒙特亚古多一样严肃的革命者。他认为阿尔韦亚尔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和机会主义者。至于既不是民主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的圣马丁，里瓦达维亚则明显地讨厌他。圣马丁相信人民主权的原则——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但是他不认为平民可以执政，而是主张君主政体。圣马丁的君主政体的阐述，使得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愤怒地向整个房间里乱扔东西，发泄怒气。

里瓦达维亚担任洪达秘书的几个里，因为他暴躁、专横的行事风格得罪了很多人，而最近到任的理性绅士则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新团队。尤其是卡洛斯·德·阿尔韦亚尔，他拥有了很多崇拜者。其中稳重、安静的圣马丁更进一步地激发了人们的信心，并且由于他的努力，理性绅士团体整体上具有了军事力量的说服力。到 1812 年 10 月底，他们已经控制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

## 莫雷洛斯征服瓦哈卡

尽管许多乡村牧师加入了新西班牙的叛乱活动，但教会的高层仍然坚定地忠于其欧洲领袖。在新西班牙南部的城市瓦哈卡尤其如此。瓦哈卡的主教憎恨莫雷洛斯，对莫雷洛斯进行了抨击，并且形容莫雷洛斯像撒旦一样拥有“牛角和尾巴”<sup>[1]</sup>。由于瓦哈卡的主教对叛乱牧师直言不讳的批评，加的斯摄政团体将其提升到了墨西哥城的主教区，但是当莫雷洛斯和他那支经验丰富的小军队去瓦哈卡拜访他时，他还没有前去接管新的职位。

在库奥特拉镇（Cuautla）围攻的六个月中，莫雷洛斯的部队穿越了南塞拉马德雷山（Sierra Madre del Sur），中断了通信，夺取了骡车，偶尔还占领了一些城镇，证明了美洲独立事业还在继续。在通往韦拉克鲁斯（Veracruz）路上的奥里扎巴（Orizaba），莫雷洛斯的人占领并烧毁了利润丰厚的王室烟草专卖公司的仓库，然后折回南方，向瓦哈卡进发。瓦哈卡有效地设防并加强驻守，但莫雷洛斯的部队经过长达两周的跋涉，在穿越南塞拉马德雷山脉的峡谷和山脊后突然出现，取得了突袭的优势。攻获瓦哈卡仅用了两个小时。墨西哥编年史记下了莫雷洛斯对他的部队精辟的预言，“今晚我们在瓦哈卡睡觉”，也记下了一位笔名为瓜达卢佩·维多利亚（Guadalupe Victoria）的年轻人的重要行为。<sup>[2]</sup>有一天，他将成为墨西哥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袭击瓦哈卡的那天，这位年轻的爱国者军官发现他的路被一条汹涌的护城河挡住了，立即将他的剑扔进水中，以此激励他的士兵。它太重了，带着它无法游泳，但是如果没有带着他的剑就从战场返回将意味着耻辱。在他的将士眼中，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将自己的生命押在了胜利上，当他追随着剑，步入水中时，将士也紧随其后。那天晚上，莫

雷洛斯的部队彻底洗劫了瓦哈卡州并喝下大量优质麦斯卡尔酒，之后他们确实在瓦哈卡州睡了一晚。但他们攻入此地时，主教已经逃跑了，其余的西班牙指挥官都被立即处决。

1812年11月25日占领瓦哈卡州颇具震撼效应。它是莫雷洛斯军事行动的制高点，为其带来了新的威望和物质资源。事实上，瓦哈卡一直是制衡反叛乱的中心。莫雷洛斯从瓦哈卡的皇家地牢中释放了数百名爱国者囚犯，将一些最瘦弱的囚犯放在马背上巡游，以宣扬西班牙人对他们的虐待行为。他还安排了两场公共仪式。第一场是对瓜达卢佩圣母的集体感恩仪式，第二场是对洛佩斯·雷昂（López Rayón）在锡塔夸罗（Zitácuaro）成立的国民洪达的集体效忠宣誓。尽管洛佩斯·雷昂的国民洪达已经近乎不存在。锡塔夸罗遭到毁灭后，只剩下几名逃亡的、披着长袍的律师，他们的马鞍袋里装有带着抬头的信笺。但是此时，国民洪达和莫雷洛斯的军队组成了新西班牙的整个美洲独立事业。

### 玻利瓦尔宣布“死亡之战”

玻利瓦尔在离开加拉加斯大约半年后，于1812年下半年抵达卡特赫纳（Cartagena）。在委内瑞拉沿海的库拉索岛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和其他政治流亡者一起度过，思考着美洲大陆上令人沮丧的全貌。在加勒比海岸，只有卡特赫纳仍对西班牙充满敌意。内陆以南，新格拉纳达的大部分地区尽管有叛乱，但由于内战而使得叛乱力量支离破碎。在昆迪纳马卡（Cundinamarca）的安东尼奥·纳里尼奥（Antonio Nariño）政府拒绝接受其

他省份的独立，他希望这些省份可以在波哥大（Bogotá）的统治下重新统一。陡峭的安第斯山脉和帕斯托的原住民地区已成为保皇派的据点。与卡塔赫纳地区相异的圣玛尔塔地区也充满了坚定的保皇主义者。在这些险恶的情势下，卡塔赫纳共和政府迫切需要经验丰富的士兵。因此，它欣然接受了玻利瓦尔及其爱国同胞为逃离米兰达的共和国的沦陷而提供的服务。

1812年12月15日，玻利瓦尔发表了一份宣言，“一个加拉加斯人致新格拉纳达市民”，他解释了委内瑞拉共和国的瓦解，并反复强调有必要防止西班牙利用委内瑞拉作为重新征服新格拉纳达的平台。<sup>[3]</sup>为解释委内瑞拉共和国早亡的原因，玻利瓦尔主要指责米兰达的共和理想主义思想和欧洲人的误导。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共和国的早期宣言将委内瑞拉的内战归结为共和主义者与君主制拥护者之间的冲突。在1812年的美洲，共和主义者因其新奇的法国思想，很可能惨败于与君主制拥护者的任何竞争。玻利瓦尔明白，要想有获胜的机会，必须将冲突重新塑造成纯粹而单一的美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对抗。

卡塔赫纳指派玻利瓦尔在马格达莱纳河（Magdalena）担任军事指挥官。几年前，洪堡在马格达莱纳河期间曾在莫普克斯（Mompox）研究过短吻鳄，在那里，这位顽强的贵族赢得了一次小小的军事胜利。然后，玻利瓦尔无视他的指示，将目光向东转到了委内瑞拉——这对他来说很重要，虽然不是卡塔赫纳授予他的任务。1813年2月，玻利瓦尔的将士袭击了库库塔镇，并开始向加拉加斯进发。尽管玻利瓦尔偶尔会向他在卡塔赫纳的上司汇报，但玻利瓦尔继续在这场被他称为“死亡之战”的战役中按照自我观点来行动。

民族主义者的宣泄通常采取一种取悦大众的方式，对于爱国者来说，这种工具太强大了，在美洲的任何地方都无法忽视。自伊达尔戈以来，在所有叛乱中，对欧洲人的劫掠和无数次即刻处决，都是惯常做法。玻利瓦

尔的创新在于将无情的焦土战争纳入官方政策，并以一句吸引人的口号标语表达出来。在1813年6月的一天，玻利瓦尔威胁要求即刻处决所有为费尔南多七世服务的欧洲人，他在“死亡之战”宣言中承诺永远不处决美洲人，即使他们反对共和国。事实上，新的运动将委内瑞拉的共和主义者与君主制拥护者之间的内战重新定义为美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内战，这样做更有利。

尽管血流成河，但“死亡之战”为玻利瓦尔的活动提供了新的动力。到1813年8月初，刚满30岁的玻利瓦尔率领他的不到2000人的军队骑马挺进加拉加斯。沿途许多房屋在遭遇地震后都是一片狼藉——墙壁周围堆着许多的瓦砾——但它们已经为欢迎玻利瓦尔凯旋而被装饰起来了。加拉加斯似乎很高兴获得共和国的支持，并以穿着白色礼服的圣母形象来迎接这位胜利的英雄，宣称他为“解放者”(the Liberator)。与古罗马的形式一样，12名年轻女子围着玻利瓦尔的马，为他加冕胜利的桂冠。这些景象与美洲其他年轻共和国模仿的希腊和罗马（被认为是非君主政体的典范）的风格相吻合。例如，想想目前正在建设的华盛顿特区到处都有的仿希腊神图案。

但是委内瑞拉的第二共和国还远未巩固，甚至比第一共和国更加不稳定。玻利瓦尔的行进只是绕过了科罗地区，科罗仍然是坚定的保皇派大本营。卡贝略港以及圭亚那和安戈斯图拉(Angostura)，这两个位于奥里诺科河上守卫良好的城市，一路延伸到内陆地区，仍然由保皇派掌控。库马纳已成为东部自治革命运动的中心。事实上，玻利瓦尔的共和国实际上只包括加拉加斯周围委内瑞拉的一小部分。从一开始，它的政府几乎就将所有精力都花在了挑起战争上，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玻利瓦尔的强项。“死亡之战”仍在继续。随着双方继续以牙还牙，不断累积囚犯并定期处决其中一些人，10个欧洲人换10个美洲人，然后不断反复。共和国似乎没有吸引

力了。加拉加斯的平民厌倦了战争，而且他们对玻利瓦尔努力的军事动员开始日渐反应冷漠。同时，黑暗的雷雨笼罩在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的拉诺斯平原上空，这里正酝酿着一场可怖的斗争。

### 比卡里奥受审

当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出现摇摇欲坠和迅速衰落时，恰逢墨西哥城里莱奥娜·比卡里奥（Leona Vicario）因叛国罪被审判。想象一下，她的监护叔叔——一个直言不讳的保皇派人——的震惊、悲伤和愤慨，他认为比卡里奥直言不服“父王”是对上帝的罪过。然而比卡里奥坚持爱国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否认的。当伊达尔戈的叛乱被平息后，在莫雷洛斯的统治下，莱奥娜的革命热情重新被点燃，她因公开发表支持美洲国家独立事业而闻名。并且她不仅仅停留在言语层面，还积极组织相关活动。莱奥娜将她在墨西哥城的住处变成了新西班牙爱国者事业的非正式交流中心。的确，莱奥娜和一小群自称为“瓜达卢佩人”的秘密爱国者同盟是总督辖区首都的主要叛乱分子。通过爱国者的交际网络，莱奥娜与分散在各地的叛乱群体领导人保持通信，她给每个叛乱者都取了代号，并且用加密的语言和他们沟通。其中最勤奋的信使之一是安德烈斯·金塔纳·罗（Andrés Quintana Roo），他是一位来自新西班牙南部的热情的爱国主义记者，曾在洛佩斯·雷昂的国民洪达中工作过。

1813年初，当王室当局逮捕莱奥娜的一名信使，也就发现了她的叛国行为。幸运的是，一名爱国主义者及时警告了她。恰逢周日的狂欢节，他

们在街道上制造混乱，帮助她逃脱。在几名仆人的陪伴下，她逃离了墨西哥城，据说是要去一个偏远的城镇参加聚会。然而，一离开墨西哥城，她就病倒了，并最终向她的保皇派叔叔投降。莱奥娜“间谍活动”的被揭发和她的被拘押都成为墨西哥城的话题。莱奥娜面对审问她的法官，没有透露任何可能伤害她秘密事业的内容。她的审讯并未公开，因此她在审问中表现出的机智、决心和自尊并不为人所知。然而，当她从拘留所潜逃并消失在人口稠密的墨西哥城中时，确实传闻许多人私下为这位勇敢的美洲人鼓掌。先锋记者兼小说家费尔南德斯·德·利扎尔迪（Fernández de Lizardi），虽然经常受到审查的困扰，但还是冒险在报纸中发表了钦佩莱奥娜的评论。随后，城里人口耳相传一个故事，说是几周后一列载满货物的骡子列车离开了墨西哥城，许多骑着骡子的男人跟随在列车两旁，还有几个女人坐在骡子担子上。所有这些帕尔多男人和帕尔多女人都打扮得如同新西班牙的普通骡夫，那天莱奥娜·比卡里奥涂黑了自己的皮肤，打扮成帕尔多骡妇的模样偷偷溜出城，去往瓦哈卡，她希望找到安德烈斯·金塔纳·罗。

### 阿苏尔杜伊创建了“忠诚营”

胡安娜·阿苏尔杜伊（Juana Azurduy）在她安第斯的家里等待了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帕迪利亚（Manuel Ascencio Padilla）近一年的时间，同时照顾着她的四个孩子，并学会了使用军刀。曼努埃尔回来时告诉她，许多爱国主义妇女在卡斯特利远征军被摧毁后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英勇战斗的故事，使得胡安娜更坚定了自己成为爱国主义战士的决心。当布

宜诺斯艾利斯派遣出第二支远征军队保卫上秘鲁时，胡安娜和曼努埃尔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加入了队伍。这一次，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将军是卡斯特利的表弟，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创始人之一，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Manuel Belgrano）。与卡斯特利相比，贝尔格拉诺更加和蔼可亲，对当地的天主教保守主义者也更敏感。胡安娜和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喜欢贝尔格拉诺，他也很喜欢这对夫妻。甚至在到达上秘鲁之前，贝尔格拉诺在图库曼（Tucumán）和萨尔塔（Salta）已经赢得几场可喜的胜利。

但是，要想在上秘鲁取得胜利，贝尔格拉诺需要能说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的当地人的帮助，胡安娜和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因为他们的乡村成长经历可以毫无压力地说这两种语言。于是他们的任务就是从乡村招募印第安人。胡安娜骑着马，穿着军装，手持军刀，给当地印第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开始称呼她为“帕查玛玛”（Pachamama）或“大地之母”，并且她给贝尔格拉诺的军队带来了一万名新战士。但是贝尔格拉诺将这些大量未经训练和缺乏经验的志愿者（让人联想起伊达尔戈的追随者）与他的规模更小、装备精良的部队区分开。毕竟胡安娜和曼努埃尔·阿森西奥招募来的志愿者都是原住民印第安人，而贝尔格拉诺部队中此前都是来自平原的白人和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用棍棒和吊索作战，就如同圣经故事中大卫对付歌利亚时所用的一样。贝尔格拉诺倾向于雇用印第安人作为辅助人员，尤其是作为搬运工来运送补给，并在翻山越岭中艰难地搬运火炮和炮弹。

1813年10月1日，胡安娜和曼努埃尔·阿森西奥看到贝尔格拉诺的军队在一个叫做维拉卡普乔（Vilcapugio）的地方被击败，而他们招募的成千上万名印第安人则被禁止参与战斗。之后，胡安娜质问贝尔格拉诺时，贝尔格拉诺告诉她，他担心这些志愿者缺乏战场纪律。这种担忧不是凭空想象的，米格尔·伊达尔戈的军队在卡尔德隆桥（Calderón Bridge）时就

发生过这类事故，致使贝尔格拉诺不得不慎重考虑。因此，胡安娜从贝尔格拉诺那里借了一本训练手册，并开始训练她亲自精挑细选的“忠诚营”，以展示帕查玛玛和她的士兵可以做什么。仅仅几个星期后，贝尔格拉诺再次与保皇派军队对峙，这一次他被彻底击败了。但是，在贝尔格拉诺的精良部队放弃抵抗之后，是“忠诚营”的印第安人士兵在阿尤玛（Ayohuma）战场奋战到了最后一刻，他们在保皇派军队致命的枪林弹雨中不断拉动着投石器顽强反抗。战斗结束后，贝尔格拉诺将军刀交给了胡安娜·阿苏尔杜伊，以表彰她所率领的“忠诚营”的英勇精神。

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是个令人同情的人物。他创制了阿根廷国旗，倡导公共教育，并以释放了许多等待被处决的囚犯而闻名。不幸的是，在阿尤玛战败后，他从上秘鲁撤退时，他还试图炸毁美丽的波托西铸币厂。诚然，铸币厂是西班牙权力的象征，也是敌人可以使用的资源，但它位于城镇的中心，贝尔格拉诺的这一尝试使他在波托西无人喜爱。总之，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上秘鲁的第二次远征再现了第一次的场景。这些南部平原人民激动地赶到这里，把所有人都激怒，自己也遭到殴打，然后撤退——留下上秘鲁的爱国主义者遭受回归的保皇派的迫害。

### 从奇尔潘辛戈诞生了一个国家

阿那瓦克的国会（the Congress of Anáhuac），这是莫雷洛斯麾下的小型制宪会议，在位于南部的奇尔潘辛戈大本营召开。该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国家。1813年11月6日，当阿那瓦克国会宣布国家独立时，这个国家尚

未有自己的名字。“阿那瓦克”诗意地指称古代阿兹特克人，比其他任何名称都像是一个文学称谓。用“新西班牙”这个名字是不可能的。“墨西哥”这个名字从古都蔓延传播到全国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墨西哥人更喜欢将这次会议记为奇尔潘辛戈大会，因为代表们是在崎岖的南塞拉马德雷山区尘土飞扬的小镇开会。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起草一部宪法。莫雷洛斯简短地给他们阐发了自己的想法：国王将不会再存在了，因为已经有足够多的国王了。不再有种族阶级制度了，因为已经有足够多的种族阶级问题了。奴隶制同样也存在得够多的了。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应该只是美洲人，就像每个人都应该是天主教徒一样。会议规定要设立两个全国性的法定假日，分别应该是瓜达卢佩圣母节和伊达尔戈 1810 年在多洛雷斯村起义的周年纪念日。在表达了这些观点之后，莫雷洛斯就自己离开，让会议代表继续工作。他曾解释说因为他只是一个贫穷的乡村牧师，无法胜任去处理关于阿那瓦克的花哨文字工作。这些工作更适合于像安德烈斯·金塔纳·罗（Andrés Quintana Roo）这样的文人。此时，他正与莱奥娜一起在奇尔潘辛戈大会中担任副主席。

与此同时，莫雷洛斯尚未输掉任何一场重要的战役。在前一年拿下瓦哈卡后，他甚至还攻下了阿卡普尔科（Acapulco）。但是，1813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努力突破阿卡普尔科人民的长期围攻，并且尽力迫使他们投降，但是最终他也没有获得什么太多直接的好处。还有更糟糕的消息，按照加的斯的命令，费利克斯·马利亚·卡列哈将军（General Félix María Calleja）已取代贝内加斯担任新西班牙的总督。卡列哈发誓要抓到莫雷洛斯，也许他也是唯一能做到的人。然而，莫雷洛斯似乎没有感受到威胁。在阿那瓦克国会宣布独立后的第二天，莫雷洛斯认为需要一个更合适的场所来进行进一步的审议，于是他又一次担负起护送国会转移的军事行动。

国会为什么不在莫雷洛斯的故乡召开呢? 他的故乡是凉爽优美的巴利亚多利德, 那里还有肥沃的巴希奥地区和瓜纳华托的银矿。

### 费尔南多七世让时光倒流

在法国被囚禁了六年之后, 费尔南多七世这个“万众企盼”的人又回来了。1814年5月13日, 马德里人民给予了他盛大的王室欢迎, 不仅庆祝他们心目中所崇拜的他(至少, 民众仍然想象他是这样的), 而且还庆祝他最近公布的对加的斯议会所做的一切逆转。费尔南多让政治变革的时钟往回拨动了, 他恢复了所有西班牙公职人员的职务, 和他们在其1808年成为国王时的职务一模一样。费尔南多拒绝成为一个立宪制的君主。他逮捕了自由派的领导人, 废除了加的斯宪法, 解散了议会, 并说他之后会再召开另一个议会。事实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为什么费尔南多想要绝对的权力, 这一点并不神秘, 因为西班牙民众似乎希望他拥有这种权力。也许他们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他。他曾经是属于西班牙人的蓝眼睛男孩\*, 此后迅速被法国人俘虏了, 从那时起西班牙人一直记挂着他, 但这种记挂总是在他缺席的时候。总体而言, 西班牙在1814年5月似乎接受了一个观点: 撰写宪法的自由主义者是整个法国的一部分, 最好被人们遗忘。当然, 西班牙的自由主义思想确实有很多受到法国的启发——同样地, 加的斯议会比整个西班牙国家都要自由得多。就如同阿那

---

\* “某人的蓝眼睛男孩”指比任何人都更受宠的年轻人, 因此获得比其他人都更好的待遇。——译者注。

瓦克国会和其他战时大会一样，它象征着主权国家的人民，但在没有真正选举的情况下不一定能体现他们的集体意志。因此，当费尔南多重新获得绝对权力，恢复封建贵族的特权，甚至重新建立神圣宗教裁判所时，西班牙人民可能会为之欢呼，认为这一切都是法国大革命前美好时光的回归。

也是时候让殖民地回归了。美洲代表向（加的斯）议会提交的恭敬的请愿书应该永久性地尘封了，而不会在会上讨论了。费尔南多七世认为与危地马拉牧师安东尼奥·德·拉腊萨瓦尔（Antonio de Larrazábal）这样的麻烦制造者没有任何可讨论的，他也是当时被监禁的加的斯自由主义者之一，更不用说与侵犯王室特权的叛乱分子讨论了。费尔南多更愿意以军事手段解决美洲问题。他命令尽快准备一次远征行动，这将是西班牙有史以来向美洲派出的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至于加的斯议会宣称的欧洲人和美洲人的平等，也许它从来只是口头上的承诺，但现在连这种平等也消失了。

### 纳里尼奥再次入狱

第二天，在新格拉纳达，年迈的革命者安东尼奥·纳里尼奥被费尔南多七世的支持者俘获，当时他正带领着昆迪纳马卡军队进攻帕斯托。这次纳里尼奥被活捉了。

事实证明，帕斯托人是费尔南多七世在美洲的最顽强、最忠诚和最坚定的臣民之一。帕斯托社会主要由原住民构成，带有浓厚的安第斯特色。除了当地的帕斯托神职人员和该城市的西班牙裔美洲精英之外，混血的乡镇居民和帕斯托的印第安农民都是坚定的保皇派，他们不希望加入一个不

服从费尔南多七世的新共和国。毫无疑问，帕斯托的忠诚是对本土保守主义的回应，也是对帕斯托和基多之间久远对抗的回应。基多第一届洪达的想法之一就是袭击帕斯托。当基多第二届洪达攻下并短暂占领该城时，也未能使帕斯托人民支持美洲解放独立的事业。在1814年中期，帕斯托作为新格拉纳达保皇派南部的顽强堡垒屹立不倒——安东尼奥·纳里尼奥曾发誓称要向这里的人民介绍自由的好处，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自由。

波帕扬（Popayán）是新格拉纳达南部的城市，距帕斯托不远，在今年初就被纳里尼奥的军队攻陷。当纳里尼奥的军队驻扎在波帕扬休整时，纳里尼奥给帕斯托的居民写了封信，解释说美洲人不应该与美洲人作战，波哥大始终把帕斯托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但是印第安人收集了如葡萄柚般大小的圆形石头用于他们的弹弓攻击，并在纳里尼奥军队必经的道路上方悬崖边缘上放置巨石。帕斯托的城镇居民同样热情地参加了防御行动，随着纳里尼奥的军队向这座城市推进，他们进行了一连串的抵抗行动。最终，就在军队几乎挺进帕斯托的当口上，这个城市顽强的居民击溃了纳里尼奥的军队，并于1814年5月14日在不知道纳里尼奥是谁的情况下俘虏了他。纳里尼奥了解帕斯托人对他的看法，所以伪装了自己的身份，声称自己不是纳里尼奥，但是清楚纳里尼奥的下落，并承诺如果能被优待，那么他就会告诉他们（帕斯托人）纳里尼奥的行踪。俘虏他的人将他带进城去以听取这个消息。当这名俘虏被西班牙将军安全关押时，他就跑到阳台上，向人群嘲笑他们：“帕斯托的人们啊！你们在寻找纳里尼奥将军吗？他就在这里呢！”<sup>[4]</sup>

因这一事，帕斯托人赞成对纳里尼奥执行即刻处决，但西班牙将军却保护起这名反抗俘虏，感谢他阻止了在波帕扬的劫掠。此外，纳里尼奥还是一名有价值的俘虏。不久，他又一次戴上镣铐，被送往利马，然后再前往加的斯。距他脱离之前西班牙人的羁押还不到四年时间。

## 玻利瓦尔遇见拉诺斯人

与此同时，玻利瓦尔的命运也急转直下。在纳里尼奥被俘一个月后，玻利瓦尔输掉了在拉普尔塔（La Puerta）的决定性战役，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迅速瓦解。蒙特韦德在这位运气不佳的解放者的失败行动中没有发挥作用。这次，玻利瓦尔的宿敌是该国的一整片地区，称为拉诺斯（Llanos）。

拉诺斯地区位于奥里诺科河的一侧延伸至委内瑞拉内陆部分，该河在1814年还是人口稀疏的边疆畜牧区，那里居住的都是强悍的牛仔——这些拉诺斯人（Llaneros）也被称为平原骑兵，这些人已成为强大的军事资本。拉诺斯人的优势是老派的。在世界历史中，马一直是最重要的作战工具。加上拉诺斯地区的地形，拉诺斯人的骑兵技能使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因为他们懂得使用简易的长矛。殖民时期建筑中常见的那种单窗格栅的铁条被削尖成长矛头，可以将十几根竹竿变成大量的致命武器。由于枪支仍然稀缺，这种简易武器的价值倍增。边境骑兵，通常是帕尔多人，他们在美洲独立战争的这些年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常是为了爱国主义势力而战，但并不总是如此。在帕斯托附近帕蒂阿谷地（Patía valley）的非洲裔骑兵，是保皇派势力帕斯托人极为有用的盟友。委内瑞拉的拉诺斯人也是保皇派，至少在目前来看是这样，他们都在一个“本土化”的欧洲人的领导下，此人名叫托马斯·博韦斯（Tomás Boves）。博韦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以前是一名船长，留在了委内瑞拉，就住在拉诺斯地区的边缘，从事马匹、骡子和牛皮的贸易。在委内瑞拉生活的岁月使博韦斯成为一名骑手，他的骑术甚至在挑剔的拉诺斯人眼中也值得尊敬，但他因允许甚至鼓励暴行而声名狼藉。如果玻利瓦尔想要展开“死亡之战”，那么博韦斯可以让他尝到死亡的滋味。

在爱国主义者的阵营这边，玻利瓦尔与另一位解放者圣地亚哥·马里尼

奥 (Santiago Mariño) 联合起来了。马里尼奥领导着委内瑞拉东部的共和主义运动, 该运动在库马纳附近兴起, 独立于玻利瓦尔以加拉加斯为中心的共和主义运动。1814年6月15日, 东部和西部的两位解放者在拉普尔塔面对着来路不明的一波又一波的拉诺斯骑兵的冲击, 他们的军队溃退了, 并向加拉加斯全速逃奔而去。加拉加斯的居民赶紧撤离这座城市, 成千上万的人向东徒步前往库马纳, 以躲避博韦斯。他们的恐惧并非不合理。有关博韦斯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 一件轶事对于许多人来说就足够了。在拉普尔塔战役后几周, 瓦伦西亚市投降于博韦斯, 面带微笑的博韦斯邀请该市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参加舞会以庆祝他的胜利。她们不敢拒绝, 但是当她们与博韦斯的部队共舞时, 她们听到了后来被证实是她们的丈夫、儿子和兄弟在城外被屠杀的声音。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公共广场上, 也回响着对无罪欧洲人不经审判就清算行刑的惨烈声音。内战在委内瑞拉比美洲其他国家都更加血腥。

在库马纳, 博韦斯的骑兵横扫加勒比海地区所有的对手, 玻利瓦尔和马里尼奥的联军被击溃, 他们被迫再次登上小船, 扬帆流亡。最后博韦斯在一次扫荡行动中被击毙, 第二共和国的势力也宣告结束。但他的拉诺斯骑兵军队彻底改变了委内瑞拉的军事力量平衡。在接下来的两代人中, 谁赢得了拉诺斯人的信任, 谁就可以统治委内瑞拉; 反之就无法成功。

### 圣马丁酝酿了一个计划

何塞·德·圣马丁 (José de San Martín) 的肺部问题原在西班牙时就有, 但在美洲逐渐发展成了慢性的轻度肺结核病。1814年9月7日, 在阿根廷西

部较远的安第斯山脚下宜人的小城门多萨（Mendoza），圣马丁完成了一段漫长而折磨人的骑行。他期望，那里的气候可以改善他的健康。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将使他能够推进自己的战略计划（后文将进行描述）。圣马丁想尽一切可能来推动该计划的愿望在他到达门多萨的当天就受到了考验，当时市政会自豪地为他提供了一个住所。圣马丁对这些讨好个人的事情的正常反应是尴尬地拒绝——而且，一如往常，他首先拒绝了市政会的提议，最后为了取悦该市的建市领袖才答应接受该邀约。他的战略计划需要他们的帮助。

过去一年中，圣马丁在脑海中勾画出了自己的战略计划蓝图，其中部分的时间是在图库曼度过的，在那里他取代了最近在上秘鲁被击败的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贝尔格拉诺是圣马丁要找的那种人——始终如一、理性、谦逊的人。两人在见面之前通过一系列的信件往来就已经成为朋友。圣马丁接管了贝尔格拉诺的指挥权后，仍将贝尔格拉诺留在身边，并在贝尔格拉诺重建战败的军队时，捍卫这位战败将军的声誉。耐心地准备、训练和补给工作一直是圣马丁的专长，而不是追求战场上的英雄主义。在图库曼，他努力地为衣衫褴褛的士兵置办制服，并创办了一个学院来训练军官。圣马丁将来自北部城市萨尔塔（Salta）的马丁·格梅斯（Martín Güemes）调来负责训练和部署高乔人游击队，这是一个不错的决定。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每次从上秘鲁撤退，保皇派的军队都向南追击。格梅斯和他的高乔人游击队都能成功地阻止这些追击，但他们的职能主要还是防御性的。

随着离上秘鲁越来越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挑战性。与贝尔格拉诺和其他两次上秘鲁远征之旅失败的老兵进行交谈后，圣马丁决定，占领高地已经成为分散最终战略目标的致命因素：占领利马，这一西班牙在南美大陆上的主要殖民权力堡垒。圣马丁决定，拿下利马和安第斯高原必须逐次赶上。同时，上秘鲁——高耸的海拔，广阔的地貌和在德萨瓜德罗（Desaguadero）天然的地理瓶颈——构成难以

逾越的后勤障碍。圣马丁的计划是绕过这些障碍，从更南端的，靠近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狭窄地点越过安第斯山脉。从那里，一支海路远征军实际上可以在利马总督府门口登陆。圣马丁的战略计划要求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门多萨建立一支新的陆军，靠近通向圣地亚哥的通道。他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请求对该地区进行军事指挥。

同时，圣马丁以前的朋友和合伙人卡洛斯·德·阿尔韦亚尔，或多或少地掌握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权力。但是圣马丁并不指望获得阿尔韦亚尔的帮助，因为他的工作重心截然不同。阿尔韦亚尔的首要诉求是摧毁并消灭阿蒂加斯（Artigas）领导的东岸部队，因为他们仍旧拒绝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指挥。阿尔韦亚尔还想第三次派远征队到上秘鲁。阿尔韦亚尔希望能领导这两次军事行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军事荣耀和功绩。因此，他很高兴看到圣马丁被派往遥远的门多萨，也很高兴看到贝尔格拉诺前往伦敦执行外交任务。

因此在1814年9月，圣马丁在门多萨安顿下来，准备他要进行的长远的工程。他的健康状况确实有所改善。更妙的是，他的妻子雷梅迪奥斯（Remedios）也来到此处与他并肩作战。接下来的两年将是他们在一起最长的时光，也可能是他们婚姻中最幸福的时光。从政治上来看，门多萨的局势，在隔壁的智利爱国主义政府垮台后变得更加复杂。

**请记住兰卡瓜！**

1814年10月2日，贝尔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在黎

明时分，从智利中部城镇兰卡瓜（Rancagua）的一座钟楼顶观察着，寻找承诺的救援部队的踪迹。奥希金斯和他的爱国主义同胞被效忠于秘鲁总督阿瓦斯卡尔（Aberscal）的保皇派军队围攻，被迫躲到了该镇的中央广场，广场的四个角落都被敌人摆上了路障和大炮。奥希金斯的部队缺少弹药和水，无力抵抗太长的时间。总督阿瓦斯卡尔曾在秘鲁和基多都取得过胜利，将为绝对君主费尔南多七世重新征服智利。

当奥希金斯扫视周围寻找帮助时，他的心里一定在翻腾，因为他知道只有他的死对头何塞·米格尔·卡雷拉（José Miguel Carrera）能在这时帮助他。奥希金斯和卡雷拉曾作为敌对双方开始了这场革命，他们一个代表着智利圣地亚哥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代表着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的爱国主义者，有着地区之间的鸿沟。这些分歧最终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就得到了解决，但难以言说的情感依然存在。

当阿瓦斯卡尔从秘鲁派出的第一支远征军在康塞普西翁附近登陆时，奥希金斯和卡雷拉试图共同对抗保皇派的侵略者。然而，他们之间的相互猜疑阻碍了有效的合作，紧接着第二支秘鲁远征军前来增援第一支远征军。奥希金斯在和早期秘鲁军队的几次小规模冲突中获胜，这使他成为爱国主义者阵营的军事英雄，但卡雷拉拥有更牢固的政治关系。傲慢的卡雷拉认为奥希金斯是总督的私生子，是一个教养和智力低下的社会暴发户。当阿瓦斯卡尔的第三支远征军在南部成功登陆并迅速向圣地亚哥挺进时，他发现奥希金斯的部队正在同卡雷拉的部队周旋。在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他们轻易地就将奥希金斯困在兰卡瓜。

奥希金斯对卡雷拉承诺的救援部队缺乏信心是有先见之明的。卡雷拉后来说，他撤回去是因为他相信兰卡瓜已经投降。奥希金斯看到卡雷拉的部队调转方向后，就从钟楼下来，面对即将来临的最后冲击。当弹药消耗殆尽时，奥希金斯率领所有残余部队最后一次尝试突破重围。骑兵逃生的

机会最大，正如奥希金斯本人和其他数百名骑兵一样，他们成功逃脱了围困。不过，在兰卡瓜的1700名捍卫者中，到当天结束时约有1000人伤亡，400人被俘。战败后的几天里，大量的平民难民在一次溃逃中从圣地亚哥涌向安第斯山区。奥希金斯和卡雷拉，以及所有自1810年以来参与智利各种地方自治项目的人都是大逃亡人群中的一部分。从其最初的康塞普西翁基地出发，由阿瓦斯卡尔派遣的秘鲁远征军逐渐在智利全国重新建立了总督的权威。奥希金斯和卡雷拉等流亡者则是不得不越过安第斯山脉来到门多萨，这给圣马丁送来了经验丰富的新兵，但麻烦也随之而来，因为智利人继续在内部相互斗争。

可以说，兰卡瓜之战是智利首次进行自治实验失败的时刻，但从长远来看，智利的独立是不可避免的。不知为何，希望的炼金术师将这场失败转化成一种激励。像库奥特拉（Cuautla）的爱国主义者一样，兰卡瓜的爱国主义者虽然也曾血流成河，但还是骄傲地反抗着。智利爱国主义者会像萨姆·休斯敦（Sam Houston）的得克萨斯人记住阿拉莫（Alamo）的方式那样，来记住兰卡瓜。爱国主义事业从因其牺牲的英雄身上获得新的感召力，因残酷的保皇派重新征服的经验获得了新的说服力。1814年末，随着保皇派势力重新实行王室控制，这样的事情在整个美洲都屡见不鲜。

### 阿瓦斯卡尔扼杀普马卡瓦的叛乱

1815年初，在秘鲁的西库阿尼（Sicuni）地区，67岁的马特奥·普马卡瓦（Mateo Pumacahua）发现自己受到了即刻处决之前的那种审讯。当天

即将彻底结束的普马卡瓦叛乱，是秘鲁本地面对西班牙镇压的一次大规模反抗。毫无疑问，普马卡瓦为曾加入美洲独立事业而感到后悔。在安第斯山脉南部，普马卡瓦一直是西班牙统治下最忠诚和最受尊敬的印第安捍卫者之一。几个月前，在安第斯山脉高地的前印加首都库斯科，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在沿海地区建立了一座新的首都来取代库斯科。但是，这座古老的印加首都仍然是秘鲁殖民地的强大权力和权威中心。例如，库斯科是检审法院的所在地，库斯科还拥有在西班牙统治下仍然享有声望的印加贵族的遗迹。普马卡瓦本人声称自己是印加皇室的后裔。另一个声称具有这种血统的人是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他在18世纪80年代曾领导过一场盛大的起义。忠诚的马特奥·普马卡瓦当时正值壮年，曾与图帕克·阿马鲁作战，甚至参加了西班牙对战败叛军的报复行动。普马卡瓦对西班牙王室的服务为他赢得了社会荣誉，并在民兵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拉巴斯的爱国主义者于1809年创建革命性的洪达时，在普马卡瓦部下的帮助下摧毁了它，库斯科同样是阿瓦斯卡尔成功反击卡斯特利和贝尔格拉诺入侵上秘鲁的中转集结地。

当总督阿瓦斯卡尔无奈地在秘鲁颁布《加的斯宪法》时，库斯科与利马的旧有竞争关系有了新的表现。库斯科的美洲人渴望选举自己的市政会，这是宪法授权的，他们用烟火和斗牛来庆祝。乡村的印第安人也有一些值得庆祝的事情——宪法废除了每年的贡赋或人头税。当库斯科在欧洲人占主导的检审法院与美洲人占主导地位的市政会发生冲突时，城市人群拥护市政会，熟悉的模式又重演。大学毕业生（特别是一个叫何塞·安古洛 [José Angulo] 的美洲人）和牧师领导着库斯科的爱国主义运动，直到西班牙当局严重侮辱了普马卡瓦（他们毫不客气地剥夺了他在检审法院的位置，这是一种疯狂的错误）。然后，美洲人组成的市政领导为了向普马卡瓦示

好，公然使用“费尔南多的面具”蒙蔽这位王室的老仆。他们知道，这位长期担任民兵的指挥官，其追随者称他为“印加人”，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来加入他们的美洲独立事业。

而这正是所发生的一切。在高峰时期，短命的普马卡瓦叛乱占领了两个重要的安第斯城市拉巴斯和阿雷基帕。但是，普马卡瓦叛乱和新西班牙的伊达尔戈起义表现出同样的弱点。在这两种情况下，城市白人和梅斯蒂索人都召集了印第安群众，但是他们既无法使这群人武装完备，也难以让他们遵守纪律。普马卡瓦号召的12 000至14 000名战士中，除很少一部分人外，都携带着弹弓和棍棒，而没有枪支。他们表现出了传统主义的形象，与城市领导层的自由主义议程想象相去甚远。与伊达尔戈的部队一样，普马卡瓦的部队大肆地进行掠夺。西班牙人的财产是他们的主要掠夺目标，接着他们紧盯着富裕美洲人的财产。因此，美洲人对该场叛乱的支持度迅速下降。当普马卡瓦的军队遇到另一支规模更小、装备更精良、纪律更严明的部队时，这支军队被击溃到几乎消失，这几乎重现了卡列哈曾经在卡尔德隆桥击溃伊达尔戈部队的场景。

在他的军队战败不久，马特奥·普马卡瓦被俘，粗鲁的审讯人员一再蔑视囚犯对问题的回答，尽管在1815年3月17日他对那些问题做出了有尊严的回应。普马卡瓦抗议说，他之所以同意在库斯科周围增派印第安人军队，只是因为何塞·安古洛（José Angulo）告诉他，费尔南多七世已经死于法国人的囚禁，必须保护王国免遭篡夺者的侵害。当被问及为什么他签署了组建新政府的文件时，普马卡瓦声称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只是赞同叛乱军的市政领导人的建议。当被问及为什么他穿的衣服表明他是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Huayna Capac）的后裔时，普马卡瓦否认自己曾经穿过任何除军装以外的衣服。当被问及他是否知道背叛国王的下场时，老普马卡瓦说他知道，就是死刑。然后，（审判人员）向他核对了证

词，普马卡瓦也在上面签字了。他将自己的角色作用尽量最小化，以期获得从轻从宽的定罪。但是，当这位老人一签署证词，立即被绞死，死后被斩首、摘取脏器并分尸。普马卡瓦的头被送到库斯科，挂在城市主广场的长矛上示众。他的一只手臂被送往阿雷基帕以类似的方式示众，这里也是他曾获得最大胜利的地方。

像智利一样，秘鲁也安全地回到了西班牙王室的控制之下，并且保持多年不再发起新的起义。

## 伊图尔维德登场

到 1815 年 5 月，西班牙王室的控制权也在新西班牙得到安全重建。自奇尔潘辛戈大会以来，莫雷洛斯的行动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莫雷洛斯原本希望占领巴利亚多利德并在那里建立国会，但最终惨败。这位反叛牧师长期以来的连胜纪录已经永久结束了。各种小型起义力量继续在新西班牙存在着，但它们变得完全支离破碎，并且彼此之间越来越多地相互争斗。随着莫雷洛斯的衰落，另一个巴利亚多利德土生土长的人成为一名冉冉升起的新星。

这颗新星就是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他是一位富有的年轻地主和民兵军官，曾拒绝伊达尔戈参与起义军的个人邀请，而是在克鲁塞斯山与伊达尔戈作战。伊图尔维德在莫雷洛斯在巴利亚多利德的耻辱性战败中发挥了作用，战后亲自领导了一次残酷的扫荡行动。这位保皇派军官因其残酷地对待爱国主义者俘虏而声名狼藉，而莫雷洛斯的

军队人数日渐减少，他的“便携式”国民会议更是常常迁徙，仅比追杀者部队领先一步之遥。在偏远的山村阿帕钦甘（Apatzingán），他们召开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议，这次参与人数稀少的大会上写下了一部共和宪法，即使它将永远无法实施。莱奥娜·比卡里奥和安德烈斯·金塔纳·罗这对夫妻是这个车轮上的流动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承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共同为美洲独立事业而奋斗。1815年5月1日，伊图尔维德为了追捕莫雷洛斯和他的国会而发起了一场新的远征行动，而总督卡列哈在墨西哥城的主广场上焚烧了阿帕钦甘宪法，教会当局宣布，阅读该文件的人将会被开除教籍。

### 阿蒂加斯建立联邦联盟

在美洲，西班牙王室当局唯一未能成功重新行使其权力的地方是前拉普拉塔总督区。实际上，到1815年年中，总督埃利奥（Viceroy Elío）放弃蒙得维的亚，而将该城弃给围攻此处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并返航回西班牙，这让卡洛斯·德·阿尔韦亚尔在胜利中得意洋洋。然而，对蒙得维的亚人民而言，只是用一个占领者替换了另一个占领者，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以铁腕手段控制了局面，并吞下了大量战利品，其中包括8000件急需的枪支、数百门加农炮，以及卡洛塔·华金纳（Carlota Joaquina）送给总督埃利奥的印刷机。但是阿尔韦亚尔把他全部的政治资本都花在围攻蒙得维的亚的行动上，因此他树敌很多。不幸的是，当他的部队突然反对他时，阿尔韦亚尔的领导权就突然崩溃。最终，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从

蒙得维的亚撤军，这让何塞·阿蒂加斯（José Artigas）的乡村跟随者多年来第一次进入自己省份的要塞首都。

阿蒂加斯已成为劳塔罗俱乐部最糟糕的噩梦，该俱乐部致力于建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控制。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敌，阿蒂加斯去年组建了一个联邦联盟，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将东岸与前拉普拉塔总督区其他四个寻求自治的省联系在一起。联邦联盟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带来了严峻的经济和军事挑战，这要归功于它的规模，水草丰美的牧场，以及它位于乌拉圭河和巴拉那河的地理位置，这使它可以独立进行大西洋贸易。不久，联邦联盟成员开始绕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从自己的河港出口牛皮和腌牛肉。联邦联盟认为阿蒂加斯拥有一个军事首脑的头衔，他是“自由人民的保护者”。最接近联邦首都的地方是阿蒂加斯在普里夫卡西翁（Purificación）的营地。

普里夫卡西翁是边境的定居点，是军事基地的一部分，是一排排带茅草屋顶的小泥屋，在高原上俯瞰着乌拉圭河。所有到访这里的人都会对普里夫卡西翁的原住民人数感到惊讶。毫无疑问，那里使用瓜拉尼语与使用西班牙语的人一样多。普里夫卡西翁也是监狱的一部分。阿蒂加斯建议将西班牙囚犯送到那里进行某种乡村式的再教育，（让他们）在与美洲乡村的接触中学习共和主义价值观。阿蒂加斯表现出了他倡导的朴素的生活方式，住在没有家具的房间，经常穿着普通的乡村服装而不是制服。他一直与平原边疆的普通民众，与高乔人和印第安人有联系。他收养了一个瓜拉尼青年安德烈斯·阿蒂加斯（Andrés Artigas）作为儿子，此时他给养子写了一封信，说明他计划召集一次大会，并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防御联盟，以抵御即将来临的“汹涌的西班牙人”<sup>[5]</sup>。阿蒂加斯当时指的是费尔南多七世在加的斯进行的伟大远征，以歼灭其余的美洲叛军。远征军有超过一万人，乘坐 60 艘船，都是西班牙对拿破仑作战时经验丰富的退伍军人。远征

军的指挥官巴勃罗·莫里略 (Pablo Morillo) 是那场战争的英雄。拉普拉塔河是他的预期目的地, 如果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联邦联盟无法表现出统一战线, 它将会被轻易攻下。

1815年6月29日, 由阿蒂加斯召集的小型国会在乌拉圭河西岸的一个名为阿罗约德拉齐纳 (Arroyo de la China, 也叫“妇人溪”) 的地方举行, 并同意派遣一个代表团顺流而下, 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谈判建立防御性联盟。然而, 他们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谈判的心情。根据刚刚从欧洲传来的消息, 莫里略的远征军已经前往委内瑞拉。

### 玻利瓦尔写下他的《牙买加来信》

西蒙·玻利瓦尔在被博韦斯击败后在牙买加流亡 (以及其他冒险活动在这里无法追溯), 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在美洲所发生的令人沮丧的事件发展。自5月以来, 曾经富裕的玻利瓦尔身无分文, 住在租来的房间里, 睡在吊床上, 依靠英国商人朋友的支持来获取食物和花销。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被惠灵顿公爵最终击败的消息最近传到了牙买加, 玻利瓦尔坐下来写了他著名的《牙买加来信》, 日期是1815年9月6日, 在金斯敦。

玻利瓦尔的《牙买加来信》部分回应了一位英国当地绅士对他的询问, 但玻利瓦尔将回信全都在报纸上发表, 希望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这本质上是对英国援助的恳求。像许多美洲独立运动领导人一样, 玻利瓦尔也是一个亲英派, 而此时寻求英国的援助似乎尤其合适。在与拿破仑作战十年之后, 英国陆军和海军的规模对于和平时代来说都过于庞大了; 也许美洲人

可以利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增强自身的力量。如果英国想在美洲地区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么玻利瓦尔则想引导它。实际上，他已经视英国为它实际上将会成为的样子，即南美洲新的霸权国家。但他并不期望这种关系是会发生冲突的。很难说英国商人和美洲人谁更想开展与英国的贸易往来。玻利瓦尔的《牙买加来信》对经济机会和陷入困境的美洲独立事业，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玻利瓦尔坚持认为，莫里略远征队已经占领委内瑞拉，但将无法占领卡塔赫纳。他也向读者保证，智利和秘鲁随时可能再次起义。他说新西班牙的局势多变而混乱，这是事实。但是只有拉普拉塔地区无可置疑地成功摆脱了西班牙的控制，才真正符合玻利瓦尔的乐观描述——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完全符合，因为他忘了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阿蒂加斯之间持续的自相残杀的对峙。玻利瓦尔还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胜利的军队”已经到达了上秘鲁，但没有说在那里发生了什么。

当谈到美洲的经济潜力时，玻利瓦尔赞叹不已。丰富的财富尚未开发！当然，玻利瓦尔同样也说，许多事情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即使是洪堡凭借其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也无法回答有关该地区未来发展的所有问题。玻利瓦尔还思考了如何治理独立的美洲，他含糊地暗示必须根据该大陆的特殊社会构成来调整新机构。然后，他没有直接点名英国，而是反复表示需要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国家从政治上将美洲纳入其翼下，以获得指导和保护。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国家？（后来玻利瓦尔解释说，英国可能会直接控制巴拿马和尼加拉瓜，在其中一个地点开辟一条跨洋运河，并使地峡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

当被围困的卡塔赫纳请求玻利瓦尔的领导时，玻利瓦尔决定离开牙买加，重返战场。卡塔赫纳的防御工事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但其守军是需要吃饭的。当玻利瓦尔起草《牙买加来信》时，莫里略截获了一份来自卡塔

赫纳的绝望的求救信，报告说该城算上马和狗，只剩下40天的食物供应。玻利瓦尔出海以指挥这座陷入困境的城市，但当他仍在海上时，守军投降了。玻利瓦尔从过往的船只得知卡塔赫纳投降的消息后，改在海地登陆。

### 若昂六世创建了联合王国

英国的影响力也使在里约热内卢的若昂六世感兴趣，到1815年时，那里的人认为这些影响有些过多了。若昂首次抵达美洲时便开放了巴西的港口进行国际贸易，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抵达的船只都是英国的。此外，若昂还专门为英国提供了其他特权。英国商人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因此，英国商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常常令人恼火。英国教徒可以信奉新教，这对葡萄牙君主来说，是做出的一个重要让步。英国外交部也毫不吝惜地施加外交压力。毕竟，英国和葡萄牙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最著名的是最近，英国舰队护送若昂穿越大西洋以逃避拿破仑的蹂躏。

但是现在，英国外交官正向若昂施压，要求他们返回里斯本。拿破仑的失败开创了欧洲的一个新时代。拿破仑的军事冒险破坏了旧时代的君主制，并激发了整个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革命。即使在共和制没有成功的地方，君主立宪制也取代了绝对君主制。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奥地利的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 of Austria）在维也纳发起了一场运动，以恢复欧洲传统君主的权力和尊严。他们的统治应该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由行使人民主权的民选代表大会授权他们这样做。这就是所谓神圣同盟。西班牙的费尔南多选择了神圣同盟代表的专制主义，但是葡萄牙的若昂呢？葡萄

牙既没有民选国民议会，也没有一部宪法。不可否认的是，让一位欧洲统治者在美洲殖民地建立他的王室是很奇怪的。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普遍认为，若昂重返在里斯本的王位是最好的选择。英国人甚至派出海军中队护送他回家。

但若昂拒绝离开，并对这种压力感到不满。法国军队一离开葡萄牙，若昂的葡萄牙臣民便呼吁他回国。因此，若昂以惊人的姿态正式宣布巴西将不再是殖民地，并于1815年12月12日发布了一份皇家宪章，将巴西提升为与葡萄牙地位相等的王国。此外，该宪章还将巴西和葡萄牙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联合王国。因此，若昂用他的王室毛笔轻轻一画，就赋予了巴西人多年来一直寻求的法律平等，使巴西和葡萄牙在法律上成为他王冠的两根支柱。此外，联合王国的王室法院不是在里斯本，而是在里约热内卢。巴西人为之欢欣鼓舞，而在葡萄牙，几乎没有人感到高兴，也许除了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和那里的其他巴西人。（若泽·博尼法西奥作为王室的仆人，仍未获得返回祖国巴西的许可。现在，他已经五十多岁，人们可以说他还在偿还他的学生贷款，因为他在德国学习矿物学时得到了十年的奖学金支持，所以将他与王室服务联系在一起。）

若昂还试图通过与奥地利结盟来抵消英国的压倒性影响。在君主制的行事方式中，最好的结盟是盟友之间的王储婚姻。因此，若昂和卡洛塔·华金纳派遣了一个秘密代表团前往维也纳，以安排他们的继承人佩德罗亲王和奥地利公主利奥波迪娜结成联盟。为了安抚梅特涅亲王，他肯定不赞成若昂的王位永久移居至美洲，若昂指示他的特使转达他希望返回里斯本王室的渴望，当巴西没有受到威胁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热潮的感染时，他肯定会这样做。利奥波迪娜公主是一个聪明而富有朝气的年轻女子，她对巴西致命的热带气候不屑一顾，并宣称她一直想去美洲。尽管佩德罗的

父母都是众所周知的身形不好看的人，但出于某种奇迹，他却有一个完美的身材。

西蒙·玻利瓦尔在牙买加流亡期间乐观地展望了美洲革命，随着革命的落幕，旧式君主制似乎在巴西比以往更强大了。友善而懒散的若昂每晚都为请愿者举行听证会，请愿者在解释他们的请求之前都要跪下来先亲吻他的手。卡洛塔·华金纳特别喜欢看到人们下跪；当她的王室马车从街上经过时，她的警卫会习惯性地用马鞭抽打那些没有跪下的人。在这一点上，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傲慢造成了一些问题，当时，美国外交代表拒绝下跪，甚至威胁说如果卡洛塔·华金纳的警卫试图进行习惯性的马鞭抽打的话，他们就开枪射击警卫。据美国外交官称，于是共和党人就没有跪在街上。因此，若昂对居住在里约热内卢的所有外交官们给予了特殊豁免，这让他的妻子很不高兴。

### 莫雷洛斯作为叛徒被处决

1815年12月22日，当里约人民还在庆祝他们作为若昂联合王国首都的新地位时，拒绝向除上帝之外的任何人下跪的莫雷洛斯作为他的国家和国王的叛徒而被处决。莫雷洛斯曾多次呼吁英国提供支持，更坚持要求美国给予支持。可不幸的是，虽然莫雷洛斯在新西班牙南部的太平洋沿岸拥有据点，但远离大西洋港口，而大西洋港口可以为他提供直接通往伦敦或华盛顿的海路。因此，他试图通过各种不可靠的中间人来间接获得美国的支持，这些中间人声称在新奥尔良和费城有关系，但从来没有让莫雷洛

斯与任何有价值的人联系过。最终，莫雷洛斯和他的“便携国会”决定将他们的活动转移到新西班牙的墨西哥湾沿岸，这样做的目的是与美国人民——希望是真正的共和党人——能更好地交流，能帮助有需要的共和主义兄弟。正是在莫雷洛斯护送“便携国会”的时候，保皇派终于将他俘虏了。

总督卡列哈让立即将莫雷洛斯带到墨西哥城，接受王室和教会官员的彻底审讯。这位激进牧师因叛国罪被判死刑已成定局。莫雷洛斯似乎对被宗教裁判所定为异端更加不安。由于害怕自己的灵魂被诅咒，他进行了忏悔，为此，“通情达理”的教会权威给予他的好处是，他的尸体不会被肢解以示众。莫雷洛斯被关在一辆封闭的马车里，带到了墨西哥城北部的埃卡特佩克（Ecatépec）小村庄，在那里，一个行刑队向他的背部开了一枪，并将他的尸体谨慎小心地埋了起来，没有人知道。

1816年，莫里略的远征军结束了对新格拉纳达的重新征服，并在波哥大重新设立了一个总督区。到那时，美洲起义军只保留了拉普拉塔总督区的控制权，即使在那儿，阿蒂加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冲突也预示着爱国主义者的薄弱。若昂的葡萄牙军队将很快利用这一弱点。在其他地方，西班牙的军队显然已经镇压住了叛乱。但是表象是骗人的。西班牙人重新征服的残酷性，再次唤起了美洲独立事业的吸引力，甚至在曾经反对独立的人群中都是如此。这段不算是内战的年代即将结束。随着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军队抵达，完成对美洲的重新征服，这场冲突变得更加纯粹的是美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冲突——从长远来看，这场冲突中美洲不会失败。玻利瓦尔在《牙买加来信》中写道：“让两大洲相遇，要比调和西班牙和美洲的精神差异更容易。”<sup>[6]</sup>他是正确的。

注释

[ 1 ] Wilbert H. Timmons, *Morelos: Priest Soldier Statesman of Mexico* ( El Paso: Texas Western College Press, 1963 ), 77.

[ 2 ] Rubén Hermendorf, *Morelos: Hombre fundamental de México* ( Mexico City: Editorial Grijalbo, 1958 ), 111.

[ 3 ] Salvador de Madariaga, *Bolívar* ( Mexico City, Editorial Hermes, 1951 ), 1: 375.

[ 4 ] Rebecca Earle, *Spain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Colombia, 1810—1825* (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000 ), 53.

[ 5 ] Walter Rela, *Artigas: Cronología histórica anotada, 1811—1820* ( Montevideo: Alfar, 2000 ), 126.

[ 6 ] *Selected Writings of Bolívar*, ed. Vicente Lecuna and Harold Bierck Jr., trans. Lewis Bertrand ( New York: Colonial Press, 1951 ), 1: 105.

## 第五章 独立胜利（1816—1824）

到 1816 年，只有人口稀少的拉普拉塔省仍在发生起义。为了完成对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重新征服，费尔南多七世发誓要在加的斯组建第二支远征军，这次的目标无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新西班牙、秘鲁和上秘鲁的局势已经被西班牙王室牢牢掌握在手中，以至于坚守的总督卡列哈和阿瓦斯卡尔都可以退休了，享受他们作为西班牙王国救世主的声望。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由于他的母亲，疯狂的玛丽亚一世女王最近去世，他终于从摄政王的位置上“毕业”了）似乎对他的巴西王位十分有把握。然而，在几年之内，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控制都在最小的阻力下失去。发生了什么事？

### 圣马丁开始扭转局面

1817 年 2 月，圣马丁的军队执行了这位有条不紊的将军总战略的第一步，越过安第斯山脉猛攻保皇派的军队，这时美洲的独立复兴开始了。这次雄心勃勃地跨越安第斯山脉的进攻，是圣马丁这两年来复杂计划和艰苦准备的结果。基本上，他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他的安第斯军队。从欧洲人和

教堂经营的农庄中没收的奴隶构成他部队的原初核心力量。圣马丁努力对他们进行充分的培训，让军队变得齐整。兰卡瓜战役后，越过安第斯山脉的智利人，提供了资深老兵的增援。贝尔纳多·奥希金斯成为圣马丁的亲密合作者（这使得卡雷拉家族事实上成为他的敌人）。但是，圣马丁最大的合作者是门多萨市。

市议会和平民百姓都参与了圣马丁的计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因为他必须征收税款和确切的贷款来支付弹药和补给。按照他作为职业军官的理念，圣马丁打算领导一支正规的军队，而不是一支杂牌军，需要军队有正规的纪律和装备。这座城市的女士，骄傲的美洲人，为爱国事业献上了她们的珠宝，并以裁缝的身份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生产数百套军队制服。工匠用天然硝酸盐制造火药，然后熔化教堂的钟来制作大炮。

这些准备工作是在对拉普拉塔河前总督区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的气氛中进行的。在阿蒂加斯的领导下，联邦联盟各省的实力不断上升，严重挑战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控制权。当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图库曼组织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联邦联盟各省并没有派代表参加。当然，巴拉圭或上秘鲁也没有派代表参加。由此产生的代表大会在1816年7月9日正式宣布独立，不仅从西班牙而且从费尔南多七世的控制中独立出来。这个新国家的名字叫拉普拉塔联合省。

圣马丁在图库曼大会上的代表支持独立，但是圣马丁想要的是美洲君主制，他认为这将比共和国，或者尤其是松散的共和国联盟，提供更大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圣马丁钦佩英国君主立宪制模式，即国王要服从议会制定的法律，就像加的斯宪法所要求的那样。但这并没有使圣马丁成为一个支持西班牙人的角色。他首先宣称自己是美洲人，他相信人民主权的原则。也就是说，他认为统治权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一个国家的主权人民。美洲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包括自己的国王。

根据圣马丁的估计，西班牙对智利的重新征服使得爱国主义者起义的时机成熟了。他赶紧进行准备。从门多萨穿越安第斯山脉到智利，只有在南半球的夏天才能做到，那时高山通道上将没有冰雪。因此，在1817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圣马丁的安第斯军队就开始了他们那改变历史的任务。为了展示他的士兵的军装和纪律，并激励他们为艰苦地攀登而奋斗，首先，他让他们从营地行进到了门多萨的主要广场上，士兵在公开仪式上宣誓效忠于他们的战旗，随后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包括一场由圣马丁军队的士兵在擂台上进行的激动人心的斗牛活动。然后，各个支队开始交错着，沿着旨在迷惑敌人的各种备选路线，向着高耸的安第斯山的东坡行进。到了这个时候，智利的保皇派知道会有一场袭击，但是圣马丁决心通过多条道路同时进入智利，以保留出其不意的进攻效果。为了加快军队的前进速度，补给食物已被藏在攀登的沿途各个地点，这将需要几天的时间。军队沿着狭窄的山路行走，旁边是陡峭的悬崖、瀑布，一片荒凉。圣马丁扔下他那步履稳健的骡子的缰绳，让它无方向地直接带着他走，也不指路。毕竟，此时只有一个方向是可能的：前方。

沿着安第斯山脉的西坡进入智利，圣马丁军队的两个主要支队按计划会合了，并于1817年2月15日在查卡布科取得了重大胜利，使他的敌人损失了600人。该策略奏效了。第二天，圣马丁入侵部队的先头部队进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费尔南多七世的支持者在智利南部仍然很强大，尤其是在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的故乡康塞普西翁地区，考虑到西班牙王室军队在其南部边境长期驻扎，这种情况是合理的。尽管如此，刚开头的胜利总是令人感到欣喜，圣地亚哥人民对美洲独立的解放者作出了热情的回应。总督阿瓦斯卡尔从秘鲁派来军队，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想要重新征服他们，但此时他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独立的意志。在查卡布科战役结束后几天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庆祝舞会上，这些人戴着法国式的“自由帽”参加宴会，并举杯敬礼，

以至于每个人干杯之后都会把酒杯打碎，以便以后再也不会被人亵渎。兴高采烈的大会将拉普拉塔河联合省的新国歌一直唱到最后，唱了两次。

圣马丁那天晚上大声唱歌，但总体而言，他的领导力在新环境中步履蹒跚。圣马丁沉迷于细节和工作，对人群的崇拜几乎不关心，他在智利的公共关系——这对他的战略计划来说是微妙而关键的事情——是灾难性的。3月，他拒绝了圣地亚哥市为承担他的个人开支提出的一万比索捐款，将这笔钱捐出来用于建立一个公共图书馆。他接受了将大主教的宫殿作为其住所，但拒绝使用随之配套的豪华银器。他还拒绝了6000比索的年薪。有人可能会以为这些斯巴达式的无私举动会受到热烈欢迎，但圣马丁却似乎对礼物不感激，对热情的支持者也没有反应。圣马丁总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有些笨拙，在智利，由于他的肺结核病给他带来更多的困扰，他变得深居简出。不仅人们因担心传染而普遍避开结核病患者，而且圣马丁首选的止痛药——鸦片，也进一步使他的社交风度逐渐丧失。

圣马丁对圣地亚哥的跨安第斯进攻只是他宏伟战略的第一步。最终目标是利马。在圣地亚哥和利马之间，差不多有一千英里是地球上最干燥的沙漠。圣马丁的计划是通过海路覆盖这段距离并进行两栖攻击。但是为此，他将需要一支海军，而对于一个没有航海传统的资源匮乏的年轻共和国来说，创建一支海军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 巴西感染共和主义的传染病

在圣马丁胜利之后不久，令若昂六世担忧的革命传染病确实在巴西暴

发了。然而，这种传染病并非来自附近。巴西人与智利人或委内瑞拉人一样，是从欧洲获得的信息，从源头上感染了。最近成立的政治俱乐部成为革命传染病的主要媒介。若昂六世于1808年开放了巴西港口，导致外界影响涌入了累西腓（Recife）等港口城市，最终暴发的。伯南布哥最近的棉花产业繁荣吸引了许多欧洲商人到累西腓。1817年3月，累西腓起义的一位领导人是当地商人，他居住在伦敦并与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有联系。在俱乐部的集会上，当地知识分子（包括神职人员、军官、商人和种植园主）讨论了人民主权和其他革命思想的概念。王室治理者听说了这些自由派的讨论团体，并决定逮捕参与者，但他的镇压行动却事与愿违。在1817年3月6日的一次戏剧性事件中，一名自由派军官拒绝被逮捕，并在其部队面前杀死了试图将其羁押的王室官员，然后引发了革命的呐喊。

军队追随起义的军官，这是一个正常程序。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累西腓的统治阶级也毫不迟疑地赞同起义。第二天，皈依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军官、商人和种植园主宣布伯南布哥成立为一个共和国，并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甚至地方教会也正式认可了这个共和国。当时伯南布哥最高级别的王室法官是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的弟弟安东尼奥·卡洛斯（Antonio Carlos）。在1817年4月，安东尼奥·卡洛斯在写给他仍在葡萄牙的弟弟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是如何加入新伯南布哥共和国政府的。从今以后，伯南布哥的公民将以革命的精神互相称呼为“爱国者”。虽然表面上废除了种族阶级的区分，但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废除奴隶制。毕竟，以奴隶为动力的棉花种植园是伯南布哥新繁荣的基础。这种政治传染病迅速蔓延。邻近的两个殖民地的港口城市也很快宣布自己为独立的共和国。

但是，事实证明，民众对新共和国的支持不可靠。平民百姓赞赏降低肉类征税和同意提高士兵的工资，这是新共和国政府的两项优惠政策。他

他们还赞同了新政府明显地亲近美洲的倾向。巴西甘蔗酒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爱国者餐桌上的从葡萄牙进口的葡萄酒。葡萄牙商人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所有在巴西土生土长的，不论富人和穷人，都可以很轻易地就在巴西团结聚集在一起了，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美洲人的美洲！打倒欧洲人！为了维护累西腓商人阶层的良好信誉，临时政府采取了措施保护其免受不守规矩的人群的侵害。

不幸的是，对于爱国者来说，他们的对手若昂六世并没有像费尔南多七世那样无助地被囚禁起来。他甚至没有远在大西洋彼岸，他对这一公然地挑战王权的行为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仅仅几个星期后，当若泽·博尼法西奥的脑子仍在为安东尼奥·卡洛斯的信件所困扰时，就有消息传到葡萄牙，王室军队已经平息了伯南布哥的叛乱，并监禁了包括他的兄弟在内的数百名叛乱分子。安东尼奥·卡洛斯将在巴伊亚地牢（Bahian dungeon）中苦苦挣扎四年，在此期间，许多囚犯因叛国罪被审判和处决。

1817年的起义似乎证明了若昂六世留在巴西的决定是正确的，它保护了巴西，抵制了自由派思想的蔓延。这也坚定了若泽·博尼法西奥回家的决心。最后，他获得了回国的许可。

### 玻利瓦尔的伟大复出

西蒙·玻利瓦尔没有使用别名“复出小子”（Comeback Kid），虽然这个名字很适合他。1817年7月18日，玻利瓦尔的一支小部队占领了奥里诺科河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城镇安戈斯图拉（Angostura）时，玻利瓦尔实

实际上开始有效地扭转西班牙保皇派在南美洲北部的优势局面，就像那年早些时候圣马丁在美洲南部开始做的一样。

实际上，玻利瓦尔自流亡牙买加以来，不是一次复出，而是多次复出。海地总统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re Pétion）为他提供了武器，以换取他对释放委内瑞拉奴隶的承诺。玻利瓦尔再次与他的前盟友圣地亚哥·马里尼奥和委内瑞拉失败的第二共和国的其他东部领导人结盟，他们聚集在海地一起与他开展共同的事业。这些领导人拥有玻利瓦尔没有的东西——一支军队，或至少拥有组建一支军队的人员——并且他们在奥里诺科河河口附近的圭里亚（Guiría）拥有一块立足于大陆的据点。担任指挥后，玻利瓦尔利用武器和军队，试图对委内瑞拉中部进行一次考虑并不周详的水陆两路攻击，其结果可想而知。就像他几年前在附近的卡贝略港所做的那样，这位羞愧的解放者再次乘船撤离，让武器和军队听天由命。玻利瓦尔在加勒比海上航行了几个星期，最后回到了圭里亚，但在那里他不再受到欢迎。当然，解放者最没有尊严的时刻是，他的一个昔日盟友用剑指着他追到一个码头，让他回到他的船上，再次将他带到了海地。然而，几个月后，玻利瓦尔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返回委内瑞拉，似乎只有他才能团结那些分裂的爱国者。

东部领导人曼努埃尔·皮亚尔（Manuel Piar）将玻利瓦尔召回，他后来肯定对此感到后悔。皮亚尔拥有出色的革命资历。他的母亲伊莎贝尔·戈麦斯（Isabel Gómez），是一名帕尔多助产士，曾参与1797年的“法国”阴谋，该阴谋使玻利瓦尔的老导师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不得不以萨穆埃尔·鲁滨孙（Samuel Robinson）的化名从委内瑞拉逃离。皮亚尔从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帕尔多人激进主义的传统，灵感来自海地革命的例子。他曾在第一共和国的米兰达和第二共和国的马里尼奥的军队中任职，到1817年初，他已成为委内瑞拉最优秀的爱国主义者将

军。皮亚尔的伟大成就是创建了一支爱国主义的拉诺斯人的军队。博韦斯的去世使得他那不可阻挡的追随者四散开来，没有凝聚力了，于是皮亚尔招募了其中一些人作为美洲独立事业的补充力量。然后，皮亚尔开始在奥里诺科东部平原上展开行动。4月，皮亚尔的军队在奥里诺科河南侧击败了最近增援的西班牙军队，赢得了数年来最重要的胜利，为美洲独立事业带来了丰富的物资。此外，皮亚尔的胜利削弱了圭亚那和安戈斯图拉西班牙据点的势力，最终导致他们被抛弃。

玻利瓦尔向皮亚尔表示祝贺，然后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皮亚尔沮丧地退出了玻利瓦尔的军队，并指责玻利瓦尔歧视他这个帕尔多人。在帕尔多人占主导地位的拉诺斯平原地区，这一指控是很敏感的。因此，玻利瓦尔迅速下令将皮亚尔逮捕，并在1817年10月简易的军事法庭上，同意在安戈斯图拉城镇广场上开枪处决了让自己最得意的将军，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件。第二天，玻利瓦尔对他的帕尔多部队解释，种族歧视已经成为过去，并宣布分配发放奖金。

在处决了曼努埃尔·皮亚尔后的几周内，玻利瓦尔实现了获得英国援助的梦想。5艘船，载有800名英国志愿人员启程前往委内瑞拉。这些不是英国的正式军队，而是由玻利瓦尔驻伦敦的代理人，从拿破仑战争后被遣散的三万英军中结集起来的雇佣军。玻利瓦尔希望欧洲人能为他那衣衫褴褛的拉诺斯人提供现代训练，后者主要是用长矛作战。这个英国军团装备着多余的设备 and 色彩缤纷的制服，他们希望赢得荣耀，赚取金钱，参访异国他乡，并建立一个或两个共和国。然而，他们的5艘船中的1艘沉没在大西洋中，船上的人无一幸免。其余的人在到达安戈斯图拉下船之前，就面对着热带的酷热阳光和如欧洲麻雀般大小的蚊子，看不到获得任何报酬的希望。他们的幻想开始破灭，逃兵开始出现。大多数失望的雇佣兵在他们还没有开始军事行动之前，就离开了。渐渐地，英国军团的剩余成员被

合并进其他部队，担任军官。丹尼尔·奥利里（Daniel O'Leary）是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他很快学会了西班牙语，后来成为玻利瓦尔的私人秘书。

英国军团的到来并没有帮助玻利瓦尔走得很远。事实证明，皮亚尔招募拉诺斯人的想法是正确的。玻利瓦尔现在联系了另一组爱国起义军，在一个名叫何塞·安东尼奥·派斯（José Antonio Páez）的雄心勃勃的拉诺斯人的指挥下，他们在奥里诺科平原上游的阿劳卡和阿普雷地区向西行驶了数百英里。派斯与他的拉诺斯追随者之间有着融洽的关系，就如在阿蒂加斯和他的高乔人之间。派斯是名骁勇的骑兵，是一名军事行动家，他手持巨大的长矛，亲自带队疾驰冲锋，有时甚至进入维京海盗式的战斗狂潮，最终以类似癫痫发作的方式达到高潮，使他在战场上失去意识。派斯在委内瑞拉社会被认为是一个白人，但由于被人摇唇鼓舌的诽谤，他的父亲曾需要在殖民地法院中为家族的“纯正血统”而进行辩护。无论玻利瓦尔如何看待派斯，他都需要他，尤其是在没有皮亚尔的情况下，因为派斯控制着奥里诺科平原的大部分地区。玻利瓦尔致信安排一次会议，并于1818年1月向西行进去与他会面。一个加拉加斯的贵族和一个粗俗的拉诺斯人互相研究了几秒钟，然后笑着拥抱了起来。一个大陆的独立目标离我们又更近了一些。

### 波利卡帕和赫特鲁迪斯

在波哥大，现在在新总督的“庇护”下，官方的残暴行径使王室统治与美洲其他地方一样，丧失了声誉。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开处决一个名叫波

利卡帕·萨拉瓦雷耶塔（Policarpa Salavarrieta）的妇女，她被指控协助美洲独立事业，因而有罪。在革命的头几年，她这位年轻裁缝到达波哥大，寄宿在亲戚家中，她很钦佩纳里尼奥，并自豪地派遣她的年轻追求者阿里霍·萨巴拉宁（Alejo Sabaraín）参与纳里尼奥征服帕斯托的战役。在莫里略重新征服新格拉纳达后，阿里霍作为战俘返回波哥大，波利卡帕则加入了在监狱附近活动的爱国主义者抵抗组织。监狱不给囚犯提供食物，而波利卡帕在探视阿里霍时就帮助供应了食物——通过这种方式隐藏源源不断的通信。当阿里霍最终被释放时，他和其他人立即前往拉诺斯地区，打算加入玻利瓦尔的队伍，由于波利卡帕等人维持的通信网络，他们打听到了玻利瓦尔的行踪。不幸的是，有一条消息落入了王室权威当局的手中，王室当局当即抓回了阿里霍并开始寻找波利卡帕。她本可以轻松地逃离波哥大，避免被俘虏，但她拒绝放弃再次被囚禁的阿里霍。最终，当局找到了波利卡帕藏身的房屋并拘留了她。他们很快认定她犯有叛国罪，背叛了费尔南多七世，而她自己曾引以为傲的反抗宣言也使得这一罪行成为板上钉钉的事。也许是因为波利卡帕的傲慢举止，总督采取了不同寻常的程序，决定将其公开处决。波利卡帕冒着危及灵魂不朽的胁迫，她拒绝接受来自一位欧洲牧师之手的天主教最后仪式。曼努埃尔·皮亚尔在安戈斯图拉逝世仅几周后，波利卡帕和阿里霍就在波哥大的主要广场上一起被行刑队处死了。

几乎同时，另一位美洲爱国者赫特鲁迪斯·博卡内格拉（Gertrudis Bocanegra）在新西班牙因为类似的指控被处决。像胡安娜·阿苏尔杜伊一样，赫特鲁迪斯在成长过程中对原住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并且她与她的丈夫一起参与了美洲的独立事业。实际上，据说她坚持要求自己的丈夫辞去西班牙王室职务，作为婚姻的条件，也以此招募了她的丈夫加入美洲独立运动。她的儿子也因为她的影响而加入了其中。当她的丈夫和儿子两人

都被杀死时，赫特鲁迪斯直接参加了斗争，以不顾自己生命的奋力斗争而闻名。像波利卡帕·萨拉瓦雷耶塔一样，她通过秘密供应和维持通信工作帮助了爱国主义者，这也是她被捕的原因。与波利卡帕一样，赫特鲁迪斯拒绝透露任何合作的爱国者名字。与波利卡帕一样，她在被处决前戏剧性地展现自己的反抗，撕下眼罩，利用这一刻向人群大喊：“自由的日子将到来！”<sup>[1]</sup>

### 格雷罗入场

赫特鲁迪斯去世的时候，新西班牙似乎是一个被重新占领的安全殖民地。在莫雷洛斯被俘虏并被处决后，新西班牙的独立运动逐渐瓦解。可以开展的集中指挥步履蹒跚，然后停止了。在新西班牙西部的高地起义军据点，已经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洛佩斯·雷昂创立的国民洪达最终消失了，莫雷洛斯创立的国会也消失了。一个新的总督掌权，时移事易，王室当局统治着新西班牙的所有城市。莱奥娜·比卡里奥和安德烈斯·金塔纳·罗已撤退到南部的山区农村，一次又一次远离城镇。莱奥娜在一个山洞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最终，保皇派的军队赶上了他们，并抓住了莱奥娜。为了与她团聚，安德烈斯通过谈判，自己投降了。其他的游击队还在当地坚守，但是许多游击队员为了生存转而从事土匪活动，新西班牙的大多数爱国者都已经放弃了继续坚持下去。

因此，当比森特·格雷罗（Vicente Guerrero）在1818年3月6日占领了尤贾拉镇（Jaujilla），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成就，即使是短暂的成就。很

快，格雷罗就被保皇派的人一道追逐，沿着草木覆盖的山坡匆匆离去，但他始终坚持不懈，并在1818年9月取得了一连串小小的胜利，并根据阿帕钦甘宪法重建了一个象征性的爱国主义者的政府。对莫雷洛斯本人而言，格雷罗就像曼努埃尔·皮亚尔一样，他是浅肤色的帕尔多人，其实是可以被认可为白人的，但他选择不这样做。他曾经是个骡夫，并且会讲几种印第安人的语言，就像新西班牙的众多骡夫一样。反过来，格雷罗的追随者几乎全都是深色皮肤的人。他们是来自巴尔萨斯河谷（Balsas River valley）和太平洋沿岸炎热地区的帕尔多人，是来自偏远南部山区的原住民。莫雷洛斯亲自任命格雷罗为南部的指挥官，因此，这位帕尔多将军代表了莫雷洛斯运动的直接延续。

与此同时，一支由白人和肤色较浅的梅斯蒂索人组成的爱国主义者部队，在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哈维尔·米纳（Javier Mina）领导下，在新奥尔良组织起来，然后在坦皮科（Tampico）附近的墨西哥湾沿岸发起了首战，但这是一次短暂而失败的首次尝试，他的部队也从未与格雷罗联手。两个爱国主义者团体之间缺乏联系，象征着新西班牙的美洲独立事业内部的历史分歧。莫雷洛斯的继承人继续依靠从下层民众中来获得可提拔的人才，而不是依靠玻利瓦尔这样的贵族领袖或米纳这样的国际自由主义者。例如，格雷罗任命了爱国主义者中的唯一一位印第安将军：来自特拉维特兰村（Tlahuitlan）的佩德罗·阿森西奥·阿尔基西拉斯（Pedro Ascencio Alquisiras）。

不过，如果格雷罗的游击战可以在崎岖不平的南部山区和巴尔萨斯河谷无限地默默蔓延，那么这种无声的蔓延就是它所能做的。它需要建立更多的关系，米纳的远征队可能为它送来视野更广阔的微风。

## 玻利瓦尔在博亚卡桥上获胜

同时，在拉诺斯地区，玻利瓦尔拥有派斯没有的关系和视野。派斯也认识到这一点，并接受了玻利瓦尔的领导。1819年初，玻利瓦尔把他的骑兵留在阿普雷（Apure）由派斯指挥，自己则返回安戈斯图拉，迎接更多抵达的英国志愿军，并组织起委内瑞拉已经多年不存在的爱国主义者政府。

玻利瓦尔现在设想的政府还将包括新格拉纳达，他曾不止一次为这一事业效力。玻利瓦尔召集制宪会议在安戈斯图拉开会并起草宪法，邀请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参加。当然，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的大部分地区仍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因此在1819年2月15日只有26名代表到来，他们聚集在一起聆听玻利瓦尔滔滔不绝的讲话，为新共和国的宪法制定提出建议。其中包括一个拥有准君主制权力的总统和一个类似于英国上议院的世袭参议院。“统一、统一、统一”是玻利瓦尔的信条。他对提议实行美国尊崇的联邦制提出警告，坚持认为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多元人口，长期以来被西班牙暴政剥夺了自治的经验，需要强大而稳定的权威。他相信人民享有主权，甚至强调在法律面前各种肤色的人必须平等，但玻利瓦尔对民主并不热衷。他认为，美洲尚未为此做好准备。演讲结束后，玻利瓦尔将其指挥官的指挥棒交给了国会主席。然而，第二天，当安戈斯图拉国会任命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时，结果却是西蒙·玻利瓦尔（结果完全在所有人的预料中）。几天之内，玻利瓦尔总统就在返回阿普雷的路上，恢复了对军队的指挥权。

玻利瓦尔和派斯共同领导着拉诺斯地区，在1819年3月和4月击败了那里的西班牙军队，但他们的实力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挑战西班牙征服者莫里略在委内瑞拉高地为应对他们布置的部队。随着5月的雨季来临，他们

将面临长达多月被迫无法活动和军队逃兵增加的前景，玻利瓦尔提出了一项冒险而又出色的计划，该计划将与两年前圣马丁对智利的跨安第斯山脉的袭击计划相辅相成。要看到玻利瓦尔计划的出人意料之处，必须知道三件事。首先，拉诺斯地区从阿普雷一直延伸到新格拉纳达的卡萨纳雷，派斯和玻利瓦尔都从未在那作战过。其次，雨季使这些平原上的水灾泛滥，因为河流漫过河岸，并在数周和数月的时间内用大量的水覆盖了农田。最后，最近三年来西班牙总督恢复控制的新格拉纳达首府波哥大站在拉诺斯地区的边缘，虽然地势上高过平原地区。到目前为止，新格拉纳达的内陆平原远离大海，是其所有区域中最偏远的地区。这条通往波哥大的后方进路几乎没有人防备。因此，根据玻利瓦尔的说法，雨季的来临使得在那出现的军队将具有出其不意的优势。

玻利瓦尔在1819年5月的一个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立即开始行动。玻利瓦尔的秘书奥利里写道，有一次，军队在齐腰高的水流中持续行走了一周。士兵都很难找到睡觉的契机，更难的是，保持军队宝贵的火药储备干燥。幸运的是，一支拉诺斯人的军队可以比几乎任何其他人更好地承受这种经历。无论如何，他们中的许多人只穿了一件缠腰布和一双软皮凉鞋。在卡萨纳雷，一个来自新格拉纳达的年轻人，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遇见了他们，并带路向西走。6月22日，他们开始攀爬，往上爬。毕竟，这是安第斯山脉，而不是像委内瑞拉那里一样的山脉尾端，而是高耸的、散布着火山的主山脉，类似于圣马丁军队在前往智利的路上所穿越的山脉。玻利瓦尔的军队在开始攀登时，已经因为穿越被水淹没的平原而身体虚弱了。他们没有进行有条不紊的准备，没有在沿途小心翼翼地藏存物资。日复一日，爬行的坡度越来越陡峭，温度越来越低。在多岩石的山腰上，拉诺斯人的简陋衣服和脆弱凉鞋对他们能起到的保护效果不佳。从未离开平原的马在光滑的

石头上滑倒并跌落。数百人沿途倒下，拒绝前进。尽管如此，玻利瓦尔的军队仍在继续攀爬，士兵也由于疲惫而开始落后，无数人因暴晒而丧生，其他人则中途退出了。但是随后他们穿过最后一个山口，进入了安第斯高原。

随即，当地人民来帮助他们。玻利瓦尔的军队在面对敌人之前，有几天的时间来恢复实力。然后他们打了两场战役，并都取得了胜利。其中第二场战役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战役，是1819年8月7日的博亚卡桥之战，西班牙军队被彻底击溃，1600人被俘。玻利瓦尔在三天后骑马进入波哥大，在总督府前下马，但总督和所有王室检审法院的法官已经逃向卡特赫纳的方向，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在智利一样，西班牙人的强硬征服，为爱国主义者的卷土重来铺平了道路。莫里略重建的远征军队是一支欧洲人的军队，而不是忠于费尔南多的美洲人军队。自拿破仑战败以来，总共有27000人次的西班牙军队被派往美洲，这些部队每一次发动的打击都让他们的美洲对手成为爱国主义的追随者。因此，波哥大人民把玻利瓦尔的士兵当作英雄来欢迎，新格拉纳达内陆各地都发生了自发的爱国主义者起义活动，迎接总督突然离任的消息。

### 葡萄牙人再次入侵东岸

与此同时，何塞·阿蒂加斯在历史的轮转中败了下来。最终让他离开的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他的宿敌——葡萄牙人。拿破仑战败后不久，若昂六世决定利用阿蒂加斯和联邦联盟制造的动荡作为契机，再次向拉普

拉塔省东岸提出要求。通过这样做，他同时实现了葡萄牙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目标，并找到了应对后拿破仑时代葡萄牙军人复员问题的方法。像英格兰和西班牙一样，葡萄牙也有大量过剩的军人，因此有 5 000 名葡萄牙退伍军人迅速部署到巴西，然后从那里向蒙得维的亚进军。

阿蒂加斯继续加强对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力量，但他忠诚的原住民和高乔人的长矛骑兵团面对若昂装备精良、补给充足的军队，完全无法阻止后者的无情推进。这支军队将阿蒂加斯的力量向西推出东岸，让他们躲进联邦联盟的其他省份恩特雷里奥斯（Entre Ríos）、科连特斯（Corrientes）和米西奥内斯（Misiones）。阿蒂加斯在这个讲瓜拉尼语的乡村驻地环境中感到宾至如归，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终点。1819 年 10 月 19 日，阿蒂加斯在一个名为曼迪索维（Mandisovi）的营地中给儿子胡安·曼努埃尔（Juan Manuel）写信，让他负责那些留下的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财产、穷亲戚和奴隶。有趣的是，这位领导曾将被解放的奴隶算作其新兵队伍的一员，但是他却从未废除过奴隶制，甚至没有严重批评过这一制度。

他的土地被占领，他的部队被摧毁，他的个人精力被耗尽，这位昔日的自由人民保护者流亡了，尽管没有像其他许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那样流亡到欧洲。相反，阿蒂加斯选择了巴拉圭，自 1811 年以来，巴拉圭一直在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的总统任期内保持独立。弗朗西亚通过将巴拉圭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离，使巴拉圭脱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轨道。弗朗西亚并不急于允许让阿蒂加斯这样受欢迎的独立事业的领导人进入他的国家，但他认为让阿蒂加斯在他的监视下（正如巴拉圭的一切似乎都是如此）总比让他在邻近地区游荡更好。

##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宪法革命

费尔南多七世采取了和他缺席的邻居若昂六世同样的方法，来处理拿破仑时代的军人复员问题。为了缩减曾帮助他保住西班牙王位、人数多达15万的军队，费尔南多计划再派14 000名士兵去惩罚在美洲的不听话的臣民。费尔南多处理美洲叛逆的主要方法首先是，也始终是，军事报复。就像莫里略之前远征军队的老兵一样，他们都有过一个经验丰富的将军，正是新西班牙前任常胜总督费利克斯·马利亚·卡列哈（Félix María Calleja）。卡列哈向他的部队保证，一旦到了美洲，他们将超越科尔蒂斯（Cortés）和皮萨罗（Pizarro）等传奇西班牙征服者的辉煌。但是，随着准备工作的进行，数千名等待登上加的斯运输船队的士兵开始对他们的低工资和糟糕待遇感到不满。渐渐地，费尔南多七世对曾经抵抗法国的自由主义爱国者的报复性行为导致了西班牙军官群体中立宪主义精神的复兴。

1820年元旦，立宪主义精神的复苏在为卡列哈远征队伍结集的西班牙军队中变成一场叛乱。1820年3月7日，叛乱蔓延开来，费尔南多被迫在马德里宫殿的阳台上宣布，他放弃了绝对权力，并接受了恢复自由派的加的斯宪法的提议。葡萄牙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再加上英国在该国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军事入侵所带来的羞辱——导致该国的军官各种效仿，发起类似的起义。葡萄牙退伍军人对他们的国王感到愤怒的原因则不同，军人主要愤怒于国王继续在里约热内卢居住。因此，在1820年8月25日，当葡萄牙第二大的重要城市波尔图的驻军宣布叛乱时，他们立即要求若昂返回里斯本。他们还要求召开议会，以撰写一部宪法。

西班牙打了个喷嚏，葡萄牙就感冒了。这对美洲意味着什么？

## 圣马丁驶向秘鲁

在智利，圣马丁即将发现一个事实。经过多年的计划和准备，运送他的水陆两路入侵部队的舰队于1820年8月20日起锚，启程前往秘鲁。就在这样做之前，圣马丁登上一条小船，在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港口检阅了他的部队，船上的船员、已经登船的4100名士兵（配有800匹马、35门大炮和15000支火枪）和海滨的人群欢呼雀跃。

自圣地亚哥解放三年半以来，这段时间里对圣马丁而言是艰辛的。仍然控制着智利南部的保皇派势力，与爱国主义者的回击进行了艰苦的战斗。保皇派从秘鲁获得增援，在一次战斗中向北方挺进并击败了爱国主义者，最后在第二次战斗中屈服于圣马丁和奥希金斯的部队。圣马丁往返穿越安第斯山脉，前往门多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试图使他的战略计划步入正轨，但复杂情况成倍增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圣马丁的计划持同情心的劳塔罗俱乐部成员仍然掌握着权力。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面临许多紧迫的问题，包括葡萄牙人对东岸的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仍然声称拥有该地区），以及在加的斯进行新的征兵集会。更为紧迫的是，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邻的两个联邦联盟省份（圣达菲省和恩特雷里奥斯省）的势头强劲，足以威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圣马丁发现很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其太平洋入侵舰队筹集到资金，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事实证明，在现在由奥希金斯统治的智利筹集资金也并不容易。大量的税收和激增的强制贷款，使得奥希金斯和圣马丁都不受欢迎。尽管如此，一艘又一艘的船只被收购——从西班牙人手中缴获或从英国或美国购买。

由于在智利没有人拥有指挥军舰的技能，因此圣马丁的舰队在国际市场上寻找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一些复员的英国海军军官受雇于此，其中

包括一名叛逆的苏格兰领主托马斯·亚历山大·科克伦（Thomas Alexander Cochrane），由他担任海军司令。科克伦既傲慢又贪婪，但也无所畏惧且足智多谋，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准备远征的最后几个月，他几次向利马进军进行初步攻击，虽然无法对沉重的防御工事造成任何损伤，但科克伦还是对智利南部塔尔卡瓦诺（Talcahuano）的西班牙海军设施进行了一次惊人的成功突袭，永久地解除了南部保皇派带来的威胁，并让圣马丁的远征队可以安心地向北航行，而不必担心后方的袭击。

然而，随着西班牙宪政革命的消息穿越大西洋而来，圣马丁也准备起航，拉普拉塔联合省开始全面瓦解。像阿蒂加斯以前指挥的高乔人大军一样，圣达菲省和恩特雷里奥斯省的联合部队击溃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队，导致其革命的洪达和图库曼国会解散。在接下来的两代人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将仅统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范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葡萄牙人完成了压榨阿蒂加斯的政治生活空间时，联邦联盟取得了控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胜利。就圣马丁而言，他多次没有响应放弃他的战略计划的要求，以及带领他的安第斯军队从众多危险中解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请求。他曾写信给阿蒂加斯和其他联邦联盟军队的指挥官，恳求他们拒绝联邦制，他在从瓦尔帕莱索出发之前向他的同胞发送了一份反联邦主义宣言。但是圣马丁拒绝放弃对秘鲁的进攻，他的进攻也最终开始了。

离开瓦尔帕莱索三周后，舰队在秘鲁南部登陆，总督的代表带着谈判要点出现了。作为一位新晋的立宪制君主，费尔南多七世为他叛逆的臣民提供了开明的自由立法的好处。欧洲最近发生的事件，使在海滨村庄米拉弗洛雷斯（Miraflores，现在是利马的一个街区）举行的谈判变得有些紧张，充满了动荡不安和矛盾的气氛。在秘鲁的西班牙官员包括仍然支持专制主义的强硬派和支持宪政主义的自由派，他们现在彼此猜疑。美洲人民坚持，承认他们脱离西班牙的独立是进行其他任何事情的前提条件。圣马丁表示，

鉴于自己支持君主主义的倾向，有可能与支持宪政主义的自由派达成共识。也许秘鲁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君主制的国家，由某些公认的欧洲蓝血王子统治。但最终谈判毫无进展。

因此，圣马丁的军队在花费了数周的时间在岸上进行补给调配，并向高地发动了一次声东击西的远征之后，接着划着船驶向他的小型运输船队，并重新登船。军队的船队驶过利马，并在其北部策划了一次登陆的假动作，以在该城市中引起恐慌，然后撤回到一个舒适的距离，最后于1820年11月9日下船。圣马丁知道他的4100名士兵也许可以拿下利马，但他们永远无法征服在利马身后高耸入云的广阔安第斯高地。秘鲁，只有靠赢得人心才能赢得胜利，鉴于西班牙正在发生的变化，此刻似乎对这一点是有利的。谋划战略、谨慎和充分准备是圣马丁的标志，而不是像玻利瓦尔对波哥大的背后偷袭所显示出的急不可耐的冲动。这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战役。

### 伊图尔维德和格雷罗就三项保证达成协议

同时，在新西班牙，自豪地披着莫雷洛斯斗篷的帕尔多将军比森特·格雷罗和主要的保皇派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已达成协议。现在，伊图尔维德驻扎在位于巴尔萨斯河流域的乡间小镇伊瓜拉（Iguala），他被新总督派去打败格雷罗，但西班牙的宪政革命让伊图尔维德产生了一个不同的想法。西班牙的政治动荡再次使新西班牙王室的效忠者的生活变得困难。费尔南多七世不再是“万众企盼之人”，也失去了他的王室神秘感。新西班牙的欧洲人的傲慢态度，在美洲人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让人生

气。毕竟如果是自由的宪政主义占上风，谁需要费尔南多和他所喜爱的西班牙佬？新西班牙可以拥有自己的君主立宪制。至少，伊图尔维德是这样推断的。

自1810年以来，新西班牙的浅色皮肤的统治阶级一直与伊达尔戈、其后的莫雷洛斯和最终的格雷罗领导的棕色皮肤的拥护美洲独立事业的群体保持距离。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新西班牙的西班牙裔美洲人，与其他地方的美洲人一样，都倾向于美洲。他们也可以接受自由的宪政主义。那棕色的皮肤使新西班牙的西班牙裔美洲人与格雷罗的事业之间拉开了距离，是伊达尔戈横冲直撞的部队的幽灵，它早就定义了新西班牙的美洲独立事业的内涵。但是，只要有浅色皮肤的人领导，棕色皮肤的人就没有那么可怕。这就是伊图尔维德看到的机会。格雷罗的战士非常强大，这是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但在军事上，他们被遏制在南塞拉马德雷山的大本营中。另一方面，在道义上，他们为整个新西班牙举起了美洲独立的旗帜。就伊图尔维德而言，他拥有格雷罗的部队没有的东西，即在墨西哥城和整个新西班牙的军事和政治联系。如果他们联手，可能会是一个成功的组合。

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也暗示了与格雷罗进行谈判的新可能性。1821年初，伊图尔维德与他联系时，格雷罗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伊图尔维德遵循加的斯宪法的基本规定，提议为新西班牙建立一个独立的君主制。如果他再多想一步，伊图尔维德可能会注意到加的斯宪法剥夺了帕尔多人的特权，而包括格雷罗本人在内的南方爱国军的大部分都由帕尔多人组成。也许伊图尔维德认为格雷罗满足于为白人而战，为自己获取荣誉，而不用担心他的追随者。格雷罗却将授予帕尔多人权利这一点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伊图尔维德遵从了格雷罗的要求，并于1821年2月24日提出了他的《伊瓜拉计划》(Plan de Iguala)，该计划旨在通过围绕三个基本协议点，也被称为

“保证项”<sup>[2]</sup>，召集不同选区来实现独立。第一项保证是与西班牙的君主制分离。第二项保证是对天主教的忠诚将会是官方的信条。第三项保证是新国家所有居民的平等。第三项保证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美洲白人期望与欧洲人完全平等的长久目标得到了保证。西班牙裔的欧洲人也得到保证，一个独立的政府将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原住民和非洲裔美洲人也被保证享有公民身份。

当《伊瓜拉计划》令格雷罗感到满意时，他将自己置于伊图尔维德的指挥之下。

### 若昂六世返回葡萄牙

然后，在巴西发生了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在里约热内卢发生的葡萄牙军官起义，迫使若昂六世宣誓效忠一部尚未成文的葡萄牙宪法。22岁的佩德罗王子（Prince Pedro）在当天的政治活动中首次担任领导角色。自由主义的蔓延似乎甚至感染了这位王位继承人。

波尔图的立宪主义革命的涟漪已经在巴西海滩上荡漾了几个月。更具体地说，波尔图的消息是由驻葡萄牙的英军指挥官贝雷斯福德将军（General Beresford）带到里约热内卢的，他曾在1806年率领暴戾的英军入侵了拉普拉塔河辖区。贝雷斯福德将军在葡萄牙度过了很多年，但立宪主义政府却希望贝雷斯福德的部队离开。若昂六世表现得优柔寡断，令贝雷斯福德感到失望。或许是需要进行一些改革。或许若昂六世会派佩德罗王子代替他去葡萄牙，等等。同时，葡萄牙立宪主义者直接呼吁对巴西海岸

沿线的各港口城市提供支持。在亚马孙流域入口处的帕拉（Pará）和巴西第二大城市巴伊亚的萨尔瓦多（Salvador），本着与说西班牙语的邻居十年前的相同精神，他们建立了自治洪达。欧洲的事件再次使上级当局受到质疑。葡萄牙语美洲国家的各大殖民地应该服从若昂六世还是立宪主义者，服从里约热内卢或里斯本？最终，每个殖民地都成立了临时洪达。

在巴伊亚临时洪达组建成功的消息传到里约热内卢后不久（在新西班牙宣布《伊瓜拉计划》的两天后），军队在黎明前聚集在罗西奥地区（Rossio），这是里约普通民众常去的地方。他们的官员宣布葡萄牙立宪主义革命的来临，要求国王公开宣誓接受和服从新近召开的葡萄牙议会起草的任何宪法。这些要求来自若昂六世的军队，胆怯的国王平静地屈服了。若昂按照起义军的要求写下书面誓言，并派急切激动的佩德罗王子带着他的书面誓言回到罗西奥地区的百姓身边，向人民宣誓。若昂六世此前从未让佩德罗王子参与过国家事务，王子对此欣喜若狂。佩德罗王子为他先进的政治思想而自豪，在19世纪20年代的巴西，年轻的世界主义者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佩德罗王子骑着马毫不畏惧地直奔罗西奥地区的叛军集会地。他不仅觉得自己与他们的独立事业有某种联系，而且佩德罗王子还是一位有着平民色彩的王室人物，他能自在地与普通士兵谈论马匹。然而，当他爬上附近剧院的台阶，向民众宣读他父亲的书面誓言时，起义军官拒绝承认该间接文件的正式性。他们要求佩德罗王子亲自将父亲带到罗西奥。他们想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他们的国王说：“我发誓我会遵守宪法。”于是，佩德罗王子疾驰回到宫殿，乘坐着华丽沉重的马车，带着国王回到罗西奥。这位被羞辱的君主，感觉自己被耍得团团转，公开放弃了他的专制主义方式，几乎使所有人都很高兴。欢乐的人们解开了马匹，并欢呼雀跃地将王室马车（和车上无助的乘客）拉到了街上走着。

几天后，若昂六世颁布了新闻自由的法令，此后不久，宣布选举巴西代表参加议会。他还宣布了自己要回里斯本的消息，尽管他没有如此说，但他还是服从了里斯本立宪主义政府的意愿。1821年4月21日，里约热内卢各个地区的民选代表被召集起来开会，要求正式移交权力，若昂六世离开后，佩德罗王子将作为他父亲的摄政者在里约进行管理。

会议在该市的商品交易所举行，自由主义者迅速控制了会议，并要求立即实现宪政。在里斯本议会撰写葡萄牙宪法之前，他们呼吁暂时采用加的斯宪法作为自由立法的典范。会议的领导人在半夜将这一要求传达到了王宫。他们还发出命令，除非另行通知，否则任何船只都不得从里约热内卢起航。年轻的激进分子主持了会议，里约热内卢的主要公众人物都参加了会议。许多人是葡萄牙人，他们阻止若昂六世离开，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他留在巴西，而是因为有传言称若昂六世和他的侍从计划将携带国库中一半的黄金潜逃。迫于压力，若昂六世同意将佩德罗王子的摄政权归入西班牙宪法，但佩德罗王子的自由主义总是更多地表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实践中，他派遣部队清查了商品交易所这一建筑物。士兵让这里“恢复秩序”，在此过程中造成数人受伤和死亡，第二天，若昂六世撤销了他对西班牙宪法的接纳。

四天后，若昂六世完成了他的航行准备工作，伤心地与里约热内卢告别，这次无疑是永别。甚至里约热内卢震耳欲聋的热带雷暴也不会再打扰他。另一方面，卡洛塔·华金纳高兴得跳起舞来。但是她讨厌“新的”葡萄牙，因为她发现没有人会跪在泥地里迎接她的到来。她认为，自由主义的传染病摧毁了一切。她的丈夫更愿意接受新秩序。在登上将他带回里斯本的船只的前夕，若昂六世将儿子拉到一边，并说出了有先见之明的话：“佩德罗，如果巴西（同葡萄牙）分道扬镳，那就让它为你服务。我知道，与某些后起之秀不同，你将始终尊重我。”<sup>[3]</sup>

## 玻利瓦尔和莫里略结识

玻利瓦尔在博亚卡桥取得胜利后，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看着他在新格拉纳达历时五年的重建和安抚工作迅速瓦解，感到无比沮丧。在几个月之内，主要的保皇派人士就只留在卡塔赫纳（逃亡的萨马诺总督在那里避难，然后再逃往巴拿马）和帕斯托附近。在新格拉纳达的其余地区，王室的控制权完全消失了。公众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有利于美洲的独立事业。莫里略，这位在西班牙反对拿破仑而发动的独立战争中的爱国英雄，从来都不喜欢征服者的角色，现在他放弃了这个角色。西班牙立宪主义革命的消息传到莫里略所在的加拉加斯的总部后，这位西班牙指挥官欣然接受了指示，向玻利瓦尔伸出了橄榄枝。1820年11月，莫里略和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西部见面，进行谈判。首先，他们的谈判同意进行为期六个月的休战，几天后，即11月27日，两位将军举行会议，亲自批准该协议。当他们面对面时，莫里略和玻利瓦尔双双下马，拥抱在一起，并让他们的士兵将一块巨石滚到了现场，以便将来可以在那建立一座纪念碑。这两个人互相敬酒，宣布双方拥有永恒的友谊，并睡在同一屋檐下。具有讽刺意味的巧合是，他们在七年前玻利瓦尔宣布“死亡之战”开启的同一所房子里，庆祝“死亡之战”的结束。

休战状态并没有一直维持下去。在休战期满之前，玻利瓦尔和派斯袭击了莫里略的部队，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此事。正是因为如此，派斯的拉诺斯的长矛骑兵在1821年6月24日进行的卡拉沃沃（Carabobo）战役中获得了一次绝对的胜利，彻底打击了保皇派军队的士气，保皇派保住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军队。出于所有实际目的，卡拉沃沃战役决定了委内瑞拉从西班牙永久地独立出来。何塞·安东尼奥·派斯成为英雄，但当胜利的爱

国者此后不久凯旋进入加拉加斯时，人群中对西蒙·玻利瓦尔呼声最高。早在多年前，就再也没有人嘲笑过给他的解放者的头衔。

### 中美洲也宣布独立

1821年年中，一场类似多米诺骨牌倒下的隐喻响彻了整个美洲。1821年9月15日，兴奋的人群聚集在危地马拉城的主要广场上，其中许多人拿着一份名为《自由的天分》（*Genius of Liberty*）的报纸。西班牙的立宪主义革命解放了新闻界，报纸发表了有关伊图尔维德的《伊瓜拉计划》的新闻，并接连发表了他一系列胜利的新闻，因为新西班牙的保皇派几乎没有战斗就放弃了。伊图尔维德的“三保证军”从伊瓜拉进军到富饶的巴希奥地区，随着当地民兵大举转向，他的运动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瓜纳华托州、克雷塔罗州和巴利亚多利德州几乎都没有抵抗能力。瓜达拉哈拉、韦拉克鲁斯和普埃布拉紧随其后。到1821年8月，新西班牙中部的主要城市都接受了《伊瓜拉计划》。9月15日出版的《自由的天分》报纸向危地马拉读者宣布了这些美洲人的胜利。此外，它还宣布危地马拉王国与新西班牙接壤的一个省份，恰帕斯州也接受了《伊瓜拉计划》。“危地马拉主权人民万岁！他们的自由和独立万岁！”报纸上用大字呼喊，人们挤满了危地马拉城街道，以表示他们的赞同。<sup>[4]</sup>

然后，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个首府城市的市政会公开暂时试探性地代表整个国家发言，并支持大型街头游行示威。没有任何人反对。1820年西班牙的立宪主义革命使得在危地马拉城设立了一位接纳自由主义的西班牙

牙总督，他愿意接受《伊瓜拉计划》倡导的民众对独立的渴望。随后的投票确认，整个危地马拉王国（包括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等省份）都希望效仿伊图尔维德。因此，中美洲的独立是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实现的，没有人比美洲独立事业的老领导人安东尼奥·德·拉腊萨瓦尔神父（Father Antonio de Larrazábal）更高兴，他现在回到了危地马拉。拉腊萨瓦尔在他的家乡受人尊敬，那里的居民被加的斯宪法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因此，当自由主义之星在1820年再次升起时，拉腊萨瓦尔就成为危地马拉著名的圣卡洛斯大学的校长。议会将他的照片挂在会议室里。1821年9月15日，拉腊萨瓦尔在议会的独立宣言中自然地扮演了主导的角色。根据《伊瓜拉计划》，他曾协助撰写的加的斯宪法将成为该国的法律。

中美洲没有经过一场战争就实现了独立。

### 伊图尔维德提议建立墨西哥帝国

在本月底之前，伊图尔维德的胜利军队开进了迄今为止西班牙政府在美国的最伟大的行政首都——墨西哥城，墨西哥城是自伊达尔戈十年前短暂发动起义行动以来，再未出现过叛乱的城市。在那十年间，无论哪个省都可能由于叛乱组织的麻烦事而时不时地出现问题，只有在墨西哥城，历届总督都相安无事地进行统治。但是在1821年9月27日，伊图尔维德率领他的“三保证军”进入墨西哥城，并穿过主要街道竖起的凯旋门下。在他身后是身穿整齐制服的民兵部队，他们从未为拉美独立战争而战，而在他们身后的则是上千名穿着破布的棕色皮肤的人，他们曾为拉美独立斗争进行过数十次

战争，但从未涉足过这座城市，他们就是格雷罗将军的部下。

等待伊图尔维德的是一位最近刚从西班牙来到这里的新总督——奥多诺胡（O'Donojú），他是第二个爱尔兰裔西班牙总督，就像前一位总督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Ambrosio O'Higgins）一样。奥多诺胡认为无法阻止伊图尔维德的武装胜利之旅，因此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向费尔南多七世报告说，一个独立的墨西哥帝国已成为必然。因此，奥多诺胡向伊图尔维德赠送了墨西哥城的钥匙，两个人一同聆听墨西哥主教堂民众的诵唱。

《伊瓜拉计划》要求将新的墨西哥帝国的王冠给予一位将从欧洲到来，愿意在美洲国家成为君主的王子。为了减轻他们因不忠行为而感到悔恨之情，在最后一刻创建了墨西哥帝国的爱国主义者将王位留给了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本人。由于费尔南多似乎不太可能离开西班牙来到墨西哥，因此有一长串王位候选人的名单，首先是费尔南多的兄弟。在费尔南多下定决心的过程中，伊图尔维德建立了摄政区，该摄政区又将几乎完全的控制权交到了伊图尔维德的手上。于是，玻利瓦尔给他的墨西哥同行——伊图尔维德，写了一封祝贺信。玻利瓦尔写道，（我们两人）试着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手牵手地一起出现在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出现在世界的中心”，与此同时，他还尝试给两个新的独立国家命名。<sup>[5]</sup>

### 佩德罗说：我会留下

在墨西哥成为独立君主制国家的几周之后，巴西也照做了。1822年1月9日，佩德罗王子从皇宫的阳台上向一群激动的人群宣布，他打算违抗

葡萄牙的议会不久前发出的指令，这一指令要求他像父亲一样回到里斯本。fico\* 这个词，意思是“我会留下”，这也正是巴西人民希望从佩德罗口中听到的答案，而他也因为这一宣言而在历史上广为人知。但是为什么众人希望听到王子宣布他不服从葡萄牙议会，其中还包括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的意志？毕竟，葡萄牙议会正在撰写宪法，不到一年前，起义的葡萄牙军队和里约热内卢人民共同迫使被羞辱的若昂公开宣誓他会遵守。这一事实中新增了什么看点呢？答案中一个有趣的部分是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

若泽·博尼法西奥终于回到了巴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回到了自己心爱的桑托斯（Santos），桑托斯是他的家乡圣保罗州的主要港口，在那里他拥抱了自己年迈的母亲。他还拥抱了他的弟弟马蒂姆·弗朗西斯科（Martim Francisco），这位马蒂姆与他有着许多共同利益的联系，但他无法拥抱他的另一位弟弟安东尼奥·卡洛斯（Antonio Carlos），因为安东尼奥仍被囚禁在巴伊亚州的监狱里。若泽·博尼法西奥很快便投入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作，就是为圣保罗殖民地的发展贡献力量。在到达巴西后不久，他和马蒂姆·弗朗西斯科就骑着马开始了他们对圣保罗的为期五周的考察之旅，主要考察了该地的农业和资源状况，在这次旅行中，若泽·博尼法西奥明确了他对整个巴西发展的最有力，也是最具争议的建议：废除奴隶制。在短短几个月内，若泽·博尼法西奥在圣保罗的工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对他带领圣保罗的发展来说是激动人心的时刻。选举出的各地代表会有机会出席里斯本议会。他的弟弟安东尼奥·卡洛斯在葡萄牙立宪主义革命后被释放出狱，成为各地代表中的一个。当若泽·博尼法西奥在撰写官方指示时，他有机会将他关于如何发展圣保罗的观点写入其中，再由圣

---

\* fico 这个词源于葡萄牙语 ficar，意思是留下。——译者注

保罗代表将这些文本携带到里斯本议会上。除了废除奴隶制之外，这份有关圣保罗的改进愿望清单还包括，更好地分配土地，以及在该国内陆地区建立一个新首都。

但是若泽·博尼法西奥很快就意识到，他对葡萄牙的新议会不应该寄予太多的希望。就像之前在加的斯议会上的美洲代表一样，到里斯本议会的巴西代表的人数远不及一个小小的葡萄牙的代表人数。当然，他们引起了葡萄牙人的注意。巴西代表团非正式的领导人，直言不讳的安东尼奥·卡洛斯很快就陷入了一场冲突。另一位代表，来自巴伊亚的爱卖弄的共和党人西普里亚诺·巴拉塔（Cipriano Barata）在袖子上戴着他具有革命性的凭证。巴拉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阴谋家，也是一位前政治犯，他头戴一顶巴西特色的宽边草帽，穿着来自伯南布哥的棉质衣服，说话时带有夸张的巴西口音，就像一幅巴西的广告牌一样在里斯本走来走去。但是，大多数葡萄牙代表仍然对他们的基本目标保持镇定，不被说服和改变，该目标就是让葡萄牙重新获得对巴西的统治地位。葡萄牙商人无法保持对巴西贸易的垄断地位，这对他们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此外，尽管他们可能是优秀的立宪主义者，但大多数前往议会的葡萄牙代表都将巴西人视为庸俗的殖民地民众。为了永远抹杀由里约热内卢统治的联合王国的念想，议会否决了建立独立的巴西王国的想法。他们在里约热内卢并不想要王位，也不需要摄政王。相反，他们认为每个巴西殖民地都应直接从里斯本接受命令。

另一方面，几乎每个里约热内卢的居民都希望这座城市成为王室法院所在地。因此，在1821年，里约热内卢人民同葡萄牙的立宪主义革命割裂，并逐渐聚拢在佩德罗王子的周围。佩德罗在读了一封敦促他使巴西独立的消息后宣布了他打算留在里约热内卢，这是若泽·博尼法西奥从圣保罗发给他的消息。在他宣布留在里约热内卢之后的一周，23岁的王子任命了这位彼时年龄60岁的年长学者为内阁首脑。佩德罗显然十分需要一位聪

慧又虔诚的顾问在他身边，而若泽·博尼法西奥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两者共同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该市葡萄牙驻军发动起义的威胁。佩德罗和若泽·博尼法西奥动员了该市民众，获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广泛支持，以此来面对葡萄牙军方指挥官，后者将其部队撤至里约热内卢瓜纳巴拉湾（Guanabara Bay）的另一侧。几周后，这些葡萄牙军队启程回到葡萄牙。然后，佩德罗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巴西内陆，他访问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通过在偏远地区展示他的王室形象来扩大他的政治基础。而且由于佩德罗的王室形象是风趣而充满活力的，因此米纳斯吉拉斯的人普遍感到高兴。1822年的前几个月里，随着里斯本议会上葡萄牙表明的对巴西实现再殖民化的意图逐渐清晰起来，巴西人开始以崭新的眼光看待佩德罗。即使是对于希望建立共和国而非君主制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佩德罗王子现在就象征着巴西与葡萄牙的平等，象征着巴西有权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而不是仅仅依靠里斯本而成为葡萄牙海外殖民地集合中的一个。当佩德罗和若泽·博尼法西奥拒绝执行里斯本议会提出的任何其他法律时，里约热内卢市政会纪念性地授予了他“巴西永久捍卫者”的头衔，佩德罗也欣然接受了这一头衔。

### 墨西哥城赞扬阿古斯丁一世

费尔南多七世不想越过大西洋去墨西哥，西班牙的议会也拒绝了由费尔南多众多兄弟姐妹中的一位亲王继承新墨西哥帝国王位的要求。消息传

来后，谁把士兵带到了墨西哥城的街道上，谁又把人员带到了拥挤的剧院，大喊“阿古斯丁一世万岁”？是阿古斯丁·伊图尔维德（Agustín Iturbide）本人吗？答案极有可能是肯定的。尽管拥护阿古斯丁·伊图尔维德担任墨西哥帝国的皇帝的计划虽然有一部分是排演出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情况。伊图尔维德这一突然的、压倒性的政治地位的上升，使得他立马成了命运的宠儿。那天，为阿古斯丁一世喝彩并穿过街道冲到他家的人群足够真实。伊图尔维德从他的阳台上接受了民意之声的决定。篝火和大炮齐声欢迎了这一消息。激昂的爱国主义者推倒了费尔南多被推翻的王朝的各个成员的雕像。甚至比森特·格雷罗都接受了这个想法，至少是正式接受了。因此，1822年7月21日，阿古斯丁一世在墨西哥城的大教堂中被加冕为墨西哥帝国的皇帝。

### 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在瓜亚基尔见面

五天后，在今天的厄瓜多尔，美洲两大解放者面对面站在一起，玻利瓦尔紧张而忧虑，圣马丁高大而沉着，两个人都为了美洲独立的事业奋战了多年，并在南美大陆上穿行了数千英里，最后终于在瓜亚基尔会面。瓜亚基尔以前是西班牙重要的海军基地和造船中心。过去的两年的确是对美洲独立事业很友好的两年，因为西班牙王室的控制在整个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或多或少都消失了。到1822年中期，只有秘鲁的安第斯高地和上秘鲁仍处于费尔南多七世的控制之下。不幸的是，出于美洲独立的原因，玻利瓦尔和圣马丁无法共同努力，并且双方都立即意识到了这一点。

圣马丁不遗余力地做好了一切准备，而圣马丁式的进攻安第斯高地的基础工作，现已证明是昂贵且费时的事，安第斯高地现已成为美洲的最后一个保皇派的据点。同时，圣马丁的军队仍未在秘鲁进行过有意义的战斗。这位准备充足、有条不紊的将军毕竟占领了总督府利马，确实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只有当西班牙总督拉塞尔纳（La Serna）从利马撤回安第斯山区时，他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在利马，圣马丁宣布自己为秘鲁的临时军事保护者，从而也宣布了秘鲁的独立，使君主制成为可能。他驱逐了欧洲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财物。圣马丁宣布，从现在开始，秘鲁大多数居住在此的印第安原住民将不再需要缴纳赋税。相反，他们将成为这一独立国家的一员，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他们都是秘鲁人。圣马丁并未废除奴隶制，但他确实宣布，在独立的秘鲁，奴隶母亲的子女将生而自由。另一方面，他的控制是有限的，他的改革并未扩展到利马以外的地方。

抛弃利马之后，拉塞尔纳总督在安第斯高原中部的印加古都库斯科落脚。自1810年以来，安第斯高原的最高统治者就一再抵制来自拉普拉塔总督区的美洲独立想法的侵袭。尽管保皇派在这一高原地区所能获得的认同依然强烈，但西班牙人却对费尔南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为他们故意“安抚”了该地区。不过，圣马丁没有做好攀登高原的准备，他仅是在以头脑管理驻军和以关注细节的方式管理利马这些事上，就大量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同时，利马人民抱怨圣马丁的闲散军队变得焦躁不安且行为不端。长期无薪工作的海军上将科克伦（Admiral Cochrane）除了变得焦躁不安，其实表现得更为叛逆，扬帆远赴其他地方只为自由派服务，还带着智利的海军部队一起。科克伦曾是一位耀眼的战士，但他对美洲独立的承诺完全是一种单纯的牟利行为。

圣马丁在处于弱势地位时，到达了瓜亚基尔。他的部队来自智利和

已解散的拉普拉塔联合省，而到达秘鲁时，他的部队能获取的资源非常少，也没有来自本国的增援部队。另一方面，玻利瓦尔到达瓜亚基尔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经过血腥的战斗后，帕斯托终于归顺于玻利瓦尔。此外，玻利瓦尔有了一位新的得力助手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Antonio José de Sucre），他是一位来自库马纳（Cumaná）的26岁老将，在他的带领下，1000名属于玻利瓦尔部队的士兵经由海路提前抵达瓜亚基尔。在过去的一年中，苏克雷在瓜亚基尔推动了自发的爱国主义者起义，然后在圣马丁军队的一个分部的帮助下攀登上安第斯山脉并占领了基多。苏克雷在名为皮钦查的火山一侧进行的皮钦查战役中获胜，是玻利瓦尔与圣马丁部队之间合作的第一个例子。这也是两位伟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瓜亚基尔曾是哥伦比亚和秘鲁之间争夺的领土，圣马丁曾计划在同玻利瓦尔的会议上与其讨论这一问题。但是在1822年7月26日，当圣马丁登陆瓜亚基尔时，玻利瓦尔已经占领瓜亚基尔，并极其高效地将其吞并到了哥伦比亚。作为哥伦比亚的总统，东道主玻利瓦尔向这位沉默寡言的美洲南方地区解放者表示了欢迎，并把他带到一所专门为进行秘密谈判而准备的房子里。尽管关于他们谈话的报道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有一个最为基本的描述。圣马丁甚至没有提出有关瓜亚基尔的问题。相反，他要求玻利瓦尔在进攻秘鲁高地和上秘鲁方面提供帮助。玻利瓦尔很乐意提供军队，但无法满足圣马丁需要的人数。因为圣马丁迫切地希望看到自己的伟大项目获得成功，他甚至提出愿意接受玻利瓦尔的领导，但玻利瓦尔拒绝了这一请求。最后，圣马丁表达了他希望秘鲁像墨西哥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制帝国的愿望。在这一点上，真诚的共和党人玻利瓦尔坚决拒绝，甚至不愿意继续讨论有关建立君主制秘鲁的话题。会谈结束后，玻利瓦尔邀请圣马丁来参加为他举办的庆祝舞会。但是圣马丁整夜

呆呆地坐着，很早就离开了，而且直接回到他的船上，在黎明时就起航返回利马。等到晚起的庆祝者醒来时，才发现他早已不见了。在利马，他辞去了作为军事保护者的职务，并再次经由圣地亚哥出发前往欧洲，终于结束了他对美洲独立事业的积极参与。

同时，玻利瓦尔遇到了他人生中最伟大的爱人——曼努埃拉·萨恩斯（Manuela Sáenz）。现年25岁的曼努埃拉，在1822年玻利瓦尔凯旋进入基多时就曾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在爱国主义庆祝活动中，他们相遇了，并曾一起跳过舞，不久之后便秘密地投入彼此的怀抱。在那时，曼努埃拉的家人已将她许配给一位英国商人詹姆斯·索纳（James Thorne），她现在住在利马，最近刚和父亲一起去基多探望旅行。曼努埃拉与玻利瓦尔的爱情故事一直持续到了她生命的尽头，她的生命比玻利瓦尔更长。曼努埃拉·萨恩斯自从成年以来一直是爱国主义的认同者。十几岁的时候，她从一个修道院学校逃出来，与一名潇洒的军官一起私奔，这就标志着她的反叛精神。在圣马丁作为利马军事保护者时期，曼努埃拉曾居住在利马，并因她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被圣马丁授予勋章。她同苏克雷相处融洽，她也同苏克雷一样，认为自己在美洲独立事业中的地位已经成熟。

曼努埃拉希望得到西蒙·玻利瓦尔的全身心，并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她可以得到他的大部分。在圣马丁从瓜亚基尔离开后，曼努埃拉在那儿见到了玻利瓦尔，两人在田园诗般的乡间小屋缠绵了几天，然后玻利瓦尔不得不再次回归参与到军事行动中。帕斯托，这个至死不渝的保皇派地区，坚决拒绝踏上爱国主义者的道路。在一年之内，不屈不挠、忠心耿耿的帕斯托人两次举起了费尔南多七世那破破烂烂的旗帜，为了阻止他们挥舞旗帜的行为，玻利瓦尔不得不举起剑杀死这些人。

## 里约拥戴佩德罗一世

1822年10月12日，佩德罗一世（Pedro I）在其24岁生日时被授为巴西独立帝国的皇帝。佩德罗一世的演说并非像人们对阿古斯丁一世（Agustín I）的鼓掌一样是自发的，而是完全上演了一场政治舞台秀。不过，从两个方面来说，这是完全真实的：佩德罗无可否认地拥有皇家血统，他当然是巴西一致认同的候选人。

到了这个时候，佩德罗和若泽·博尼法西奥显然选择了让巴西脱离葡萄牙而独立。对佩德罗来说，1822年9月7日，当他得知葡萄牙议会决议废除他摄政王的身份并宣布他颁布的所有法令失效时，情况变得明朗起来了。当佩德罗第二次前往巴西内陆，去圣保罗时，在伊皮兰加河（Ipiranga River）附近，紧急信使骑手为他带去了摄政王身份被废除的消息。佩德罗最终挑衅地将葡萄牙议会的决定踩在脚下，叫嚣着“不独立，毋宁死！”这也是所谓“伊皮兰加的呼声”。在里约热内卢，市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对君主专制的理念并不持友好态度，但他们仍然看到了借此推进自己议程的机会。只要佩德罗的权力来自主权人民，并嵌入在一部由人民选举而出的国民大会所书写的宪法中，他们就可以接受一个君主制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市议会说服佩德罗，要求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在出现“伊皮兰加的呼声”事件的两天后，里约热内卢的三个政治派别的联席会议一致认为，佩德罗应被拥戴为特别的立宪皇帝。

佩德罗王子并不反对成为立宪制的君主，但若泽·博尼法西奥不想在拥戴设帝的流程中提及宪法，于是他采取了自己的方法。一个由巴西各个偏远省份中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将很难控制，但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喜欢控制住局面，这种控制欲是一种家族特征，那些在安东尼奥·卡洛斯

和马蒂姆·弗朗西斯科周围工作的人也发现了这一点。安德拉达家族三个兄弟的做法都十分容易为自己树敌，这就是他们的失败之处。

总体而言，在里约热内卢以及附近的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佩德罗获得了来自人民最坚定的支持。其他偏远的地区首府（目前都由临时洪达统治）对以里约热内卢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做法所表现出的认同感较少。特别是巴西东北部的地方领导人，批准了佩德罗举行民选国民议会的呼吁。尽管如此，佩德罗在1822年12月1日作为独立巴西帝国的君主加冕时，几乎没有提到巴西各地方自治带来的挑战。

## 墨西哥成为共和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西成为独立帝国的第二天，正是独立的墨西哥帝国终结的开始。与制宪会议的冲突使阿古斯丁一世在加冕前就已经感到困扰。也许最令人生厌的问题来自我们之前提到的，曾在加的斯有见过最后一面的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塞尔万多·特蕾莎·德·米耶尔神父（Father Servando Teresa de Mier）。在离开加的斯之后，米耶尔神父在欧洲和美国流亡了数年，然后于1817年加入米纳远征军前往墨西哥，但失败了，使他最终被判入韦拉克鲁斯监狱。当西班牙人接受墨西哥独立后，米耶尔神父又出现了，然后他领导了共和党的反对派参加墨西哥新的制宪会议，直到被指控密谋推翻皇帝，然后他再次入狱。米耶尔神父在他的监狱格子间里继续写作和发表文章，而阿古斯丁一世对他个人或制宪会议的不合作态度都逐渐失去耐心。最终，愤怒的皇帝关闭了国会。此后一个月，

即 1822 年 12 月 2 日，一场颠覆帝国的革命始于韦拉克鲁斯。

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娜（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上校，此人在之后的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的事件中闻名。与伊图尔维德一样，圣安娜在经过多年同美洲独立事业的对抗战争之后，在最后一刻选择加入美洲独立运动的一方。圣安娜的努力为《伊瓜拉计划》争取到了韦拉克鲁斯的支持，并获得阿古斯丁一世的崇高赞誉。但是当圣安娜试图与阿古斯丁的姐姐结婚时，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遭到了拒绝，因此他成了共和党人。圣安娜的叛乱很快吸引了比森特·格雷罗和瓜达卢佩·维多利亚（Guadalupe Victoria）等人的追随者，他们从未真正喜欢过组建墨西哥帝国的想法。墨西哥城的政治俱乐部现在起着政治风向的领导作用，这同早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和其他地方中的政治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这些政治组织在墨西哥的主要贡献是促进联邦制，这一制度曾被玻利瓦尔、圣马丁和若泽·博尼法西奥猛烈批评。那些认为新国家的政治制度需要由上自下来设计的人，天然地反对联邦制对中央集权的限制。但是，许多渴望逃避中央集权的省级领导人则倾向于联邦制。因此，由叛乱分子制定的墨西哥联邦政府的《卡萨马塔计划》（Plan of Casa Mata）在全国各地迅速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迫使临时的皇帝下台。此外，针对阿古斯丁一世的叛乱，不仅改变了统治者，而且改变了政府的组织形式，建立了墨西哥共和国。阿古斯丁·伊图尔维德于 1823 年 5 月被流放欧洲。

### 钟摆在欧洲走向专制主义

1823 年 5 月，就在墨西哥危机逐渐消散之际，一场危机始于西班牙，

一支法国军队再次不费吹灰之力地占领了该国。这次入侵者的行动与梅特涅亲王的欧洲君主反动同盟——神圣联盟——相一致。他们的任务是拯救费尔南多七世，以免他继续遭受自由主义的折磨，并恢复他的传统特权。费尔南多很乐意接受这一支持，再次推翻宪法，恢复了绝对权力。

西班牙再次打喷嚏，葡萄牙又感冒了。随着法国对西班牙的迅速占领成为事实，驻守在里斯本城外的葡萄牙军队中的保守派军官宣布了自己的政变，恢复了若昂六世的绝对权力。若昂没有发挥绝对权力的特别用途，因为他缺乏采取任何严厉措施的意愿。若昂不允许葡萄牙发生任何复仇的事情，正如报复心很强的费尔南多在西班牙所做的一样，他让成千上万的自由主义者被监禁或流放。卡洛塔·华金纳公主的心情更像她哥哥的心情，而不是她丈夫的心情。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是肯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迅速而剧烈的政治动荡，阻碍了他们对收复美洲前殖民地的努力。

### 巴西人打一场小型的独立战争

1823年见证了整个巴西独立战争，这是摧毁西班牙美洲的缩影。到1823年初，大多数巴西地区（现为“州”）都效仿了里约热内卢的做法，拥护了佩德罗为巴西帝国的皇帝。所有的抵抗情绪都来自偏远的北部——塞阿拉（Ceará）、皮奥伊（Piauí）、马拉南（Maranhão）和帕拉（Pará），最重要的是来自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Salvador）。在萨尔瓦多，一支由葡萄牙正规军组成的强大驻军已被围困了几个月。在巴伊亚的陆地上，围攻

者是当地的巴西民兵。在巴伊亚的海洋边，围攻者是最近来自智利海军的坚韧不拔的苏格兰海军上将科克伦，他用若泽·博尼法西奥着手组织的一支小型巴西海军封锁了这座城市。然而，1823年7月2日，葡萄牙驻军放弃了对这座城市的包围，登上了他们的船只撤退，扬帆远航，让多种族的巴伊亚民兵进入这座城市庆祝爱国主义运动的胜利，这一天成了现在每年在萨尔瓦多举行的爱国胜利纪念日。巴西小型海军对撤退的葡萄牙护航舰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然后沿海岸航行到了最后两个仍在抵抗的省份马拉尼昂和帕拉，科克伦上将通过假装在地平线那边拥有一支完整的战斗舰队来虚张声势，成功迫使这两个省份投降。到那时，在塞阿拉和皮奥伊的葡萄牙部队已经被当地爱国者击败。仍然占领蒙得维的亚的最后一批驻美洲的葡萄牙部队也在11月撤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小型独立战争的成功结束，却使得为这场胜利付出巨大贡献的若泽·博尼法西奥被推翻。在佩德罗登基之时，政治战线就已经形成。此后不久，若泽·博尼法西奥逮捕并流放了许多坚持要佩德罗向宪法宣誓的人。因此，这位盛气凌人的首相在其暴风雨般的任期内激怒了许多人。佩德罗现在也希望减少听从一些若泽·博尼法西奥的建议。当有关巴伊亚被攻占的消息传到里约热内卢时，佩德罗将内阁首席若泽·博尼法西奥和财政大臣马蒂姆·弗朗西斯科都解雇了。

同时，安德拉达的三弟安东尼奥·卡洛斯从里斯本议会返回，与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巴西国民议会。这不是普通的国民议会，而是一次制宪议会，有权为新的巴西帝国撰写宪法。很快，安德拉达兄弟率领组建了一支以抨击葡萄牙人而闻名的派系。佩德罗和葡萄牙议会之间较早的权力斗争大致遵循着以出生地区分的路线，即是在巴西和葡萄牙之间进行的，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欧洲人被当成替罪羊，这与爱国主义者在美洲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不一样。毕竟，佩德罗是在葡萄牙出生的。葡萄牙

出生的人，现在也是巴西公民，在这个新生帝国的商业、民政和教会等级制度的许多领域占主导地位。抨击葡萄牙人，将会把这些人从对他们有利的位置上拉下来，现在成了整个巴西城市中的一种流行政治策略。最近葡萄牙发生的专制主义军事政变的消息使安德拉达的本土主义情绪增加了热情和紧迫感。后来发生了一起小事，当在里约热内卢驻军的一名葡萄牙军官因为他们的荣誉被冒犯了，而殴打了一名里约热内卢人时，事件引起了轰动。议会中的安德拉达派系使这件事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巴西的荣誉现在也危在旦夕。佩德罗对议会的举止特别生气，并对若泽·博尼法西奥的做法感到特别愤怒，他派部队结束了制宪会议，并逮捕了安德拉达兄弟。

### 玻利瓦尔快要失败了

在秘鲁，玻利瓦尔开始感受到连续十年不断作战所造成的身体损耗。在1824年的新年这天，人们不得不将他抬上岸，运送到一个叫帕蒂维尔卡（Pativilca）的地方，因为他的肺结核病第一次发作了，这也是最终杀死他的疾病。肺结核病在19世纪很普遍，但仍然令人震惊的是，玻利瓦尔和圣马丁都曾遭受过肺结核病的折磨。一个在帕蒂维尔卡曾看到憔悴的玻利瓦尔瘫坐在长凳上的访客，认为这位美洲解放者可能活不了多久。他战战兢兢地询问玻利瓦尔现在打算做什么。玻利瓦尔用凹陷的眼睛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他，坚定地回答：“胜利。”<sup>[6]</sup>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在圣马丁第一次进入利马的三年后，在他绝望地放弃了利马一年多之后，秘鲁还是一如既往地陷入泥潭。费尔南多七

世的部队继续占领着高地，这个部队有约 12 000 人，由经验丰富的人指挥着，他们似乎能够随意重新进入利马。另一方面，利马的爱国者运动极为分裂，领导层犹豫不决，军事力量参差不齐，这是由于这些军事力量是由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分别从美洲的两端带来的。圣马丁的军队处于叛变的边缘，他们既没有圣马丁，也没有补给、资金或增援。在利马待了几个月后，玻利瓦尔撤退到秘鲁北部的特鲁希略（Trujillo），在那里他可以将部队召集起来，并通过登上安第斯山脉，使部队适应要进行战斗的高海拔地区。据称，他仍然是哥伦比亚总统，但他在波哥大的副总统却没有给予任何合作。他的副总统弗朗西斯科·德·葆拉·桑坦德（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曾在 1819 年帮助将玻利瓦尔的军队从奥里诺科平原引导到波哥大的后方山区，现在成为美洲解放者的主要对手。另一方面，苏克雷和曼努埃拉仍然在他的身边，最近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也使西班牙专制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改善，也有所帮助。到 1824 年 6 月，玻利瓦尔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他的军队终于准备开始穿过安第斯山脉，向南进军库斯科，在那里有美洲的最后一位总督在等待。

### 佩德罗一世粉碎赤道联邦

在大陆的另一侧，独立的巴西帝国于 1824 年开始瓦解，看来差不多了。政治地震再次发生在东北部各省，而震中再次出现在伯南布哥。伯南布哥的地方领导人拒绝接受佩德罗指定的省长，他们指控佩德罗非法关闭国民议会。1824 年 7 月 2 日，即巴伊亚从葡萄牙军队手中解放的周年纪念

日，他们宣布建立一个新国家，一个共和国，被称为赤道联邦。这个名称之所以合适，是因为可能加入新的共和制联邦的各省份位于巴西北部沿海的赤道地区，该地区仅与里约热内卢有着松散的联系。

显然，这是阿根廷和墨西哥鼓励实行联邦制的离心力。但这也是对皇帝的高压手段的原则性抵抗。伯南布哥政治良知的声音来自一位激进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华阿金·德·阿莫尔·迪韦诺（Joaquim do Amor Divino），神圣之爱与他的昵称“瓶子”（Caneca）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父亲的制革厂中，瓶子被用来分配干鞣酸。）卡内卡修士（Friar Caneca）是一位学者，他在书本中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巴西独立的政治刺激引诱他投身新闻界。他的著作中大量提及古典历史和拉丁语的引文，更适合给修道院的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而不是在大街上对着人群，鼓舞人心。尽管如此，卡内卡修士的新出版物还是抓住了一个中心点。佩德罗在少数顾问的帮助下亲自撰写了一部宪法，并将其强加于巴西。卡内卡修士认为，只有体现巴西人民主权的国民议会才能为新帝国建立有效的宪法。如果佩德罗的统治没有一部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起草的宪法，那么他的统治就是武断的、专制的和非法的。

不幸的是，对卡内卡修士和他的崇高原则来说，佩德罗现在拥有相当多的可支配的武装力量，而他也不愿进行理论上的讨论。事实证明，赤道联邦演变成了1817年累西腓叛乱的翻版，并且它传播的范围更广，持续的时间更长，其垮台崩溃的声音更大。叛逆的卡内卡修士因其叛国的写作文章而被判处死刑，但由于累西腓的王室刽子手拒绝绞死一个他认为是圣洁而无辜的人，所以卡内卡不得不最终接受被枪决。联邦的另一个殉难的英雄是一位名叫若昂·吉尔赫姆·拉特克利夫（João Guilherme Ratcliff）的国际自由主义革命者，他曾主动担任赤道联邦唯一一艘海军舰艇的指挥官。在被捕并入狱后，拉特克利夫在执行死刑之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显

然，他的自由主义活动曾在某个较早的时期深深地激怒了佩德罗的母亲夏洛塔·华金纳公主，因此，作为王室内部的一种和解姿态，拉特克利夫的腌制头颅被送往里斯本，以供她欣赏。

到1824年底，随着伯南布哥叛乱被安定下来，佩德罗的宪法出台，巴西帝国经受住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考验。

### 西班牙在阿亚库乔战役中投降

同样在这一年的年底，玻利瓦尔的军队进入了西班牙最后一位总督的安第斯据点，并在1824年12月9日赢得了美洲国家独立事业的最后胜利。

实际上，这里曾有两场战役。第一场战役是胡宁之战，发生在1824年8月初，当时玻利瓦尔的部队已经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适应海拔高度，玻利瓦尔的骑兵也能够作为持枪骑兵来作战。身穿军官制服的曼努埃尔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结果没有定论，人员伤亡也很轻。阿亚库乔之战则是几个月之后一场更具决定性的战斗，在海拔超过一万英尺的地方，玻利瓦尔的军队进行了数周的密集机动准备。苏克雷在阿亚库乔指挥着爱国主义者的部队，因为玻利瓦尔和曼努埃拉已返回利马。对面的整个领域是总督拉塞尔纳，以及秘鲁的全部保皇派军队。当两军在战斗前相互对峙时，不同的秘鲁士兵从双方的队伍中走出来，向在另一方队伍中的亲属大声喊话告别。

阿亚库乔之战本身就是反常的。当爱国主义者俘获了拉塞尔纳时，这场战役迅速而完全地结束了。这位总督在阿亚库乔之战中的投降行为，使

得西班牙在美洲的剩余势力都彻底投降。骑手载着这个消息向各个方向飞奔。经过 15 年的艰苦奋斗，争取独立的斗争真正结束了。

为什么西班牙重新征服的浪潮会如此急剧地消退？战场上的胜利只说明了部分故事。在博亚卡桥、卡拉沃沃、查卡布科、皮钦查和阿亚库乔赢得的胜利意义重大，但双方数千名士兵的战斗只能间接地确定对广阔领土的控制。最终，周围一百多个城镇对这种胜利的反应使一切都不同了。从 1820 年开始，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立宪革命开始，整个美洲地区的反应越来越一致。阿亚库乔之战之后，几名叛乱的西班牙指挥官在上秘鲁坚守了数周，但在他们周围没有聚集起任何支持的力量。当最后一批西班牙士兵撤离美洲时，对美洲独立事业的抵抗力量才绝对地结束了。整个美洲大陆上最顽强的保皇派势力，终于接受阿亚库乔之战作为历史的判决。多年来，再没有保皇派游击队继续战斗；没有顽固的游击队潜伏下来，随时准备在出现危机时重现。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只有最反动的边缘分子才会提出恢复殖民地地位的主张。其他所有人都认为这一问题已经解决。美洲是独立的。

## 注释

[ 1 ] Matilde Gómez, *La epopeya de la independencia mexicana a través de sus mujeres* ( Mexico City: ANHG, 1947 ), 22.

[ 2 ] Theodogre G. Vincent, *The Legacy of Vicente Guerrero, Mexico's First Black Indian President* (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 125.

[ 3 ] Octavio Tarquinio de Sousa, *História dos fundadores do Império do Brasil, Vol. 2: A vida de Pedro I* ( Rio de Janeiro: José Olímpio Editora, 1957 ), 265—266.

[ 4 ] Mario Rodríguez, *The Cádiz Experiment in Central America, 1808—1826*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146.

[ 5 ] *Selected Writings of Bolívar*, ed. Vicente Lecuna and Harold Bierck Jr., trans. Lewis Bertrand ( New York: Colonial Press, 1951 ), 286.

[ 6 ] Gerhard Masur, *Simon Bolivar* (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69 ), 367.

## 第六章 国家建设的开始（1825—1840）

公众情绪长期以来的转变是 19 世纪 20 年代军事胜利的基础。美洲的独立是在阿亚库乔之战后达成的协议，但并没有真正地决定下来。相反，在自 1808 年以来的整个时期的辩论、抗争和“安抚”过程中，美洲独立的事实才逐渐在人们的心中决定下来了。

在最初关于如何应对拿破仑的辩论中，人们高度一致地宣称美洲的独特身份，此时这一决定才开始成形。但后来内战在该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在对旧有邻里恩怨的回忆中，致使这一观念黯然失色，城市、省份，甚至社会阶层出现相互对立。这些并不复杂的内战混淆并暂时挫败了新兴的美洲独立事业，同时最终加剧并扩大了美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对立。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成为公众对战斗的持续解释来源，用来解释哪一方独立事业的缘由更为复杂。不管他们的个人动机有多复杂，不可否认的是，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是为美洲而死的。在随之而来的残酷统计中——无论哪一方进行统计——梅斯蒂索人、帕尔多人和印第安人都被算作美洲人。革命者战略性地宣布了这一新的含义，但推动词语含义变化的是流血事件，而不是宣言。

就这样，美洲的独立事业在失败中变得更有意义，相反费尔南多七世的事业即使在胜利中，也失去了吸引力。西班牙的远征者，他们是一群从后拿破仑时代的西班牙来到美洲的入侵者，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们是和解

的最大敌人，他们被派去安抚民众，却最终疏远了原本应该得到安抚的人民。费尔南多七世本人的回归也让人大失所望。这个曾经的“万众企盼的人”心胸狭隘而富有报复心，他夺取了绝对的权力，并利用它来迫害那些以他的名义与法国人作战的自由主义爱国者。费尔南多七世在自己的军队发生叛变的情况下，被逼无奈接受了一部宪法，但在后来被法国的另一次入侵所拯救时又宣布放弃了这部宪法。西班牙的这种混乱，恰好与圣马丁和玻利瓦尔在 1817—1824 年的伟大的跨大陆战役同时发生。

这两位最伟大的爱国者将军的获胜军队规模相对较小，他们的许多士兵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这与早期来自下层群众的大规模起义完全不同。虽然有色人种充斥着爱国者的队伍时，他们的军官往往是白人，再现了社会等级制度，并赢得了自由派（或保守派）西班牙裔美洲人的支持。这些解放者几乎没有表现出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来疏远保守派，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甚至共和主义对普通人来说也不像 15 年前那样古怪了。被米兰达和其他人推崇的讲英语的北美共和国，已经赢得了对英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 年战争），并且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费尔南多七世以前令人敬畏的神秘感消失了，西班牙的重新征服提醒了所有人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不喜欢西班牙佬。可以说，费尔南多七世失去了美洲，比任何人都失去得更多。

因此，在新西班牙经过十年残酷无情的、毫不动摇的王室控制后，1821 年，伊图尔维德的“三保证军”无需打一场重要的战斗就能挺进墨西哥城了。同样如此，危地马拉王国甚至没有组建一支爱国军队就宣布独立。最后，巴西的情况提供了第三个例子，即通过对人民主权权利的一致主张，在战场之外宣示了独立。

到 1825 年，建立在模糊的国家观念基础上的人民主权，支撑着所有新的美洲政府。但在独立之后，地区和地方身份比国家身份更重要。区域和

地方身份往往代表着文化差异和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利益，更多的是在地方和区域范围内组织，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曾经分裂了新格拉纳达和拉普拉塔河的前总督辖区的同样古老的离心倾向，在新独立的国家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它们否定了波哥大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首要地位。它们的载体是联邦共和国，这是圣马丁和玻利瓦尔等未来的国家缔造者厌恶的想法。中央集权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几乎困扰着所有的新国家。有效的共和制机构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出现。在此期间，事情开始迅速分崩离析。

### 洪堡寻求一个咨询职位

1825年，56岁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为美洲的共和国的激增而欢呼。他保留了对法国大革命基本原则的信念，但在实践中给予了它们一点灵活性。当拿破仑入侵整个欧洲，包括洪堡的故乡普鲁士时，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已在巴黎定居，巴黎是拿破仑的光辉首都。毫无疑问，对于这位欧洲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来说，欧洲没有比巴黎更令人兴奋的地方了。在那里，洪堡开始出版他三十卷本《1799—1804年新大陆亚热带区域旅行记》的法文版，该书篇幅冗长而漫无边际，但充满了新的信息和对自然的浪漫描述，极大地吸引了19世纪中期的读者。然而，到了1825年，洪堡想离开巴黎，如果可能的话，也想离开欧洲。对喜马拉雅山的探索将是他对安第斯山脉探索的一个恰当的延续。

洪堡曾经的艾米·德·邦普兰（Aimé de Bonpland）几年前曾返回美

洲，洪堡也考虑过这一备选计划。当一群法国投资者开始提到有可能保留洪堡，继续作为有偿顾问，为他们在新独立的墨西哥开展的顾问服务时，洪堡非常乐意接受。毕竟，对于了解墨西哥银矿的潜在财富价值方面，还有谁是他更好的向导呢？然而，洪堡的希望破灭了，因为他收到了墨西哥政府的一位部长的信件，此人是一位名叫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的聪明年轻人，他的家族财富来自瓜纳华托的矿场。洪堡在巴黎曾遇到过阿拉曼，当时阿拉曼正在欧洲完成他的学业。可惜的是，阿拉曼的信中只字未提洪堡的潜在顾问职位。这很可能是因为阿拉曼事实上支持另一个竞争性的投资者团体，是英国人的而不是法国人的，他在信中也并没有提到这些。话已至此，洪堡把他的注意力从墨西哥转移开来了。

事实上，对洪堡来说，还好他没有效仿邦普兰的做法。邦普兰出发探索美洲南部地区，在之前的探险中，他和洪堡都没有去过那里。不幸的是，邦普兰离弗朗西亚博士的巴拉圭太近了，最后和何塞·阿蒂加斯一起被囚禁在那里。弗朗西亚作为巴拉圭的永久总统继续统治着巴拉圭，在19世纪20年代的整个十年里，邦普兰一直被软禁在那里。洪堡的计划是去墨西哥，而不是巴拉圭。而且他的目的不是收集科学标本，而是帮助欧洲资本对墨西哥经济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如果他去了，肯定会与卢卡斯·阿拉曼合作。尽管阿拉曼是一个具有君主主义倾向的保守派，但他对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教育有着雄心勃勃的设想，同时也具有洪堡所推崇的那种能力。

阿拉曼体现了墨西哥新共和国中保守派的精神。保守派基本上赞同殖民时期“美好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但是需要在他们自己的仁慈控制下。阿拉曼是瓜纳华托一个成功的欧洲商人的儿子。阿拉曼的母亲实际上曾与米格尔·伊达尔戈有过交往，在1810年瓜纳华托的劫难中，伊达尔戈曾派了一名士兵来保护阿拉曼家。即便如此，伊达尔戈的一些追随者还

是威胁要杀了这个年轻人，把他当成了西班牙佬，直到家里的仆人说服袭击者，说阿拉曼是个美洲人。阿拉曼被选为1820年召集的西班牙议会的议员，所以当伊瓜拉计划结束西班牙在墨西哥的统治时，他正在西班牙。回国后，阿拉曼的教育背景和能力水平使他在后伊图尔维德时期的墨西哥政府中获得担任部长的机会——他首先是在包括比森特·格雷罗在内的过渡团队中工作，然后是在第一任当选总统、莫雷洛斯的另一位前副手瓜达卢佩·维多利亚手下工作。这些深色皮肤的南方爱国者军队的资深领袖根本不配合阿拉曼。他们倾向于代表墨西哥非白人多数群体的观点，也倾向于利用民众对居住在墨西哥的欧洲人的持续愤怒。亲西班牙的阿拉曼来自伊图尔维德独立运动的最后一翼，他在1821年才与费尔南多七世决裂，于是他厌恶地从维多利亚的政府中辞职。

洪堡最终搬到了柏林而不是墨西哥城。渐渐地，他在普鲁士担任了一些重要的官职，开始集中精力进行中亚旅行，经由俄罗斯陆路，最终确实完成了这次旅行，在60岁的时候，洪堡仍然可以每天步行10英里。他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工作仍然摆在他面前。但他再也不会造访美洲了。

### 玻利瓦尔起草宪法

西蒙·玻利瓦尔在1826年达到人生中的巅峰。在阿亚库乔之战后，他的亲信苏克雷击败了上秘鲁的所有西班牙抵抗力量，并在玻利瓦尔的支持下，宣布上秘鲁脱离利马、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马德里而独立。从此，上秘鲁成为玻利瓦尔共和国，后来简称为玻利维亚。玻利瓦尔迫不及待地要

从利马穿过高原到达库斯科、拉巴斯和波托西，波托西有一座巨大的银山，象征着西班牙从美洲攫取的财富和对新近成为美洲人的印第安矿工的虐待。热情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为玻利瓦尔进入沿途的每个城镇欢呼。玻利瓦尔在他的老导师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的陪同下旅行，多年前他曾与这位导师一起在欧洲进行徒步旅行。在爬上波托西的银山，插上四个新独立国家的旗帜时，玻利瓦尔非常激动，因为20年前在访问罗马时，年轻的玻利瓦尔曾在这位导师面前跪地发誓要解放美洲。玻利瓦尔的队伍随后从波托西下到附近的丘基萨卡，苏克雷将作为玻利维亚的第一任总统在那里执政。

现在，罗德里格斯已经50多岁了，在过去的26年里，他一直在欧洲游荡。他才华横溢，但性格怪异，甚至对他最忠实的朋友来说也是令人恼火的存在。有人说，西蒙·玻利瓦尔是唯一认真对待他的重要人物。没有什么比西蒙·玻利瓦尔的信任更重要了。他的老导师讨厌等级制度，相信美洲普通人的潜力，不论帕尔多人和非洲人，还是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只要他们能从他的一所学校中毕业。罗德里格斯的初等教育方法，是他在18世纪90年代作为加拉加斯的一名年轻校长时建构起来的，他认为应该在同一间教室里教育所有的孩子，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认为，即使是富人也应该在那里学习贸易。罗德里格斯认为，美洲已经经历了一场政治革命，但需要另一场社会经济革命。他认为，只要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族群体仍然是未受教育和被剥削的下层阶级，新建立的共和国就永远不会像预期的那样运作。玻利瓦尔让他的老导师担任玻利维亚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他还坚持开玩笑地称呼老导师为鲁滨孙。

玻利瓦尔现在把他个人的灵感倾注在新起草的玻利维亚宪法中，结果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玻利瓦尔并没有完全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但从他的宪章文本的独裁性来判断，他很可能已经这样做了。玻利瓦尔的宪法

是一个原创性的作品，灵感来自他如饥似渴但又反复无常的阅读。宪法的特点是总统终身制，由每一位总统指定他的继任者，以及一个终身的、世袭的副总统。完全间接的选举对普通人来说作用不大。玻利瓦尔认为，他的宪法首先满足了稳定的需要，他认为这是一部杰作。他希望看到这部宪法在秘鲁和哥伦比亚被采用，前者确实采用过，但是在十分短暂的时间内，后者则没有采用。

同时，玻利瓦尔勾勒了一个地缘政治愿景，这个愿景比他遗留下的任何其他启发都更能激励后世的美洲人。从本质上讲，玻利瓦尔想得很远，把整个美洲——不仅仅是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秘鲁或玻利维亚——都纳入他的参考范围。他的第一个想法是需要建立一个防御性联盟。甚至在阿亚库乔之前，他就已经写信给几个已经独立的美洲国家的首脑，召集他们在巴拿马举行外交会议。选择巴拿马并不是偶然的。米兰达和玻利瓦尔在他们对独立的美洲的设想中都把巴拿马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作为一种外交姿态，玻利瓦尔还邀请美国参加巴拿马会议，尽管他和卢卡斯·阿拉曼一样，认为对美洲主权的主要威胁实际上来自美国。

此外，玻利瓦尔设想了一个安第斯联邦，该联邦将以他自己的军队所解放的国家为中坚力量。在他最具思辨能力的时候，他说要把从墨西哥到智利和阿根廷的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启动这样一个项目的诱惑力肯定很大。除了担任哥伦比亚（此时包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总统外，玻利瓦尔还被秘鲁的新国民议会任命为秘鲁的独裁者，而他永远忠诚的苏克雷现在是玻利维亚的总统。当玻利瓦尔在1826年初回到利马时，有人说要给他一个王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玻利瓦尔对安第斯联邦的梦想是一个共和主义的梦想，或者至少不是一个君主制的梦想。西蒙·罗德里格斯的学生都不可能成为君主制的拥护者，也无法逃脱老校长的鞭打。玻利瓦尔是最早摘掉“费尔南多的面具”的爱国主义领袖之一。他成年后一直挥

舞着共和主义的旗帜，现在他也不打算背叛它。

然而，快乐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到1826年中期，哥伦比亚的问题需要玻利瓦尔亲自出马。桑坦德和派斯之间的嫌隙有可能使这个国家分裂。玻利瓦尔于9月出发前往波哥大，将他的军队留在利马。但玻利瓦尔部队的士兵来自大陆各地，在战后的秘鲁已经开始不受欢迎了。军队很快就会跟着他回家。苏克雷作为玻利维亚的总统也不会持续太久。玻利瓦尔对安第斯联邦的设想随着他两个月的北上旅程，每走一步就进一步地消退。

### 南方的分裂现象继续存在

在遥远的美洲南方，政治上的统一也在消退。1826年，旧的拉普拉塔总督区被分成六个国家或准国家。当联邦主义者进军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前联合省已经完全失去了统一的迹象，使其成为一个松散的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国家。同时，佩德罗一世正式将东岸并入巴西帝国，而在殖民时期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统治的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则永远分道扬镳。

何塞·阿蒂加斯（许多人认为他是这次分裂的主要策划者）似乎注定要在巴拉圭的软禁中度过余生。弗朗西亚总统为阿蒂加斯提供了少量津贴，允许他耕种、饲养一些牲畜，并居住在他在巴拉圭农村为自己建造的小屋里，不受干扰地生活。即使在东岸开始了反对巴西统治的爱国者起义后，这位前自由人民保护者也没有表现出急于逃离和返回东岸的意愿。在宁静的巴拉圭，阿蒂加斯定期收到家乡发生重大事件的消息，但他已经永久地摆脱了想要参与其中的欲望。

1825—1828年东岸的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班牙在阿亚库乔的最终失败的消息。阿蒂加斯的善战高乔人回来了，但没有阿蒂加斯，由他的几个老部下率领着。美洲这最后一点土地还没有解放！甚至长期以来四分五裂的拉普拉塔河联合省也设法组建了一支军队来帮忙。由于英国对巴西和拉普拉塔河地区都很感兴趣，于是出手对这一起义进行了外交干涉。谈判拖了两年之久。与此同时，佩德罗一世前往巴西南部边缘地区，亲自指挥巴西军队。面对他，联合省派出的不是别人，正是圣马丁以前的朋友卡洛斯·德·阿尔韦亚尔，更重要的是，这位的军队更强大。

当然，对外战争可以激发团结，在与巴西的冲突中，统一联合省的努力取得一些进展。有趣的是，这些努力的主要推动者是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Bernardino Rivadavia），他是早期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共和派的秘书，也是最近从流放地返回的玛丽基塔·桑切斯的伙伴。1826年，里瓦达维亚成为第一位试图整合联合省的总统。

里瓦达维亚不是这个职位的合适人选。尽管大多数人持有保守主义的立场，但没有人能更好地代表这一群意识形态驱动的领导人们，他们引导美洲走向共和主义的未来。这些人希望根据英国和法国专家的建议来改造他们的社会和经济。里瓦达维亚打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门，最大限度地开放给英国，其商业影响如潮水般涌入。他对欧洲移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尽管在19世纪20年代到达阿根廷的移民很少，但这也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阿根廷的特点。同时，里瓦达维亚向牧场主开放了公共土地，并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教导潘帕斯草原上的高乔劳动力，目的是使他们更加有服从性和更加有生产力。里瓦达维亚还促进了公共初等教育，这是非常具有阿根廷特色的，并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他还解决了教会问题，在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眼中，教会是旧政权的有力象征，但在独立初期的美洲大陆，教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受普通民众关注的问题。总的来说，里

瓦达维亚的改革计划和这些年的许多计划一样，都是以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模式为聚焦重点。为了实施他的改革计划，这位五月革命的忠实继承者希望把权力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蒂加斯的粗暴联邦主义继承者拒绝接受里瓦达维亚的自由主义的统一政策，并推翻了他。

1828年，在英国的调停下，在原来的东岸省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缓冲国——乌拉圭共和国。在巴拉圭，邦普兰去看望阿蒂加斯，给他带了一份乌拉圭新宪法的副本，这位老战士热切地亲吻着这份新宪法。然后阿蒂加斯又回到了他平静的乡村生活。十年后，随着弗朗西亚博士的去世，阿蒂加斯被邀请作为英雄回到蒙得维的亚，但他拒绝离开巴拉圭，不得不说，这个国家似乎对长期来访者越来越有吸引力。

回到联合省，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府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完全消失了。联邦主义者甚至统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由嚣张的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掌权。罗萨斯利用共和主义的意象，把自己称为“杰出的美洲人”。他的民粹主义姿态赢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贫困人口的青睐，而他的经济政策则让农牧业精英心服口服。罗萨斯也是一名牧场主和风干牛肉前制造商，他认同主导群体的经济利益。当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时，或者甚至在这之前，罗萨斯就对他的反对者采取暴力措施，他们就是备受诋毁的“一元主义者”，他们因赞成单一的而非联邦的宪法而被称为中央主义者。

现在住在比利时的圣马丁，早就料到了这种事情的发生。1829年，他甚至试图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联邦主义者和一元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时，他乘坐一艘欧洲船只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岸。像阿蒂加斯一样，圣马丁最想要的是和平和宁静。他甚至没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岸，而是在蒙得维的亚登陆，并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直到他确信自己无法逃脱联邦主义者和一元主义者之间的争斗。圣马丁预言，由于既得利

益者要求保护他们的财产，混乱将导致独裁，这正是许多年轻共和国发生的事情。由于担心自己会被任命为独裁者，圣马丁回到了比利时，再也没有踏足美洲。

### 玻利瓦尔的死期到了

玻利瓦尔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在1828年9月波哥大一个寒冷的夜晚，一群军官试图暗杀他。当这些人进入总统府时，玻利瓦尔正和曼努埃拉在一起。她读着书哄着他入睡，但当她听到攻击者在大厅里的声音时，她把他叫醒了。玻利瓦尔从窗户跳了下去，而曼努埃拉则把这些想要行凶的刺客拖延了几分钟。他在黑暗、寒冷的水中躲在一座桥下，然后赶到一个军营，在那里他的士兵保护了他。

自从解放者回到哥伦比亚后，事情就完全变了味。玻利瓦尔从来没有在波哥大住过很长时间，他曾在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南部住了五年。在他不在的时候，副总统桑坦德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桑坦德不同意玻利瓦尔对安第斯联邦的设想，拒绝了玻利瓦尔的宪法。作为副总统，桑坦德与玻利瓦尔的委内瑞拉老盟友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发生了可怕的冲突，导致派斯宣布委内瑞拉脱离哥伦比亚独立。这就是最终把玻利瓦尔从秘鲁带回波哥大的原因，他在波哥大的公众招待会上乏善可陈。玻利瓦尔重新担任哥伦比亚总统，并亲自前往委内瑞拉直接处理危机。与玻利瓦尔面对面时，派斯很快就接受了和解，但玻利瓦尔在回到波哥大之前，他在委内瑞拉待了好几个月。也许他害怕自己在波哥大越来越不受欢迎，敌人越来越

越多。

玻利瓦尔现在最关心的是国民议会，这个议会可以考虑他的宪法和安第斯联邦计划。议会召开了大会，但桑坦德的支持者主导了会议，玻利瓦尔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在这一时刻，玻利瓦尔以违反宪法的方式宣布了独裁权力。人们暗杀他的企图，必须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尽管如此，暗杀行为还是深深地震动了玻利瓦尔。有几个人因此被处决——虽然桑坦德没有被处死，但他面临流放。玻利瓦尔赦免了许多涉案人员。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公众的尊重更重要，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他的荣耀”。他非常希望被民众爱戴。他伟大的政治计划，也就是他毕生事业的巅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他眼前崩溃了，他的肺结核病迅速恶化，使他看起来像60岁而不是45岁。曼努埃拉·萨恩斯忠诚地照顾着他，玻利瓦尔很喜欢她，但她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些麻烦。

曼努埃拉的非传统行为，如穿着男装骑马到处跑，激怒了波哥大这个古板的社会。曼努埃拉这样做也是很有目的的。当她离开她的英国商人丈夫去追随玻利瓦尔时， she就把社会习俗放在一边。当曼努埃拉与玻利瓦尔一起住在前总督的避暑别墅里，而她的丈夫就住在不远处时，她甚至让利马这个不那么古板的社会感到震惊和羞耻。玻利瓦尔喜欢在没有曼努埃拉的情况下旅行，但她总是跟着。她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最重要的是，她是玻利瓦尔的忠实支持者。当玻利瓦尔返回波哥大时，她起初是留在了利马，当利马的哥伦比亚军队很快叛变时，曼努埃拉亲自带着一把手枪和一把金币，去改变他们的想法。一到波哥大，由于玻利瓦尔总统和桑坦德副总统现在是死敌，曼努埃拉在一个晚上上演了一场模拟处决副总统的戏码，以此来逗乐她的晚餐客人。玻利瓦尔的一些官员喜欢曼努埃拉，但其他人认为她不必要地破坏了玻利瓦尔的声誉。

1829年，反对玻利瓦尔统治的叛乱在哥伦比亚的各个地方萌芽。派斯

仍然渴望委内瑞拉的独立，于是再次宣布独立。厄瓜多尔也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在军队之外，玻利瓦尔在波哥大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政治支持。到1830年初，他缺乏继续担任独裁者的体力和精神耐力。5月，他在波哥大与曼努埃拉告别，乘船沿马格达莱纳河前往卡塔赫纳，打算离开这个国家，但去哪里，他并不确定。在卡塔赫纳，玻利瓦尔收到了一个最坏的消息：他最信任的将军和钦定的继任者，他最指望能挽回他的政治愿景的人，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在35岁时被谋杀了，显然是死在玻利瓦尔的敌人手中。

可怜的苏克雷，玻利维亚的前首都丘基萨卡被改名为苏克雷，因为他曾宣布玻利维亚独立。厄瓜多尔的比索被称为苏克雷，以纪念苏克雷在皮钦查的领导才能。但他的一生让人感到沮丧，因为他的诚实、能干和自我牺牲精神为他赢得了名声，但没有带来个人的幸福。苏克雷与基多的一名女子订了婚，他没有谋求成为玻利维亚的第一任总统，而是出于对玻利瓦尔的忠诚而勉强接受任命。两年后，当玻利维亚人决定自己统治自己时，苏克雷在一次暗杀行动中幸存下来，并以其特有的方式拒绝处决被捕的刺客，而是用200比索将其释放。苏克雷在镇压后来的军队叛变时手臂受伤，最终辞去了总统职务，前往基多结婚。婚姻的幸福与他无缘。几乎在同一时间，玻利瓦尔命令他离开基多，以对抗秘鲁人重新整合瓜亚基尔港的企图，苏克雷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然后，权力的缰绳从他手中滑落，玻利瓦尔把苏克雷叫到波哥大，让他接管在哥伦比亚的政治遗产。苏克雷没有成为哥伦比亚总统的野心，但这并没有使他免遭玻利瓦尔的敌人的攻击。在他死后，苏克雷唯一的孩子神秘地死在她继父的手中（这在基多有传言），就这么突然结束了这位令人钦佩的美洲人的后世血脉。

在得知苏克雷被暗杀的消息后，已经病入膏肓的玻利瓦尔提议前往他的故乡加拉加斯。但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委内瑞拉正处于反玻利瓦尔运

动的阵痛之中，不会接受他。玻利瓦尔只走到了附近的圣玛尔塔（Santa Marta）。这位奄奄一息的解放者很沮丧，认为他的努力毫无用处，用他的名言来说，他只是在“耕耘大海”<sup>[1]</sup>。他被邀请住在城外的甘蔗种植园，在那里他一定感到很自在。1830年12月，肺结核夺去了他的生命。玻利瓦尔死时一贫如洗，他在20年的斗争中耗尽并捐出了全部财产。他的行李中甚至没有一件适合他的葬礼的衬衫，还必须额外准备一件。

### 格雷罗仅当了一年的总统

比森特·格雷罗是莫雷洛斯的继任者，他代表了美洲南方的革命和《伊瓜拉计划》的种族平等保障，他在民众支持的浪潮下，于1829年成为墨西哥的总统。1828年有争议的选举最终通过一场名为“阿科达达”（Acordada）的大骚乱得到解决，这是一记警钟，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墨西哥城人民的情绪。阿科达达暴动的目标是城市中心广场上的一个高级购物区，即帕里安市场（the Parián market），那里的西班牙商人提供从欧洲进口的最好的奢侈消费品。《伊瓜拉计划》保证了在墨西哥的欧洲裔西班牙人居民的权利，他们在独立的墨西哥开始生活时，享有他们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要求的同样的社会和经济特权。他们像墨西哥的主人一样漫步在帕里安市场，在许多方面，他们仍然是墨西哥的主人。当然，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的“幽灵”表示反对，他们的声音在南部由帕尔多人、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推动的基层乡村政府运动中响起，其中许多人曾是参与争取独立斗争的老兵。阿科达达暴动构成全国范围暴动的一部分，它使帕里安市场变成

一个浓烟密布的废墟，迫使所有剩余的欧洲裔西班牙人离开该国并带走其财产。这场骚乱促使格雷罗及时地进入总统府，以面对费尔南多七世策划的一场真正的但不强大的美洲复出企图。

在西班牙公民被驱逐出墨西哥和财产被征用的刺激下，一支小型船队于1829年7月在坦皮科附近卸下一支由数千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人侵部队。对入侵者来说，不幸的是，墨西哥湾沿岸的沿海低地与该国另一边的太平洋低地一样，在独立战争期间一直是爱国者游击队活动的温床。沿海地区的乡村帕尔多人是骄傲的美洲人，他们迅速拿起武器对抗入侵的欧洲人，并有效地使用了武器。一支墨西哥军队在一个月内动员起来应对威胁，但这似乎没有必要。当地爱国者的抵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入侵者从未走出过他们的滩头阵地。格雷罗总统在剧院的包厢里看戏时，得知了西班牙最后一次入侵被摧毁的消息，他立即站起来，在一片掌声中宣布了这场胜利。就在四天前，他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与已经成为委内瑞拉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派斯一样，格雷罗领导了一场政治运动，其中曾参与独立运动的帕尔多老兵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

然而，墨西哥的保守派建制力量比委内瑞拉的更强大。19世纪20年代末自由主义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就是将数千名欧洲商人驱逐出墨西哥，它造成墨西哥家庭的分裂和商业的断裂。保守派很快做出了反应。格雷罗退回他在南方的根据地，一个新的政府在墨西哥城成立。这一政府的名义领袖是伊图尔维德时期最后的爱国者将军之一，其推动力是首席部长卢卡斯·阿拉曼，他崇拜西班牙，回忆新西班牙的“美好往昔”，并憎恨比森特·格雷罗。太平洋沿岸强硬的老兵奋起反抗保守派政府，这就是著名的“南方战争”，这场战争中南方基本上赢得了胜利。格雷罗的自由党重新获得了总统职位。但他们将不得不在没有格雷罗的情况下执政。1830年初，保守派政府绑架了格雷罗，在一位意大利船长的帮助下，他们邀请格雷罗

在船上共进晚餐，然后制服了他，并将他交到政府刽子手的手中，经过一场没有公开的审判后，他们将他送到了—一个隐蔽地点的行刑队面前。阿拉曼也因此再也没能完全摆脱过在这起背信弃义的暗杀事件中是共犯的污名。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洲正分裂为两股政治势力，通常简单地称为自由派和保守派。自由派一般代表美洲独立运动的意识形态遗产，如格雷罗，而保守派一般代表对这种遗产的反对力量，如阿拉曼。自由派首先是创新者。他们希望为新国家建立新的政府体系。他们往往是亲欧派——但倾向于法国或英国，从不倾向于西班牙。自由主义者认为西班牙政教合一的传统是欧洲中世纪的遗留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自由主义者主张将有效的公民权扩大到帕尔多人、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然而，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者将人民主权的主张，即自治的权利，扩展到省一级，通常要求在联邦制宪法下建立一个羸弱的中央政府。

阿拉曼等保守派则站在所有这些问题的对立面。他们不热衷于创新，只是表达对旧制度的怀念之情。阿拉曼在墨西哥历史上留下了印记，不仅是作为政府部长，而且主要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认为自己是西班牙遗产的守护者，并欣然担任了曾属于著名美洲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的庄园的管理人。19世纪30年代，他曾一度将科尔特斯的遗骨藏匿起来，以保护它们不被憎恶西班牙佬的自由主义者破坏。阿拉曼研究了西班牙君主制的历史，特别崇拜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这对骄傲的“天主教君主”就在他们启动哥伦布的著名航行时，在1492年完成了基督教对西班牙的重新征服。阿拉曼认为天主教会是西班牙传统政治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守主义自然地吸引了墨西哥的精英家庭，他们有那么多的资源和特权需要保护。但它也吸引了贫穷但虔诚的人们，他们对保守派对教会的维护作出了回应。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教会问题成为保守派在墨西哥获得国家权力的门票。

## 一个孩子成为巴西的国王

1831年4月7日，自由主义者迫使佩德罗一世退位，当时在凌晨时分，佩德罗一世的军队成员开始与一大群不受约束的臣民一起，要求对其政府进行人事变动。佩德罗愤怒地宣布，他将“为他的臣民做任何事情，但不会因为他们而做任何事情”，也就是说，决不因为他们强迫他，而做任何事情。<sup>[2]</sup>

有些消沉的佩德罗已经厌倦作为一个立宪制的君主。巴西在殖民地和帝国之间的连续性，使他控制了美洲独立初期最强大的国家机器。然而，自从他的王室拳头以惊人的方式击溃赤道联盟后，一连串的失误使这位冲动的君主在这些年里感到不愉快。像卡内卡修士这样的殉道者已经成为反对派的有力象征，并成为帝国声誉的污点。利奥波迪娜皇后的死是另一个污点。利奥波迪娜，大胆、聪明、适应能力强，在里约热内卢深受民众喜爱，人们普遍认为她的死是因为佩德罗对她进行了可耻的情感虐待。佩德罗让他著名的情妇成为利奥波迪娜皇后的侍女，并公开承认了他与情妇的私生女的父女关系，他还授予她一个贵族头衔。他也授予了这位情妇两个贵族头衔。里约热内卢的人民曾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19世纪20年代，佩德罗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的运气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从南部战区回到里约热内卢，参加利奥波迪娜的葬礼，当时她已经去世，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此输掉了战争。更糟糕的是，从德国带来作战的雇佣军在里约热内卢发生了兵变，使民众感到恐惧。1827年与英国签订的限制奴隶贸易的条约，在这个仍然受种植园农业驱动的国家，激化了与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对立。由于各种原因，巴西的经济陷入困境，通货膨胀激增。从对佩德罗的声望的负面影响来看，但最糟糕的是他一直在参与葡萄牙的

政治。佩德罗的父亲若昂六世，在回到里斯本几年后去世。佩德罗放弃了对葡萄牙王位的诉求，让位给了他7岁的合法女儿玛丽亚·达·格洛里亚（Maria da Glória），但当佩德罗的弟弟米格尔向她挑战时，佩德罗成为他女儿的主要支持者。这也使他不断地卷入了葡萄牙事务。

19世纪20年代，随着佩德罗的每一次失误，巴西的自由主义群体都因此获得新的追随者。自由主义者最受欢迎的议题是煽动人们反对继续占据巴西政府和军队职位的葡萄牙裔人士。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他们的独立事业与本地的混血人口象征性地联系起来，并将他们的敌人与葡萄牙对巴西的重新殖民化的“幽灵”联系起来。还有佩德罗，他周围都是葡萄牙出生的部长们，每天都更多地沉浸在葡萄牙的事务中，同时又表现出在治理巴西方面的无能。在19世纪20年代末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媒体中，巴西的自由主义者尤为突出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独立的最初几年里，巴西人终于接触到了新的政治思想，就像西班牙裔美洲人早先取得的那样。这一切的因素累积结果是在里约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导致佩德罗一世放弃了巴西帝国的王位，让位给他当时仅有五岁半的儿子，未来的佩德罗二世。佩德罗王子再次留在了里约，而他的父亲则乘船返回了葡萄牙。

在19世纪30年代，摄政者一直掌握着巴西君主的权力，直到王子成年。这位年轻的王子还有一位导师和个人监护人：正是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若泽·博尼法西奥在1831年4月7日的戏剧性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在法国流亡了6年，之后才被赦免并返回里约热内卢。尽管年近七旬的他可能是个独裁者，但这位傲慢但和蔼的老部长是巴西拥有的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他对佩德罗王子的监督是这个男孩真正接受优越教育的开始，这种教育将使他成为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统治者，完全不同于佩德罗一世。尽管如此，若泽·博尼法西奥一如既往地强势，与代表推翻佩德罗一世的自由主义力量的摄政者发生冲突，并很快回到了退休状态。

摄政时期是巴西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在没有废除君主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使国王服从于国民议会，并在巴西总体上分散和下放权力。然而，松开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的束缚，使巴西的地区主义力量得到了更自由的发挥。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连串的地区性起义震撼了巴西，从该国的亚马孙北部到其与新成立的乌拉圭共和国的南部边界。伯南布哥的自由派也再次起义。巴伊亚、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的自由派也是如此。一些分裂的共和国刚刚成立，或者威胁要成立。在里约热内卢，自由派改革者吸取了教训，改变了路线；一些人转而支持保守派。他们甚至允许佩德罗二世在1840年提前掌权，因为他们非常需要君主权力的稳定力量来对抗持续的地区叛乱。到1850年，权力的重新集中取得了成功。佩德罗二世将作为立宪制君主统治近40年之久。

### 一代人过去了

赢得独立的那一代人在独立到来后并没有长期执政。至少，对于主要领导人来说，是这样的。也有一些例外。何塞·安东尼奥·派斯（José Antonio Páez）已经成为委内瑞拉的大地主之一，他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一直是政治的推动者和影响者，到那时，所有其他伟大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都已经消失在舞台上。他有时拥护委内瑞拉绝大多数帕尔多人的事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主要目标是他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的胜利。在这一点上，派斯代表了被称为“考迪罗”（Caudillos）的粗鲁的战争领袖，他们在独立战争中出现，部分地填补了殖民统治退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考迪罗

们同时具有了军事和政治权力。在委内瑞拉，以及整个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在19世纪一直控制着一些地区和地方。有时，像派斯一样，他们会成为整个国家的总统。更多的时候，总统们拥有大学学位，就像弗朗西亚博士一样，他最终在1840年放弃了巴拉圭的总统职位——显然死亡是他曾打算放弃的唯一途径。

我们还应该讲完可怜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的故事，他在经历了漫长而屈辱的流放之后于1842年去世。奥希金斯的故事特别令人感动。他是一个憎恨贵族的改革者，真诚地想让智利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但他得罪了该国强大的既得利益者，行为独断。在智利长期处于反对状态的南部（讽刺的是，奥希金斯自己的家乡），康塞普西翁的一场起义，甚至在阿亚库乔之前就推翻了他。奥希金斯离开了智利，在秘鲁加入了玻利瓦尔，尽管他没有参与那里的军事行动。在玻利瓦尔取得最后的胜利并撤出秘鲁后，奥希金斯在智利仍然是不受欢迎的人，他的余生一直在流亡，时而居住在利马，时而居住在附近的一个乡村庄园，而与此同时，智利则成为美洲大陆最稳定和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对奥希金斯来说，幸运的是，对奥希金斯的记忆在他死后得到了恢复。他现在作为智利伟大的独立英雄出现，使哈维拉·卡雷拉的家族黯然失色。

阿蒂加斯和圣马丁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们都在流亡中死去，后来尸体被送回祖国。如今，他们都被安放在拉普拉塔河两岸的爱国主义公墓中。玻利瓦尔的雕像也存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几个这样的爱国主义公墓中。他的遗体最终被送回加拉加斯，现在安放在委内瑞拉的国家万神殿里。对玻利瓦尔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其他哥伦比亚独立英雄的崇拜，他们至少可以在故乡去世。安东尼奥·纳里尼奥早在1823年就去世了，在他的对手桑坦德的严密监视下，死在哥伦比亚高原自己的家中。1840年轮到桑坦德，他也是死于自己的家中，他曾在19世

纪30年代担任过哥伦比亚总统。尽管他与玻利瓦尔有过冲突，但桑坦德被公认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位开国元勋，是国父。

那么开国之国母呢？很少有女性出现在本书中，因为很少有女性出现在独立史中。在那些年里，女性很少承担那种能载入史册的公共角色。不过，还是有几个人的名字出现了。波丽卡帕·萨拉瓦雷耶塔（Policarpa Salavarrieta）和格特鲁迪丝·博卡内格拉（Gertrudis Bocanegra），当然没有后来的生活可以报道。关于莱奥娜·比卡里奥（Leona Vicario），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讲。她的丈夫安德烈斯·金塔纳·罗（Andrés Quintana Roo）很早就与伊图尔维德决裂，成为墨西哥共和国早期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处决格雷罗的那个无情政府在1831年也把金塔纳·罗俘虏了，囚禁了。幸运的是，比卡里奥通过在媒体上与卢卡斯·阿拉曼辩论，使金塔纳·罗的案件一直处于公众的视野中。比卡里奥最终于1842年去世。

然后是胡安娜·阿苏尔杜伊（Juana Azurduy），她训练了印第安人忠诚营，帮助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对抗西班牙统治，这里也最终成为玻利维亚。胡安娜、她的丈夫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帕迪利亚（Manuel Ascencio Padilla）和其他玻利维亚游击队在贝尔格拉诺撤退后继续战斗，但他们逐渐失去了阵地。胡安娜的四个孩子都在战争中丧生，曼努埃尔·阿森西奥也是如此牺牲的。西班牙人对杀死胡安娜的丈夫感到非常自豪，他们把他的头颅挂在长矛上展示，直到她的手下夺回头颅将其安葬。最后，胡安娜向南撤退到萨尔塔，在那里她生活在爱国者将军马丁·格梅斯（Martín Güemes）的保护之下。然而，在阿亚库乔之后，她又回到了她心爱的丘基萨卡，玻利瓦尔在那里看望了她，并为表彰她的爱国主义服务向她授予了一份养老金。此后，人们对她的关注也不多，多年来她的养老金也没有得到兑现。胡安娜·阿苏尔杜伊在82岁时孤独地去世，无人理睬、穷困潦倒。

玛丽基塔·桑切斯（Mariquita Sánchez）也活到了82岁，她的革命后生活与胡安娜·阿苏尔杜伊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玛丽基塔的第一任丈夫于1819年在结束对美国访问的外交任务返回途中去世。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法国外交官，她的余生都是以门德维尔夫人的身份度过的。玛丽基塔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外世界的迷恋是她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表现。当她的自由主义老朋友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Bernardino Rivadavia）在19世纪20年代领导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时，玛丽基塔帮助他建立了针对女孩的公共教育体系。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她定期住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自由主义者逃到那里，为了躲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罗萨斯独裁统治的迫害。在蒙得维的亚，玛丽基塔成为年轻的政治激进分子和流亡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类似教母的角色。当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50年代最终推翻并取代罗萨斯政权时，玛丽基塔在自由主义政权的公共仪式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在她60多岁的时候，她已经成为1810年5月革命的一个活的象征。

曼努埃拉·萨恩斯在秘鲁去世。为什么她没有在玻利瓦尔人生的最后旅程中陪伴他，这似乎是个谜。曼努埃拉最终被桑坦德赶出波哥大，在1833年离开哥伦比亚，但当时她不能回到她的家乡厄瓜多尔，因为玻利瓦尔的敌人控制了那里。因此，曼努埃拉在牙买加待了一年，最后在秘鲁海岸靠近厄瓜多尔的一个小镇派塔（Paita）住了下来。曼努埃拉的英国丈夫仍然住在利马，仍然希望她回去，但她拒绝前往。当厄瓜多尔政府最终允许她返回祖国时，她也没有回到她出生的城市基多。相反，在接下来的25年里，她在派塔安静地生活，靠制作和销售糖果、腰带和刺绣来维持生计。她与几个旧有的玻利瓦尔主义者保持着政治上的往来，她还用玻利瓦尔敌人的名字为她的狗取名，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玩笑。曼努埃拉在派塔接待了许多尊贵的客人，其中包括意大利民族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

（Giuseppe Garibaldi），他在巴西和乌拉圭为自由主义事业而战，沿着南美海岸航行，顺道来拜访她。

她的另一位访客一点也不引人注目。1850年左右，西蒙·罗德里格斯在派塔出现在曼努埃拉的家门前，他的金属框眼镜被推到了额头上，穿着一件似乎被驴子啃过的衬衫。这位玻利瓦尔的老导师在过去的25年里，从智利南部的康塞普西翁到厄瓜多尔的一个叫拉塔昆加（Latacunga）的小镇，一直在安第斯山脉漫游，与一连串的印第安妇女成家，在不同的地方开办蜡烛厂，为玻利瓦尔的声誉写下慷慨激昂的辩护词，并到处创办小学，这些小学在他继续旅行后不久就关闭了。罗德里格斯这时已经70多岁了，早在1825—1826年，他只担任过几年玻利维亚的第一任公共教学主任和监察长。这位激进的教育家试图在同一个教室里教育男孩和女孩、富人和穷人、白人和印第安人，这对于玻利维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同样不能接受的还有他的观念，即所有的学生，甚至是富裕的学生，都应该学习实用的技能，如木工和编织，或者认为盖丘亚语比拉丁语更适合作为第二语言。罗德里格斯竭力不想与任何人为敌，他也没有得到总统苏克雷的支持。在一种纯粹的罗德里格斯的姿态中，这位心怀不满的，即将成为前公共教学主任和监察长的人，邀请苏克雷和丘基萨卡的其他知名人士参加宴会，并将他们的食物装在便壶中（当时被称为“夜壶”的陶瓷容器）中，以示他的“敬意”。然后他辞职了，离开玻利维亚，途经秘鲁，到智利逗留。

在智利时，罗德里格斯会见了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他曾在1810年陪同玻利瓦尔出访伦敦，并留在那里，再未返回加拉加斯。到19世纪30年代，当罗德里格斯访问他时，贝略已经进入智利的外交部门工作，然后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的国立大学，成为美洲的主要文学家。罗德里格斯的夜壶故事让学究气的贝略笑到喘不过气来。他同意罗德

里格斯关于教育重要性的观点，但贝略的兴趣是高等教育——培养知识精英——而罗德里格斯则希望改造和增强普通人的能力。

罗德里格斯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使美洲沉浸在等级制度中。种族阶级制度、印第安人的强制劳役和非洲奴隶制是一个社会形成过程中可能拥有的最糟糕的经历。一场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少数人进行的政治革命结束了殖民化，但它并没有消除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奴役和剥削，以及不可避免的无知和贫穷。例如，奴隶制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才逐渐从新兴的共和国中消失。（奴隶制在巴西以及彼时仍然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存在的时间更长。）在这种有毒的遗产被消除之前，政治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不会是真正的共和国，因为它们不会真正体现一个自由、开明的人民的主权。这位疯狂的天才设计了一个普及公共初等教育的计划，他向任何愿意听的人急切而详尽地描述了这个计划。他还写了关于这个计划的文章，并自费出版了他的文章，这些文章密密麻麻，几乎无法阅读，他后来看到这些印有文章的小册子被用来在市场上包蔬菜。但他始终坚持不懈，从未因他的努力而获得物质上的充裕。他怎么可以这样呢？他曾宣称，从教育中赚钱是可以想象的最卑鄙的事情。

但公共教育需要钱，好的公共教育需要很多钱。据称，玻利瓦尔创建了一个1500万比索的捐赠基金，用于在玻利维亚建立公共教育体系，之后，根据这些计划，罗德里格斯将跟随玻利瓦尔到哥伦比亚，在那里建立一个公共学校系统。然而，这一切都仅仅在讨论的阶段。许多自由主义者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公共教育计划，甚至一些保守派，如阿拉曼，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总体上，他们对兰开斯特体系（“人人为师”）表示出兴趣，在这个体系中，优秀的学生教其他学生，直到其他人达到自己的水平。兰开斯特体系在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师的国家有明显的优势，但它鼓励一种死记硬背的做法，这让罗德里格斯很生气：这不是卢梭所想的。然而，最终，

教育学理论的作用并不重要。在新独立的美洲，初等教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稀缺性。公共初等教育是弱小的、资源不足的政府的一个低优先事项，这些政府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而且几乎全部是社会精英组成的，而这些精英的子女已经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我们不知道西蒙·罗德里格斯在1840年左右到曼努埃拉·萨恩斯位于派塔的沙土房子里拜访她时说了些什么，毫无疑问，他们谈到了玻利瓦尔。罗德里格斯总是带着玻利瓦尔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他似乎拒绝承认，他的杰出学生是多么缺乏深厚的民主感情。几年后，一位前往的喀喀湖的法国旅行者发现了一位老人，听他讲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以为这位老师是自己的同胞。这位老人与一位印第安妇女生活在非常简陋的环境中，正在制作蜡烛。那当然是罗德里格斯，他最终在秘鲁去世，至死仍是一名教师和改革者。今天，他的遗体安放在委内瑞拉国家万神殿中，靠近玻利瓦尔。至于曼努埃拉，她只比她的老友多活了几年，于1859年去世。她最后被埋葬在一个普通的坟墓里，现在已经不知所终。曼努埃拉一直保存在棺材里的玻利瓦尔的信件被烧掉了，显然是和她家里其他可怜的家具一起被烧掉了，因为白喉流行病使她丧生，为防止疾病传播而不得不焚烧掉她的物件。

亚历山大·冯·洪堡与曼努埃拉·萨恩斯同年去世。他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一部名为《宇宙》的自然科学综合概述的著作，但作为普鲁士政府的一名官员，他越来越专注于国家事务。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话题转向美洲时，年长的洪堡似乎最关心的是他想看到的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和电报线路，或他想看到的是按照他半个世纪前绘制的路线修建的运河。在19世纪中期，欧洲的扩张能量创造了一个全球帝国主义的新时代。英国主宰了美洲的国际贸易，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主宰了古巴和墨西哥以南的地区，这些地区被吸引到美国的商业轨道上。法国人在美洲政治霸权的竞争中屈居亚军，开始普及“拉丁美洲”这个新名称，以争取与该地区的文化亲缘

关系——因为法语，像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一样，源于拉丁语。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洪堡似乎对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持悲观态度，因为这些政府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并且证明无法开发洪堡在数千页的出版物中列举和调查的自然资源。尽管他保持了对奴隶制的一贯反对，但这并不足以使洪堡收回他对美国在19世纪40年代侵略墨西哥的本能认可，这为美国南部奴隶制的扩张铺平了道路。洪堡私下里赞同美国获得墨西哥一半的领土主张——这是一种手段，是胜利的北方共和国用以补偿自己征服南方的姐妹共和国所付出的代价和麻烦。他似乎已经接受了美国的“天定命运”的论调，即以牺牲“竞争力较弱的种族”为代价，让讲英语的人在大陆扩张。那个在1799年登陆库马纳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变成了什么样？到19世纪40年代，洪堡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帝国主义者，这至少部分表明他对拉丁美洲独立斗争的结果感到失望。在这里，洪堡不再是一个好的向导，除非作为他那个时代的普遍想法的一个标志。毕竟，他仍然是欧洲研究美洲的伟大专家，探险家、科学家、企业家、怪才和国家元首都在向他进行大量的咨询。

在去世前几周，洪堡在几家德国报纸上贴出通知，不再接收任何新闻、咨询或征求他意见的邮件；同时，也不再通过包裹邮寄任何未经允许的标本。作为洪堡，他提供了丰富的支持性数据。在19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有1600封到2000封信件和包裹寄到他家，而这些都是不拆封就可以随意丢弃的垃圾信件。洪堡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幸运的是，他在晚年表现出的帝国主义情绪从未广为人知，这对他在美洲的声誉是个好事。

## 注释

[1] Gerhard Masur, *Simon Bolivar*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69), 484.

[2] Roderick J. Barman, *Brazil: The Forging of a Nation, 1798—18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9.

## 后记：遗产经久不衰

1859年听说洪堡去世后，墨西哥总统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计划为他竖立一座雕像。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对墨西哥的干预迫使华雷斯在委托制作铜像之前就下台了。法国的干预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一个墨西哥帝国的宝座，并将一位奥地利大公置于其上。这是欧洲在19世纪中期对拉丁美洲进行的几次引人注目的干预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以牺牲墨西哥为代价，在军事上扩张自己的领土。同时，拉丁美洲的港口充斥着英国、法国和美国商船的桅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商业入侵。鉴于这一切，不少观察家都说，实际上是在套用甘地关于西方文明的调侃：“拉美独立？这将是一个好主意！”

而且，霸权国家不仅是经常从外部侵犯主权。由于代表根深蒂固的统治阶级利益的专制政府，主权人民往往无法在国内行使其公民权。现在是对美洲的独立斗争进行全面评估的时候了。首先，他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很快形成稳定的民族国家，并拥有自由的制度来促进经济发展。这似乎是洪堡的失望之处。鉴于后来世界各地的经验，这样的批评似乎是短视的，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许多人同意这样的批评，显然包括西蒙·罗德里格斯。

早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位玻利瓦尔的老导师关注的与其说是外界的干涉，不如说是美洲独立未能在社会和经济上改变美洲。社会和经济

革命往往需要伴随着政治革命，但它并没有。在19世纪中叶，当罗德里格斯对曼努埃拉·萨恩斯进行告别访问时，他看到他周围的安第斯共和国中，很少发生他认为能使自由主义共和国发挥作用的那种社会和经济转型。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玛丽基塔·桑切斯·德·门德维尔（Mariquita Sánchez de Mendeville）持更乐观的看法。在她去世前不久，有人请她写一本关于她早年生活的回忆录，她描述了将美洲殖民地与西班牙捆绑在一起的“三条锁链”：“恐怖、无知和天主教。”<sup>[1]</sup>她所说的恐怖是指一个没有民众支持的政府，它通过暴力行动强加自己的意志，例如在18世纪80年代，图帕克·阿马鲁被四匹马车裂处决，场面极其恐怖。她回忆起殖民地的父母因担心女孩会与恋人秘密通信，而拒绝教育女孩的情况，以此来解释无知。最后，所有这些都带有宗教上的理由，宗教裁判所的禁书清单就是例证。1810年5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的革命打破了这三个枷锁，至少在门德维尔夫人看来是如此，她毕竟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严格说来，在正式的政治体制方面，确实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一种积极的转变。

这两位老革命家都有自己的道理。20世纪仍然需要社会和经济革命。这一看法最终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拉丁美洲独立后，强大的外来者还会偶尔侵犯其主权。后殖民或准殖民或新殖民的关系仍然存在，但对美洲的直接殖民统治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明确结束了。此外，各地都建立了自由的政治机制，包括选举、代议制立法机构、有限任期的总统，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甚至巴西帝国也是一个严格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无可否认，有些成果是虚幻的：许多自由主义机制在19世纪的时候运作不畅。

谁会感到惊讶呢？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一开始就不是自由主义的革命。1808年，人们对“被绑架的”费尔南多七世几乎一致表示了忠诚，此后，少数共和主义思想家不得不戴上“费尔南多的面具”，这毫无疑问地表明，

共和国在斗争的最初几年缺乏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些年里，随着印刷厂生产出数以百计的政治宣传册和新闻报纸，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迅速传播，但在十分之九是文盲的社会里，印刷革命遇到了固有的限制。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层之所以选择共和制，并不是因为共和主义在国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是因为共和主义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哲学激发了他们的异见（或至少帮助他们证明了其合理性），而美国宪法提供了一个备受模仿的范式。当建立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在没有适合君主立宪制的君主的情况下，大多数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认为，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立法机构组成的共和国是进步的现代人的唯一选择。但他们是在自欺欺人。

总的来说，在独立之后，美洲并不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大多数人似乎对政治秩序保持着非常传统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1822年，墨西哥和巴西这两个最大的国家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众热潮，他们热衷于拥护戴王冠的国王登基。特别是印第安村民和乡村人口，表现出强烈的保守倾向，大庄园主也是如此，他们在各地都支配着乡村。大多数美洲人仍然按照社会规则组织他们的生活，这些规则变化缓慢。他们认为宗教真理是不可挑战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世界的自然规律。

共和制模式中固有的平等公民权的新政治理想，与殖民地时期对等级和权威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大量被奴役的印第安“公民”使这些社会与年轻的美国不同，在美国，大多数印第安人和有色人种被轻易地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玻利瓦尔和其他许多人认为，西班牙的暴政禁止普通人自治，从而剥夺了他们接受公民教育的机会。共和制模式意味着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殖民统治中，宪法、选举和立法会议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与美国的殖民经历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宪章、选举和议会一直是规范、是常态。美国宪法和它建立的机构是相对本土化

的。它们源于英国殖民者的历史经验。相比之下，美洲的新共和主义宪法似乎有点像相对哥伦比亚或智利本土的外来物种——确实与人民的历史经验相距甚远。学习新的程序只需要一点时间，但赋予它们令人敬畏的权威却需要很长的时间。美洲的“虚幻的共和国”如果脱离了当地的实际情况，显然不会有好的效果。

在这方面，帝国时期的巴西与早期的西班牙语美洲共和国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比。简而言之，巴西更保守的政治体制与殖民时期的不平等和剥削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它的君主立宪制比西班牙语美洲共和国更稳定，但也更坦率地实行等级制度。因此，巴西遭受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之间的不匹配的影响较小，而阿拉曼在墨西哥的情况则令人担忧。当墨西哥在19世纪中期从一场内战走向另一场内战时，巴西这个由前葡萄牙殖民地组成的庞大的体系保持得非常好，其出口产量逐年增加。帝国时期的巴西保留并增加了其有头衔的贵族，奴隶制在从西班牙语美洲共和国中消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推动巴西种植园的生产。

有凝聚力、有包容性的国家，是人民主权和共和政府的基础，这一基础在独立宣言响彻整个西半球之后的一个世纪才建立起来。身份政治，即美洲人的美洲，使独立成为可能，但身份政治很快成为障碍。一旦每个人都成为美洲人，那么成为美洲人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作为墨西哥人、危地马拉人、哥伦比亚人、秘鲁人、玻利维亚人、智利人、巴拉圭人或阿根廷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没有什么相对的意义了。新的国家缺乏国家认同。谁真正属于这个国家？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参与虽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对精英阶层来说仍然是个问题。渐渐地，艺术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会在与听众的对话中，精心设计出可行的国家身份。共同的经验将凝结在国家叙事中，这些叙事最终以种族混合作为独特的民族性的起源。然而，这一过程在1825年才刚刚开始。事实上，他们用了两代人的时间，都没有获得发展前

进的动力。在 21 世纪，世界各地的潜在国家建设者和国家决策者都应该将这一教训铭记在心，这个教训在拉丁美洲的经验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另一个教训是：尽管建立真正体现人民主权的包容性国家和政治机构有很多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济于事。人民主权既不是启蒙运动的独特概念，也不是法国的特有概念。毫无疑问，法国的版本在美洲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因为它与人们头脑中已经存在的信念相匹配。毕竟，1810 年的美洲洪达建立的基础是君主制下的传统自治诉求，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美洲是王室的另一个独立支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即使是圣马丁和若泽·博尼法西奥这样坚定不移的君主主义者也对这个想法做出了回应。参加加的斯议会的美洲人代表也对它做出了回应。伊达尔戈、莫雷洛斯和格雷罗支持这一观点；玻利瓦尔、派斯和皮亚尔、贝尔格拉诺和奥希金斯、阿蒂加斯和阿苏尔杜伊也支持这一观点，甚至伊图尔维德和佩德罗一世也支持。如今，似乎已经很明显了，美洲的普通人，不论是来自寒冷的山区，还是蒸腾的低地，男人和女人，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工匠和农民，也都对人民主权的概念做出了回应。自决是独立的最基本承诺，是永远无法收回的承诺。

看到这一点，该地区后来的历史就更容易理解了。在 19 世纪，自由主义制度往往被认为是虚构的，特别是在外人看来，但美洲人却奇怪地下定决心要维持这种制度。众所周知，独裁者经常对选举结果进行操控，但为什么他们仍然从未忽视举行这些选举？为什么人们经常会违反宪法，但从未忽视这一根本大法，宪法经常被废除，但总是会被重新确立？为什么自由主义共和体制在理论上得以维持，而在实践中却被削弱？事实上，虽然自由主义共和制度长期被破坏，但这种顽强的韧性是其具有重要性的有力证据。简而言之，选举和宪法象征着人民的同意。它们是人民主权不可或缺的象征，即使它们未能提供人民主权的实质内容。

人民主权的承诺并没有帮助战后的美洲人解决许多自治的实际问题。战时以“主权人民的声音”为口号的言辞暗示了从未真正存在过意见的一致性。与战时的言论不同，实际的治理需要更精确地界定主权人民。谁应该是有投票权的公民？保守派说，“有美德、有洞察力、有财产、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父辈，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如果莫雷洛斯还活着，他会说：“任何美洲人。”但很明显，即使是莫雷洛斯也不会建议女性参与投票。人民主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主题，它已经成为有争议的空间和冲突的来源。

因此，拉丁美洲争取独立斗争的巨大贡献就是确立了非殖民化世界的主权，不是作为一种运作的现实，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愿望，一种西方政治文化的基本原则。拖延成为一种标准策略，那些无法否认该原则，但又不希望承担实施该原则的后果的人往往采用推迟实行人民主权的战术。因此，在19世纪末，佩德罗二世对巴西需要一位皇帝的这一事实公开表示遗憾，并希望有一天巴西不再需要。当时统治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以类似的、可能是真诚的借口为他对选举结果的管理操作辩护。最终领导了统一的阿根廷的胡里奥·罗卡（Julio Roca）将军和拉丁美洲的专制领导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哀叹说，更多的民主制度是可取的，但必须推迟。老百姓“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制度。

推迟实行也是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口头禅，他们谈到了“白人的负担”——有责任训练世界上幼稚的非欧洲人口，他们不可否认地应该有自决权，但还没有准备好行使它。当美国在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时，推迟实行人民主权的做法为其较为有限的帝国主义冒险提供了理由。在1900年左右，许多提议推迟实行真正的人民主权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认为非欧洲人可能永远达不到实行的标准。但是，如果他们尊重现代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他们可以将推迟实行人民主权的做法合理

化，认为这只是一段善意的临时监护期。到 1945 年，人民主权在美洲的确立使其成为全球非殖民化的首要原则，当时这一进程在非洲和亚洲进入了全面实行的最后阶段。

今天，美洲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分界线上显得有些模糊不清。美洲人在语言、宗教、物质文化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绝大多数是属于西方的。大多数美洲人并不是纯粹的欧洲人后裔，他们的社会也不完全是由欧洲传统塑造的，但是如今，拉丁美洲引人注目的多种族国家是世界上最持久的自由主义共和国之一。使这些国家成为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共和国，使每个人都获得公民权的全部好处，这是一场持续的战斗，而且远未结束。美洲人在追求自由主义理想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条陡峭而崎岖的道路。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构成了西方政治价值观在全球扩张的关键一步，既显示了这些价值观的革命潜力，也显示了它们被引入不同传统的社会时带来的挑战。该地区的宪法框架经常遭到破坏，但总是顽强地重新建立起来。在美洲，自由主义开始时可能是一种外来的物种，但它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 注释

[1] María Sáenz Quesada, *Mariquita Sánchez: Vida política y sentimental*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1995), 14.

## **Americanos: Latin Americ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By John Charles Chasteen

© John Charles Chasteen 2009

Americanos: Latin Americ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9.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 part )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Chinese ( Simplified Characters ) Trade Paperback.  
© 2024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ALL RIGHTS RESERVED**